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

東瀛視域：  
日本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研究

指導教授：林香伶  
研 究 生：施柔妤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施柔好 君所撰寫之論文

東瀛視域：日本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

邱毓瑜

高嘉議

林唐侗

指導教授：

林唐侗

系主任：

阮美慧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6 日

## 謝誌

在大肚山上待了近十個寒暑，有多少的日子都從往山上的公車作為起始。從高中時代的校車，五都合併前的 86、88、106、146，其後的 BRT 或者優化公車。公車的號碼變了，中港路改成台灣大道，路的終點仍是山裡的大學。我多麼希望通學路上能有其他選擇，卻仍為離別的時刻不捨。

長時間的通學，公車總是在耳機的樂聲晃蕩中駛出市區，那些曲子總是能留住某些片刻。サヨンの鐘是雨景；武滿徹的黑雨是搞砸某事的午後；THE BLUE HEARTS 大概意味著特別沮喪的日子。曲目回環，如同琥珀裡的昆蟲，保存了那些與大肚山相連的悲喜，我也到了日子滿足，該下山的時刻。

一路走來有太多的感謝，必須先感謝造化的厚愛，讓我遇見太多的美好。謝謝香伶老師讓怪怪的我能夠適性發展。謝謝鄭毓瑜老師、高嘉謙老師願意閱讀我的論文，不吝給我建議，讓口考成為一個平安喜樂的過程。

謝謝我的朋友。教我做電子資料庫的惠芳同學，紀念那些每週四熬夜寫報告的日子；數字概念比我好很多很多，老是笑嘻嘻的若瑜，讓系圖、研究室各項事務都能在愉快的氣氛下推進；一起參加讀書會的怡秀、鴻祐、辰硯；在書寫的過程中教我查找書目的子靖；在最後關頭罩我英文的羿晴。謝謝這些小夥伴，在課業上給我許多的刺激，也讓我知道學習的路上永不孤獨。

謝謝家人的陪伴。特別感謝家母，在我焦慮的時候，總會帶我到咖啡館轉移陣地轉換心情，有多少的詰屈的文獻都是在這樣的時空裡讀完；謝謝舅舅們成為我永遠的榜樣；謝謝阿嬤跟在天上的阿公，總是以無比的熱情關注我的課業。

願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2017 年 7 月

## 摘要

日本明治時期（1868-1912）《支那文學史》的書寫蔚然成風，當時的日本學者以西洋文學史觀重新審視漢籍，並在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對「文學」的定義進行擴展，繼而影響日後中國學者《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本文即以《支那文學史》作為研究主題，除去緒論與結論後，共分四章，分層次探討明治《支那文學史》的成書背景與著作內容，要點如下：

其一，藉由考察明治時期的時代背景，理解以西學為尚的明治時期，是如何藉由法規、教育制度、官方與民間的提倡，造成漢學復興的背景，產生關注中國古典文獻的《支那文學史》研究風氣。

其二，分別選定笹川臨風（1870-1949）、古城貞吉（1866-1949）兩位文學史作者，以其人生平、著作、交友圈為軸心，探討兩位性格與背景相異的文學史作者，如何寫成極具對比性的《支那文學史》著作。

其三，比較兩部《支那文學史》的異同，就文學家的敘寫角度及選錄作品等差異，考察兩位文學史作者分別關注的議題，並由文體選擇與時代範圍的設定中，理解其中反映的明治時代共性。

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是奠定文學史體例，擴展文學定義的重要研究成果，本論文藉由考察此類著作，以釐清早期文學史書寫的種種現象。

關鍵詞：笹川臨風 古城貞吉 明治 支那文學史 文學史

# Abstract

In Meiji Period of Japa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came a trend. Japanese scholars in this period started to re-ex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expanded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se influenced Chinese scholars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The article choos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research topic. Apart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4 chapters, discussing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eiji Period hierarchically. The three main points of the article are as follow:

First, by investigating Meiji Period’ s time background, which honored western literature, I tried to find out how Meiji Period caused the revival of sinology through relying on regulations, education system, official and civil advocacy. Moreover, this period began to concern and mak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econd, I select Rinpuu Sasakawa ( 1870-1949 ) and Teikichi Kojou ( 1866-1949 ) these two history of literature’ s authors as my research topic. I focused on their live, writings and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In order to inquire into how these writers, who had different background, wrote out extremely contras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rd, to figure ou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iji Period that reflected in their works, I compared tw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de comparison and contract of two different china literature. Moreover, I surveyed the issues they had concerned, the style they had chosen, and time range of the setti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eiji Period established the style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they are critical results which expand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larify all kinds of phenomena that appeared in early writings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words: Rinpuu Sasakawa, Teikichi Kojou, Meiji Perio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一、梳理《支那文學史》對中國文學史的影響 .....	1
二、日本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仿效與受限 .....	4
三、確立支那文學史的研究價值 .....	7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步驟 .....	9
一、版本選擇 .....	9
二、本論文的「明治」概念 .....	14
三、「支那」釋名與「支那」在近代文獻的使用概況 .....	15
四、研究步驟 .....	18
第三節 文獻探討 .....	20
一、相對弱勢：《支那文學史》的論述 .....	20
二、豐富：以日文撰著的文學史論著 .....	21
三、貧瘠：以中文撰著的文學史論著 .....	26
第二章 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書寫背景 .....	29
第一節 西學為尚的明治時風 .....	29
一、漢學的衰退 .....	31
二、文明開化的反思 .....	36
第二節 法律、教育制度的改革 .....	43
一、學科學制的洋風西法 .....	43
二、教育法規的保守化 .....	48
三、道德修身的提倡 .....	52
四、斯文會的活動 .....	54
第三節 古典講習科的成立 .....	55
一、學科體制的創設 .....	56
二、漢學人才的培育 .....	60
第三章 優游文人：笹川臨風其人及其著作 .....	65
第一節 笹川臨風其人及其交遊 .....	67
一、生平概述 .....	68
二、「江戶趣味」與笹川臨風 .....	69

	三、交友圈中的《支那文學史》作者	72
第二節	《支那文學大綱》的編纂	74
	一、笹川戲曲小說類著作及其他	74
	二、《支那文學大綱》編輯中脫穎而出	76
第三節	作為文學史前身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	81
	一、從《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到《支那文學史》	81
	二、舉措：將戲曲小說列入文學之林	88
第四節	《支那文學史》的篇章體例	98
	一、編纂體例的承襲	98
	二、成書過程與編排	100
	三、體現「南北人種說」的書寫策略	102
第四章	憂時儒者：古城貞吉其人及其《支那文學史》	111
第一節	古城貞吉生平概述	112
	一、年幼生涯，漢學啟蒙	112
	二、赴中遊歷，任職報館	114
	三、返日任教，以學名世	119
	四、愛書成癖，坦堂文庫	121
第二節	《支那文學史》版本差異之比較	124
	一、訓點移除	124
	二、文字之學	127
	三、戲曲小說	129
	四、初版與再版差異之成因	131
第三節	《支那文學史》的時代議題，以序文為線索的解讀	134
	一、漢字廢止論	134
	二、藉中國理解本邦	137
第四節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的文學史觀	141
	一、中日文明論	141
	二、推崇中國儒學	145
第五章	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之比較	149
第一節	上古時期（?-B.C206）	150
	一、《尚書》上古史書與開化之源	152
	二、《詩經》情感的流露與治亂的反應	157
	三、儒家本位與南北人種說	159
第二節	中古時期（B.C206-A.D618）	165

一、漢代：《史記》兼容南北的史書，寄寓針砭的憂憤之作	167
二、魏晉南北朝：清談，佛道風氣的反應與醉生夢死的避世	169
三、陶潛：建安風骨的延續與道德的高峰	173
第三節 近古時期（618-1644）	177
一、唐代：以李杜優劣論為中心的探討	179
二、宋代：詞作缺席的文學史	186
三、金元：時代創制戲曲小說	191
四、明代：詩人代表高青邱	194
第四節 近世時期（1644-1814）	198
一、清代：詩名或醜名，錢謙益評價之異論	198
二、停滯於盛清的詩作選評	203
三、小結	206
第六章 結論	209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檢討	209
第二節 未來研究展望	213
參考書目	215
附錄	219

# 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以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為研究主題，對《支那文學史》書寫背景進行探究，並選取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兩部文學史進行深度研究與比較。本論文共計六章，本章為緒論，論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步驟，以及文獻探討，期能藉由前人研究成果之回顧，以釐清日本《支那文學史》書寫對於中國之重要性，說明《支那文學史》之研究價值。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梳理《支那文學史》對中國文學史的影響

中國文學史作為中文系的必修課程行之有年<sup>1</sup>，中國文學史著作亦有諸多版本。考察中國最初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即是作為教科書而寫成，黃人(1866-1913)、林傳甲(1877-1922) 等人之《中國文學史》皆然。1904年任職於東吳大學的黃人，寫下《中國文學史》，作為授課的講義，同年任職於京師大學堂的林傳甲，亦有《中國文學史》的成書<sup>2</sup>。兩作為中國最早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兩部文學史皆試圖以西方文學史概念，審視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但在體例與收錄內容上，兩者差異甚鉅，反映初期的文學史著作現象，當時文學的定義尚具有不確定性，從中可見不同的作者對文學的定義，有其各自的的界定。

黃人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為中國人所著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但若回溯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其實並非由中國人取得先聲，早在明治時期(1868-1912)的日本，即有學者進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1882年，日本末松謙澄(1855-1920)

---

<sup>1</sup>有關於中國文學史列為大學課程的始末，可見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一書。

<sup>2</sup>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1。

即有《支那古學略史》，是為最早的中國文學史著作<sup>3</sup>，至 1892 年兒島獻吉郎(1866-1931)《支那文學史》問世，為第一部以中國文學為研究內容的文學史。日本學者所著之《支那文學史》，在時間上早於中國人的著作，對於中國人書寫中國文學史亦產生極大的影響，無論是在文學定義的界定，或是體例內容上，《中國文學史》中可見受日人《支那文學史》影響的痕跡，而林傳甲、黃人的著作中，亦能看到對於日本學者《支那文學史》的評論。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自序有「傳甲斯編，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sup>4</sup>之語，可見林傳甲以笹川臨風(種郎)文學史為發想，遂有文學史成書。黃人《中國文學史》中收錄戲曲小說，將此長期受到輕忽的文體列入文學的範疇，被後世研究者評為足以與王國維並稱的中國戲曲研究先聲<sup>5</sup>。實際上，早在 1898 年，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就已收錄戲曲小說，言：「支那文學之特色即在此處。」<sup>6</sup>對戲曲小說有極高的評價，將之視為中國文學中最可觀者。由是觀之，無論是文學史成書的發想，或是內容上文類的選擇，皆可見中國文學史受日人支那文學史影響。

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書寫蔚然成風，就後人統計約有二十種支那文學史著作發行<sup>7</sup>，日本接受中國文學的陶冶，卻在明治時期早於中國進行文學史的書寫，是十分耐人尋味的現象，若進一步檢視日本漢學的發展歷程，可知日本始終是以中國為效法對象，學術風氣的發展晚於中國。如同漢學者安井小太郎(1858-1938)所言：「本邦經術盛衰，與漢土同其撤，而每後於彼或百年或二百年。」<sup>8</sup>唯獨於《支那文學史》的成書時間，日本領先於中國，成為中國人撰寫文學史的效法對

---

<sup>3</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 期，2013 年 4 月，頁 31。

<sup>4</sup>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初版於 1904 年，今據（台北：學海出版社，1999 年），頁 1。

<sup>5</sup>黃人：《中國文學史》初版於 1904 年，今據（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6。

<sup>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 年），頁 259。

<sup>7</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 期，2013 年 4 月，頁 31。

<sup>8</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台北：學生書局，2002 年），頁 108。

象。故本論文先行概述日本漢學始終不脫中國影響的歷史回溯，以釐清日人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背景。

自唐（618-907）以來，中國作為東亞文化圈的核心，影響鄰國。中國強盛的政治背景，使得漢文成為東亞文化圈共通的書面語言行之有年，以中國為發源的儒家思想以及中國制度典籍，亦成為鄰國仿效的對象。受中國影響所及的國家包括：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卻以漢語為共同的書面語，成為國家政治與歷史文獻的載體。在東亞文化圈內的各國中，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接受起源甚早，據《古事記》、《日本書紀》的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285），百濟博士王仁來朝，獻上《論語》、《千字文》，是漢籍傳入的最早記錄<sup>9</sup>。日本對中國典章制度的效法，則可溯至隋代，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即派遣小野妹子、吉士雄、鞍作福利為第一批的遣隋使至中國<sup>10</sup>。此時以漢字為基礎，日本創造假名文字，至此漢字與假名成為日本的書寫載體兩相並用。也因此漢字的使用情形，使得口語與書面語之間有所割裂，形成日後漢學研究的某些傾向，亦為日後日本民族主義興起的潛在因素<sup>11</sup>。

根據六世紀、七世紀的中日交流記載得知，當時日本對於中國文化的吸收是全面性的，藉由仿效中國建立統一的律令國家，西元 701 年頒行的《大寶令》即是受唐代《六典》所影響的法令，《大寶令》中以天皇教化所及之處，將世界分為化外、化內，顯現當時受到中國華夷觀念思想影響的痕跡。由此可見日本取法中國的進路，先從制度入手再深入思想層面，日本則藉由中國傳來的外來語言文字與文化，建構自己的文化內蘊，無論是有形的文獻典籍與無形的思想，透過對中國文化各層面的浸潤，產生與中國難以分割的現象，奠定日本漢學發展的基礎。自聖德太子（604）訂定的《憲法十七條》，以漢文書寫引用中國典籍起始，直至今日，漢字仍被保留於日文的書寫系統中，與其他越南、韓國等國家於文字上廢

<sup>9</sup>倉石武四郎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

<sup>10</sup>倉石武四郎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頁2。

<sup>11</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53。

除漢字的情形極為不同。

## 二、日本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仿效與受限

追溯日本漢學受中國的影響，可知明治日本的漢學家對《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成果是極具開創性的，無論是在「文學」的定義，與視為中國文學的各類文體界定上皆早於中國，在內容與成書的體例，更影響日後由中國學者所主導的中國文學史編纂。長久以來，日本於文化的各層面，深受中國影響，中國文學更是影響日本甚鉅。中日兩國以漢字為共通的文化基礎，日本人長期留意中國文學的動向，是以在文學的發展上，日本長期處於中國文化的影響。

檢視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深度接受，卻發現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領先於中國。觀察日本論文學受中國影響的狀況，可追溯其長遠的歷史進程：王朝時代（794-1192）貴族階層對於白居易詩的喜愛，五山時代（1336-1573）隨著禪林文學的興盛，對宋詩的取法，至江戶時代（1603-1868），有護園學派對明詩的鼓吹，及江戶後期宗宋詩風的回歸<sup>12</sup>。在各個時代中，皆顯現日本對於中國文壇的關注，在經術與詩文上皆不脫中國的影響。日本對中國的取法，並不止於作品的欣賞，日人費盡功夫模仿文學體裁，江戶詩話的空前盛況是為例證<sup>13</sup>。當時產生大量以漢文書寫的詩話，內容是承襲中國詩話的形式，品評中國、日本之詩作，各派學人因論點異同相互攻訐，對於取法唐詩、宋詩、明詩有激烈論爭。無論是詩話體例的學習，或者在內容品評上以中國詩作為中心，皆顯現日本漢文學的發展，始終圍繞對中國的關注。

對各朝各家的詩風進行模仿，亦可知日本漢文學未能脫離中國的影響，並且在對中國的取法，常顯現延遲性，例如明代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在日本江戶時期，為荻生徂徠（1666-1728）為首的護園學派承襲，以至於「家有滄溟之集，人

<sup>12</sup>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中）》（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11。

<sup>13</sup>馬哥東編：《日本詩話二十種（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6。

抱弇州之書。」<sup>14</sup>的盛況。若將荻生徂徠的生卒年與明代擬古派的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11）並列檢視，可知日本漢學在對中國詩文風氣的追隨上，始終有時間上的落差。此現象亦為日本學者所察覺，活躍於明治時期的漢學者安井小太郎（1858-1938）嘗言：「本邦經術盛衰，與漢土同其轍，而每後於彼或百年或二百年。雖豪傑之士而不能免也。」<sup>15</sup>一說，即是對漢學受制於中國的回顧。

日本漢學之所以處於被動性的地位，可以漢字作為書寫載體探討。漢文對日本而言終究為異國語言，在學習時須由訓點以通曉文義。若回顧各類日本漢文著作，可見以探討聲律為重心者具有相當數量，特別是在江戶時期的詩話中，亦有一類專為討論漢詩文聲律而作，未諳華音是此類著作興盛之由<sup>16</sup>。直至晚清中日交流頻繁之際，不諳華音以筆談交流的狀況，常見當時文人紀錄。比如竹添井々（井井）（1842-1917）《棧雲峽雨日記》、岡鹿門（1833-1914）《觀光遊草》等書，皆以漢文寫成，描述明治時期至中國遊歷的經驗，這些日人對於漢文掌握精熟，於書面表達無礙，能即席賦詩筆談，然書中屢見對於不諳華音的描寫。由此可知當時的日人雖能閱讀漢籍，書寫漢文，漢語的學習卻始終未能普及，以致結交中國士人時，多以口代筆。

未諳華音的情況，是日人的文學作品始終受國影響之下的主要原因。江戶時期探究聲律的書籍之所以盛行，是因未能明瞭漢語聲調，書寫漢詩文時難以辨別聲韻和諧與否，故多有探討聲律的書籍刊行。總而言之，未能掌握漢語，文獻理解仰賴訓讀，是受到語言個別性差異，造成學術風氣與漢土同轍，卻始終受限於中國的現象，無論是漢詩文風氣或是漢學的取向，皆無可避免。

漢學是傳自中國的異國學問，卻於日本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漢文成為官方

<sup>14</sup>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中）》，頁 11。

<sup>15</sup>轉引自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 47。

<sup>16</sup>馬哥東編：《日本詩話二十種（上）》，頁 6。

的書面語言，德川幕府以之作為文書，並且在學術上獎勵漢學。德川幕府直轄的教育機關昌平黌，即作為朱子學的傳揚與教學機關而運作，幕府在各家的學說之中，獨以朱子學為正宗，對其他學派，如古學派、折衷學派，則以異學視之，加以禁止。在寬政二年（1790），禁止朱子學以外的異學之後，傳揚其他學說的學者如龜田鵬齋（1752-1826）、山本北山（1752-1812）、冢田大峯（1745-1832）、豐島豐洲（1737-1814）、市川鶴鳴（1740-1795）等五人，被冠以「五鬼」之名，在此狀態下，朱子學以外的相關著作受幕府禁止而難以刊行，一方面顯現幕府對儒學的重視，亦顯現德川幕府藉由漢學進行一定程度的意識型態限制<sup>17</sup>。

無論是民間詩文風氣的遞換，或是官方對於經術文章的推行，日本皆不脫中國的影響，學者或專注於中國典籍的訓解與詮釋，或於詩文書寫上模擬唐、宋、明、清各代，縱然各家各派主張有異，然「中國」仍是關注的主體。詩文力去「和臭」，以詩文中不具有日本式的用詞構句為尚，致力於使詩作水平近似中國詩人之作，在完成詩文創作或者經籍的訓解著述後，總期望能獲得中國士人的評介與認可，更希冀著作能輸入至中國。比如任職昌平黌的安井息軒（1799-1876）為當時夙儒名重一時，在書成《管子纂詁》一書後，為使此書能獲得中國學人的評介，而託中村正直（1832-1891）帶至中國託人作序。活躍於幕末至明治時的學者楠本碩水（1832-1916），主掌佐世保之鳳鳴書院，以陽明學者身分名世，亦期望與中國學者交遊論學，終結識長崎領事余元眉，極其敬重<sup>18</sup>。由此種現象可知日人研讀漢學有成後，期望獲得中國士人的肯定，並以此為最高的目標，不僅學問研究是以中國為主體，亦期望學術成果獲得中國士人的肯定，而日本漢學在各個層面上，皆以此種被動，且受制於中國的狀態下發展。

<sup>17</sup>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中）》（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236。

<sup>18</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頁73。

### 三、確立支那文學史的研究價值

透過歷史發展的溯源，《支那文學史》的書寫，顯得特殊。而文學史的書寫，日本則早於中國，並成為日後中國人書寫文學史的學習對象，更值得探究。仔細觀看中國人所書寫的文學史，受日本影響的部份並非止於體裁、架構，對於「文學」一詞的定義，更是受到日人編纂的文學史影響，將過往未視為文學的內容融括其內。日人所書寫的中國文學史，可謂重新定義了「文學」的概念，此概念成為中國人書寫文學史的內容框架，並且影響日後「文學」研究的重心，擴展了文學的界定，也影響日後的研究潮流。

日本的支那文學史書寫深具研究價值，個別文學史作者受自身教育背景與生活經歷的影響，在支那文學史的選材上反映出細微的差異，單一的文學史著作即具有研究價值。明治日本的支那文學史書寫並非單一個案，是以長時間的漢學背景為基礎，終在明治日本這一西學的接受期中，將西化的成果呈現於文學研究上，為中國文學的研究奠定基礎，使得具有道德修身色彩的漢學，發展為新式的支那學、中國學研究，並且經由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持續至今日。就研究者的統計，1882年至1997年的115年間，日本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相關出版物共有61種<sup>19</sup>，若依照時間劃分為明治、大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戰後、平成等五個斷代，明治時期（1868-1912）共有21種，占最大宗。

明治時期作為日本學習西學，走向近代化的轉變時期，此時的中國在與歐美各國的戰爭與條約的訂定下，顯現頹勢，往昔對東亞地區的主宰性優勢，也隨著西洋各國的東進擴張，而成為被動的一方。在日本學習西洋的內部成因下，以及國際形勢中國衰頹的外部因素下，日本對於傳統的漢學，逐漸產生輕視的心理，以之為陳腐的舊學，中國不再是日本學習模仿的主要目標，以往對於富強國家制度與學術上的模仿，開始由中國轉往西洋各國。

---

<sup>19</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期，2013年4月，頁31。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出版資訊，請見附表一。

在明治日本的西化風潮下，支那文學史興盛的書寫狀況顯得特殊，作為陳腐之學的漢學，在明治時期達到最後的高峰，無論是漢學家的養成，漢學研究機構的建立與各領域人才的培養，皆由明治時期的教育制度改革、學科分立、新式治學方法的採用而產生。支那文學史研究的興盛，看似與明治日本的國策背謬，亦與時風相左，當時西學傳入日本，時人在器物制度上西化，外交策略以西洋為上，鹿鳴館時代也代表明治政府西化政策的巔峰<sup>20</sup>。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期，卻是日本支那文學史研究最為興盛的時期，學者以中國作為研究的主體，並且對過往的中國文學進行回溯與分類，將之納入歷史的領域，作為以近代研究固有學問的方法嘗試。

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編纂，可視作特殊的時代現象，此現象的形成深具研究空間，過往學者對於支那文學史單一著述的研究，多聚焦於單一作者與支那文學史的關係，然明治時期之所以形成支那文學史的編纂熱潮，其背後的時代風氣，極具研究價值，在以西洋為尚的時風之下，為何造就最後的漢學復興，刊行大量的支那文學史？此時的文學史具有何種特殊的時代性？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作為支那文學史編纂的先驅，在對於「文學」的理解，又有何特殊的見地？上述數點疑問皆為本論文欲解析的問題。本論文所選取的笹川臨風（1870-1949）與古城貞吉（1866-1949）兩部《支那文學史》，作為明治時期數十種文學史著作中，深具代表性的兩種。笹川與古城的文學史，皆為早期支那文學史著作中，首尾連貫，由上古至清代的通史性著作，與出版時間較早的末松謙澄（1855-1920）、兒島獻吉郎（1866-1931）、藤田豐八（1869-1929）的斷代史性質的《支那文學史》相較，內容上具有完整性。古城的著作於十年間再版數次<sup>21</sup>受歡迎的程度顯見，笹川的著作，則是為中國學者書寫中國文學史時的效法，林傳甲 1904 年成書之《中國文學史》有言：「傳甲斯編，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

<sup>20</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 53。

<sup>21</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 期，2013 年 4 月，頁 24。

書。」<sup>22</sup>反映支那文學史對中國的影響。若就《支那文學史》的內容而論，同樣是以中國為範疇的文學史研究，卻因作者性格特質的差異，而顯現極大的不同。

笹川臨風以優遊的文人之姿，醉心於戲曲小說，純以學術興趣為出發點，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寫成《支那文學史》，將傳統上為中國人所輕視的戲曲小說，納入文學的範疇，考述歷史，評析作品，以不具道德批判的視角，純以文學的價值評論作品，於中日兩國開戲曲小說研究之先聲。古城則是以憂國的儒者身分，關注於明治日本的種種社會現象，於明治三十年（1897）寫成《支那文學史》一書。在由幕末至明治的近代化進程中，社會問題使得知識分子產生了文明的反思，對於西化風潮有所檢討，古城以儒者經世濟民之眼，審視古代中國，映照明治日本，欲以文學史的成書回應漢字廢止論等當代議題，並對全面西化的體制寄以種種批判。兩位作者背景相異，關注議題亦有分歧，但身處同樣的時代中，皆受明治時風影響，率先嘗試以西洋文學史觀，分析中國文學。因此這兩部成書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支那文學史》史著作，對日後中日兩國文學史的書寫，皆造成影響，是極具重要性的著作，故本論文選擇此二種文學史為範圍，探討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成書的時代氛圍，以及著作中顯現的作者個人特質，以時代與人物，作為《支那文學史》研究的兩大主軸。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步驟

### 一、版本選擇

本論文以古城貞吉、笹川臨風兩部《支那文學史》為主題進行探討。於版本選用上，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使用明治三十年（1897）經濟雜誌社發行之初

---

<sup>22</sup>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台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頁1。

版<sup>23</sup>與明治三十五年（1902）富山房再版<sup>2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sup>25</sup>是以明治三十一年（1898）博文館出版之版本為依據。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具有中文譯本，是以明治三十年（1897）的初版為底本，刪去由井上哲次郎、田口卯吉所撰寫的序文，增添中文版的序，改換書名為《中國五千年文學史》<sup>26</sup>由台北廣文書局出版。本論文引述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內文時，乃依據譯本《中國五千年文學史》。本論文論及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序文，以及明治三十五年（1902）再版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內文時，則依據富山房版本，原文為漢文則引錄漢文，原文為日文時，考量敘述上之順暢則由筆者譯為中文。獨立引文為筆者擷取重點之譯文，部分原文將列於註釋以為參照。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一書，於書首署名為文學士笹川種郎著，是為笹川本名，但書籍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之登錄資訊，則登錄為笹川臨風，以號為代表。考察笹川署名，常自署笹川臨風，其著作《支那文學大綱》<sup>27</sup>、《時代と人物》<sup>28</sup>、《江戸と上方》<sup>29</sup>皆然，故本論文依據國會圖書館之登錄，於文中統一稱為笹川臨風。

---

<sup>23</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

<sup>24</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

<sup>2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

<sup>2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

<sup>27</sup>笹川臨風等：《支那文學大綱》（東京：大日本圖書，1897年）

<sup>28</sup>笹川臨風：《時代と人物》（東京：春陽堂，1898年）

<sup>29</sup>笹川臨風等：《江戸と上方》（東京：國史講習會，1922年）





圖 1-5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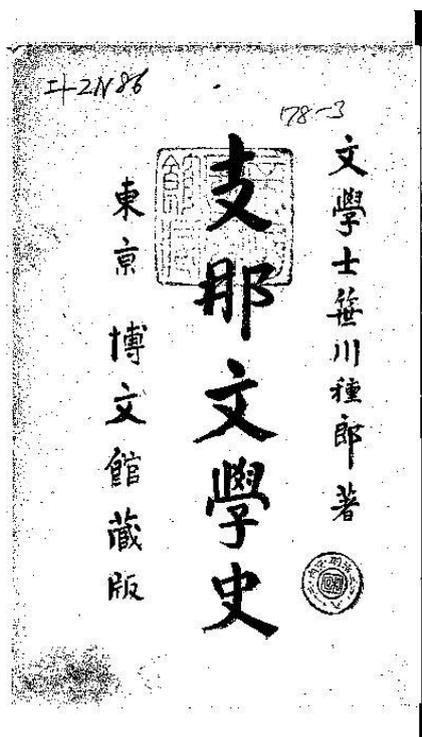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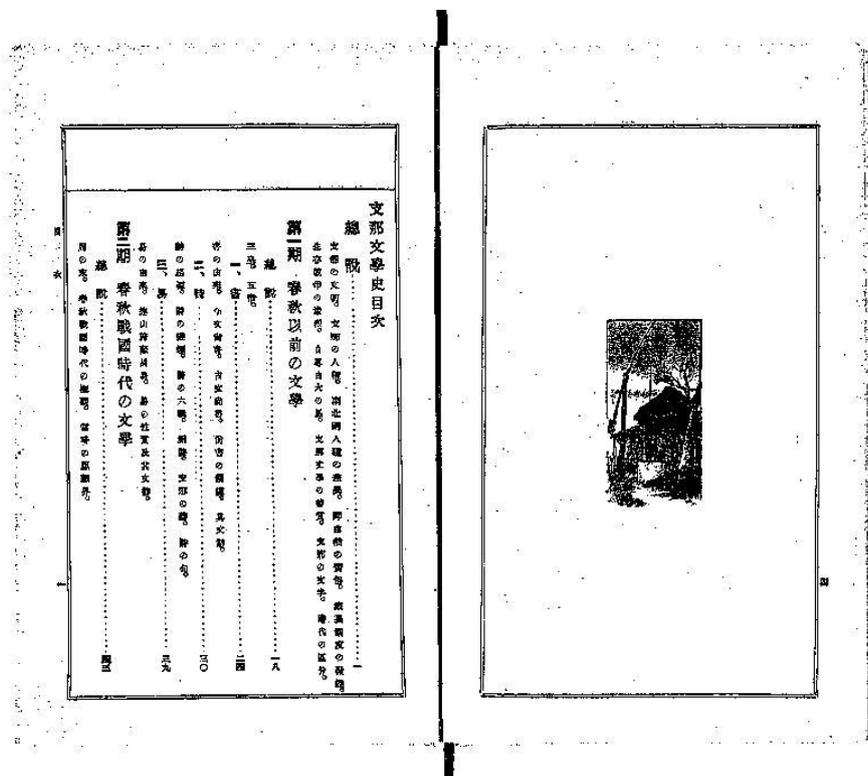


圖 1-6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目次



## 二、本論文的「明治」概念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為日本明治時期（1868-1912）。之所以沿用日本紀年，是因此文的研究對象為明治時期由日籍學者所編纂之支那文學史。此類文學史著作以中國文學為研究對象，卻為日人所著，皆出版於日本，亦以日人為預期讀者。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上，日本反而先於中國，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以外國人的身分，對中國文學進行分類與研究，於體例、內容上，皆成為中國人寫中國文學史的取法對象。在此種支那文學史研究的作者國別、出版地之外，研究上具有開創性，是以日本為先，後影響中國，故於研究的時間範圍上，以日本年號明治明治作為斷代。再者，本論文試圖藉由明治時風，探討此類支那文學史著作的形成背景。在選用文本上，本論文選定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以古城貞吉、笹川臨風兩人的著作為核心，其餘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為參酌。

本論文選定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為研究重心，是考量寫作時間與著作的完整性。雖說末松謙澄於明治十五年（1882）早已完成《支那古文學略史》<sup>30</sup>一書，然此書如題名，以末松視作「古文學」的先秦諸子為核心，屬概略性質的著作，且此書實為末松氏的講稿，並非以完整文學史脈絡為書寫目的。再者，末松謙澄為伊藤博文（1841-1909）女婿，是以政治家身分名世，並非專門從事支那學研究的研究者。今以古城貞吉於明治三十五年（1897）所著《支那文學史》為研究核心，是因古城氏此書內容上的完整性，是由古代至清代的研究範疇，是明治日本第一部確切意義上的支那文學史著作<sup>31</sup>，古城貞吉對此書於明治三十五（1902）年修訂本書再版，也反映出古城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持續關注。

---

<sup>30</sup>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学略史（上）》，（東京：末松謙澄，1882年）。

<sup>31</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期，2013年4月，頁24。

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完成於明治三十六年（1898）是日後中國學者林傳甲書寫中國文學史時的取法對象，笹川在戲曲研究的領域上，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並將戲曲研究的成果，納入文學史的書寫中。在內容上收錄戲曲，則與傳統漢學者與中國學者未將戲劇視為文學的做法大相逕庭，並且經由此舉，擴展文學的範疇，故本論文選擇以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為研究素材，是為了理解在文學概念進行重整的明治時期，學者如何藉由文學史的書寫，達到重新定義文學的結果。

### 三、「支那」釋名與「支那」在近代文獻的使用概況

#### （一）「支那」釋名

本論文定名為日本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研究，使用「支那」一詞而非「中國」，故就「支那」進行釋名，就此詞彙在中日兩國典籍中的運用，了解其反應的時代性與作為命題的緣由。

今日「支那」一詞，在日本早已廢去不用，因此詞彙具有貶意，是為一種「差別用語」，具有歧視性，對他人或者特定團體具有侮蔑性質的詞語。今日的日本，對於差別用語具有一系列的規制，不僅媒體禁止使用，於文學作品中也有意避免。然差別用語概念未確立的時代，文學作品中常有此類詞彙，在再版發行時，會將之改為意思相通的當代詞彙，「支那」一詞，即作為差別用語而受規制，在今日的刊物與媒體中，不再作為中國的代稱。

通觀明治時期以中國為探討範圍之文學史著作，包括末松謙澄、兒島獻吉郎、藤田豐八、古城貞吉、笹川臨風等作者所著之文學史著作，全數題名為「支那文學史」，這類著作成書時間有先後，卻具有題名統一的特性，未有以中國稱之者。至大正時期（1912-1926）、昭和前期（1926-1945）出版之以中國為範疇之文學史著作，仍題名為支那，直至戰後方有以中國文學史為題的著作出版，戰後的文學

史著作有以《支那文學史》為題者，亦有以《中國文學史》為題者<sup>32</sup>，命名並未統一。通觀文學史的題名變遷，二次世界大戰後，支那一詞因具有貶意而逐漸廢去不用，今日再版之明治支那文學史著作，多更改題名，以「中國」取代「支那」，一般書籍中出現的「支那」二字，亦變更為「中國」，或以「支那」之假名「シナ（shina）」代之。

事實上，「支那」一詞，見於佛典，唐人義淨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有「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彌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鉢娜寺，去此寺不遠有一古寺。但有磚基。厥號支那寺。故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sup>33</sup>文中支那寺是中國僧侶的居住地，此是以「支那」作為「中國」之代稱。宋代僧人普濟所編《五燈會元》，言寶長和尚之生平時，亦見「支那」一詞：「返飛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sup>34</sup>據此，「支那」仍作為中國代稱，是中性詞彙，不具貶意。

「支那」一詞為佛典廣泛使用，隋唐時亦隨著佛典的轉譯傳入日本，平安時期（794-1185）僧侶空海的詩文集中，即使用「支那」作為中國的代稱，此後，在鎌倉時代（1185-1333）、室町時代（1336-1573）、江戶時代（1603-1868）的時間更迭中，此詞彙見於日本僧侶、文士集中，作為地名的專有詞彙，並無特殊的褒貶意圖。對「支那」詞彙的由來，或說為「秦」的訛譯<sup>35</sup>，於古籍中尚有其他寫法如「至那」、「脂那」、「摩訶支那」、「莫訶支那」、「震旦」、「振旦」、「真旦」等，一般認為是源於佛教典籍中「Ch'in」，即「秦」<sup>36</sup>。明治時期以中國為研究範疇的文學史著作，以「支那」作為題名，是承襲此歷史背景，而「支那」作為中國的專指，其原因在於中國的隨著朝代更迭而有國號改換，文學史的研究並非限於某一朝代，故以「支那」為題，可規避政治權力改換所造成的稱謂混同，也可作為

<sup>32</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期，2013年4月，頁24。

<sup>33</sup>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據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

<sup>34</sup>《五燈會元》據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

<sup>35</sup>內藤湖南：《中國近世史》（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頁4。

<sup>36</sup>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6。

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概括性稱呼，援是之故，「支那」一詞成為通行的稱謂，是具有歷史的緣由，以及在學術研究時，具有對民族與時代的廣域涵蓋性。

## (二) 「支那」一詞在近代文獻中的使用概況

在明治時期，「支那」作為中性的稱呼並不局限於日本，中國士人也用此詞彙作為國家的代稱，並不具有貶意。試見清人著作《扶桑十旬記》其中一段關於東京帝國大學陳列室的描述：「樓上下陳列室，或日本石器時代遺物，或琉球、高麗、台灣、馬來諸島土人…及支那之風俗習慣諸標品。」<sup>37</sup>以「支那」稱呼「中國」，與琉球、高麗、台灣、馬來為相等的國名用例。支那一詞亦見於其他段落，比如六月五日到農科大學，見溫室與畜牧場：「內有榴樹，支那日本均產。」<sup>38</sup>支那做為中國的代稱，是為與日本對等的國家。《扶桑十旬記》作者為光緒進士楊芾（1855-?），此人 1907 年受端方之命，至日本考察教育制度，清末官員以支那稱中國，並與其他國名並列見之，可知此詞彙作為地名的專指，是為中性詞彙。

觀察「支那」一詞的用例，孫文（1866-1925）亦以此詞彙作為「中國」的代稱，並用於署名時的國名。宮崎滔天（1871-1922）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出版《三十三年の夢》一書，由孫文作序，有言：「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sup>39</sup>行文間以支那稱中國，並署名「支那 孫文逸仙拜序」<sup>40</sup>，由此可知「支那」一詞的使用，在二十世紀之初是不具特殊的褒貶意涵，並且是中日兩國共同的用法。

由上述用例可知明治時期的中國人，無論為清朝官員或革命黨人，在以「支那」一詞作為中國的代稱上並無分歧。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以「支那」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命題，是為當時中日兩國具有共識的稱呼，故以支那文學史作為本

<sup>37</sup>楊芾：《扶桑十旬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26。

<sup>38</sup>楊芾：《扶桑十旬記》，頁32。

<sup>39</sup>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東京：国光書房，1902年），頁5。

<sup>40</sup>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頁5。

論文的論述主題，是為了反映當時的時代背景。

#### 四、研究步驟

本論文兼取外在研究法（External Approach），與內在研究法（Internal Approach）兩種研究方法。外在研究法是將人置於歷史情境的脈絡中加以觀察，視研究對象定為歷史人（Homo historiae），觀察其在現實狀況中，受到環境制約的狀態，藉由還原研究對象至歷史中，加以分析，考察環境對於其思想內涵所造成的影響，了解社會之脈絡，如何影響單一人物之意向性（intentionality）。故本論文藉由考察明治時期的社會現象與學術風潮，解析文學史作者的書寫動機。又釐清文學史作者在何種歷史脈絡中，建構中國文學的定義，而有何種議題，被作者顯化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內容，乃是本論文關注的內容。

明治時期是日本近代化的轉變期，單一文學史作者在面對學風與思潮時，可能產生不同的反應。而同樣是面對西學衝擊的明治學者，在整理日本固有學問思想的複雜狀況中，不同的作者經常呈現不同的思想內涵，對文學史書寫，亦有不同的見解。故以「內在研究法」，由單一作者的思想自主性，試圖釐清文學史著作中，藉由選材與著重點所呈現的相異思想內容。

本論文欲處理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就成因與現象，作為探討的核心。為數眾多的《支那文學史》在明治時期出版，具有代表性的學者，紛紛投入文學史的研究撰寫中。而日人對實為異國學術的中國文學史投以極高的關注，並且在文學史的書寫上，啟發中國學者，並將文學史這一由西歐諸國於近代形成的概念，引介至中國，無論就何種層面來看，皆有探究成因之必要。

整體而言，明治時期是極端模倣西洋以達到現代化的時代，漢學復興似與時風相悖，探究其成因，為何形成支那文學史書寫風潮，極具必要性。本論文先就此著眼，意圖從明治時期這一新舊交集的時代背景入手，探究當時的風尚，以理解西學與漢學看似違背的兩種學問，如何在此時獲得平衡。令筆者感興趣的是，

為何在學制學科西化後，漢學仍得以存續，此中理由是在於官方的推行抑或民間的風氣，皆有釐清之必要。本論文的安排，亟欲自此考察，先自崇尚西洋的現象起始，接續探討明治政府於學制、學科兩方面的改革，以理解近代化的學問體系的建立背景。期能探究被視作舊學的漢學，如何在複雜的背景下，顯現最後的繁榮？

此外，本論文試圖從學科的改制中，了解明治政府對漢學的定位，如何將舊有的學問置入新式學制與學問體系，並藉由當時以漢學者的著述與研究領域，釐清明治時期以中國為研究主體的學者，特別是古典講習科出身的學者，如何藉由吸收西洋研究法後，轉化為近代化的學科，並將漢學的內容轉化，抽離道德與政治的視角，視為純粹的古典文獻，以學術的角度研究。故本論文在章節的安排上，自明治時期的學風考察為起始，檢視崇洋的時風對日人思維的影響，再進行具體的制度面西化考察，以及相對抽象的漢學研究風氣形成之考察。再藉由選定古城貞吉、笹川臨風兩位作者，探究其《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動機，並就作者之教育背景及相關著作，理解兩部《支那文學史》所反映的作者研究重心。大抵而論，古城貞吉與笹川臨風，在文學史作者中極具有對比性人。古城深受儒學影響，在思想上較接近舊式儒學，他以憂時的儒者之眼，借中國古典文學體察明治日本，以上古禮制學制，面對階級重組的明治近代化國家，寄寓種種評斷。笹川臨風則以對戲曲小說等江戶趣味的喜愛，展現優游文人的性格，源出於研究的興趣而寫成推重戲曲小說的《支那文學史》，使得戲曲小說列入文學之林，影響日後的中日戲曲小說研究風氣，擴展文學的定義。

本論文正文最末一章將藉由兩部支那文學史的比較，理解兩位作者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選錄差異與文學家的評價之別。並試圖理解在明治時期這一文學定義的再造時期，兩部文學史的作者，究竟是如何提出其文學史觀，對於文學的定義是否呈現於文體的收錄上。在此章節中，筆者試圖探討以西洋研究方法重審傳統漢籍，將漢學概念改換的現象，傳統的漢學遂在歷經明治這一變化的時期後產生

了漢學到日後中國學的轉型。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 一、相對弱勢：《支那文學史》的論述

以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研究為主題之相關論著，中國、台灣、日本學者皆有。然就目前而論，並無較具有系統的專書論述。《支那文學史》的編纂，常以教材製作為起因，隨著學制的變遷，政府對於中國相關議題的重視與否，致使特定版本的《支那文學史》，僅在一定的時間與教育機構中流行。而不同年份出版的支那文學史也隨著日人對於「文學」概念的理解，有內容上的增刪，是故後世學者對支那文學史研究，多集中於某單一作者的支那文學史，以單篇論文的方式呈現，且多刊載於日本的期刊之中。

明治時期的日籍學者，以日文寫支那文學史研究，其內容雖以中國作為探討的核心，是以日本人為預期讀者。在現今的研究中也反映相同的現象，即支那文學史相關的研究成果，大都以日文寫成，並且選擇集中於日本期刊發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進行支那文學史相關研究的學者，日籍學者的論文，可見川合康三、井上泰三的研究，然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來自於中國籍學者。這些研究成果以日文寫成，並且發表於日本期刊上的現象，或可反映出關注支那文學史研究的受眾與支那文學史著作相同，多是以日本國內為預期讀者。以中文寫成的論文，發表於大陸地區期刊的文章，大多是概論《中國文學史》的成書背景，偶涉受到日人影響的部分。台灣籍學者所著目前僅見柯喬文一篇，在內容上以《支那文學史》

與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為連結，反映出論文的預期讀者，是以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為核心，而非支那文學史著作本身<sup>41</sup>。

若單就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而論，戴燕、陳國球、陳平原等人皆有專著問世，如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sup>42</sup>，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sup>43</sup>，戴燕《文學史的權力》<sup>44</sup>等書，皆就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背景進行詳細考察，藉由學制與實風等切入點，論述早期中國文學史的寫作面向。無可否認，中國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乃是深受明治時期的日籍學者書寫《支那文學史》所影響，然此數種出版物中，皆以中國為探討主體，在日人《支那文學史》的書寫成果上，僅是以提點的方式約略論及，對《支那文學史》的成書背景與書寫內容上，皆未有詳細論述。事實上，明治時期日籍學者所論《支那文學史》，成為日後中國學者直接效法的對象，對將文學史引入，影響晚清中國，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由現今的研究成果而論，多數僅作為論述中國文學史時的附庸，故本論文以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為探討範圍，還原其重要性。

## 二、豐富：以日文撰著的的文學史論著

今檢視單篇論文，以日文發表的文章占絕對性多數，其中以井上泰三〈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一文，是較為特出的，別於其他學者以單一作者、單一著作的方式探討，是以整體的概念審視日本編纂中國文學史的歷史。井上留意到在漢學的領域上受中國牽制的日本，唯有在支那文學史研究上領先於中國，由此觀之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有其重要性。此文對早期的支那文學史做概括式的論述，包括兒島獻吉郎、藤田豐八、古城貞吉、笹川種郎皆有論述，觀察到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中，文學、思想、史學混雜的情形，亦收錄文字學相關

<sup>41</sup>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2007年12月），頁45-66。

<sup>42</sup>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sup>43</sup>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sup>44</sup>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內容。對明治以後的支那文學史部分，井上也略有提及，然有別於前述提名式的探討，僅是對日本學者研究支那文學史對白話文學的重視略作介紹。整體而言，此文以日本人所編纂之中國文學史的歷史作為研究範圍，在文末附有明治時期到平成年間的中國文學史書目，使欲了解日本學者書寫支那文學史的研究者能有所本，但對於文學史著作何以產生文學、史學、思想混同的現象並無探討，對於日人之所以領先中國完成支那文學史著作的原因，亦僅提出疑問，也未進行論述。

在支那文學史研究的單篇論文中，杜軼文發表的系列文章，都以單一作者與支那文學史的關係進行探討，是研究支那文學史時難以忽略的系列著作。〈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sup>45</sup>注意到日本所刊行的支那文學史，是在十九世紀初期東方各國在「西學東漸」下生成的產物，日人吸收西洋的研究方法與理念，嘗試對固有的學問進行整理，杜軼文選取古城貞吉為研究對象，藉由對古城的生平探討，歸納出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強烈的儒學色彩，得自於古城的漢學教育背景。另外在東京大學預備門求學的期間，萬國史（世界歷史）的學習，也是影響古城歷史觀的重要因素。

此外，杜軼文歸納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內容不限於中國文學，對佛典、外來文化的收錄，顯示這是一本全面關注中國文化的著述，但此文對《支那文學史》著作不限於文學，反而傾向文化史的內容，並未進一步探究其由，對於吸收西學後的日本學者，何以將研究趣味轉至中國文學亦未進行探討，僅是做現象的敘述。

〈兒島獻吉郎の支那文学史研究について〉<sup>46</sup>一文，乃是以兒島獻吉郎為考察中心，先考察兒島在寫成《支那文學史》一書之前，明治二十四年時曾發表〈支那文學史〉為題的單篇論文，在當時的漢學復興熱潮下，發表於《支那文學》這

---

<sup>45</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卷71（2003年3月），頁389-409。

<sup>46</sup>杜軼文：〈藤田豊八の中国文学史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73，（2004年10月），頁94-117。

本具有講義性質的雜誌上。杜軼文認為藉由兒島的漢文學習經驗，能明瞭當時的漢文學界動向與兒島的中國文學研究觀，藉由此單一作者，也能推知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理解。兒島曾受業於三島中洲，漢文教育的習得是具有道德教化的目的，後入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杜軼文在整理兒島的學習經歷與文學觀之後，得出其支那文學研究的特點有三：一為中國文學為人的文學，兒島的著作是以人物為中心記述；二為考察中國文學史的流派變遷時，是以特定流派的代表人物切入，由個人理解全體；三為承認小說戲曲的文學地位，予以文學研究。在文學史的書寫上，採用南北地域因環境相異而風格不同的說法，影響後世的文學史著作中南北文學的區分。

在明治時期日本人的文學觀相關議題上，杜軼文引述市村瓚次郎(1869-1947)的說法，認為日人出於對傳統漢學教育的習得，在受西學影響後，自負對於漢文的了解優於西洋人，成為研究支那文學史的動機；另一方面，在明治維新引入西洋文明後，中國文化具有陳舊、不合時宜的印象，以西洋觀念改造中國文化，有其必要性。而中國文學研究在漢學的影響下，深具道德色彩，故應引入西洋研究方法進行新式研究。杜軼文在此文中，自兒島的教育背景，解釋其《支那文學史》中的某些特性，並試圖以此單一學者為延伸，處理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學觀，然而在處理此問題時，未見新論述，僅是引述生於明治時期的學者市村瓚次郎之說，以一人的論述代表大部分明治時期學者似有不足。此論文亦言及明治三十年代為支那文學史編纂的興盛期，卻未解釋經過以文明開化為號召的明治維新後，何以對具有古舊印象的漢學，形成研究熱潮的背景因素。

杜軼文〈藤田豊八の中国文学史研究〉<sup>47</sup>一文是以藤田豊八為核心，言明治時期西歐的思想與器物傳入日本，近代的「文學」概念傳入，將原本容納文學、歷史、思想的「漢學」領域細分，並展開專門化、系統化的研究，引述江上波夫之言，指出此時的學者將日本、中國、滿蒙、朝鮮視作一個整體，以「東洋」的

<sup>47</sup>杜軼文：〈藤田豊八の中国文学史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73，(2004年10月)，頁94-117。

概念含括，欲建立以世界為輸出對象的日本史觀、東洋史觀。藤田在此時期的學者中具有代表性，其以東洋史學者的身分活躍於明治日本，亦以日本教習的身分前往中國，並擔任翻譯一職，在當時的中日交流上具有值得探討之處。藤田長年擔任教師，其《支那文學史》是作為東京專門學校的講義而編纂，杜軼文考察藤田的講義書寫時間與版本，條列當時東京專門學校講義的收錄內容，並引述前輩學者對藤田氏《支那文學史》的內容歸納，理出「思想」與「藝術形式」為探討中國文學的兩大軸心，此種別於以往的書寫方針，獲得極高的評價。然而此文並非以《支那文學史》單一著作為探討對象，對於藤田氏於各刊物上發表的中國文學相關論文，均作條列式整理，除此之外也並非集中探討藤田豐八《支那文學史》一書，間論及明治時期東京專門學校講義的編纂，以及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異同論述，並提及明治三十年代，青年學者以近代研究方法鑽研中國文學者不在少數，但僅對現象有所掌握，仍未對此現象探究成因。

〈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sup>48</sup>是杜軼文最近一篇探討單一文學史作者與著作的論文，此文論及明治時期的學者，在寫成支那文學史時，多正值二十代、三十代的青年時期，但在日後的研究生涯，卻未必以支那文學史為研究重心，比如古城貞吉、藤田豐八轉向東洋史研究，笹川臨風則轉向日本美術研究。杜軼文考察笹川氏的生平與著作，將笹川氏的支那文學相關研究，區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以文學史為重心，後期則是以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為重心。此文言及日本在中日戰爭後，對中國展現輕視的態度，強化日本主義，但是另一方面，青年漢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論著甚多。對此現象，杜軼文引述高山樗牛（1871-1902）對於學界狀況的陳述，卻未探究漢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熱潮何以產生，僅作為引言論及笹川氏觀注向來受到輕視的小說戲曲，認為笹川氏的研究具有開闢研究分野的創見，其中國文學研究的特色，則在於注重民俗、社會的要素，以文學史作為文化

---

<sup>48</sup>杜軼文：〈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 80（2008 年 3 月）頁 125-144。

史的側面考察。

陳廣宏著，伴俊典譯〈齋藤木の「支那文學史」講義録について 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成立初期の中國文學史講義〉<sup>49</sup>一文，是以齋藤木的《支那文學史》為探討主題，兼論東京專門學校的中國文學史講義。齋藤的生平是考察重點，齋受業於青槐書院，此書院教育方式以漢文、西學並重，齋藤接受西洋思想，青年時投身自由民權運動，並對政治抱有熱情，在學術上亦講求經世致用，與東京專門學校調和東西文明的教育目標理念相合，故於此任教。陳廣宏考察東京專門學校的辦學理念，以學科分立為洋學、國學、漢學的狀態，留意到當時西洋的文學史概念輸入日本，日人始思考文學史的書寫。分析齋藤氏《支那文學史》的內容，藉此理解此文學史著作的定位。

陳廣宏留意到明治時支那文學史的書寫與日本國粹主義的興起有關聯，並掌握各個支那文學史著作中「文學」定義的不確定性，但是並未探究其中緣由。若藉由考察明治時期日人對「文學」一詞的定義，或能釐清當時支那文學史收錄內容上的特異之處，再者，日本國粹主義的興起與明治維新引入西學的政策似有背反之處，若能釐清國粹主義興起之由，方能理解當時《支那文學史》書寫興盛相關背景。

川合康三〈中國文學史的誕生：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之一面〉<sup>50</sup>是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學史書寫風潮進行回顧，釐清日本《支那文學史》書寫背景，認為日本江戶到明治是學風的轉變期，由對中國的效法轉往西洋，但其中的轉變並非單向，而是在東洋與西洋的相剋之下，產生的種種拉鋸。川合康三的文章中，述及文學史觀念的確立，由法國人 Hippolyte Taine 所著《英國文學史》結合歷史與文學的概念確立近代文學史，此文學史觀，則由三上參次、高

<sup>49</sup>陳廣宏著，伴俊典譯：〈齋藤木の「支那文學史」講義録について -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成立初期の中國文學史講義〉《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 中国文学研究》，卷 36，(2010-12)，頁 1-26。

<sup>50</sup>川合康三著，朱秋而譯：〈中國文學史的誕生：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之一面〉收錄於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頁 237。

津鞏太郎所學習，成為《日本文學史》書寫的動機。再者，川合康三整理早期於日本出版之支那文學史，注意到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數量繁多，其中對文學定義的闡釋，也顯現翻譯用語「文學」定義尚未固定的現象。也注意到，日本可能受西歐近代文學關注俗文學的影響，於支那文學史中，對俗文學這一領域積極研究。川合康三此文是歸納《支那文學史》所反映的時代特徵，以及其中受西歐影響的部分，可謂全面性的梳理文學史由西洋至東洋的書寫進程，但其中缺少對單一著作的詳論，是以著作為主軸，對文學史成書的時代仍論述甚少，此即是本論文欲研究擴充的部分。

### 三、貧瘠：以中文撰著的文學史論著

台灣學者關於支那文學史相關研究，僅可見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sup>51</sup>一文，此文以久保天隨為切入點，久保天隨數度遊覽台灣，留下相當數量的漢詩，後任教於台北帝國大學。柯喬文以《台灣日日新報》所連載翻譯的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為主體探討當時日本的《支那文學史》研究成果以漢文、日文雙語為載體輸入台灣的方式，無非是日人藉由控制漢文的輸入，掌控殖民地的知識。此文涉及後殖民理論、孔德實證論等理論，將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視為觀察日本統治時代台灣知識體系的材料，論述時亦考察其他漢文教育相關材料，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以及作為翻譯的台灣知識分子謝汝銓（1871-1953）亦為考察對象。整體而言，本論文並非單獨討論《支那文學史》，而是以此做為日治時期日本統治者對台灣人進行的知識傳遞，以及「漢文」對於中日史料記述的複雜性，而以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傳遞為論述核心，就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書寫成因也未有探討，雖提及其餘日籍學者如末松謙澄、古城貞吉皆有《支那文學史》著作，卻未能說明明治年間文學史興盛的原因。

---

<sup>51</sup>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2007年12月），頁45-66。

大陸地區關於《支那文學史》研究的論文，則有〈早期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日本影響因素〉<sup>52</sup>、〈20 世紀初期日本的中國文學史〉<sup>53</sup>、〈試論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譯本《歷朝文學史》的動態〉<sup>54</sup>〈談談 1900 年前後的三部《中國文學史》著作〉<sup>55</sup>等數篇，篇幅皆較為簡短，多以早期中國文學史為主軸，試圖釐清其中受日人影響的部分。李群〈早期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日本影響因素〉<sup>56</sup>一文，欲藉由近代日本論文學觀，了解《支那文學史》所收錄的內容，為何異於今日之文學。論及「文史不分的傳統學術習慣和雜文學觀根深蒂固，文學史家很難在短時間內一下子徹底與之斷絕。」<sup>57</sup>是未能釐清近代日本以漢學為萬般學問，故文學史內容涉及文學史學哲學各領域的的現象。趙苗〈20 世紀初期日本的中國文學史〉<sup>58</sup>一文，是對日本支那文學史興盛的狀況進行解讀，並論及中國人所著之中國文學史受到日人影響的部分。題名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中國文學史」，但是在行文上，支那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混用，並未說明兩者差異，也未能對明治時期的西化風潮與漢學復興的矛盾現象進行解讀。郝蕊〈試論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譯本《歷朝文學史》的動態〉是考察中國上海會文學社曾編《普通百科全書》，譯介各國著作，包括題名改為《歷朝文學史》的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郝蕊在論述上，對 1903 年會文學社的始末花費篇幅論述，對譯介圖書的版本選擇亦有所推想，但在對材料的蒐集上有不足之處，笹川種郎與藤田豐八等人所著《支那文學大綱》，作者明言未能掌握。此文對中國晚清《奏定大學堂章程》相

<sup>52</sup>李群：〈早期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日本影響因素〉《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6 卷 2 期（2009 年 5 月），頁 63-69。

<sup>53</sup>趙苗：〈20 世紀初期日本的中國文學史〉《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9 卷 3 期（2010 年 5 月），頁 86-88。

<sup>54</sup>郝蕊：〈試論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譯本《歷朝文學史》的動態〉《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Vol.9-1 (2016 年)，頁 1-15。

<sup>55</sup>黃霖：〈談談 1900 年前後的三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古典文學知識》，（2005 年 1 月），頁 44-50。

<sup>56</sup>李群：〈早期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日本影響因素〉《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6 卷 2 期（2009 年 5 月），頁 63-69。

<sup>57</sup>李群：〈早期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日本影響因素〉《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6 卷 2 期（2009 年 5 月），頁 65。

<sup>58</sup>趙苗：〈20 世紀初期日本的中國文學史〉《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9 卷 3 期（2010 年 5 月），頁 86-88。

關學制學科的政策有所論及，在論述上，也非集中於笹川《支那文學史》，其論外在的譯本、譯者等，較著重於中國晚清的學制學科改革與《普通百科全書》相關的人事問題。總體而言，以中文所書寫的支那文學史相關文章，在篇幅上較為精簡，多屬概論性質，且在論述的深度上，不若以日文寫成的文章，多數不集中於單一作者的文學史，多藉由中國人書寫之中國文學史為切入點，溯及日本人書寫支那文學史之關聯。

黃霖〈談談 1900 年前後的三部《中國文學史》著作〉<sup>59</sup>一文，考述竇警凡《歷朝文學史》、林傳甲、黃人《中國文學史》三部做為教材的早期文學史，歸納出其中傳統文學觀的瓦解、西方進化論的介入、編史功利觀的增強等特色。其論述主軸為《中國文學史》，唯有論林傳甲的文學史時，提及林傳甲對笹川臨風文學觀的批為笹川不應將雜劇、院本、小說列入文學史的書寫範圍。

由上述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可知，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的《支那文學史》編纂情形蔚然成風，就個別文學史作者的生平、教育背景探究，可對個別文學史的內內容收錄進行一定程度的論述。但是，對於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書寫的風氣，過往的研究中，並未有明確的解答。西學的輸入是明治時期迎向文明開化的必然過程，此時的日本以過往的漢學為古舊之物，並且對中國的蔑視與日俱增，欲了解支那文學史的書寫背景，明治時期的漢學復興是不能忽略的背景，故本論文將自明治時期的西化風氣與漢學復興進行探討，以釐清支那文學史著作的書寫風潮，以及著作中反應的時代氛圍。

---

<sup>59</sup>黃霖：〈談談 1900 年前後的三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古典文學知識》，（2005 年 1 月），頁 44-50。

## 第二章 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書寫背景

本章就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書寫背景進行探討，將自社會背景與時代風潮等層面，論述於明治時期西化風潮之興盛，是如何藉由官方政策的推行，使得器物與制度上的西化滲透至民間。其次，再由此為起始，論述明治時期西化時風下，推斷形成漢學復興的可能原因。其三將以官方與民間兩種層面，論述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於何種時代氛圍之中，重新關注中國的古典文獻，而有眾多《支那文學史》的問世。

### 第一節 西學為尚的明治時風

明治時期(1868-1912)是日本轉向近代化的重要進程，在明治以前由漢學為研究主體的學術風氣，經由明治維新後，因洋學興盛而逐漸衰頹，西洋之學成為政府所提倡之學問主體。漢學是以傳統上以漢字書成之中國典籍為研究重心，但是在明治時期，對此歷經長時間傳承的漢學，時人或視之為陳腐，或對承載典籍的漢字發出廢除之聲。就日本而言，漢學、漢字非本國所造，終究是得自中國的學問，日人對漢學知識的理解，在於漢字的習得，漢學的學習多在於社會階層較高的公卿與武士。一般庶民對漢字未能通達，明治時遂有漢字廢除的議論，認為漢字學習不易，更使得知識的習得限於優秀階層，不利於教育的普及，應廢除。在漢字廢除論的盛行下，更衍伸出羅馬字派、假名派、期望以不同的文字系統取代傳統的漢字<sup>1</sup>。

西洋之學的傳入並非只改變傳統的學問體系，更使得時人對做為知識載體的文字產生反思。別於往昔德川幕府以漢文為公文書的情形，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

---

<sup>1</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97。

在接觸西學後，漸漸習得西洋研究方法，並且對知識傳播所使用的文字，亦產生疑問。自三世紀漢字傳入日本起始，六世紀七世紀為日本學習中國文化之高峰<sup>2</sup>，漢學、漢字早已成為日本學問的一部份，但日本漢學並非完全等同於中國的學術，縱使是以同樣的中國典籍為研究主體，但是在國情不同制度不同的狀況下，也是一種研究的重心有所差異的學問體系<sup>3</sup>。

日本漢學是日本在以中國典籍為基礎，逐漸產生獨特的研究面向與方法，並非完全同於中國的研究，應屬日本化的研究成果，其中蘊含的日本特色難以拆解。誠如溝口雄三所言：「日本漢學稱不上是一種外國學，在本質上，它只是日本學。」<sup>4</sup>，故名為「漢學」，實為日本化的研究。明治時期的學者，經由西學的洗禮之後，開始思考漢學的種種問題，並試圖將中國析出而論，文學史的書寫，即是此種背景下的成果，欲了解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書寫風潮的生成，需自此特殊的時代背景著手。

另外，在明治的時代背景下，必須注意的是「文學」一詞的界定。*Literature* 被譯為「文學」見於此時的文獻中，但是漢學中源自於孔門四科文學科的「文學」義，已在西學的影響下產生改換。「文學」一詞，在中日兩國的文獻中，本是指以經史之學與漢詩文為中心的優秀文章，在江戶時期，僅用於指稱儒學與漢詩文<sup>5</sup>。但是在文學作為 *Literature* 的譯語之後，也產生了定義的改換<sup>6</sup>。

此現象的產生，與 *Literature* 為多義語有關。英語 *Literature* 的字義，有一般著述、一般語言藝術、高級語言藝術、高級知識著述等義，在明治時期有不同的譯法。*Literature* 曾被譯為「文字」、「識字」，明治十年（1877）歐內斯特·薩道義《英和俗語辭典》譯作「文道」。但一般認為，將 *Literature* 明確譯作文學的文獻，

<sup>2</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53。

<sup>3</sup>王建：《神體儒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河南：大象出版社），頁2。

<sup>4</sup>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頁129。

<sup>5</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103。

<sup>6</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107。

是明治十四年（1881）四月由東京大學三學部印行的《哲學詞彙》<sup>7</sup>。在 Literature 與「文學」聯繫越來越密切之後，「文學」之外的譯語，即淘汰不用。

考察日本近代文獻中，文學一詞的使用情形，亦具有多義性。比如慶應二年（1866）福澤諭吉（1834-1901）在《西洋事情》中，寫道「1423 年版刻發明之後，文學大為進步，經學、性理、詩歌、歷史之學極其盛美。」<sup>8</sup>經學為哲學、倫理，性理為醫學、生理學之義。此數種學科，皆涵蓋於文學的範疇之中。

明治二年（1869）由啟蒙家西周（1829-1897）起草的《德川家沼津學校追加規定》稱「文學之義在於政律史道醫科利用之四科」<sup>9</sup>將政治法律，歷史道德、醫學，以及涵蓋天文、化學、地質學的「利用科」列入文學的範疇，視此類學科為文學，是與武學相對的概念。

明治八年（1875）柳田泉於《家庭雜誌》中有言：「所謂文學即是 science，是論述百科之學的名稱，並非指詩文等。」<sup>10</sup>柳田泉將詩文置於文學範疇外，是罕見的用法。但是大抵而論，此時期的洋學者已經具有共識，將一般學術與語言藝術並稱為文學。

由此數種用例來看，Literature 譯作文學，在明治日本，大抵是涵蓋詩文等一般語言藝術以及洋學者所強調的百科實學，亦是使得《支那文學史》著作中，文史哲各類學科混同，學制禮制相關以及以詔令公文書皆可列為文學範疇的原因。

## 一、漢學的衰退

就明治時期漢學者對當時學風的敘述，可知漢學衰頹是為定論。明治時期日本將學習的對象由中國轉往西洋諸國，連帶使得漢學為西學所壓抑，在明治初期的學者眼中，此由仿效中國到模擬西洋的時風轉變最為明顯，據明治時期的學者

<sup>7</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 102。

<sup>8</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 111。

<sup>9</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 107。

<sup>10</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 113。

古賀茶溪（1816-1884）所言：

我邦與唐山對岸，二千年來受其薰陶。舉目所見，凡百事物，過半莫不仿唐山式樣。…然世之好尚逐年變遷，國之弊害隨時不同。今日世人輕侮唐山事，絕無所忌憚。<sup>11</sup>

依據古賀茶溪所言，日本對中國的學習具有長久的歷史，學習的事物並不限於學問，也有制度與器物層面的模仿，而這樣的學習並非流傳於少數階層，而是以「舉目所見，凡百事物」的普及性，在社會中影響。明治以後的社會，國際局勢改變，明治政府仿效西歐諸國建立近代化的國家，西風東漸的結果，造成日本國民對中國事物產生輕侮之心，甚至無所忌憚。

器物層面與思想層面西化後，學問風氣也受波及，漢學的衰退在所難免，如岡松甕谷（1820-1895）為《莊子考》序言所載：

我邦漢學衰廢，莫甚於今日，經史子集，束之高閣，無復顧者，余將攜二考，赴禹域遊，歷訪碩學宏儒以相商榷。<sup>12</sup>

岡松甕谷活躍於幕末至明治，親見漢學洋學的勢力消長，以「衰廢」言明治漢學風氣，將明治時期視作漢學最為衰弛的時代，此論是就日本漢學的發展歷程所作出之斷語。漢學的衰退既已是必然之勢，政府的提倡與時人模倣西洋諸國，經史子集束諸高閣，取而代之的盡是西洋典籍。因此岡松甕谷認為其傳統漢籍的考證著作《莊子考》、《楚辭考》二書，須攜至中國方有碩學能相與參商。此漢學衰退之說並非孤證，西村天囚（1865-1924）有言：

<sup>11</sup>劉岳兵：《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5。

<sup>12</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台北：學生書局，2002年），頁130。

維新以降，取長補短之說起，自教學兵行以至技藝之末，一切崇尚西法……  
模仿洋風，抵排舊俗，國典漢書猶且棄而不講，將併取彼之短，而又捨我  
之長，其弊有不勝言者焉。<sup>13</sup>

西村天囚對明治時風的總結，在於全盤西化。自 1868 年明治維新為起始，舉凡制度層面的教育制度、兵制，以及生活層面的風俗、技藝，皆是以西法為尚，棄置以漢文為主體的國典漢書，西學代之的結果，對舊有的風俗，自然也予以排斥，在制度面與生活面，皆尚西洋。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西村天囚將捨去「國典漢書」一事視作「捨我之長」，其以國典漢書並列，是將漢籍作為日本論文化的一部分，並對漢學研究的評價極高，認為日本對漢籍的研究是「我之長」，將實為傳自異國的中國學問，視為日本的一部份，並對漢籍的解讀具相當程度的自負，反觀天囚對於西學，並未予以正面的評價。同為活躍於幕末至明治的漢學家中村敬宇（1832-1891），在記敘明治時風時，亦言：「當此時棄漢學如土苴…以吾所譯《西國立志編》十部交換善本《佩文韻府》，書肆欣然有喜色。」<sup>14</sup>中村敬宇以當時風氣視漢學如土苴，時人對西學的興趣遠高於漢學，故能以外文譯書輕易換得善本古籍，時尚西學，漢學的衰退是無可避免，中村氏更言「或有漢學者鬱憤不堪，於不平之餘，入海而致死。」<sup>15</sup>言漢學不為世所重，側寫漢學家的困境。此無非是當時飲食衣服居室器具，以至於語言文字，受西洋影響後無可避免之勢，器物面與生活面西化後助益甚廣，以致時人對西學頗為崇尚，明治學術風氣是以西洋為主體，政府對西洋學問的引進則是壓縮了漢學的發展空間。

由漢學家對於明治時期的記述，可知明治時期作為近代化的關鍵期，其對於西洋的模仿最為全面性，西洋諸國，既是日本在近代國家建立時的模仿對象，就

<sup>13</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1。

<sup>14</sup>中村正直述、木平讓編〈中村正直古典講習乙部開業演說〉，《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東京：松井忠兵衛，1888 年），頁 43。轉引自連清吉《明治的漢學家》（台北：學生書局，2002 年），頁 141。

<sup>15</sup>中村正直述、木平讓編〈中村正直古典講習乙部開業演說〉，《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東京：松井忠兵衛，1888 年），頁 43。

物質層面的食衣住行皆是如此。試見明治時人的詩作，可知此種生活層面的西化，在當時甚為普及，並非限定於公卿官僚，而是對於社會的全面性改造，時風改換的劇烈，可由時人詩作得知。木下彪《明治詩話》收錄一首〈東京繁昌新詩〉云：

東邦開化日繁昌，學佛模英事復忙。煉化經營連十里，即今坐見大西洋。

16

此詩並可見明治社會風氣，「東邦」是指日本，「學佛」是指學習明治時期譯作「佛國」、「佛蘭西」的法國，「模英」是指模擬英國。法國與英國作為明治日本所取法的先進國家，藉由西洋器物改造日本，使國家邁向文明開化的進程。當時銀座街道即是此種西洋模擬的體現，行人改撐西洋式的蝙蝠傘，街道模仿法國巴黎的規劃，如〈銀座竹枝〉：

不見街頭塵土存，鋪來鍊瓦潔於園。遊人且向雨中步，無復深泥粘屐痕。

17

「鍊瓦」即磚塊，此詩寫銀座街道為改以磚塊鋪地，取代原本一下雨即泥濘難行的泥土地。此詩可見明治時期日人在器物上的西化，以及對西洋文明便利之稱許。對於新式道路〈日本開化詩〉載：

道路修成綺陌平，車聲日夜九區轟。宏然共在都鄙客，瞥爾經過幾里程。

18

此詩是寫明治三年（1869）京濱道路開通，西式馬車（乘合馬車）通行於東京、橫濱之間的專用道，此詩即寫通車後，時人對於馬車道平坦、通行迅捷的驚奇。西洋器物帶來便利，因此時人採以開放接納的心態。食肉與穿著西式服裝也是明

---

<sup>16</sup>木下彪：《明治詩話》（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頁275。

<sup>17</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275。

<sup>18</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298。

治時期受西洋影響下的時風改換，西洋諸國的富強，使得欲朝向近代化國家的明治政府以之為仿效，器物制度上自然如此，關乎民生的衣著與飲食習慣，亦隨之西洋化。

西化對於明治日本影響之深，不局限於政策法令的制定，而是藉由食、衣、住行等層面深入民間，這也使得原本江戶式的趣味，在時風的改換下漸漸染上洋風。檢視明治八年（1875）出版的《東京新詞》<sup>19</sup>收錄的詩題有：〈太陽曆〉、〈時計〉、〈瓦斯燈〉、〈電信機〉、〈汽船〉、〈蝙蝠傘〉、〈風眼鏡〉<sup>20</sup>等物的吟詠，另外就明治九年（1876）所出版的《日本開化詩》<sup>21</sup>詩題來看，可見〈新聞紙〉、〈鐵道〉、〈寫真〉、〈寫真鏡〉、〈時辰儀〉、〈瓦斯燈〉、〈牛肉店〉等詩題，可知明治時期，接觸西洋器物對時人而言極為新鮮，特意以詩記之，另一方面，可見其中涵蓋食衣住行的各樣器物，洋風西法可謂全面性的影響時人生活。

檢視這類對文明器物的大量吟詠，有一值得探討之處，明治時代為西學的鼎盛期，亦為漢學的最後高峰，器物、體制西學與漢學是具有衝突性，卻又。首先，詩作全然是以漢文寫成，以傳自中國的傳統漢詩描寫西洋器物，是展現明治日本社會風氣的側寫，縱使西洋器物在政府文明開化的號召下，在朝在野影響甚鉅，但是承襲自江戶時代的漢學素養，仍舊無法於時人的思維中排除。看似全盤西化的社會風氣，卻仍是以漢學素養為基盤，這是在考量明治日本的學術風氣時，值得注意的一點。在引進西洋的學風之後，時人或對舊有漢學進行批判，然實際上，縱使以洋學者身分活躍的學者，其背後的漢學根柢亦是不容忽視的一環。日本在歷史上歷經漢學與西學的學習，能融合東洋西洋兩方文明之特點，然漢、洋，終非日本自有之學問，在外來學問的受容上，並非平移式的全盤接受，而是融合自有文明的嫁接<sup>22</sup>，因而在學問上產生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混合樣貌。

西學在接受，最主要是體現於器物上，正如文明開化、殖產興業是明治政府

<sup>19</sup>大橋蘆洲、北稻香：《東京新詞》（東京：松柏堂，1875年）。

<sup>20</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306。

<sup>21</sup>平山果、宮內貫一：《日本開化詩》（東京：中邨熊次郎，1876年）。

<sup>22</sup>王建：《神體儒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頁2。

的政策，以西學帶來富強，器物革新、制度改革，創造近代化國家可謂引進西學的目的性，另一方面，隨著西洋文明進入日本，西洋的社會學、民族主義等思想，也逐漸為日籍學者所知悉，洋學興盛，在此之下漢學受到壓抑，被視作陳腐之學。對於明治初年的學術風氣，町田三郎曾將明治元年至明治十年初視作一個斷代，認為此時的學術特點是漢學衰退與啟蒙思想的隆盛<sup>23</sup>，此種社會現狀，自然是日本政府見西洋諸國強盛，意圖仿效而引進西學有關。

就政府層面而言，明治四年以岩倉具視(1825-1883)、伊藤博文(1841-1909)、大久保利通(1830-1878)等政府官員為首，加上留學生共計百餘人的使節團，赴西洋進行為期兩年的訪查，此次的岩倉使節團的考察，傾政府一時之精銳，在意圖上，考察歐美國情，學習西洋器物制度，是此使節團的一大目的，就成果而言，岩倉使節團達到考察西洋文明，建立近代化國家，隨行的留學生，也成為日後在教育、經濟、工業各方面，建構近代化日本的重要力量，岩倉使節團也達到藉由出訪廢除舊幕府時代與西洋諸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此後，學習西洋的政策，亦反映在日本國內的學制改革上，比如明治十年東京大學的設立即是如此。東京大學於文學院設立和漢文學科，學習傳統學問，然此時西歐的語種如英文、法文、德文是學生的必修課，並且各科課程是以英文授課<sup>24</sup>，英文作為理解西洋學術的途徑，受到政府的重視。

由此觀之，明治政府藉由效法西洋文明，成為近代化國家的富強策略，是以西洋崇拜的風氣盛行，官方、民間，皆對文明的便利感到傾慕。在此環境之下，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著書成因，深具探討價值，令筆者感興趣的是，在洋風盛行的極端下，為何會產生漢學的復興，致使學者將注目點轉往被視作過往學問的漢學，並將當時於國際情勢上屈居劣勢的中國，作為研究的主體，進行一系列的文學史研究。

---

<sup>23</sup>吳廷璆主編：《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425。

<sup>24</sup>天野郁夫著，黃丹青譯：《大學的誕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7。

## 二、文明開化的反思

明治時期的漢學復興，部分原因在於對政府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兩大策略的反動，在明治政府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之下，日本確實是向西歐的文明國家靠攏。然而當時的日本，縱使經由大政奉還，以明治為年號，逐漸建立近代化國家體制，國內的戰事，並未隨著改元而消弭，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年（1868-1869）的戊辰戰爭，即是明治政府與舊幕府勢力的內戰，在此戰爭之後，明治政府方為國際所承認。在此之後，因一連串土地、軍事、財政改革，引起舊士族階層的反彈，造成國內戰事難平，明治七年（1874）的佐賀戰爭，即是此種士族反叛的一次內戰。正因廢藩治縣的策略，廢除舊有的諸侯、武士階級，改為士族、華族，造成此些舊特權階級人士經濟與居住權益上的損失，引起不平，武裝反對明治政府。此類內戰，持續於明治初年，直至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戰爭平定後，明治政府始完成日本境內的權力整合<sup>25</sup>。

明治時期是近代化國家的建立時期，正因為此種由舊到新的過度，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常有權力分配不均的情形，縱使在器物上能直接仿效西洋，但是在相對無形的制度改革上，卻因國情的不同而有許多難以落實之處，在此之下造成的社會不安，使得時人開始進行文明的反思，西洋文明是否適切於東洋，新政府政策下的種種弊端，亦使時人開始懷念舊幕府時代，以及作為當時代表的漢學，開始在社會中興起<sup>26</sup>。正因明治時期對於西洋文明的學習，多著重於器物層面而非思想層面，在制度改革上衍生的種種弊端，使得時人開始懷念江戶時代，並且，傳統的漢學研究本具有道德<sup>27</sup>的要素，故漢學的復興，是建立於此種文明的反思之下，藉由明治時興盛的漢詩文創作，可觀察此種時風，亦是此種風氣的形成，造就支那文學史書寫的潛在因素。

試見明治詩人描寫時風的漢詩作品，可見在洋風盛行下的批判。《明治詩話》

<sup>25</sup>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53。

<sup>26</sup>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53。

<sup>27</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99。

載有一詩云：

眠耶時耶住行耶，總倣洋風不遺髮。眼睛難耐不化青，鬚髯稀疏腮未沒。

瞥見先生贈答書，常用西曆年月日。<sup>28</sup>

誠如此詩所言，明治時期對於西洋的仿效，是在於生活的各層面，引進西洋二十四小時制的時間，交通工具的改革，著西服、斷髮、蓄鬚，無非是以西洋為效法，「眼睛難耐不化青」是為詩人對時風的諷刺之筆，對於西洋是否能完全適用於東洋，時人對有所懷疑，比如此詩言日人模仿西洋人蓄鬚，追求外貌上的相似，但是鬚髯稀疏，未能完全同於西洋人，反而十分滑稽。總生寬（1841-1894）〈東京繁昌新詩〉云：

斷髮人多鋪亦稠，新奇今日學歐洲。糞船束藁渾除去，剪出文明開化頭。

<sup>29</sup>

此為對時風的反應，言理髮店生意昌盛，時人認為單憑髮型上的西化，即可具備文明開化的西歐文明，詩人對此是以諷諧之筆敘述。歐洲各國的器物，成為時人競逐效法的對象，然而此種效法似停留於器物層面，文明開化，似是藉由髮型、服裝斷定，單就外在的模仿是否可稱為文明，在當時漢詩作品中，可見對於明治時期文明開化的反思。

這種於器物層面的極端西化，是與時政有所關聯。明治四年（1871年）岩倉使節團的派遣，除了以取法西洋為目的之外，修改舊幕府時代的所訂定的條約亦為重要目標，卻未能達到效果。此後明治政府對西化政策的提倡，也與井上馨、伊藤博文「認為改變西方對日本的印象是改約捷徑，因而採取極端的歐化政策，

---

<sup>28</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 277。

<sup>29</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 266。

吸收移植歐美文化。」<sup>30</sup>的想法有關。此種西化策略的最終體現，即被稱為「鹿鳴館外交」，以耗費三年時間所建成的鹿鳴館作為外交場所，舉行舞會邀請西洋使節，藉由器物服飾等物質的西化，欲使西洋諸國相信日本已經不是未開化國家，而具有與歐美相同的文明<sup>31</sup>。但是這樣的政策，也引起時人的批評，不僅《明治詩話》所收錄的當時詩作中，常有對西化的嘲諷，後世的研究者，亦對此風氣有歸納性的描述，如林明德所著《日本史》一書中，有言：

文化方面，正如《五條誓文》所示，最高方針是開明的、進取的，以吸收西洋文化為國策。文明開化到處風靡……結果，學問、文藝之發展頗有進展，但亦有僅止於西洋文化模仿之弊。<sup>32</sup>

模仿之弊，即是對明治時風的檢討。縱使引進西洋文明，但庶民的生活未必能比舊幕府時代來得改善。舊幕時代嚴格的市民階級分層，是造成生活困境的一項原因，明治時期經由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秩祿處分等一系列政策，廢除舊藩主階層、武士階層，地方領土收歸國有的方式，以收歸權力、增加財政收入，並以破除舊有階級，收歸民心<sup>33</sup>。但是對時人而言，隨著新政府的組成，並未能達到實際意義上的平等，反而產生了新的階級，在生活上仍舊是困難重重。

明治政府的政權確立，倚重薩摩、長州出身人士。據林明德《日本史》中，對明治維新的成因分析，言及「西南雄藩」的出力：

明治維新的原動力為西南雄藩的下級武士。他們鑒於外患頻仍，國勢日非，於是聯合朝廷的公卿、諸藩的上層武士和社會的中間階層，倡導尊王倒幕，

<sup>30</sup>劉予葦、趙建民主編：《日本通史》，（台北：五南出版社，1991年），頁213。

<sup>31</sup>劉予葦、趙建民主編：《日本通史》，頁213。

<sup>32</sup>林明德：《日本史》，頁232。

<sup>33</sup>劉予葦、趙建民主編：《日本通史》，頁197。

迫使德川幕府就範，達成「大政奉還」實現王政復古。<sup>34</sup>

此段敘述中的「西南雄藩」即是以薩摩（鹿兒島）、長州（山口縣）兩藩為核心，再加上土佐（高知縣）、肥前（佐賀縣）等藩，在藩政、軍備上較為富強，具有討幕的資本。

在慶應二年（1866年）時，薩摩、長州兩藩結成薩長同盟，使得局勢由尊王攘夷向尊王討幕推進<sup>35</sup>。在慶應三年（1867年）時薩摩、長州兩藩收到天皇密敕，此份以漢文寫成的密敕，是對末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的討伐令：「源慶喜，藉累世之威，恃閭族之強妄，賊害忠良，數棄絕王命……汝宜體朕之意，殄戮賊臣慶喜，以速奏回天之偉勳，而措生靈於山嶽之安。」<sup>36</sup>由此可見當時的情勢，薩摩長州兩藩不僅具有實質討幕的實力，接獲討幕密詔，更意味著倒幕派公卿的支持，使得討幕派的聲勢更為浩大。

在明治政府政權確立後，以薩摩、長州出身的維新名士，成為新政府的官員，是為新的特權階級<sup>37</sup>。對於原本居住於東京的居民而言，這些來自薩長兩藩的新官員無非是鄉下武士，他們藉由有功於新政府，獲得主掌時政的權力，至東京享有特權、耽於逸樂，是時人對於新政府的批判對象。就當時的漢詩文作品，描寫新政府官員沉溺狹斜的詩作數量甚多，比如菊池溪琴（1799-1881）〈東京春詞〉：

太平諸吏百無憂，大道春風調紫騮。日上宮門猶未關，伊公終夜在紅樓。

38

松平慶永（1828-1890）〈雜言〉詩云：

權貴爭登猿若坊，彩棚呼酒伴紅妝。無生不喜區區技，坐見乾坤大劇場。

<sup>34</sup>林明德：《日本史》，頁 165。

<sup>35</sup>林明德：《日本史》，頁 226。

<sup>36</sup>汪公紀：《日本史話 近代篇》（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頁 88。

<sup>37</sup>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40。

<sup>38</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 319。

田島任天（1852-1909）亦有詩云：

天向此樓別貯春，滿筵香迸綺羅春。誰知倚樓紅翠客，悉是佩金施紫人。

菊池琴溪的詩作批判了沉溺於「紅樓」聲色的官員。松平慶永的詩作，則寫道權貴爭相前往江戶、明治時期的歌舞伎座所在地「猿若町」。田島任天的詩作，也特意強調沉溺酒色的，皆為「佩金施紫」的高官。此類詩作反映時人對官吏的諷刺，在國家政治穩定後，新政府官員夜宴於聲色場所，荒怠朝政，這是當時的人民對新政府官員的印象。身著西服、模仿西洋人蓄鬚的新政府官員，時人有譏諷之語：「近來髯之社會流行，大者為鯰髯，小者為鱈髯。」<sup>41</sup>以「鯰公」稱大官，「鱈」則成為小吏的代稱，以其蓄鬚似鯰魚鱈魚得名。「鯰公」與「鱈」，在詩作中，常與「貓」並寫，「貓」為聲妓之代稱<sup>42</sup>，新政府官員「駟馬高蓋，有時而三顧蘇小之家。」<sup>43</sup>成為批判的對象。由此可見詩人對於新政府官員由鄉下武士一躍為政要的生活上批判。正因為新政府官員的逸樂，讓時人對於過往的時代有所懷念。明治初年對官吏溺於狹斜的批評，多見於漢詩作品中，縱使新政府對於舊階級的廢除不餘遺力，但是反形成新的黨派門閥，新官員自地方躍至中央，身著西服，配金懷錶，招搖過市的情況引起時人不滿。

與身居政要的新政府官員相比，被削去俸祿的舊武士階層無以為業，也逐漸形成新的社會問題，以往藉由各藩財政所供養的武士，在失去俸祿後，亦有變賣家產者流落街頭者。但是舊武士階級的存在，也形成漢文復興的潛在因素，失去

<sup>39</sup>森春濤編：《東京才人絕句》（東京：小江湖社，1875年），頁7。

<sup>40</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371。

<sup>41</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325。

<sup>42</sup>成島柳北：《柳橋新誌二編》（東京：奎章閣，1874年），頁21。「都俗戲稱聲妓曰貓，以三弦皆張貓皮也。」

<sup>43</sup>成島柳北：《柳橋新誌二編》（東京：奎章閣，1874年），頁4。

俸祿的武士，或開設私塾授徒維生<sup>44</sup>，所教授的內容自非洋學，而是承襲德川幕府「學問即漢學」<sup>45</sup>的教育，以正統的漢學、漢文為授課內容<sup>46</sup>。政府的提倡使得學校以西洋文物的輸入為尚，學校教授西洋學問，漢學權威失墜，但是在此時的漢學家，如芳野金陵(1803-1878)、中村敬宇(1832-1891)、重野成齋(1827-1910)等人，還是以文學權威的身分受世人尊敬，縱使是提出亞洲蔑視的思想，以脫亞論聞名的福澤諭吉(1835-1901)，亦喜愛創作漢詩，閱讀漢文。由此可知洋學在當時雖然興盛，然學習洋學的學者，在本質上仍是以漢文教育為背景，明治時期學風的兩面性，即體現於此時期活躍的學者教育背景上。在明治時期以洋學為尚的時風裡，洋學校林立，但另一方面，舊式的私塾仍然隆盛，當時的書生常一面至學校修習洋學，一面於傳統的私塾學習漢學<sup>47</sup>，明治時期東京著名的漢學塾，如明治二年(1869)島田篁村(1838-1898)開設的雙桂精舍；明治三年(1870)岡鹿門(1833-1914)設立的綏猷堂；明治十年(1878)三島中洲(1831-1919)設立的二松學社<sup>48</sup>，皆為當時漢學塾代表。

明治初年，在政府引進西洋文明，建立近代政府的狀況下，無論是體制的建立、官吏任用、政策推行上，尚有許多未臻完善之處，因而造成士民的潛在性反感。另一方面，明治距離江戶時期未遠，行之有年的漢學教育，以及幕末宿儒的活躍，時人仍有極好的漢學素養，能以漢文閱讀與創作。以漢詩文做為反映時政，懷念過往的書寫載體，也反映此時西學與漢學的二重性。即使在政府的提倡下，以「文明開化」為號召，但在知識層面上，漢學仍為基盤，無法輕易排除，此亦為漢學、中國文學研究興盛的潛在理由。

<sup>44</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231。

<sup>45</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2。

<sup>46</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1。

<sup>47</sup>木下彪：《明治詩話》，頁 229。

<sup>48</sup>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頁 40。

## 第二節 法律、教育制度的改革

### 一、學科學制的洋風西法

就明治時代的教育制度而論，由江戶時期幕藩體制下，各個藩各自為政，自成派別的藩校漢學教育，演變至經過中央整合，學制改革後的近代化學校，不僅是學術上引進西洋學問的結果，也是實質上漢學與洋學的勢力消長。今檢視黃遵憲《日本國志》對日本教育體系的回溯，亦可觀測到漢學到洋學的風氣改換，《日本國志》中，就日本的學術風氣，先追溯漢學的傳入云：

日本之習漢學蓋自應神時始，時阿直岐自百濟來，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經典。十五年又徵博士王仁，仁始齎論語十卷千文一卷而來。<sup>49</sup>

由上述論述，可見日本漢學風氣的養成。黃遵憲由上古時代傳說起始，言漢籍經過百濟博士王仁之手，自中國傳入日本，再考述日本歷隋唐宋元以至近代的學術傾向，皆受中國影響，漢學成為日本學術之主流。對西學的東傳，黃遵憲則以江戶時期為西洋書籍傳入的濫觴：

延享元年將軍吉宗始建天文台於江戶神田……文化八年始置翻譯局於淺草天文台中，特舉蘭學者數名專譯和蘭文書稱為蕃書和解方。安政三年丙

---

<sup>49</sup>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39。

辰又改稱翻譯局。<sup>50</sup>

上述記載中，延享元年（1744）、文化八年（1811）皆為江戶時期的年號，在明治政府建立前的江戶時期，對西洋書籍的傳入具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性，此由翻譯局的設立即可知。此段文字之所以強調傳自荷蘭的蘭學，是因在江戶幕府的鎖國政策下，僅有荷蘭商人獲准赴日經商，在荷蘭人的經濟活動中，西洋學術也因此輸入日本，科學機械等近代化產物，亦在此時為日人所知悉。在江戶時期，日本即派遣學生留學西洋諸國，如法國、英國、普魯士，開始在政府的培育下學習西洋知識，此也是在明治之前對於西學接受的醞釀期<sup>51</sup>。

由此可見，明治時期的洋風興盛，並非突然而至，而是經過幕末的西力東漸，時人攘夷、開國的爭論之後，而逐漸接受西學傳入的現象，明治時期能完成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歷程，幕末作為接受西學的緩衝，自然有重要的助力。若論明治時期的學制，依照《日本國志》的記載，可見當時模倣西洋的積極性：

維新以後，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覽歐美諸大國，目睹其事物之美，學術之精益以崇尚西學為意。明治四年設立文部省，尋頒學制於各大學區，分設諸校。有外國語學校以英語為則。有小學校，其學科曰讀書，曰習字，曰算數，曰地理，曰歷史，曰修身，兼及物理學、生理學、博物學之淺者。益以畀畫、唱歌、體操。諸事有中學校其學科亦如小學，而習其等級之高者，藝術之精者。有師範學校則所以養成教員，以期廣益者。……有東京大學校，分法學、理學、文學三學部。<sup>52</sup>

上文言及 1868 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派遣使節赴歐美諸國，特別是明治四

<sup>50</sup>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339。

<sup>51</sup>天野郁夫著，黃丹青譯：《大學的誕生》，頁 23。

<sup>52</sup>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340。

年（1874）岩倉使節團歷時兩年，經十五國的外交訪問，新政府任居要職的官員大量出訪西洋，考察器物與制度層面，如此大規模的使節團，對於甫建立近代國家的政府而言，是極其罕見的，也反映出明治政府「壹意外交」以歐美各國為重要邦交對象的政治策略。

在多次的考察中，西洋學制導入日本，小學、中學、大學的設置，取代以往的私塾、藩校，就其學科而論，亦可見漢學與洋學過渡時期的並存現象，修身、習字是為傳統的漢學教育內容，物理、生理、博物之學，則是自西洋引進的關於自然科學相關概念後的學科分化，體操、唱歌納入學科之中，也是別於傳統漢學教育的科目，黃遵憲特意做注，言「謂鞦韆蹴鞠之類，可以使身體習勞苦。」<sup>53</sup>，反映此二科目並非時人所見慣。事實上，在引進西方教育制度之後，日本亦經歷無師西學者以授課的問題，故師範學校的設立，是為了培育能教授地理、歷史、物理、算數西學諸科目的人才，使得傳統只習得漢籍經史的知識分子，具備西學的基礎知識，成為第一線的教員。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大學的成立，其分為三個學部，然無論屬於文學部、理學部、法學部，學科皆以英文授課，在黃遵憲的註解中，言及：

各科課程分為四年，生徒階級亦分四等定制。將來用國語教導，現今暫用英語。且於法蘭西、日耳曼二語中兼習其一，唯法學部必兼學法蘭西語。

54

引進西洋教育體制後，學科的授業也是以英文為主，更需選擇英語、法語作為第二外語<sup>55</sup>，在此狀態之下，不僅西洋學問是作為學問的主體，以外語授課，等同於對以往漢學為學問主體的挑戰，是導致漢學者憂心的主因。如同東京大學總理加藤弘之的論述：「今日之勢，斯文寥寥如晨星……自稱日本學士者，唯通英文

<sup>53</sup>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340。

<sup>54</sup>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340。

<sup>55</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5。

而亡乎國文。」<sup>56</sup>英文作為獲取西學知識的媒介受到推廣，東大學科以英文授課，無非是反映政府對於習得近代化知識的積極性，藉由英文、法文、德文等外文的學習，以達到技藝與知識上與西洋諸國比肩的目標，作為最高學府的東京大學，在學科上以及外語授課的形式上，也確實反映學風的變化。

黃遵憲《日本國志》以客觀角度，記載學制的變化，考察日本自古的學術風氣變遷，若見其《日本雜事詩》則可見其對於時風的直接論斷，如：「五經高閣竟如刪，太學諸生守兔園。猶有窮儒衣逢掖，著書掃葉老名山。」<sup>57</sup>黃遵憲在此詩是直接對學風觀測與批判，當時五經四書不為世人所重視，中學校教材以唐宋八大家文、《通鑑肇要》、《二十一史約編》為主，故黃遵憲批評此種漢學教材的選擇近似兔園冊，僅是童蒙啟發讀物，另一方面言及窮儒著書掃葉，則是反映當時漢學家的生不得時，縱使漢學持續不輟，卻仍不為世間所重視。

當時學校取法西洋制度，課程內容包括物理、算數、歷史、地理等等學科，在教員的任用上，自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傳統知識分子以漢學為教育背景，在作為初等教育而廣設的中小學校中，具有西學背景者，畢竟為少數。雖日本政府廣派留學生、設立師範學校作為具備西學知識分子才的培養措施，然無論是師範學校或者留學生皆須耗費時日養成，故明治政府廣聘西洋人作為教員，無論是專門學校，或者由昌平黌改制的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皆以西洋人士作為教師的主要來源，而東京大學更為實質上以外語授課的「西語大學校」，固然政府意圖培養日籍教師以日語授課，但在實行層面上，卻未能達到此目的<sup>58</sup>。

就《日本國志》的記載：「朝廷既崇重西學，爭延西人為之教師。明治六七年間，各官省所聘，府縣所招，統計不下五六百人。」<sup>59</sup>可知明治初期藉由外籍教師的引入，補足具有西學知識教員不足的問題。並且，延引西洋人為教師的情況，並非局限於首都或特定的區域，而是由中央到地方各府縣皆積極招聘。此舉

<sup>56</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4。

<sup>57</sup>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33。

<sup>58</sup>天野郁夫著，黃丹青譯：《大學的誕生》，頁 17。

<sup>59</sup>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340。

與原本地方藩校以漢學者為教員的狀況大相逕庭，無異是壓縮漢學者的生存空間。西學與漢學，兩者在學制上皆為官定的學科，但是在內容上，對西學的重視是高於漢學，漢學以唐宋八家文為教材，被黃遵憲譏為近似童蒙讀物的授業內容，與江戶漢學以朱子學為正統，各學派以獨自的訓解系統訓讀漢籍的方式具有難度上的差異。縱使政府規定每週授業時數，以及中小學畢業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漢學知識，但漢學者在政府積極延攬西洋人作為教員的背景之下，早已失去任聘優勢。故《日本雜事詩》中，言「窮儒」、「著書掃葉老名山」是記述當時漢學者的困境，亦是在教育體制改變後連帶影響教員結構的側寫。就體制、學科上審視，漢學始終未被排除於近代化教育，然就結果而論，西學仍是趨勢所在，就《日本國志》所載：

各府縣子弟以私費學於外國者尤眾。……各官省爭譯西書，若法律書、農書、地理書、醫書、算術書……由是西學有蒸蒸日上之勢。西學既盛，服習其教者漸多，漸染其說者益眾。<sup>60</sup>

上述可見，效法西學並非政府強制政策的唯一結果，民間對此也十分積極，在官方派遣的留學生、使節團之外，自費留學生也蔚然成風。

若說明治政府改革學制，藉由體制的干預，改變學風，以積極引入西學達教育近代化，那麼，地方各省爭相翻譯西學書籍，則是自發性的習取西學。譯書內容涵蓋各層面，其中西洋宗教得力於民間對西學的好感，以及政府不再禁教的雙重因素下，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之間亦頗為興盛，宗教不是強制性的法規條例，「服習其教者漸多」絕非妄斷之語，而是由崇尚西學而來的結果。

安井息軒（1799-1876）於明治六年（1873）以漢文撰寫《辯妄》一書，以儒學者的立場批判基督教，此事反映了明治時人對西洋學問及西洋宗教的喜愛蔚然

---

<sup>60</sup>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340。

成風，足使漢學者感到危機，而成書以批判。但另一方面，《辯妄》的成書也反映了縱使如安井息軒，集江戶漢學大成的儒學者，在明治之後對西方宗教也不得不採取重視的態度，在環境的驅使下需藉由研讀基督教典籍，找出其不合事理之處一一駁證，試圖說明西學未必最佳，且西洋學問宗教未必全然適用於東洋。誠如《辯妄》一書的序言：「我邦服西洋百工技藝之靈巧者，必並信耶蘇教，或乃欲敷其教於國中。」<sup>61</sup>相較於明治時期藉由法規及體制改革達到教育風尚的改換，宗教是不具有強制力的，然藉由西洋技藝，西洋宗教亦獲得時人的好感而盛行於國內，此亦是明治時期西洋諸國的影響力進入日本的重要標誌。無論是《明治詩話》一再言及的服裝器物風俗習慣的西化，或是《日本國志》由西洋學問至西洋宗教的取法，皆為明治時期西學以風行草偃之勢，自教育層面影響民間智識習得的反映。

## 二、教育法規的保守化

論明治時期漢學發展的背景，當時的教育法規改革是值得考察的一環，近代化學校的設立，學門的分科，以及漢文是否納入學科之中的探討，皆對漢文的興盛有所關聯。在明治十三年（1880）《改正教育令》頒布後，以道德修身作為教育的重點而受到提倡，漢學與道德修身的聯繫，是當時教育方針中，具有政治意圖的一項，此種政治意圖，隨著法律的修訂進入教育體系中，漢文教育，被視作必修學科而納入中小學校的受業科目中。明治十四年（1881）所頒布的《小學校教則綱領》以及《中學校教則大綱》，明確規範小學、中學的授課科目中包括漢文，自小學的中等科起始，漢文教育成為必修科目<sup>62</sup>。

規範範圍為國中、高中的《中學校教則大綱》對於漢文科目的授課時間，更有詳細的規定，在國高中共計五年之間的學程中，每週學習漢文的時間應有六至

<sup>61</sup>安井息軒：《辯妄》（中西源八：出版地不明，1873年），頁2。

<sup>62</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215。

七小時<sup>63</sup>，與和文的授課時間相當，是為學科中學習時數最高者。漢文是源自中國的語言文字，在此卻與教授日本本國學問的和文課程授課時間相當，可反映出明治時期學科整備後，對於視作舊學的漢學，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維護。在高校、中學、小學各個階段的教育單位中，漢文作為必修學科，授課時數亦有要求。中小學為初等教育單位具有相當數量，在此狀況下有教員人數上的需求，漢文教育的推行意味著教員的漢學素養足以用於教學，亦為明治時期知識分子仍具有一定程度漢文能力的表現。

此時初等教育體制中的漢文教育，政府亦有相關規定，漢文教育的預期成效，並非止於兒童啟蒙的程度，而是須有漢文的閱讀與書寫能力。在明治十九年(1886)的《尋常中學校學科及其程度》中，即明白紀錄學員漢文能力的規定<sup>64</sup>。明治時期將漢文列入各級學校的規定，把江戶時期各藩藩校的漢學教育，轉型為近代化的學科，對於舊幕府體制下養成的漢學人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任用。漢文設為學科，在學科近代化的過渡時期中，對漢學的保留存續具有維繫的作用，但此時漢學教育的內容，仍是與道德修身連結。或說明治政府對於漢學教育的提倡，是出於此種理由，藉由初等教育，將內容為儒家式倫理階級觀的漢學教育，深入社會，以培養忠君愛國的思想，強化天皇制，此種統合教育與政治目的的方針，也由此延續直至二戰時期，成為軍國主義的支撐<sup>65</sup>。以法律條文規範授課科目的情形，反映出明治政府對漢文的重視，以及將漢文與修身連結後，欲使其影響力深入社會的企圖，以結果而論是成功的。

若自體制層面檢視，明治十三年(1880)《改正教育令》的頒布實為對西洋自由思想的抑制。明治日本引進西洋器物以及學說，在思想層面上，「天賦人權論、民權和國權的關係論、道德論、慾望論等等，可以說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關平等說的基本理念，在日本得到了相當的傳佈。」<sup>66</sup>西洋思想傳入日本，是情

<sup>63</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215。

<sup>64</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216。

<sup>65</sup>吳廷璆主編：《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 433。

<sup>66</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122。

勢下的必然，但此中思想未必對於政體的穩固有所助益，提倡平等的自由民權思想很快受到政府的抑制。

明治十二年（1879），明治政府以田中不二麿（1845-1909）《理事功程》一書為基礎<sup>67</sup>，制定《教育令》，田中氏此書是以接受美國自由主義教育思想而成，《教育令》是「模仿美國自由主義的產物」<sup>68</sup>，但政府體察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民主思想，並不利於明治國家體制，在士族反亂與自由民族運動盛行的當時，《教育令》勢必引起政府的緊張，故次年即有《改正教育令》的頒布，內容重回保守的儒家教育觀，強調仁義忠孝以及貫徹忠孝大義<sup>69</sup>，目的在於天皇制的維護。另一方面，儒家傳統德目的提倡，也是漢學者對於當時西歐化的一種反動，學者們認為西洋倫理未必適用於日本的風土，更因為明治維新中對技藝的重視勝於道德，故提倡儒家思想。比如明治天皇的侍講元田永孚（1818-1891），對明治政府效法西洋的正策略有所批評：

維新以來，俄而模仿歐美文明，教育方法亦用其規則……至近年，法律、理學、經濟、工藝，博識多藝之人勝維新之前百倍。然皆外面之裝飾，長於才思技能之洞而我邦之精神魂性乏，道德義勇之根柢薄，雖欲養成國家柱石之才而不復可得。<sup>70</sup>

就元田永孚的觀察，著重於器物制度面的西化，是忽略內在道德教化的主要原因，如此政策不利於國家人才的培養。另外，西村茂樹（1828-1902）亦有類似的看法，認為：

今日之教育，唯採歐美之智育一方，而不顧德育如何。人民受如此教育，

---

<sup>67</sup>天野郁夫著，黃丹青譯：《大學的誕生》，頁 26。

<sup>68</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115。

<sup>69</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115。

<sup>70</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1。

日後恐不能為日本國所用。<sup>71</sup>

元田永孚、西村茂樹皆以西學重技藝而不利於道德作為批判點，認為須學習儒家道德教化，方能培養人才為日本所用，為日本所用的目的很大的成分是為了天皇制的維護，故以自由主義為主體的《教育令》自然面臨修改的必要。

在此狀況下，《改正教育令》的頒布僅是先聲，明治時期的日本政府，是藉由一系列的法規，將傳統儒家式強調道德品行、具有階級秩序的價值觀以法律的方式體現，藉由提倡漢學中的道德色彩，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明治十三年（1880）由西村茂樹所撰寫的《小學修身訓》由文部省發行作為教材使用，內容為提倡孝行、勤勉等德行，培養對天皇的忠誠心，在思想上與西村茂樹明治十二年所寫的《教學大旨》精神相通<sup>72</sup>。就《小學修身訓》的思想而論，明國體、培養尊王愛國之心為其要旨，此後的修身教科書亦因循此原則，使用日本與中國的古典籍，「先選擇本邦聖主賢哲之嘉言善行，摘取漢土聖賢言行中，於我風教特有裨益者而雜之。」<sup>73</sup>將中國與日本典籍中涉及道德教化的事例，用於明治日本培養尊王愛國心的推動。

另外，由元田永孚所撰寫的《幼學綱要》出版於明治十五年（1882），收錄中國日本兩國之古訓，為道德綱目解說之教科書，其中收錄的德目包括孝行、忠節、和順、友愛、信義、勤學等等共計二十項，具有強烈的儒家色彩，德目包括人倫關係與個人修養兩方面，強調具有秩序的價值觀。明治天皇將此書頒贈賜至東京開會的地方長官，並有頒賜敕諭：

彝倫道德，教育之主本，我朝、支那所專崇尚。……方今學科多端，本末有誤者亦不在少。年少就學，最當以忠孝為本，仁義為先。因命儒臣編纂

<sup>71</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0。

<sup>72</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8。

<sup>73</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8。

此書，頒賜群下，使知明倫修德之要在於茲。<sup>74</sup>

勅諭強調忠孝仁義的德目為此時教育的忠旨，究其原因仍是近代日本所理解的文明開化，太過著重西洋的制度風俗，而忽略思想層面，「缺少了深層次的精神的內容」<sup>75</sup>是使得漢學中的道德教化重新被提出，藉由政治與教育的結合而有復興之勢的重要原因。

在此時期的法規中，明治二十二年（1889）《明治憲法》、二十三年（1890）《教育敕語》<sup>76</sup>的完成，象徵政治與教育合一的國策方針，成為明治時期到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時國家道德教育的基本綱領<sup>77</sup>，確立明治政府自法律、政治、教育等方面建立近代天皇制的意識基礎。《教育敕語》頒行後，時人對有所評價：「全國公私立學校之學生應時時奉讀，為人師長者也應著意諄諄教誨而不懈怠，使之煥發仁義孝悌忠君愛國之情。」<sup>78</sup>其中所將道德條目的仁義孝悌與忠君愛國之情相互連結，讓儒家式的道德觀政治化，成為天皇制國體主義的基礎，為明治政府的國體建構的背景，最終「天皇制國家的絕對統治及忠孝道德，獲得歷史與理論的合理性。」<sup>79</sup>，政治策略確實藉由《教育敕語》的頒行而進入教育體系當中，成為明治時期的漢學復興基礎。

### 三、道德修身的提倡

在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條目制定過程中，仍有不少知識分子提出異議。比如伊藤博文（1841-1909）認為社會的混亂並非源於道德的淪喪，而是國家體制改變後，社會階層急遽重組所成。福澤諭吉（1835-1901）認為道德修身不應置於法律條文之中，應是個人自發性的道德提升或說儒教是強以德目規範人民。森有禮

<sup>74</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9。

<sup>75</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 261。

<sup>76</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 360。

<sup>77</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115。

<sup>78</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 360。

<sup>79</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 294。

(1847-1889) 則謂道德應是自主學習而非受限於規範中<sup>80</sup>。此類以道德修身為主題的論爭，使得彼時的和、漢、洋學者有所爭論，然而在《教育敕語》頒行之後，確立日本政治與教育相結合的治國方針，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道德修養。

明治時期對漢學復興的成因，政治上的需求是重要成因，藉由儒家道德觀的提倡，達到社會秩序的維護，以之作為西洋民權思想的抑制。文藝復興以來的學說包括流行於英美的個人主義思想，與儒家群體式的價值觀兩相悖逆，藉由此些體現儒學價值觀的條文，達到政治與教育的統合，此背景亦讓漢學家有活動的空間，構成漢學復興的基礎。

明治十幾年代，部分知識分子對西化政策的內裡有所省思，認為文明開化的成效僅在於知識與技藝，道德的層面並未有所著重。西村茂樹（1828-1902）、元田永孚（1818-1891）等人為此中代表，認為明治政府的西化策略對於技藝與知識的過分偏重，造成風俗上的敗壞，應維護道德，以遏止風氣的偏差。藉由崇尚道德的教育實踐，以達到矯正之功效，日本的教育應該提倡「祖訓國典」，而非以洋風為取法。「祖訓國典」的本質，實為「身分取向的儒家教訓」<sup>81</sup>，儒家階級式的道德觀成為政府所鼓吹的思想，其原因無非是以之作為強調君臣大義的政治策略。此種以儒家為基礎的道德教育，是具有國家主義、皇室中心主義的色彩，藉由教育帶來政治上的影響性。因此基於道德提倡的目的，漢學作為道德提倡的手段而推行。或說自此起始，日本政府對於教育的政策，可以說是由原先效法西洋，習取技藝知識，以獲得制度器物上的進步，改為回歸漢學，以儒家式的德目為依據，將重心轉為道德修身。

無論是《明治詩話》中所反映的時人對於文明開化的反思，或是活躍於政治教育領域上的西村茂樹、元田永孚等人對相關法條的影響，官方與民間對過度西化的政策逐漸產生批判的風潮，無論是對舊幕府時代的生活與人物進行追想，或是教育層面、法制層面提出理論與條文的修正，皆顯示漢學的復興，並非官方或

<sup>80</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3。

<sup>81</sup>陳弱水：《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頁 250。

民間單一面向的提倡，而是在時間積累之下，逐漸醞釀為風氣，自明治十年代起，藉由官方民間兩方面共同推動所造成的現象。

對於漢學的提倡，官方民間漢學研究團體的活動，即是在此種背景下發生。明治政府欲建立的近代化國家，是以西洋諸國為參考，然為了天皇制的維護，思想層面效法勢必無法落實，僅能以器物的西化作為目標，此即是在明治時代以西化為尚的風氣中，能達到漢學發展高峰的背景狀況。

#### 四、斯文會的活動

在《教育敕語》頒行後，日本政府教育策略由開化主義轉往儒教主義，顯然是官方的政策改換的關鍵。以民間的角度而言，亦有漢學者藉由漢學相關研究組織的建構，進行漢學教育的維持與推廣，斯文會即是其一。斯文會的前身是由森重遠（生卒不詳）、岡本監輔（1839-1904）、福地源一郎（1841-1906）等人為核心，建立名為思齊會的組織，然而彼時幕末的漢學者逐漸凋零，又為自由民權運動的興盛期，時風西學為尚，故未能引起太多的迴響。而後會員藉由尋求政府官員的支持，在官員岩倉具視（1825-1883）、股野琢（1838-1921）、廣瀨進一（1845-1904）等人的支持，獲得政府的經費援助，並在重野安繹（1827-1910）、川田剛（1830-1896）、谷干城（1837-1911）等學者的參與後，將思齊會進行整合改組。至明治十三年（1880），斯文會成立於神田錦町的華族會館，以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會長，以谷干城作為副會長，與會者除明治政府的官員之外，亦有中國公使何如璋。<sup>82</sup>

斯文會是以《論語》作為命名的來由<sup>83</sup>，其創立緣由，是出於漢學者對社會秩序崩壞而產生的危機感，欲藉由儒學的恢復重整社會秩序。漢學者的危機意識，與明治政府對自由民權運動憂慮下，獲得支持之後，以皇族作為會長，亦表示斯

<sup>82</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201。

<sup>83</sup>出自於《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會由民間學者自行發起，演變為受政府所支持的組織，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目的。試看川田甕江（1830-1896）所記〈斯文會記〉：

斯文會何為而設也？振起斯文也、以文會友也。夫經緯天地之謂文、道德博聞之謂文、學勤好問之謂文、慈惠愛民之謂文、有儀可象之謂文、辨而不爭察而不羈之謂文、貴本之謂文、道藝之謂文、法度之謂文。其書則經史子集、其義則禮樂射御書數、其德則知仁聖義忠和、其行則孝友睦淵任恤、其業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sup>84</sup>

此段對斯文會的創設主旨，具有明確的說明。振起斯文與以文會友，是為設立宗旨，然試究斯文之「文」可知斯文會對漢文的提倡，無非是建立在傳統漢學以道德教化目的的出發點上，漢學與君主政治，具有實際上的連結，漢學是為了政治而服務。在川田甕江對「文」一辭的闡說上，可大略分為數類，一類是學術性、教育性的「文」，如學勤好問、道德博聞、辨而不爭察、有儀可象、道藝，一類是道德性的「文」，如貴本，另一類則為政治性的「文」，如法度。斯文會所欲振興的「文」具有數種性質，此性質的歧異性，也意味著斯文會並非單純的學術研究組織，而是由漢學的研習，具有某種實質目的推行。

〈斯文會記〉以「經史子集」作為研習的範圍，提倡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淵任恤等傳統德行，此類德行是為了維持具有階層性的社會秩序，藉此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由此可知，斯文會的成立，以及官員對斯文會的支持，無非是希望藉由漢學本身的道德性，維持舊式的社會秩序，以壓抑社會上的自由啟蒙思想。

由親王作為會長，是表達政府方的干預與支持，宮內省亦提供實質上的資助，每年提供兩千四百元的金援，並且，宮內省亦將太政官管轄下的舊史館借予斯文

<sup>84</sup>轉引自陳瑋芬〈「斯文学会」の形成と展開〉《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 中国哲学論集》1995年12月，卷21，頁92。

會作為活動場地<sup>85</sup>。藉由斯文會振興漢學宣揚道義，在官方與民間的合作下斯文會成立，漢文復興的一環，而展開種種活動。其實質活動在於演講、著書、辦學、三種項目，由明治十四（1881）年起，以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主體的講師，講授《詩經》、《尚書》、《論語》、《孟子》等書。著書的部分，則有會員詩文集《斯文一斑》、學會演講筆記《斯文學會演講筆記》、《斯文學會報告書》等相關著作<sup>86</sup>。並於明治十六年（1883）在宮內省的資助下成立斯文齋，授課科目有修身學、文章學、法律學、史學等科目。

由斯文會的成立與活動內容，乃是藉由漢學的復興達到政治性的目的，由以儒家為主體的學問，推行充滿儒家色彩，具有階級之別的社會秩序，此種思想，為天皇制的確立進行思想傳播，與幕末時代風氣有重疊之處，是較為保守的思想。可惜的是在明治西化的時代風氣之下，斯文會的設立，未能完全達到此種思想推行的目的，明治十六年至二十年（1883-1887）左右是被稱為鹿鳴館時代的西化全盛期<sup>87</sup>，在森有禮任職文部省改換教育政策方針後，隨著斯文齋的閉校，授課的漢學者各自分散，也帶來斯文會的衰微，斯文會雖能為漢學復興具有一定的助力，然其終就有時間上的侷限。

若說斯文會是民間發起，官方資助下的組織，作為漢學復興的助力，那麼，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設立，則全然是政府方面的提倡，藉由學科的設立，顯示政府對於漢學的重視，由官方資助的學費，藉由官方對於漢學研究相關人員的獎勵與培育，以期達到政治上的企圖。

### 第三節 古典講習科的成立

<sup>85</sup>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01。

<sup>86</sup>陳瑋芬〈「斯文学会」の形成と展開〉《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 中国哲学論集》1995年12月，卷21，頁91。

<sup>87</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319。

## 一、學科體制的創設

在明治時期的學制改革中，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創設，扮演漢學人才培育的重要地位。東京大學在明治十四年（1881）設立，在學科以英文授課的狀況下，加藤弘之憂慮於漢學後繼者的培育，而有設立和漢文科的建言<sup>88</sup>。此處「和」與「漢」的學問分別，是產生於幕末，至明治以後才確立和學、漢學、洋學的學問分類<sup>89</sup>。和漢文學科的設立，也意味著此種以國別進行學問分類的方式，也意味著漢學逐漸自日本抽離，漢學的提倡雖與政治需求不無關聯，但最終的結果，卻形成以考證為基底的學術研究，而不著重於規範階級秩序及道德教化的部分。

加藤弘之數度提出建言，而有古典講習科的設立，其中教員為承襲幕末漢學的最後一批學者，皆為當時漢學界的一時之選，如中村正直（1832-1891）、三島毅（1831-1919）、島田重禮（1838-1898）、井上哲次郎（1856-1944）等人，皆受聘負責講授古典講習科各領域<sup>90</sup>。

在新制學校的設立之前，明治初期具有相當數量的漢學私塾以及漢詩文團體，大沼枕山（1818-1891）的下谷吟社、鱸松塘（1824-1898）的七曲吟社、森春濤（1819-1889）的茉莉吟社，皆為此時民間自組的漢詩團體<sup>91</sup>。此漢詩吟社與漢學塾繁盛的現象是承襲江戶時期各地藩校的漢學教育，亦為漢學者活躍的結果，漢文的私塾，是江戶漢學者在進入明治後的活躍之處，亦是在明治政府藉由版籍奉還、秩祿處分等諸般政策，將諸藩的權力收歸中央後，藩士因社會階級重整而失去俸祿，開設私塾以營生<sup>92</sup>。到明治十年以後，更有三島中洲的二松學舍，中村敬宇的同人社等漢學塾的興盛<sup>93</sup>，此類漢學塾部分於日後改制為大學，為漢學界的人才培育，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為明治儒學復興的助力。

<sup>88</sup>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4。

<sup>89</sup> 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 116。

<sup>90</sup> 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216。

<sup>91</sup> 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81。

<sup>92</sup>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231。

<sup>93</sup>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頁 18。

漢學的復興可由數種面相來看，官方的提倡與民間的發揚，漢學家獲得能發揮所長的場域，並由此類機構，培養漢學研究的後繼者，造成了漢學的存續。另一方面，正因為明治時期對西洋的接受，在學術上引進西洋研究方法，而有研究領域的擴展與界定。漢學的復興，實為將傳統學問導向近代化研究的過程。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設立即為代表，古典講習科所培育的人才，是以漢籍研究為基礎，將研究領域擴展為中國文化的各層面，是將傳統漢學轉向新式支那學、中國學研究的重要過程。

在明治時期的西化政策下，民間對西洋的崇拜情形使得漢學被視為陳腐之學，當時學風傾向西洋，對漢學亦有激烈的批判，以福澤諭吉（1835-1901）、中村正直（1832-1891）、森有禮（1847-1889）等留學西洋者為核心，學者組織明六社，以宣揚啟蒙運動為目的，藉由出版雜誌傳揚西學，並對漢學進行批判，認為漢學無益，致力推崇以實用為尚的西學。然明治維新對於西洋的模仿，仍停留於器物制度層面，西洋的啟蒙思想，並不利於政府所採行的天皇制，故漢學的提倡具有重要性，因漢學是以儒家具有階級秩序的思想為主軸，對於天皇制的確立有所助益，在此近代國家的形成中，造就漢學復興的潛在因子。倘若持續全面西化的教育策略，漢學人才終零落如晨星，日本學士將只通英文<sup>94</sup>，是東大總理加藤弘之（1836-1916）對於大學教育現狀的憂心。但是加藤的憂心未必僅對學問現狀而發，而是出於一定程度的政治關心，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是需要建立於本國的文化上，以漢文書寫的古文獻是理解日本的必要之作，故須培養人才。另一方面，學習西洋思想，將促成民主主義的發展，此不利天皇制的維繫，應重提漢文教育，是為了日本的學問與政治而產生的措施。

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在明治時代的漢學復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典講習科的設立可視為政府對漢學教育的重視，學科創設可謂將漢學與彼時的西洋之學作為均等的學問。對學生的獎助、公費生名額的設立，都可視作彼時政府對於漢學

---

<sup>94</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4。

存續與人才培養的方式，除此動機，古典講習科的設立亦有政治企圖隱含其中。漢學以儒學為中心，對儒家經典的重視，是為傳統上尊王思想的延伸，藉由儒家具具有階級性的社會觀、政治觀，明治政府對漢學的獎勵，是對天皇制的穩固之舉。

東大古典講習科是否達到政府的政治企圖，此有待探討，再者，藉由古典講習科所培育出的學者，無非是使得明治漢學興盛的重大原因，古典講習科的學生，成為各領域的開拓者，豐富漢學研究的面向，亦對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具有極大的貢獻，以下試論東大古典講習科成立始末，以理解明治漢學復興，以至於日後支那文學史的書寫風氣形成，進行背景研究。

明治十六年（1883）古典講習科設立，然此科並非東京大學創設時（明治十年，1877年）即有的學科。東大創立時，文學院設有和漢文學科，此學科的存在是為解讀和漢古典籍，縱使明治維新是以西化為目標，在制度與學科上皆取法西洋，然漢文作為歷史書的書寫載體，為了解日本的歷史與政治，需培養能解讀古典籍之人才。東大總理加藤弘之，對和漢文學科的必要性進行說明，建言：

今日之勢，斯文寥寥如晨星，今不置之於大學科目中，不僅不可永久維持，自稱日本學士者，唯通英文而亡乎國文。<sup>95</sup>

時風以洋學為尚，以及幕末的漢學家陸續凋零，使得漢學人才的培養勢不容緩，在此之下，東京大學於明治十年（1877）創立時即設立和漢文學科，作為教授國學與漢學等古典籍的學科，以期在西學興盛的風潮下，仍可培育承繼傳統學問的學者。然彼時的東京大學是以英文授課，另一方面，將以日文為材料的國學與以漢文為主軸的漢學兼併為一學科，在範圍上仍然太過廣泛，故此，加藤弘之近一步向文部省提出建議設立古典講習科的建議，然不為文部省所核可，在加藤氏數度提出建議後，方有古典講習科甲部、乙部的創設。

---

<sup>95</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4。

明治十五年(1882)附屬於文學部的古典講習科始招生，以國學為授業內容，在次年新設以漢文學為授業內容的新設學部後，古典講習科正式分為甲部、乙部，前者講授國學，後者講授漢學，皆招收公費生與自費生。值得注意的是，起先甲部的公費生人數較多，故加藤弘之向文部省建議增加乙部公費生的人數，並且在學科名稱上，提出「古典講習科乙部之名，似國典之一部份」<sup>96</sup>認為甲、乙科名之別，有等差之義，定名乙部，像是將漢籍研究附屬於國典(即日本典籍)之下，應將甲部、乙部改稱國書課、漢書課，以授業內容區分，藉此達到體制上的平等，此或反映彼時國學者與漢學者間的對抗意識。

古典講習科是以國學與漢學為構成內容，也意味著漢學在日本古典學術的不可分割性，明治時期能產生漢學復興的現象，即是來自此種漢學無法自歷史中割裂的狀態。自古典講習科創設的過程，可知當時縱使有志之士能體察歷史文獻須賴能解讀古典籍的漢學者，故對漢學的存續深感憂心，亟欲以學科的創設謀求人才的培養，然明治十幾年代是西化風氣最盛的鹿鳴館時代<sup>97</sup>，政府對漢學研究相關之學科創設，未有積極性，以致古典講習科的設立，是在加藤氏的屢屢建議下延宕數年方設立。但值得注意的是，名額僅有四十名的古典講習科，有一百六十人報考，考試科目包括經書、《左傳》、《史記》、漢文作文等，都是以漢學為內容<sup>98</sup>，能吸引高於錄取人數數倍的報考人數，意味著西化時風下，明治日本知識分子仍是以漢學素養為基礎，未曾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留學經歷者，仍試圖藉由講習科，進入新式的學科體系。

由是觀之，在明治維新以前，以漢學為學問全體的狀況，在文明開化的西化思潮之後，逐漸為新式的學制所取代。但是漢學所具備的倫理與道德教化功能，為漢學者所提倡，使得漢學仍可存在於教育體系中，亦藉由法規的訂定成為全民思想層面的準則，漢學終在政治的意圖之下，產生復興的可能。

<sup>96</sup>藤田大誠：〈明治国家形成と近代的国学構想--古典講習科の展開・終焉と國學院の設立〉《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卷40，2004年12月，頁105。

<sup>97</sup>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頁53

<sup>98</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162。

## 二、漢學人才的培育

古典講習科的成立，以古典籍作為授業內容，以培養漢學的後繼者為目的，漢學的作用，可以由元田永孚（1818-1891）所記〈聖諭記〉中，明治天皇對古典講習科的評價：「和漢學科者專於修身。」<sup>99</sup>來看。統括國學與漢學的古典講習科，其授業是以修身為重，如同漢學傳統上具有道德教化的目的。然而，若由報考古典講習科的動機以及畢業生日後的發展而論，此學科所達到的成效，可謂與道德修身無甚關聯，而是以考證一路的學術為發展。如甲部畢業生關根正直（1860-1932），自述是出於對古典文獻閱讀與考證的愛好，故欣然入學<sup>100</sup>，在觀察畢業生的研究發展後，也能證實此種著重考證的學風。

古典講習科的運作時間極短，至明治十八年（1885）停招，僅有四十四名畢業生，然檢視畢業生名單，可知古典講習科在欲培養漢學研究後繼者的創設目的上，仍是達到極大的成功，在畢業的兩期學生中，可見於日後漢學研究上具有建樹的學者，分別活躍於各個研究領域，擴展漢學研究之面向，亦藉此將傳統涉及道德義理等部分的漢學研究，逐漸轉變為純學術路線的支那學、中國學研究。試見以漢學為受業範疇的古典講習科乙部（漢書課）畢業生，市村瓚次郎（1864-1947）、林泰輔（1854-1922）、岡田正之（1864-1927）、瀧川龜太郎（1865-1946）、兒島獻吉郎（1866-1931）、長尾慎太郎（1864-1942）、菅沼貞風（1865-1889）等人，皆為在漢學研究上具有建樹者，以中國為範疇，開拓學術上的不同研究面向，並且影響日後的研究分野。比如市村瓚次郎以東洋史學為專攻，任教於東京大學，與白鳥庫吉（1865-1942）奠定東大的東洋史學基礎，以考證學為基礎，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層面，著有《支那史》、《支那史要》等書。林泰輔編有《龜甲獸骨文字》載有日本所藏甲骨，為日本甲骨學研究第一人，極早斷言甲骨是為殷王室

<sup>99</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51。

<sup>100</sup>藤田大誠：〈明治国家形成と近代的国学構想－古典講習科の展開・終焉と國學院の設立〉《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卷 40，2004 年 12 月，頁 106。

的所有物，並非庶民由使用。林泰輔《支那上代史研究》由瀧川龜太郎作序，瀧川言：

回顧明治維新以來之漢學，安井息軒、鷺津義堂、岡松甕谷、根本通明、重野成齋、中村敬宇、島田篁村、竹添井井等人次第凋零，漢學命脈漸絕。彼時起彌縫之力者，為大學古典科出身諸子，其中又以文學博士林泰輔君最為特出。其人於鄉里，習朱子學派並木栗水之學，後赴東京從島田篁村考證之風，其學不限於經學，更博通支那古文獻。<sup>101</sup>

上述可知，林泰輔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由考證著手，並參照地下材料與典籍相對應，奠定歷史研究的基礎。其於甲骨學研究之外，對朝鮮史的關注，亦開風氣之先，其《朝鮮史》、《朝鮮通史》、《朝鮮近世史》的陸續出版，可見其對考證史料的著眼。林泰輔的書籍收藏，包含近兩千冊的漢籍，特別著重於論語的收集，以和刻本為主，為日本漢籍研究具有極大建樹<sup>102</sup>。岡田正之師事重野成齋，後任教於東京大學，講授支那文學概論、支那文學史等科目，著有《日本漢文學史》一書，為日本最初講述漢文學史的研究著作；瀧川龜太郎是以《史記會注考證》一書名世；菅沼貞風為研究日本對外貿易之學者，以史料作為研究之佐證，完成《日本商業史》卻於菲律賓調查殖民貿易事業的過程中客死異鄉。長尾兩山著重於藝術史領域，著有《中國書畫話》，與中國文士學者羅振玉（1866-1940）、吳昌碩（1844-1927）、鄭孝胥（1860-1938）、黎庶昌（1837-1897）等人交遊，曾任商務印書館顧問，曾任教職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sup>103</sup>。

東大古典講習科僅有兩屆畢業生，適可反映彼時西學之盛，在有限的預算中，古典講習科僅運行極短的時間即面臨廢止，然恰如瀧川龜太郎所言，講習科的畢

<sup>101</sup>林泰輔：《支那上代史研究》（東京：光風堂書店，1927年），頁1。

<sup>102</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279。

<sup>103</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145。

業生，對於當時幕末過渡至明治的漢學人才斷層，具有彌縫之力，其研究方式別於當時以白鳥庫吉為首的疑古學風，是以傳統的考證學，加上地下材料的佐證，進行各個領域的研究，其範疇包括史學、文學、思想、藝術等各層面，涵蓋日後的研究面向<sup>104</sup>。

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創設，在動機上無法排除政治上的目的，培養漢學人才，無非是期望儒學所代表的道德修身，能發揮政治上的影響。然綜觀古典講習科出身的學者，其研究範疇是涵蓋中國文史哲各領域，無論是研究分野的開拓，或是研究方法，皆顯示出與創設目的相悖的成果，即是純粹的學術路線。由講習科諸子的研究來看，儒家講求的道德修身並非研究的動機，其研究成果也未盡以政治目的為出發點。固然古典講習科諸子皆是受傳統漢學教育，經由以漢文為主的考試獲得入學資格，與其餘學校測驗包括英文的測驗科目有所不同，在當時大學教育以英文授課的環境中，古典講習科確有體制上的特殊之處<sup>105</sup>，也因著學生的漢學背景，反映在他們的研究中，對儒家典籍有一定程度的關注。比如林泰輔對於《論語》諸版本的收集與整理，代表作〈周公與其時代〉的書寫，皆反映儒學對其治學方向的影響。但此種儒學的影響，並非政府所期望的道德性影響，林泰輔是以考證學為基礎，處理此類儒家典籍，並且以地下材料的甲骨文，作為互相驗證的材料。在方法上與動機上，皆是走向純粹的學術路線，與明治天皇「和漢學者專於修身」將漢學家、漢學界定為道德性的修身，相距甚遠。由此可見，漢學者的定義也在明治時期逐漸轉變，由傳統的修身，逐漸轉向學術研究。

論及古典講習科所培育的人才中，兒島獻吉郎（1866-1931）是極為重要的一位，其所著《支那文學史》是早期文學史著作中較為完整的一部。其書寫的體例，更為藤田豐八、笹川臨風所承襲，顯示其著作在眾多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中的重要性。

大抵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書寫風氣之所以興盛，與西歐的文學史觀傳

<sup>104</sup>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41。

<sup>105</sup>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62。

人有直接的關聯。三上參次、高津楸太郎的《日本文學史》，是受西歐影響成書，由序言中可知，三上、高津得知文學史的存在，而亟欲用於日本文學的研究<sup>106</sup>。此後，以中國為研究主體的《支那文學史》成書，即是因為明治日本相較於當時的中國，更能習取西歐的近代文化，如同川合康三所言：「由西歐傳來的文學史概念，加上自古以來浸透日本的漢學積蓄，成為中國文學史誕生的原因。日本之所以能極早產生中國文學史的書寫，絕非偶然。」<sup>107</sup>對當時具有西學及漢學素養的學者而言，《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具有必然性。古典講習科出身的兒島獻吉郎，其《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的成書，也是成書於此風氣之下。

兒島獻吉郎，號星江，備前人（今岡山縣），生於儒者家族<sup>108</sup>，曾入二松學舍師事三島中洲，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古典講習科。曾任職於帝室博物館、熊本第五高等中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帝國大學、二松學社大學等<sup>109</sup>。其代表著作有明治二十五年（1892）《支那文學史》、明治二十七年（1894）《文學小史》、明治四十二年（1909）《支那大文學史古代篇》、明治四十五年（1912）《支那文學史綱》等書，是以支那文學史為研究重心的學者。其《支那文學史》是第一本定名為支那文學史的著作，相較於末松謙澄的《支那古文學略史》，兒島在題名上清楚呈現文學史的觀念，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此書內容仍具侷限性，雖以文學史為題，實際上僅論述至古代的斷代史性質著作。兒島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是具有創建，比如《支那大文學史古代篇》在時代的區分上，別於古城貞吉於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學史》的區別方式，是將中國由上古至六朝的文學分為胚胎時代、發達時代、全盛時代、破壞時代、彌縫時代、浮華時代六期<sup>110</sup>，為各個時代的文學進展訂下標題，別於此前純然以時代區分的文學史著作。在論述上，特別著重於文學流派之間的承襲與變化，比如注意到楚辭對漢賦的影

<sup>106</sup>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東京：創文社，2003年），頁6。

<sup>107</sup>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頁7。

<sup>108</sup>杜軼文：〈兒島獻吉郎の支那文学史研究について〉《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71（2003年3月），頁181。

<sup>109</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565。

<sup>110</sup>兒島獻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編》（東京：富山房，1909年），頁2。

響，以及六朝時陶淵明、謝靈運的詩作，為唐人宋人所效法的現象。在內容上，兒島觀察到中國文學南北特色不同，著眼與地域與文學的關係，將之作為文學史書寫的綱領，成為日後其他文學史作者的效法對象。在敘述上，則不囿於傳統漢學以道德教化為著眼點，注重作家道德操守的現象，認為道德與文學未必具有關聯性：

文學者非道德家，古之文士多限於輕薄，詩人常過於奇激。……文學之真美，未必與道德之真善一致，故文學者常有違於君子之道。<sup>111</sup>

兒島在行文中不以道德審視作家作品，跳脫漢學之藩籬。從《支那文學史》到《支那文學史綱》，兒島的文學史研究專著，隨著時間逐漸建構完整，至《支那文學史綱》一書，收錄上古至清代的文學作品，是具有通史性質的著作，亦列舉龔自珍、曾國藩、王韜、吳汝綸、俞樾<sup>112</sup>等人，作為代表，將以往文學史著作常以盛清為時代下限，推展至與明治相近的晚清。兒島獻吉郎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甚鉅，長時間關注中國文學，以此做為研究重心，《支那文學史綱》由山田準（1867-1952）所撰寫的漢文序言，論及兒島著述之嚴謹，其言：

方今文明著作充于世，學者大率費旬月之成之，蓋汲々于釣名弋利也。子文則不然，問其十年所成，則僅至先秦迄隋氏，唐宋以後將有更所編述，蓋欲殫舉生之力于此也。猶自謙曰吾無才學識之三長，故困勉至此。吾不信也，三長已具，加之以精苦篤好，如此則吾子文之撰述超越一代不與夫沾々自喜者同其撰也。<sup>113</sup>

<sup>111</sup>兒島獻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編》，頁 15。

<sup>112</sup>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頁 381。

<sup>113</sup>兒島獻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編》，頁 2。

上述顯現兒島獻吉郎費時而成的文學史著作，是其研究心血，對於《支那大文學史古代篇》收錄內容的斷代性，亦出於研究撰述的謹慎。總體而言，古典講習科出身的兒島獻吉郎，是《支那文學史》相關研究的開創，無論就體例或者內容皆有建樹。其論述淡化道德教化意義的文學觀，更顯示出明治時期，古典講習科的創設，改便傳統漢學逐漸轉型為支那學研究，而以西洋的文學史觀念審視漢籍，不限於訓解或道德上的詮釋。縱使古典講習科的設立目的，有明治天皇〈聖諭記〉中期盼培育為國家所用的政治人才<sup>114</sup>，但就結果而論，卻培育出著眼學術的研究者，不以傳統漢學的道德修身作為目標，如同町田三郎所言：「古典講習科的學問目的，不再政治，也不再道德，而在於成就學者之純粹性學問之道。就此意義而言，近代漢學研究是從古典講習科開始的。」<sup>115</sup>檢視兒島獻吉郎的生平著作，可知其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是對於傳統漢學之轉型，其對文學的審視已脫離道德教化，是以漢籍為中心，兼採西洋文學史觀的純粹學術性著作，古典講習科在承先啟後的人才培養上，是具有極大的作用，縱使僅有兩屆的畢業生，但是在近代中國文學研究上已奠定基礎。

---

<sup>114</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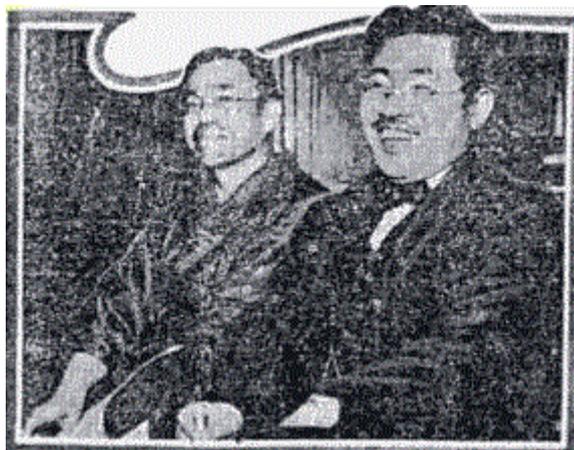
<sup>115</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63。

## 第三章 優游文人：笹川臨風其人及其著作

明治時期（1868-1912）由日本學者所編纂的《支那文學史》，領先於中國學者將西洋的文學史概念用於中國古典文獻。當時日本學者《支那文學史》作為最早的一批文學史著作，在體例與內容上皆是典型的確立，對於後世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建立範式，無論是在日本或中國，皆成為後繼學者的取法對象。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處於漢學、西學，新舊學風的交替時期，在內容上也呈現諸多嘗試性的擴展，也因為當時的文學史書寫體例，仍處於建構的階段，故於支那文學史的書寫中，編纂者的研究偏好與教育背景所致之性格特質，常體現於文本當中，產生各具特色的支那文學史。

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出版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在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選輯與規範的同時，亦呈現笹川其人的研究趣味，笹川對戲曲小說的重視，其成果可見於《支那文學史》中，於明治這一文學定義再構築的時代中，具有重要意義，將戲曲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環，進一步納入文學史的範疇成為新興的研究領域。

圖 3-1 左為笹川臨風<sup>1</sup>



<sup>1</sup>圖片來源為《ヌブンケン》171號，2009年。照片攝於大正九年（1920）。

## 第一節 笹川臨風其人及其交遊

### 一、生平概述

笹川臨風(1870-1949)，本名種郎，以號行。生於東京，自小接受漢學教育，習《四書》、《文章規範》、《十八史略》等書，同於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是以傳統的漢學典籍，作為其學問的啟蒙，就各類漢集中，笹川尤鍾情《資治通鑑》，在日本的漢學流派中，對水戶學特感興趣<sup>2</sup>。笹川對學問的喜好是值得注目的，《資治通鑑》為實用的學問，講求政治上的治用。至於做為江戶時期諸多漢學派別之一的水戶學，亦著重於政治思想，不只以儒學為主軸，同時參雜國學、神道思想，提升日本的國家主體性，並且試圖替面臨內憂外患的幕末日本，提出解決之道，在明治之前，江戶後期的水戶學影響幕末的志士，提倡尊王的思想，亦成明治維新思想的基礎。

笹川生於明治初年，當時為明治政府的奠基時期，無論是在對外的條約上，或是對內的政治法條規範，皆是尚未穩定的嘗試時期，政府機關的設置，郵務的創設亦然，在土地政策上，廢藩置縣、北海道開拓皆於當時發端。就實際而言，體制的變化、社會階層劇烈改組，是知識分子發揮的場所，在此背景之下，笹川對學問的喜好，亦反映其喜愛致用之學，關注社會現實的一面，笹川也受到當時流行於社會的自由民主思想影響，對學問具有兼容開明的傾向。

考笹川臨風的求學歷程，可知笹川有意願進學至讀工部大學，然在體制變動下進學未果<sup>3</sup>，於明治26年(1893)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就讀。笹川本欲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工部大學，該校以土木、機械、建築、電信、化學等學科所構成，在當時為日本理科的最高教育機構，並非著重理論，以其對實務的重視聞名。

<sup>2</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72。

<sup>3</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572。

在笹川日後的研究傾向中，關注現實，著眼於近世的變化，亦是其性格的體現。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後，笹川的同學有藤田豐八（1869-1929）、小柳司氣太（1870-1940）<sup>4</sup>，是為日後在支那學的領域中活躍的學者，對於文學、思想、宗教等不同領域的中國研究，能有開拓性的成果，笹川作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畢業生，亦在中國戲曲小說的研究上，成為研究的先行者而為人所知。

## 二、「江戶趣味」與笹川臨風

笹川《支那文學史》即是將戲曲納入文學範疇的重要著作，對戲曲評價之高，與傳統中國文人觀念迥異。笹川自己亦對此有所體認，明白中國向來不重視戲曲研究，以至於資料搜羅不易，造成成書時的困難。若依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所受的漢學教育而論，笹川對戲曲的喜愛是具有獨特性。因漢學傳統之下，戲曲小說並非值得重視的領域，與笹川同時的支那文學史作者古城貞吉（1866-1949），即對中國戲曲小說做出批判性的觀察：

支那文學以儒教主義為開展，故其文辭儒雅切實，以實用為目的。詩賦以溫柔敦厚為旨，取此為標準，是故士君子未敢染指戲曲小說。<sup>5</sup>

古城認為戲曲小說不受重視，是因其違背中國傳統儒家實用性的文學觀，並且不符合文辭雅正的取舍所致，以致不受重視，檢視古城的《支那文學史》正文中，亦不見論述戲曲小說的章節。由是觀之，笹川臨風長時間關注中國的戲曲小說，並將之列入文學史中探討，是顯示其在明治時期文學史作者群中的異質性。

---

<sup>4</sup>杜軼文：〈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 80（2008 年 3 月），頁 131。

<sup>5</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 年），頁 583。「此の如く支那文學に於て儒教主義の開展せられたる結果、其文辭に於ては儒雅切實を以て用に適す為し、詩賦に於ては溫柔敦厚を以て教旨と為して、標準を此に取れり、是に於てか戲曲小説等作に至りては、自らけられて士君子の敢えて指を染むるを有様と為れり。」

為何笹川及早顯現對戲曲研究的關注，或可由其性情中尋求原因，就他人對笹川的評價，有評其為「江戶興趣者（江戶趣味の人）」，笹川本人曾於自筆年譜中記述<sup>6</sup>，並贊同此說。江戶時期不僅庶民文化盛行，以日文假名寫成的通俗讀物假名草子受到庶民歡迎<sup>7</sup>，戲劇則有木偶淨琉璃與歌舞伎的盛行<sup>8</sup>，中國小說戲曲亦於日本江戶時代大為流行，特別是寶永（1704-1710）寬政（1789-1800）年間最為盛行。笹川臨風嘗言年少時的閱讀趣味，在於：「以《里見八犬傳》、《弓張月》、《娘節用》等為首，耽讀江戶時代之讀本草雙紙。」<sup>9</sup>特別喜愛江戶時期的通俗作品，對於戲曲小說的喜好，為笹川江戶趣味的一種體現，笹川臨風是以《東山時代的文化》作為博士論文，對此著作，久松潛一（1894-1976）評為：「史料運用頗豐，兼及茶道、繪畫、庭園、五山文學各領域，說明東山文化之特性。」<sup>10</sup>，以笹川為「多彩的文人」<sup>11</sup>，此種對笹川特質的側面描寫，或有助於理解其對中國戲曲小說的興味來由。笹川對於文學研究的關注，或出於此種文化關照，將文學視為文化之一環。因此笹川《支那文學史》不止漢籍中經世致用的學問，庶民文化中關乎人情的部分，亦為其關注之處，將戲曲小說收錄於文學史著作中，或有呈現中國文化整體的企圖。

就笹川其人性情特質，一同受業於東大漢文科以及共同編寫《支那文學大綱》的田岡嶺雲，也曾有所描述：

純然乎江戶之子，意氣洋洋，其情醇粹……瀟灑一箇風流才子，閑雅整飭，兼之多能。擅歌謠，擅三味線，擅煮茶插花，若往日旗下貴公子。其文為絢麗才人之調，得自其人最嗜之支那戲曲小說。<sup>12</sup>

<sup>6</sup>吉田悦志：〈笹川臨風の位置〉《大學史紀要》七卷 80，（2002 年 12 月），頁 61。

<sup>7</sup>三宅正彥著，陳化北譯：《日本儒學思想史》（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15。

<sup>8</sup>加藤周一著，葉渭渠、唐月梅譯：《日本文學史序說（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年），頁 163。

<sup>9</sup>轉引自吉田悦志：〈笹川臨風の位置〉《大學史紀要》七卷 80，（2002 年 12 月），頁 59。

<sup>10</sup>轉引自吉田悦志：〈笹川臨風の位置〉《大學史紀要》七卷 80，（2002 年 12 月），頁 60。

<sup>11</sup>轉引自吉田悦志：〈笹川臨風の位置〉《大學史紀要》七卷 80，（2002 年 12 月），頁 60。

<sup>12</sup>笹川臨風、白河鯉洋編：《嶺雲文集》（東京：玄黃社，1913 年），頁 352。「純乎たる江戶ッ

由此與笹川與熟識的田岡嶺雲的評價，與久松潛一閱畢笹川臨風論文後的評判「多彩的文人」<sup>13</sup>相互映證，笹川喜愛各種生活閑趣，具有文人的特質，其對於支那戲曲小說喜愛，影響行文的風格，亦為熟人所知。

另一方面，江戶至明治時期，日本曾出版《水滸傳》、《三國志》等中國小說，《西廂記》亦於明治二十七（1894）年出版<sup>14</sup>。明治接續江戶，對中國戲曲小說並非全無理解，然此種理解似限於文本的欣賞，未有以西洋方法析論的研究成果。故笹川藉由單篇文章、《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史大綱》、《支那文學史》等著作的刊行，具有兩種目的：一為作家作品的推廣，二為以文學研究的方法析論之。值得注意的是，笹川理解中國對於戲曲小說等俗文學的重視性不足，是出於以儒家視角以戲曲為技藝之末未足觀，而內容的俚俗亦為小說受到輕視的主要原因。然而，笹川在進行研究時，不以反儒家的視角進行批判，而是嘗試以儒家的立場解釋，使戲曲小說的存在符合既定的規範；另一方面，又試圖立道德規範之外的檢視標準，是以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感定其價值，以文學的批評，削弱往昔以道德規範訂定文學作品優劣的狀態。

關於笹川評價作品的標準，可見於《支那文學史》中，其論及前人評點戲曲小說的標準時，對毛聲山的評點頗有微詞，對湯若士的評點則予以讚揚。原因為湯若士注重的是作品所流露的性情，以及詞調之巧倩，而非毛聲山的儒教觀點。笹川論及毛聲山的評點時，謂：「聲山之觀念為儒教見地。……評者將戲曲與正史經書同一視之，是知其妄。」<sup>15</sup>論及湯若士的評點時，則謂：「唯有明代之湯若

---

兒、意氣を喜び、情に醇し……彼が風采は即ち瀟洒たる一箇の風流才子、閑雅整飭、又多能にして、謠をよくし、清元をよくし、茶を點し、花を挿くる等、宛然たる往日旗下の貴公子、其文も又絢爛錦秀才人の調あり、これ蓋し彼が其最も嗜む所の支那の小説戲曲に得來れるもの乎。」

<sup>13</sup>轉引自吉田悦志：〈笹川臨風の位置〉《大学史紀要》七卷 80，（2002 年 12 月），頁 60。

<sup>14</sup>杜軼文：〈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 80，（2008 年 3 月），頁 138。

<sup>1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 年），頁 269。「聲山の觀る所は儒教的見地より來られるなり。……評者、戲曲を見て之を正史經書と同一視せんとす。其評の妄なる問はずして知るべきのみ。」

士，評《琵琶記》以性情為其費盡筆墨工夫處，並以詞調之巧倩為長，此是千古不滅之評語。」<sup>16</sup>針對毛聲山、湯若士二人之評語可知笹川對戲曲之審視標準。笹川所否定的並非儒家觀點本身，而是以戲曲這一文類，並非正史經書，不應該以同樣的標準審視。儒家式的道德教化觀念，並非戲曲的品評標準，作品所流露的性情與構成作品的詞調，方為笹川關注的重心。

笹川臨風對於戲曲小說的關注，或可溯及江戶時期庶民文學的興盛，加上中國戲曲小說於江戶、明治流傳至日本的外在成因，與笹川臨風性情上雅好江戶庶民趣味的內部成因，致使中國戲曲小說作為笹川臨風的研究重心所在，促成其《支那文學史》成為明治時期的文學史著作中，極富有個人特色的代表。

### 三、交友圈中的《支那文學史》作者

在觀察笹川的學經歷中，有一件值得注目的事情，其交友圈涵蓋當時各領域的學者，如山路愛山<sup>17</sup>（1865-1917）、小柳司氣太<sup>18</sup>（1870-1940）均為笹川之舊識<sup>19</sup>，其中具有編寫支那文學史之經歷者更不在少數，例如末松謙澄（1855-1920）、藤田豐八（1869-1929）、白河鯉洋（1874-1919）皆有《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的書寫。其中末松謙澄為笹川任職毛利家編輯所時的總裁<sup>20</sup>，是最早的支那文學史作者，明治十五年（1882）末松所著《支那古文學略史》<sup>21</sup>出版，是為最早將中國文學以文學史的概念規範的著作。固然在內容上，此書是屬於演講紀錄的性質，

---

<sup>1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269。「唯それ明の湯若士か琵琶を評して琵琶記は都て性情上より工夫を着く并に詞調の巧倩を以て長とせずと云へるは千古不磨の評語と云はまくのみ」

<sup>17</sup>山路愛山為歷史學家、評論家。曾任職《國民新聞》，創立《獨立評論》雜誌，與斯波貞吉（1869-1939）等人結成國家社會黨，參與社會運動。著有《荻生徂徠》、《新井白石》等書。

<sup>18</sup>小柳司氣太為中國文學者、道教學者。曾任教於大東文化大學，著有《宋學概論》、《東洋史綱要》等書。

<sup>19</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570。

<sup>20</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571。

<sup>21</sup>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東京：文學社，1882年）。

並非以嚴謹的論述體系所寫成的著作，但是檢視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擴展上已具有開創性的地位。

藤田豐八是笹川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時期的同學<sup>22</sup>，他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寫成《支那文學史》，先前末松謙澄的著作是以「略史」題名，藤田的著作則是在題名上，直接採用《支那文學史》，較末松謙澄草創的略史，更趨完整。在體例上是承襲明治二十五年（1892）兒島獻吉郎的《支那文學史》，採用在地理上將中國南北二分的做法，論地域對於文學風格的影響，並且就文學作品的藝術與思想兩方面進行探討。藤田較兒島的地域南北二分，更加細微，並且注意到文言小說與隨筆的發展，在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中，是較為完整的一部。藤田豐八明治三十年（1897）《支那文學史稿 先秦文學》刊行，此書在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中也有提及，笹川在例言中有言：「先秦（秦朝以前）的文學詳論，可參照知友藤田劍峰氏之先秦文學。」<sup>23</sup>據此，可知藤田豐八的《支那文學史稿》，為笹川實際閱讀過的文獻，亦可知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作者，也會相互問學交流，當時支那文學史的書寫是於特定知識分子交友圈中的研究風氣。

白河鯉洋主要以報人的身分活躍，為笹川臨風任職鈴木家編輯所時的同事<sup>24</sup>，曾任職《九州日報》、《神戶新聞》，亦曾編寫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白河鯉洋與藤田豐八、笹川臨風一同參與明治三十年（1897）《支那文學大綱》的書寫，負責第七卷陶淵明的撰稿。對於《支那文學大綱》一系列之著作，笹川臨風於《支那文學史》序言中提及：「欲知各朝傑出文士之傳記，可參余與同人合著之《支那文學大綱》。而今支那文學鑽研風氣日盛，豈非學界之慶事。」<sup>25</sup>，可知笹川對《支那文學大綱》的肯定，亦反映明治三十年代左右為支那文學史書寫的興盛期。

由笹川臨風與友人的支那文學史相關研究書寫情況，可以時間為排序，列出以下次第：

<sup>22</sup>藤田豐八：《支那文學史》（東京：東京專門學校，1895年）。

<sup>2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1。

<sup>24</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571。

<sup>2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1。



由此可知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作為支那文學史的奠基著作，出版時間較早，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其後的支那文學史，出版時間接近，皆為明治三十年代前後之著作。笹川臨風獨立完成的《支那文學史》與集結眾人之力完成的《支那文學大綱》大綱，在出版時間上僅有一年的差距，若檢視《支那文學大綱》的編排與內容，可視為笹川《支那文學史》的先行者。

## 第二節 《支那文學大綱》的編纂

在《支那文學史》的例言中，笹川臨風提及《支那文學大綱》一書：「欲知各朝傑出文士之傳記，可參閱余與同人合著之《支那文學大綱》。」<sup>26</sup>由笹川臨風與另外數名學者所著《支那文學大綱》，可視為文學史成書之前的先行參照。今以《支那文學大綱》為主軸，兼論笹川以戲曲小說為主題的單篇論述，探討笹川臨風於中國戲曲小說的定位與研究成果。

### 一、笹川臨風戲曲小說類著作及其他

笹川臨風對戲曲小說的關注呈現於《支那文學大綱》、《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等著作之中，其對戲曲研究的成果終體現於《支那文學史》之中。除專書之外，檢視笹川臨風發表的單篇文章，可知在書寫《支那文學史》之前，其對戲曲小說

<sup>2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2。

即有持續的關注。今就杜軼文〈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sup>27</sup>一文所整理的笹川臨風著作，製表如下：

表 3-1：笹川臨風明治時期著作表

作品名稱	發表時間	出版資訊 <sup>28</sup>
〈金聖嘆〉	明治二十九年（1896） 三月～四月	《帝國文學》
〈讀雲翹傳〉	明治二十九年（1896） 三月～五月	《文學界》
〈讀西廂記〉	明治二十九年（1896） 九月～十月	《帝國文學》
〈金陵十二釵〉	明治二十九年（1896） 十一月	《江湖文學》
〈元以前的小說〉	明治二十九年（1896） 十一月	《太陽》
〈李笠翁的戲曲論〉	明治三十年（1897）四 月	《江湖文學》
〈元代的戲曲琵琶記〉	明治三十年（1897）四 月	《江湖文學》
〈支那的戲曲〉	明治三十年（1897）六 月	《太陽》
〈湯若士的南柯記〉	明治三十年（1897）六 月	《帝國文學》
《支那小說戲曲小史》	明治三十年（1897）六 月	東華堂
〈答大町桂月〉	明治三十年（1897）七 月	《日本人》
〈晁支那文學大綱〉	明治三十年（1897）八 月	支那文學大綱一 大日 本圖書
《支那文學大綱三 李笠翁》	明治三十年（1897）十 一月	大日本圖書
〈支那文學與室町文學〉	明治三十一年（1898） 四月	《帝國文學》
《支那文學大綱五 湯臨》	明治三十一年（1898）	大日本圖書

<sup>27</sup>杜軼文：〈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 80（2008 年 3 月）頁 144。

<sup>28</sup>標書名號者，為刊行的雜誌名稱，未標書名號者，為出版社名稱。

川》	四月	
《支那文學大綱六元 遺山》	明治三十一年（1898） 四月	大日本圖書
〈與陸沈堂〉	明治三十一年（1898） 五月	《讀賣新聞》
《支那文學史》	明治三十一年（1898） 八月	博文館

檢視《支那文學史》成書以前笹川臨風所發表的著作，可知其以戲曲小說作為關注點。笹川臨風所發表的單篇文章，或以劇作家為主軸，或以作品為中心，亦有論中國戲曲的概論式著作，涵蓋戲曲小說研究的各個面向，笹川刊載於《帝國文學》、《文學界》、《江湖文學》單篇文章中所關注的內容，亦於其後續研究中獲得延續，《支那戲曲小說小史》一書中，即分節論述金聖嘆、李笠翁、〈金雲翹傳〉，可知其對戲曲小說的研究，是由單一作家作品的散點研究，逐漸建構為歷時性的文學史著作。雖說笹川所著的單篇文章今僅見篇目，但將篇目與日後成書《支那文學大綱》、《支那戲曲小說小史》、《支那文學史》的內容對照，可見論述主題的連貫性，在《支那文學史》成書以前，笹川臨風所關注文學作品，始終以戲曲小說這一文體為主軸。笹川在文學史觀尚未確立前，即在《帝國文學》、《文學界》等以「文學」為題名的刊物中，以金聖嘆、李笠翁、湯若士等人為主題。發表單篇文章，將中國傳統史書文苑傳未曾收錄的劇作家，置入以文學為題的刊物之中。在意義上，等同於鋪陳《支那文學史》，戲曲小說為文學，劇作家為文學家的定位，劇作家遂與詩人同列，成為「各朝傑出文士」之代表。

## 二、《支那文學大綱》編輯中脫穎而出

欲了解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的成書，則其編寫《支那文學大綱》的經歷不可略去而不談。由笹川《支那文學大綱》的編寫，可見其文學觀的建構及背景，作為文學史書寫的鋪陳，今以《支那文學大綱》為開展，以明白文學史成書的背

景。今製表如下，可知各卷主題與作者。

表 3-2：《支那文學大綱》目次及作者簡表

卷次	作者
卷 1	藤田豐八、大町桂月等合著
卷 2 白樂天	大町桂月
卷 3 李笠翁	笹川臨風
卷 4 蘇東坡	田岡嶺雲
卷 5 湯臨川	笹川臨風
卷 6 元遺山	笹川臨風
卷 7 陶淵明	白河鯉洋
卷 8 屈原	田岡嶺雲
卷 9 杜甫	笹川臨風
卷 10 高青邱	田岡嶺雲
卷 11 司馬相如	藤田豐八
卷 12 司馬遷	藤田豐八
卷 13 王漁洋	田岡嶺雲
卷 14 曹子建	笹川臨風
卷 15 韓柳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於明治三十年（1897）參與《支那文學大綱》的編纂，由表格可知與之共事者，有白河鯉洋、大町桂月、田岡嶺雲、藤田劍峯（豐八）等人，笹川在此系列叢書中，負責書寫的冊數計有五冊，為諸人之冠，領先位列第二的田岡嶺雲兩冊，且無論是書寫的主題人物與排序，皆具有值得討論之處。

此書系的編排是由不同人物為主軸，如司馬遷、司馬相如、曹子建、陶淵明

等人，各為一卷，由不同學者負責單卷而成。在《支那文學大綱》中，不同學者於單卷著作中，負責不同的文學家，共計十五卷。值得注意的是，各人所負責的單卷，或可反映其人治學趣味之所在，比如笹川臨風共計撰寫五卷，有卷三李笠翁、卷五湯臨川、卷六元遺山、卷九杜甫、卷十四曹子建。在這些文學家當中，與戲曲相關者過半，李笠翁、湯臨川、元遺山等人，皆以劇作名世。由此可反映，笹川早已將戲曲納入文學的範疇，並且在文學史成書前，已就劇作家的生平與作品進行過一番考察。

笹川對文學家的排序耐人尋味，若以時代而論，東漢的曹子建應至於較前的位置，接續唐代杜甫，但笹川將明末清初之李笠翁置於第三卷，明末元遺山置於第六卷，金元之際的湯臨川置於卷六。笹川所負責的卷數之所以在歷史寫作上未能連貫，是因為《支那文學大綱》為一系列的刊物，因成於不同作者之手，故單一作者所負責之卷數，有跳躍不連續的狀況，也可由此判別完稿的先後。檢視笹川臨風所負責之部分，出版次序較早者，或為笹川較感興趣之主題。笹川所書寫的冊數，出版排序為李笠翁、湯臨川、元遺山、杜甫、曹子建，劇作家的次序先於詩人。此或為笹川治學趣味的反應，極具有討論的價值。若以傳統概念思考，杜甫的排序是極為特殊的，杜甫有詩聖之名，不僅在中國的評價極高，日人亦喜愛杜甫的詩作，早在村上天皇應和三年（936），平安時期的詩人大江維時（888-963），即於詩作中引用杜詩<sup>29</sup>。在五山時期，有元代高楚芳《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集》、余治安《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的和刻本刊行，反映當時的日本詩人對杜詩的註釋書具有一定需求，因此以中國傳入的漢籍為底本，出版為和刻本。不只引進中國學者的著作，五山時期的禪僧亦有對杜詩的講釋，心華元棣（1339-?）著有《杜詩臆斷》，雪嶺永瑾（1447-1537）著有《杜詩抄》，反映五山僧侶對杜詩的喜愛<sup>30</sup>。江戶時期，中國的杜詩相關書籍亦受到日本人的歡迎，比如明代紹博《杜律集解》、紹寶《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著》，有日本自行刊刻的和刻本。而在

<sup>29</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67年），頁226。

<sup>30</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228。

江戶時期日人對杜詩的喜愛，亦由關注古體近體，視為作詩規範，轉變為集中於律詩。元祿十年（1697）宇都宮由《杜律集解詳說》刊行，是以漢字與假名寫成的通俗著作，反映出當時杜詩的流傳與接受，橫跨了各個階層。至清代黎庶昌至日本，猶見《古逸叢書》收錄宋本《草堂詩箋》<sup>31</sup>。可知日本對杜詩的接受與學習時間悠長，不僅使用傳自中國的書籍，亦有日人自身的研究著述，相較於劇曲小說，杜詩於日本的流傳興盛且悠久。

然而在笹川臨風的書寫順序中，杜甫卻是排列於李笠翁、湯臨川、元遺山之後，若以傳統概念視之，此為笹川大膽之舉。將劇作家置於較前的卷數，在文學大綱這一主題的書系中，表示劇作可置於文學範疇，並且在重要性上不亞於歷史上評價極高的詩人。此系列書籍是以大綱題名，意味著是自中國文學史上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足以擔當文學的綱領。笹川在書寫上，多選取劇作家進行論述，不僅將戲曲納入於文學史中，亦顯示劇作家足以成為一時之代表，可與杜甫、曹子建、陶淵明、白樂天、司馬遷、司馬相如等人並列，足以列入文學史論述範疇。

在《支那文學大綱》這一系列的著作中，主題的選定泰半是於中國本土享有盛讚的作家，比如陶淵明、司馬遷、杜甫、白樂天、蘇東坡等人，其作品於中國的流傳皆具有跨時代的廣泛性，並成為後世師法的對象，故笹川臨風在編寫此書系時，所選擇的各家就更具有特殊性。今檢視此書系的編排，除去卷一為藤田豐八、田岡嶺雲、笹川臨風、白河鯉洋一同編寫，餘下的排序是以大町桂月所負責之卷二白樂天為起始。以白居易作為《支那文學大綱》起始，無論就歷史或流傳程度而論皆極為穩妥，因白居易自平安時期（794-1192）傳入日本後即受到公卿的喜愛。嵯峨天皇（786-842）常將白詩的字句用於自己的詩作，與臣下酬唱。另外，據《文德天皇實錄》所載，承和五年（837）太宰藤原岳守（808-851）將元稹與白居易的文集獻與天皇而獲得賞賜<sup>32</sup>。白詩的傳入，使得平安時期的日本漢

<sup>31</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228。

<sup>32</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234。

詩，由齊梁體轉向白居易平易的詩風<sup>33</sup>。白詩成為日本論文學諸多作品的出典所在，無論是《枕草子》、《源氏物語》皆有公卿吟誦白詩的場景，在日本平安時期的漢詩壇，白詩是風靡一世，成為詩人的仿效對象。但笹川臨風所著之卷三李笠翁，於《支那文學大綱》的順序上，置於大町桂月所負責的白樂天之後，兩卷之間跨度由唐代至明末清初，無論是在作者時代或對日本的影響性上，白居易與李漁呈現極大的段差，由此反映笹川對戲曲之偏重，以及率先肯定劇曲之價值，置於文學的範疇的大膽之舉。

《支那文學大綱》的排序，將劇作家置於較前面的卷數，是極為特殊的排序，也顯現笹川推廣戲曲小說的企圖。笹川清楚中國向來不重視戲曲小說，在《支那文學大綱》第三卷的序言中所說：「支那向來輕視小說戲曲，故作家傳記茫乎未明。」<sup>34</sup>即是笹川對於小說戲曲不被重視，以至於資料掌握困難的陳述。小說戲曲在志道、據德、依仁、遊藝的儒家概念之下，其重要性屈居於末位，又因其內容性質與科舉無涉，不具有經世濟民之用，而遭排拒於雅正的文學之外。笹川臨風理解戲曲在中國傳統上的定位，卻仍選擇戲曲論述，更言：

既言支那文學大綱，則必為小說戲曲大家傳。故為清朝名作家李笠翁作傳，兼及著作梗概批判，詳述其文學技法。<sup>35</sup>

笹川明言小說戲曲作為支那文學的一部份，大綱中非收錄小說不可。即使笹川知曉中國對戲曲小說不甚重視，仍將之列入文學範疇。此與中國迥異的文學價值判斷，即是笹川獨到之處，對戲曲小說研究推廣的執著，亦為橫貫《支那文學大綱》、《支那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史》的重心。

<sup>33</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234。

<sup>3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大綱》卷 3〈李笠翁〉（東京：大日本圖書，1897 年），頁 1。「小説戲曲は支那に於て蔑如輕視せられたるもの、故に作家の傳記の如き茫乎として之を捕捉するに由なし。」

<sup>3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大綱 卷 3 李笠翁》，頁 6。

### 第三節 作為文學史前身的 《支那小說戲曲小史》

笹川臨風寫成《支那文學史》之前，即有《支那文學大綱》、《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成書，其對戲曲小說的關注，即顯現於此類著作中。檢視其著作內容，可知皆是《支那文學史》的先行研究成果，在內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其中所選錄的作家與作品，亦為《支那文學史》所收錄的內容。《支那文學大綱》是笹川與志同道合者一同進行，在作家與作品的選擇上，可反映明治時期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共同認識，《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則是笹川第一本以戲曲小說為主題的專著，是笹川觀點的反映，本節細論《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內容，釐清其與《支那文學史》的異同。

#### 一、從《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到《支那文學史》

檢視笹川臨風於學術上的成果，在《支那文學史》出版的前一年，即明治三十年（1897）東京東華堂出版了笹川所著《支那小說戲曲小史》一書，或可謂《支那文學史》，對於戲曲小說的收錄，乃是此書內容的延續，而《支那文學史》，有關戲曲小說的部分，有一定的比重是得自《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的研究成果。《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的架構，是以〈支那小說戲曲的發展〉、〈元朝〉、〈明朝〉、〈清朝〉四篇，加上附錄所構成，各篇以概說為第一章，再分章論述各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作品，比如〈元朝〉一篇中《水滸傳》及《三國志》、《西廂記》、《琵琶記》，即為分章論述的重心，今製表如下。

表 3-3：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章節表

篇名	章名
第一篇 支那小說戲曲的發展	
第二篇 元朝	第一章 概說

	第二章 雜劇
	第三章 《水滸傳》及《三國志》
	第四章 《西廂記》
	第五章 《琵琶記》
第三篇 明朝	第一章 概說
	第二章 《西廂記》
	第三章 湯若士
第四篇 清朝	第一章 概說
	第二章 《紅樓夢》
	第三章 金聖嘆
	第四章 李笠翁
	第五章 《桃花扇》
附錄	《金雲翹傳》梗概

若將《支那小說戲曲小史》中收錄的作家作品，與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相對照，可見重複的作家作品。《支那文學史》自第七期〈金元的文學〉始見有關戲曲的論述，在關於各朝代戲曲的總說之後，論及小說戲曲的發展，分節論述《水滸傳》、《西廂記》、《琵琶記》。另外，第八期〈明朝的文學〉，第三章論及湯若士，第九期〈清朝的文學〉，第三章論及李笠翁、《桃花扇》、金聖嘆，所論述的主題，亦見於《支那小說戲曲小史》。

兩種著作中，雖說論述相同的戲曲小說，但論述的重心卻不盡相同。《支那文學史》的內文是笹川臨風重新書寫，並非就《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增刪而成。

《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就其題名而論，是自中國文學的眾多文體之中，擷取特定的內容，再以小說戲曲為軸心，故書中對各戲曲著作，進行詳實的介紹。單就《西廂記》一章，即自考證題名，析論每一折的篇目等進行戲曲背景資料的考察，並就曲文摘句論述，析論人物與情節的表現。第二篇第三章《水滸傳》及《三國志》中，笹川亦以不少篇幅，引述《大宋宣和遺事》之內文，論述《水滸傳》取材自《大宋宣和遺事》的情形。對戲曲的詳加考述，呈現此書題名以小說戲曲為主軸

的內容。

笹川臨風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中，對中國戲曲小說的摘錄，是以中文原文加上訓點的方式，進行介紹。其對原文的解析，常以近似於小說戲曲評點的方式處理，比如介紹《水滸傳》時，先言明有李卓吾《忠義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以及金聖嘆評點的七十回本，此外尚有一種古本，笹川明言未曾親見。在版本的使用上，笹川是以一百二十回本為依據，摘錄第四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描述魯智深大鬧五台山一回之文字：

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吃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著五台山，喝采一回。<sup>36</sup>

笹川臨風對原文施以訓點，再進行評論：「好漢義氣，如在眼前。佇立許久，如忘其身，如忘天地，獨見五台山。忽然有聲入耳，是何之聲。」<sup>37</sup>笹川臨風的評語方式極似中國明清文人評小說時的批語，內容包括是對用詞獨到的讚賞，或是讚嘆作者呈現情節的鋪陳。與明清小說批語的差異，在於笹川是於文學史性質的著作中，摘錄部分段落，附上數句評語，而非明清士人點評小說，是直接於文本上點評後出版。笹川臨風對戲曲小說作品的檢視方式，仍存有受到中國點評方式影響的部分，在吸取西方文學史觀念的同時，仍被保留下來。

《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將《水滸傳》、《西廂記》、《紅樓夢》、《桃花扇》等書列入論述的範疇，在當時來看是很大膽的選材。依笹川臨風對漢學的理解，將不受重視的小說戲曲以文學研究的角度視之，是具有開創性的做法，與漢學的保守

<sup>36</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頁 39。依笹川所言，《水滸傳》是依據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今對照明代容與堂刻本影印版，內容為：「這魯智深自從吃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部鐸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了一回。」文字略有出入。

<sup>37</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頁 39。

性呈現對比。就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所言，中國的文學是具有向世界誇耀的價值，故其言：「縱四千年星霜，橫九十萬輿域，觀支那之文學，可謂光彩陸離，足誇於宇內。」<sup>38</sup>在此文學的範疇中，包括不受中國人重視，甚至不以文學視之的《西廂記》、《桃花扇》等戲曲作品。笹川對戲曲小說的重視，已在《支那文學史》成書前的著作體現，持續以戲曲小說作為研究主題，以至《支那文學史》的完成，即是笹川欲推廣此領域的表現。

今檢視笹川臨風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之前所發表的著作，可知其研究主題的連續性，笹川寫有〈金聖嘆〉、〈讀雲翹傳〉、〈讀西廂記〉、〈金陵十二釵〉、〈元以前的小說〉、〈李笠翁的戲曲論〉、〈元代的戲曲琵琶記〉、〈支那的戲曲〉、〈湯若士的南柯記〉等文，皆以戲曲小說為主軸，發表於《帝國文學》、《文學界》、《江湖文學》、《太陽》等刊物上。上述文章的論述主題，成為笹川臨風書寫《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史》的章節內容，亦可自此理解《支那文學史》作為笹川臨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支那文學史》中對小說戲曲的關注，來自於笹川臨風對特定主題的研究趣味，從《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到文學史，對於戲曲作品的選擇，也有其重複性，顯示其戲曲小說研究的脈絡。值得注意的是，笹川選材的重複並不代表內文的重複，這是因為笹川臨風在書寫著作時，企圖介紹新知，常選擇日人較為生疏的題材進行闡釋，對於前人已有論述的領域，則概略帶過，甚至直接推薦他人的著作。比如《支那文學史》的序言中，言先秦諸子部分可參照藤田豐八的著作，就是這種思維的體現。

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中，對於作品的選擇，反映笹川臨風對於介紹新作的書寫傾向。此書第一篇第三章，將《水滸傳》及《三國志》並論，與其餘章節僅敘述單一主題的做法相異。就此，笹川於文中說明理由，是因為《水滸傳》、《三國志》兩書，日本已有譯本，並且流傳甚久通行於各階層，故不再贅筆<sup>39</sup>。

<sup>38</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頁 2。

<sup>39</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頁 33。

檢視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可知此書是將中國文學發展，置於歷史的脈絡，進行概論性質的解說。縱使文學史涉及戲曲小說的研究，內文上也非《支那小說戲曲小史》般的鉅細靡遺，僅就戲曲進行概說，摘引大量的戲文，並不就戲文加上解說與評述，是引述完畢即進行下一主題的書寫。單就引述戲文而論，《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常以摘句式的論述，對於單句的作用詳加描述，亦分析單句戲文中呈現的人物心理狀態，《支那文學史》則是引述大段戲文後，即結束章節，在論述篇幅的繁簡上，可謂大相逕庭。

論兩書在相同戲曲上的書寫方式，戲曲小史可謂細論戲曲由來始末與評析文辭，藉由單一章節聚焦特定作品。文學史則以較為宏觀的角度，將向來不受重視的戲曲小說自中國文學史中提出，視為文類的一種簡明介紹，強調在北方人種具有優勢的中國歷史上，與儒家價值觀相悖的戲曲，應以情感與文辭的角度審視。如同前述笹川對湯若士與毛聲山兩人評論《琵琶記》、《西廂記》的看法，笹川謂一人以「性情」、「詞調」為基準，一人以「儒教見地」為基準。湯若士著重性情的評法，是千古不滅之評語<sup>40</sup>，毛聲山是將戲曲與經史以同一標準視之，則是妄斷，並非評價戲曲應有的方式<sup>41</sup>。

對戲曲小說的源流，笹川延續先前文學史作者以地域造成民族性不同的說法，言說南方人種與荆楚文學的特性在於思想豐富，莊子寓言以及屈原離騷皆為此種情性的反應。然而在中國的歷史中，北方常作為支那的中心，在此歷史背景下，北方講求躬行實踐，儒家色彩深的文學，較南方文學更為主流<sup>42</sup>。南北兩方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有不同的風格，是因兩方人種差異所致，笹川在《支那文學史》對此提出論述，謂：

<sup>4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269。「唯有明代之湯若士，評《琵琶記》以性情為其費盡筆墨工夫處，並以詞調之巧倩為長，此是千古不滅之評語。」「唯それみの湯若士か琵琶を評して琵琶記は都て性情上より工夫を着く并に詞調の巧倩を以て長とせずと云へるは千古不磨の評語と云はまくのみ」

<sup>4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269。「聲山之觀念為儒教見地。……評者將戲曲與正史經書同一視之，是知其妄。」「聲山の觀る所は儒教的見地より來られるなり。……評者 戲曲を見て之を正史經書と同一視せんとす。其評の妄なる問はずして知るべきのみ。」

<sup>42</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説戲曲小史》，頁3。

南方人種為重想像之人種。與北方重實際之人種相異。燕趙古來多慷慨悲歌之士，其為時事而哭。擊筑做不平之鳴，挾匕首脅秦人，皆為時事之故。……老子太虛之說，莊生人世之觀，殆與實際遠矣，皆屬南方人種。楚多怪力亂神之說，辭賦起於南方，皆為南方人種富於想像之故也。<sup>43</sup>

在笹川的論述之中，將南方人種與北方人種，二分為想像與實際兩種特質，將地域與文學的關聯，嘗試以具有人類學概念的南北人種說進行解讀。笹川於《支那文學史》開篇中提出此論，此後論述各朝代的文學家與作品時，南北人種說作為貫串全書的綱領，屢屢提出，其原因無非是笹川欲以此解釋戲曲小說不受到重視的原因。

笹川並未言明之所以選擇在中國傳統上較不具主體性的南方文學作為論述的原因，僅在序言中謙稱對支那戲曲小說的理解，是極為有限：

僅窺五車之一隅，獲九牛之一毛，以漫編其略史。……吾僅就所見之各時代名作，略舉三四，批判介紹於世間，以供未嘗染指此鼎之士，嗜一嚮之味。此敘述編纂之法，與世之文學史相異，為使人之其性質。其精緻之作，則待吾日後博覽細讀，而期有大成。<sup>44</sup>

<sup>4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3。「南方の人種は自から想像的也。北方人種の實際的なると異なる。燕趙古來悲歌慷慨の士多しと稱せらる、彼等は時事に哭する也。老子の太虚を説き莊生の人世を觀たる殆と實際に遠かる。與に南方人種に屬する者。楚に怪力亂神を説く多き、辭賦の南方に起りたる、皆以て南方人種の想像に富める知るべきに非ずや。」

<sup>44</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説戲曲小史》，頁1。「其作の傑れて之を知らざるものあり。僅に五車の一隅を窺ひ稍やく九牛の一毛を獲て以て漫に其略史を編せんとす。吾は吾見を以て各時代の名著三四を批判し、紹介し、世の未だ指を此鼎に染めざるの士に供す□□一嚮の味を以てせんとするなり。其敘述編纂の法に至ては頗る世の文學史と其撰を異にす。要其性質を知らしめんとするにあればなり。其精緻なるものに至て希くは異日吾が博覽細讀の後に其大成を期せんかな。」

笹川自認所知尚淺，期望日後對戲曲小說的理解更為詳實，再有集大成之作<sup>45</sup>。在此之後，隔年《支那文學史》刊行，是笹川戲曲小說研究的延續，在體例上並非小史，而是更完整的文學史，顯現體例上的完備。在書寫企圖上，也保持著介紹戲曲小說於世的策略，並以南北人種說解釋戲曲小說不被重視的原因。

如是，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中，在金元文學、明朝文學、清朝文學的篇幅中，收錄諸多的小說與戲曲，即是笹川介紹、批評戲曲小說的理念延續。由單論戲曲小說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到將戲曲小說堂皇納入文學史脈絡的《支那文學史》，一方面為笹川認為「光彩陸離，足誇於宇內」的中國文學，具有誇耀推廣的價值，戲曲小說在此文學的範疇之中，佔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更全面的檢視，在「博覽細讀」之後的體會，亦為成書的動機。就其對戲曲小說的關注態度，以及中國文學整體的評價，並無西學興盛下所流行的亞洲蔑視觀點在其中，並且其收錄中國文學作品引述原文時仍附有日文訓點，可見笹川臨風的認知中，中國古典典籍與日本具有不可分割性。

今檢視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相較於成書時間較早的藤田豐八、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三人在內容的收錄上偏重不同，對此，笹川臨風於例言中亦有所言明：

欲知先秦（秦朝以前）文學詳論者，可參照吾友藤田劍鋒氏之先秦文學。

欲知以歷史脈絡敘述支那文學者，可參照古城貞吉氏之支那文學史。欲知

各朝傑出文士者，可閱吾與同好合著之支那文學大綱。<sup>46</sup>

笹川臨風在例言中，對於已刊行的研究成果進行介紹，並且對這些著作的性質，

<sup>45</sup>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頁 1。

<sup>4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 年），頁 1。「先秦（秦朝以前）の文學を詳論すなもの知友藤田劍峯氏の先秦文學あり。支那文學歴史的に叙述したるもの古城貞吉氏の支那文學史あり。各朝卓出したる文士の傳記は同人等合著の支那文學大綱ありて之を詳にす。今や支那文學の研鑽漸く盛ならんとす。又學界の慶事に非すや。」

進行約略的介紹，比如對先秦文學的相關研究著述，則推舉藤田豐八（劍鋒）的著作，若欲知不同時代的代表性文士，則推薦先前與白河鯉洋、大町桂月、田岡嶺雲、藤田豐八、久保天隨等志同道合之士合著，共計十五卷，將各朝代文士人分冊論述的《支那文學大綱》。總體而言，在文學史成書前，笹川臨風是以戲曲小說作為研究的軸心，而他與其他文學史作者的交遊，致使笹川熟知其他文學史研究成果，並且不吝於向讀者推薦這些文學史相關著作，可作為更全面了解中國文學的參考資料。

## 二、舉措：將戲曲小說列入文學之林

戲曲小說被視為文學而收錄文學史著作中，是明治時期日人所著《支那文學史》與中國傳統文學觀迥異，最具特殊性的部分。如同嚴紹盪所言：「笹川臨風的中國俗文學概念，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已經跨越了傳統儒學的界線，而把對中國小說戲曲的研究，帶入了近代學術的行列。」<sup>47</sup>笹川對文學研究的視域，在其所處的明治時期具有前瞻性。相繼問世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大綱》、《支那文學史》數種著作，成為其擴展文學定義的重要舉措。戲曲小說在中國歷史上不受重視，早為笹川臨風所知<sup>48</sup>，笹川將戲曲小說納入文學之林的做法，是極具開創性，若檢視中國傳統對於戲曲小說的看法，更可明白戲曲小說置於文學史的特殊性。宋元明清各朝代，於編寫史書文苑傳時，皆未收錄戲曲小說作者，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未將戲曲小說收錄其中，民國以後，《清史稿·藝文志》亦未收錄。清末劉廷琛（1867-1932）任京師大學堂監督時，更下令將圖書館所藏戲曲小說全數銷毀<sup>49</sup>，直至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於1902年《新小說》創刊號

<sup>47</sup>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頁239。

<sup>4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259。「上先秦より下宋代に至る文學の歴史をみ來て讀者は當に異様の感情を惹起すことなからんか。余は未だ一章も小説戲曲の爲に踐費さりしな。然れども、支那文學の特色なるは此に在り。若し夫れ歐の文學史を繙き、我國文學の歴史を見て而して支那の文學史に對せんか。何ぞ支那文學の此等產物に寂寥たる。」

<sup>49</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106。

中，寫道「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方為小說這一文體的地位進行價值上的重定。即使梁啟超欲提昇小說的地位，小說的價值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間，並未達到全面的肯定。林傳甲 1904 年所著《中國文學史》批評笹川臨風的文學史收錄雜劇傳奇是「自亂其例」<sup>50</sup>，並且對中國引進小說之事有所批評：「近日無識之文人，乃譯新小說以誨淫盜，有王者起必將戮其人而火其書乎。」<sup>51</sup>。笹川臨風對中國戲曲小說價值的重視，可謂開風氣之先。與林傳甲同年出版的黃人《中國文學史》，收錄戲曲小說，與林傳甲有所差異，可顯示戲曲研究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戲曲小說的價值仍具有爭議性。1915 年曾毅《中國文學史》、1925 年汪劍餘《本國文學史》對戲曲小說的論述仍篇幅甚少<sup>52</sup>，更可反映笹川臨風對戲曲小說研究的創見。

笹川臨風在《支那文學史》篇首的概論中，以南北人種分別說，闡釋文學風格相異的成因，並在文學史中，屢次強調南北人種性情相異，以致產生風格不同的文學作品。究其原因，南北人種說是為了解明戲曲小說歷來不受重視的原因。但實際上，關於戲曲小說的論述，是在《支那文學史》的中段以後，第七期〈金元的文學〉一章方有論述。對此編排，笹川在〈小說戲曲的發展〉一節中寫道：

迄先秦至宋，讀者讀自此處或有異樣之感，為余未有一章言戲曲小說之故也。然支那文學之特色即在此處，若與歐洲文學史及我國文學史對觀，將疑何以此物於支那如此寂寥耶？<sup>53</sup>

由上述可知，書寫文學史時，笹川臨風考察各個朝代的文學，依照時間分為九期，

<sup>50</sup>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台北：學海出版社，1999 年），頁 182。

<sup>51</sup>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頁 182。

<sup>52</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125。

<sup>5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59。「上先秦より下宋代に至る文學の歴史を讀み來て讀者は當に異様の感情を惹起すことなからんか。余は未だ一章も小説戲曲の為に費さりしなり。然れども支那文學の特色なるは此に在り。若し夫れ歐の文學史と繙き、我國文學の歴史を見て而して支那の文學しに對せんか。何ぞ支那文學の此等產物に寂寥たる。」

但是至第七期的金元文學，方有戲曲小說的相關論述，故笹川自言，讀者對中國文學中無戲劇小說的現象，或有疑惑之感。

文學史之所以不載戲曲小說，是囿於初期文學史著作的時代背景。就明治時期的文學史書寫，三上參次、高津楸三郎早有《日本論文學史》的成書，其刊行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早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發行的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兩者皆是以日人為預期讀者。明治時期的日人在閱畢《日本文學史》後，藉由此書所收錄的內容，再認識「文學」一詞作為 *literature* 的翻譯，迥異於漢籍「文學」的定義。明治四年（1871年）福澤諭吉《勸學篇》有言：「學問並非只是辨識難字、閱讀難解之古文、玩味和歌、作詩等世間不實際的文學。」<sup>54</sup>此時的文學義，擴充傳統上漢學為文學的觀念，和歌也納入文學的範疇。如同鈴木貞美所言：「『辨識難字』、『閱讀難解』之古文是 *literature* 原來的用法，而『玩味和歌』、『作詩』等，是將近代的 *literature* 即高級的語言藝術觀念與日本的觀念相對應。」<sup>55</sup>在此和歌與漢詩對等，皆可稱為文學，此已是傳統文學義的擴充，但對於戲曲小說，仍一概不論。

至明治七年（1874年）福地櫻痴（1841-1906），於〈感嘆日本文學的衰弱〉一文中，提起小說傳奇之重要。認為小說文學才是第一位的文學，《竹取物語》以來的物語，以及被稱為「戲作」的通俗小說皆為文學，卻不受重視，是日本文學衰微的徵兆<sup>56</sup>。就鈴木貞美所言，福地櫻痴列舉 *novel*，是反映十九世紀後期歐洲小說的興盛，以「小說傳奇」對應，是將中國唐代傳奇與宋代白話小說合併而成的說法。將 *drama* 翻譯為「演戲院本」，是將其與歌舞伎和淨琉璃劇本對應結果<sup>57</sup>。大抵而論，明治時期戲曲與小說的概念，皆是在西歐 *literature*，與傳統「文學」觀融會下的產物，將西洋的 *novel*、*drama* 於中國、日本固有的文體中尋求對應，因而原本不被視為文學的戲作、淨琉璃草子、傳奇小說，逐漸納入作為

<sup>54</sup>轉引自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112。

<sup>55</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112。

<sup>56</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113。

<sup>57</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117。

literature 譯語的「文學」義之中。

《日本文學史》中對於文學類型的收錄，自然是建構明治以後文學觀的重要指標，今見此書之篇章，可見〈奈良朝的散文〉、〈奈良朝的和歌、萬葉集〉、〈物語小說之文〉、〈日記紀行之文〉、〈草子隨筆之文〉<sup>58</sup>等篇目，此可反映最初的文學觀，散文列為文學的範疇並非特異之說，但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本被排除於文學之外的和歌被納入文學的範疇，物語小說亦作為文學的一環，而收錄至文學史當中。在文學定義仍具有變動性的譯介初期，文學史收錄的內容成為建構時人文學觀的重要指標，在《日本文學史》中加以介紹的戲曲小說，列入文學的範疇即如此。

日人在閱讀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時，已具有粗略的文學觀，以日本論文學史上存在的文學類型，試圖在中國文學史當中尋求對應。在此之下，笹川臨風對讀者可能存在的疑惑，即中國為何戲曲小說「如此寂寥」，是其來有自。明治時期為文學史書寫的草創期，日人自西洋的文學史著作進行摸索，以之建構自己國家的文學史觀，以西洋文學史方法研究日本古來的文學史後，再將視域擴及至對日本影響深遠的中國。早期中國人書寫的中國文學史，比如林傳甲的著作，在書中提及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亦可見明治日人支那文學史的書寫，是對中國人的文學史編寫產生一定的影響，如同朱自清為林庚《中國文學史》作序時所言：「早期中國的文學史大概不免直接間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為樣本。」<sup>59</sup>。實際考察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所著《支那文學史》，可知此說之正確性，文學史的建構，確是經歷西洋、日本，再至中國的演進歷程。

明治日本時期的日本學者書寫《支那文學史》時，試圖就文學的類型與特性進行對觀，其視角是自西洋、日本、中國。西洋重視戲劇小說等文體，故日本學者審視中國文學的發展時，就戲劇小說向來受到輕視，以至於記載甚少，資料蒐羅不易的現象，特別引起關注。日人對於戲曲小說的喜愛，尤盛於江戶時期，假

<sup>58</sup> 三上參次、高津楸三郎、落合直文：《日本論文學史》（東京：金港堂，1890年），頁12。

<sup>59</sup> 轉引自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148。

名草子、讀本等物，受到庶民階層的喜愛。明治之後，階級的重組更使得仕紳與優伶的交遊不被禁止，故成於明治時期的日本論文學史，對於戲曲小說的包容性高於同時期的中國。另一方面，在西洋文學中，小說於英法的中產階級間大為流行，被視作文學的一環而載於文學史中，日人的文學史觀念建構是得自西洋，載於文學史中的文體，亦自西洋尋求對應將戲曲小說納入其中。

笹川臨風的文學史即為西洋東洋文學概念交會下的產物，就全婉澄對笹川臨風戲曲研究的評述：「他的研究反映出那個時代年輕學人對於中國戲曲的了解程度，以及東西方思想交匯的痕跡。」<sup>60</sup>。笹川自身也曾提及若以歐洲、日本的文學史著作為對應，將對於支那文學不言小說戲曲感到怪異<sup>61</sup>。究其原因，笹川以南北人種說為解答，除了在序言中費筆墨寫南北人種差異，更於論及金代元代的文學作品時，做出以下歸納：

北方思想受儒教影響，故輕侮小說戲曲，常視之為末技小道。儒者之眼以文章為經國大業，故小說戲曲輕如塵芥，為敗風壞俗之害物。<sup>62</sup>

在此敘述中，笹川認為北方人種重視實用，受到儒家的影響較深，加之長時間處於政治軸心，具有話語權，其人對文學的喜好影響中國的文學觀。戲曲小說的幻想性與儒教的經世致用的文學觀相左，因而受到批判，不僅無益於世，更被界定為有害風俗。

在北方人種的主導下，儒家經世的文學觀使得中國戲曲小說長期不受重視，對此現象，笹川臨風認為：「支那文學之特色即在此處」<sup>63</sup>，戲曲小說不僅可錄於文學史中，更是中國文學最具特色的文類。對此，笹川就經世思想與戲曲小說的

<sup>60</sup>全婉澄：《日本明治大正年間的中國戲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頁70。

<sup>6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259。「若對照歐洲文學史與我國文學史，為何支那文學史中此等產物如此寂寥。」「若し夫れ歐の文學史を繙き、我國文學の歴史を見て而して支那の文學史に對せんか。何ぞ支那文學史の此等產物に寂寥たる。」

<sup>6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259。

<sup>6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259。

虛構想像，兩者性質的共通性進行闡述，意圖消弭戲曲小說被排斥於主流之外，弱化儒家思想的規制。

在論及戲曲小說的發展時，笹川也引述李漁《閑情偶寄》所載：

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為善，誠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謂善由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出。<sup>64</sup>

此處引李漁之言，以戲曲小說並非傷風害俗之物，其形成是欲以易解的戲劇形式，為庶民階層進行道德勸說，使人遠惡向善。此是以符合儒家經世道德的觀點，認為戲曲小說對於社會秩序的維護具有作用，並非無意義的消閒作品。笹川認為李漁此言，是反映戲曲仍受儒家思想束縛的例證，但也因此賦予戲曲教化功能，使之有蓬勃發展的理由。

那麼，對以儒教的價值觀作為戲曲價值的判斷，笹川是否持贊成態度是值得注意的一環。事實上，就笹川臨風的判斷，儒教所強調的道德教化功能，並非是戲曲小說的價值所在，引述李漁之言後，笹川引述毛聲山、王實甫、高東嘉等人對《西廂記》的評述，如好色不淫、怨悱而不亂等語，認為皆是儒家式的道德評斷，評者以與經書正史同樣的標準審視戲曲，是為妄事<sup>65</sup>。由此可知，笹川臨風對於中國歷來以道德作為戲曲小說的優劣審視標準，並非持贊成態度，甚至可言，經史與小說是具有分別性的文體，不應以相同標準視之，經史的道德教化，不應襲套於戲曲小說。

戲曲小說的價值，並非在道德教化的功效，笹川欲以不囿於儒教道德教化式

<sup>6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0。原文為日文，今引述李漁中文原文，據《李漁全集》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6。

<sup>6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9。

的評論標準，發覺戲曲小說價值之所在。笹川臨風在評述戲曲時，常直接引述前人言論，比如比較《西廂記》與《琵琶記》的優劣，引述毛聲山的評語：

《琵琶》之勝《西廂》有二：一曰情勝，一曰文勝。《西廂》言情，《琵琶》亦言情，然《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也。<sup>66</sup>

在此段落中，笹川引述毛聲山論述，《西廂記》與《琵琶記》之中關於「情」的一段見解，顯示兩部作品皆是情感的流露，但兩種「情」具有價值上的差距。雖是引述，但笹川臨風對前人的評語，並非全盤接受，而是批判前人之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何故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勝於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此是聲山以儒教見地審視之故。<sup>67</sup>

由上述可知，笹川對於往昔的評論者以道德作為情的高下標準，將孝子賢妻與才子佳人進行排序的方法提出異議，認為毛聲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笹川對於以儒家的道德觀審視戲曲，並非理想的評鑑方式，因「評者將戲曲與正史經書一同視之，其評之妄不問可知。」<sup>68</sup>笹川是認為正史經書與戲曲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其功能相異，以同樣的標準審視，是極不公允的，故批判毛聲山的評語。

就笹川臨風而論，戲曲應以何種角度評論，則由笹川對湯若士的評價得知：

---

<sup>6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9。「琵琶の西廂に勝れるや二あり、一に曰く、情勝る、一に曰く、文勝る、西廂の情は則ち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の情にして琵琶の情は則ち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情の情なり。」

<sup>6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9。「然れども何か故に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の情は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の情に勝るゝか、聲山の觀る所は儒教的見地より來れるなり。」

<sup>6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9。

「唯有明代湯若士評《琵琶記》，以性情及工夫詞調之巧倩為其所長，是為千古不滅之評語。」<sup>69</sup>湯若士評價《琵琶記》是以作品所流露的性情，以及作為文學表現手法的詞調作為依歸，是與毛聲山儒家式道德評價相異的標準，湯若士的評價方式，為笹川臨風所讚許，反映笹川對文學作品，特別是戲曲小說這一文體的評價方式。就笹川臨風於《支那文學史》中，以前人評述《西廂記》、《琵琶記》兩部著作的看法，加以評論提出修正之說，一方面是顯示笹川對於中國歷來對戲曲小說相關材料的收集，使其了解戲曲小說的地位是與以儒家論標準的評價方式有所關聯；另一方面也顯示笹川欲淡化以道德教化審視戲曲小說的狀態。湯若士以性情與工夫詞調作為戲曲評論的依據，獲得笹川的贊同，笹川亦是以此脫離儒家觀點式的方式，評價中國文學作品，在儒家的道德教化之外，以詞調這一形式上的準則，以及內容上的情感流露，做為作品優劣的依據。不因循儒家著重道德教化的濟世文學觀，認為「孝子賢妻之情」、「才子佳人之情」並不存在價值上的等差，成為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的重要原則，故其文學史當中，多是就文學家的作品評論，而非著重於文學家的道德事功，是與中國傳統上，將道德作為文學優劣判斷的標準相異。淡化漢學中儒家式的道德觀，改以文詞內容作為關注的重點，亦為笹川臨風作為明治知識分子，將傳統道德教化的漢學，轉向客觀的支那學研究的重要進程。

正因為笹川臨風不是以儒家式道德教化的視角檢視中國文學，因此在述及元代的文學時，是以小說戲曲作為論述主軸，並且以小說戲曲為最具價值者，笹川謂：

元代最值得誇耀者，為小說戲曲之盛行。具有實際傾向之支那人種，至此時有小說戲曲之發達，為支那文學史中應大書特書之處。<sup>70</sup>

<sup>69</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9。

<sup>7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55。「然も元朝最も誇るべきものは小説戲曲の盛行にあるかな。實際的傾向を有したる支那人種の間に至る小説戲曲の發達したるは實に此時代に屬す。是れ豈支那文學史に於て特筆大書すべきの事に非すや。」

由此而論，元代戲曲小說為中國文學史中值得誇耀的部分，因戲曲小說的興盛，在中國向來以實際經世濟民的文學為最高準則的傳統中顯得特殊。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戲曲研究的起始，笹川臨風是自元代寫起，此亦為具有時代反映的書寫方式，因當時笹川臨風尚未知曉敦煌文獻的存在，對於唐代的俗文學作品未能掌握，故於文學史成書時，戲曲小說的興盛是以元代為起始，而非更早的唐代。即使受限於時代，使得笹川臨風的戲曲小說研究，具有材料搜羅上的侷限，然在以戲曲小說為文學的貢獻上，仍遠遠早於中國學者。作為中國戲曲研究者的王國維（1877-1927），與笹川臨風（1870-1949）處於同一時代，王國維對於自己的戲曲研究成果頗為自負，嘗言：「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餘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sup>71</sup>，認為戲曲歷來不為世所重，相關資料蒐羅不易，《宋元戲曲史》的成書是開戲曲研究之先河。後人對王國維的戲曲研究具有極高評價，比如曾永義在《宋元戲曲史》的序文中，提及王國維對戲曲的貢獻在於：「開闢了戲曲研究的門徑，研究戲曲的淵源……使中國戲曲的研究從此進入學術的園林。」<sup>72</sup>、「首開近代戲曲史研究的潮流。」<sup>73</sup>無論是王國維自評，或後人的評語，皆將其視為戲曲研究第一人。但考述笹川臨風生平與著作，則可知笹川之戲曲研究早於王國維。就序文中曾永義的考述，可知王國維對戲曲的關注，主要在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民國二年（1913），六年之間有關於戲曲的研究十種<sup>74</sup>。若檢視笹川臨風之戲曲研究成果，可知其第一篇與戲曲研究相關的文章〈金聖嘆〉成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明治三十年（1897）《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問世，明治三十一年（1898）《支那文學史》刊行，笹川臨風對戲曲的關注，早於王國維十一年。由是觀之，首先將戲曲研究置於學術之園林者，並非王國維，而是明治

<sup>71</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台北：五南圖書，2012年），頁2。（此書初版於1915年，今據五南圖書2012年版。）

<sup>72</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18。

<sup>73</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23。

<sup>74</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23。

時期的日本學者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的成書，方為「首開近代戲曲史研究的潮流。」<sup>75</sup>。今日對於笹川臨風戲曲小說研究的考察，可知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戲曲小說的重視更是極具創見，無論是在材料的搜羅上，或者研究的方法上，皆是開風氣之先。

事實上，日本學者整體對於戲曲小說的關注是早於中國學者的，在笹川臨風之後，亦有多位明治時期的文學史作者，於著作中耗費篇幅論及戲曲小說。明治四十三年（1910）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成書，於宋代文學一章中，專節論〈小說戲曲之氣韻〉，於金代文學則多以戲曲研究為單節主題，如〈劇之發達〉、〈劇曲之形式〉、〈元曲百種〉<sup>76</sup>，考述戲曲歷史與形式等層面，並專節論述《西廂記》、《琵琶記》等作品<sup>77</sup>。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出版，書中第三十一章為〈小說戲曲之勃興〉，考述戲曲小說之源流，宋代戲曲、金代院本、元代戲曲《西廂記》、《琵琶記》等書，皆在論述之中<sup>78</sup>。相較於王國維在 1912 年底至 1913 所著之《宋元戲曲史》，明治時期日本學者對戲曲的研究，顯然已在時間上已取得先機，內容上亦涵蓋戲曲研究的各種面向，王國維所謂：「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sup>79</sup>恐言之未允。與中國一海之隔的日本，早已形成中國戲曲小說研究的風氣，在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中，對於戲曲小說的介紹已具有共識。

<sup>75</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23。

<sup>76</sup>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0），頁 196。

<sup>77</sup>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下）》，頁 237。

<sup>78</sup>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東京：富山房，1912），頁 290。

<sup>79</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2。

## 第四節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的篇章 體例

考察笹川臨風的交友圈，可知其曾與數名支那文學史作者一同共事，合力編寫《支那文學大綱》，此經歷也使得笹川臨風撰寫《支那文學史》的體例上，與其他文學史有所承襲，今藉由檢視《支那文學史》的體例編排及成書過程，釐清笹川的文學史著作受前人影響的部分。

### 一、編纂體例的承襲

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成書，常是出於教材的需求，或因此編寫文學史，或以授課時的講義整理成書，在體例上常有不完整之處。最早的支那文學史著作，是由明治十五年（1882）末松謙澄所執筆之《支那古文學略史》，此乃以講稿為底稿，是「同友慫恿，將刻以公于世。」<sup>80</sup>而非以研究專著成書，「欲使後生知漢籍之梗概。」<sup>81</sup>的動機則反映其教育性質。於講義外，亦有做為學術研究專著而出版的《支那文學史》，比如：明治二十五年（1892）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明治三十年（1897）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等，皆出版於笹川臨風《支那文學

<sup>80</sup>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史略史（下）》（東京：末松謙澄，1882年），頁30。

<sup>81</sup>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史略史（下）》，頁30。

史》以前。由此可推知，笹川臨風書寫支那文學史時，已可藉由前人著作，進行文學定義的判定以及收錄作家、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從此體例上來看，已非如初期末松謙澄不具細目的編法，而是如同兒島獻吉郎、藤田豐八、古城貞吉等人的支那文學史著作，能以時代為章節綱目，是具有體系的文學史研究。

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書寫蔚然成風，編纂者之間的交遊，則是促進著作編寫的要件。單就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來看，其於序言中，推薦藤田豐八的《支那文學史》、《支那文學史稿 先秦文學》，以及與田岡嶺雲、白河鯉洋一同撰寫的《支那文學大綱》，即反映他的文學史的書寫，是與其交友圈不無關係，已經出版的文學史著作能為笹川臨風所見，也作為補充書日向讀者推薦。特別是笹川臨風對於藤田豐八著作的推崇，可顯現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作者的廣泛交遊，具有助長文學史研究風氣的可能。笹川與藤田的交遊可溯及笹川明治二十六年(1893)笹川就讀東京第三高等中學校，日後在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兩人仍是同學<sup>82</sup>，並有一同編寫《支那文學大綱》，任教於東洋大學等共同經歷，兩人情誼深厚可知。在此狀況下，笹川對其餘文學史著作的取法是極為自然，無怪乎笹川序言所載：「欲知先秦（秦朝以前）文學詳論者，可參照吾友藤田劍鋒氏之先秦文學。」<sup>83</sup>推薦藤田豐八《支那文學史稿 先秦文學》以及《支那文學史》。笹川提及古城貞吉時則言：「欲知以歷史脈絡敘述支那文學者，可參照古城貞吉氏之支那文學史。」<sup>84</sup>強調歷史脈絡的價值。

笹川將其他文學史著作的內容介紹與讀者，做為資料上的參考，其《支那文學史》在體例上，也有直接承襲前人著作之處。比如兒島獻吉郎將中國文學分為南方文學、北方文學，以地域為區分的書寫方式，無疑影響其後的編者，藤田豐八的《支那文學史》即是承襲兒島獻吉郎南方文學、北方文學的地域二分法，再加上思想與藝術形式作為綱領。笹川臨風南北人種說的發想，是與兒島、藤田的

<sup>82</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573。

<sup>8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

<sup>8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

書寫方式，具有相似之處。此皆顯示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作者，因書籍的流通，以及自身的交遊，使得文學史書寫上，呈現互相影響的現象，讓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體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內容上也有重疊之處。

明治時期盛行撰寫《支那文學史》，書寫動機包括日本學者欲證明在研究方法與研究水平上，日本人可以與西洋學者並肩<sup>85</sup>，是以採取西洋的文學史觀，分析日本自有的文學，以及因漢學流傳而影響日本甚鉅的中國古典籍，如同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的漢文序所言：「漢土之學，實本邦文物之祖，苟志於學問者，不可不講究其書也。」<sup>86</sup>，漢學與日本的關聯，是促成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動機。另一方面，作者群的交遊亦為文學史興盛之由。在同學、同事等極為緊密的生活圈中，對於中國文學史的關注，皆有可能是《支那文學史》編纂蔚為風氣的成因。

此外，《支那文學史》著作是建立於文學史作者對於前人的理解與學習，並藉由自身對於中國古典文獻研究興趣的逐漸增添，在時間的遞進中趨於完整，對文學的定義亦在此建構的過程中趨於穩定。笹川臨風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可由其先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刊行時間早於《支那文學史》的著作進行分析，並由此種研究領域的偏好，理解笹川《支那文學史》中，極早展現對於中國戲曲的重視，並將之收納於文學的範疇的可能。就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的編排與論述方式，可見其對於明治時期由不同人所編纂之《支那文學史》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並就此基礎進行內容上的增補，最終完成具有個人特色的《支那文學史》。

## 二、成書過程與編排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是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版於東京，此書是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書寫風潮中特出的一部，在其內容上具有與其他文學史著作相近，

---

<sup>85</sup>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4。

<sup>86</sup>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史略史（上）》（東京：末松謙澄，1882年），頁2。

反映時代的一面，亦有作者笹川臨風異於其他作者的獨到之處。

先就體例而論，此書題名《支那文學史》，顯現笹川對文學的歷時性的概念，關注文學在歷史間的流動現象，就中國文學自春秋以前至清代的文學作品，進行概論性的描述。以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來看，這種具備通史體例的文學史著作，並非全面性的書寫模式。比如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出身的兒島獻吉郎，於明治二十五年（1892）即有《支那文學史》的成書，但觀其體例，可知雖以文學史為題，內容上卻非通史，而是止於春秋戰國。前述與笹川臨風同樣就讀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藤田豐八，在明治二十八年到明治三十年左右（1895-1897）所著《支那文學史》，亦是未符合題名的斷代史著作。對中國文學的論述，止於古代，而未能進展至與明治時期相對應的清代。

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常在題名上以《支那文學史稿》、《支那古文學略史》等，顯現研究時代的模糊性。但即使是確切題名為支那文學史，仍可見內容上的名不符實。觀察與笹川一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可知笹川臨風在書寫文學史時，將書名定為文學史，而非略史、小史，並且在內容上，確實以通史的體例寫成，是在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中，體例較為完整的一本。

藉由探討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動機，可知此書其他支那文學史更為嚴謹的來由。因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在書寫動機上，有一定的比例是作為課堂的教材而寫成。在明治時期引進西洋學制與學科後，可作為西洋研究方法的文學史，隨即被運用於授課上，故留下一定數量《支那文學史》講義，作為反映時代的著作。藤田豐八於二十八年至明治三十年（1895-1897）左右，任教於東京專門校，編寫《支那文學史》作為講義；明治三十二年（1899）高瀨武次郎《支那文學史》是哲學館大學漢學專修科的講義；明治三十七年（1904）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則做為早稻田大學講義而出版。做為講義而成書，常使得體例與內容上較為粗疏，比如藤田豐八的《支那文學史》，為止於先秦的斷代史性質著作。作為講義而成的支那文學史，也受學年變動的影響，版本必須修訂，因而

有內容上的增刪，也造成文學史著作的不穩定。

與這類因應授課需求而產生的支那文學史相較，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內容顯得完整，在論述上也更具有專業性。自書寫動機而論，笹川臨風並非因應教材編寫而著書，乃是以研究中國文學為理念，開始《支那文學史》的編纂。由收錄內容判斷，可知笹川是將先前發表於各雜誌的關於戲曲小說的單篇文章，以及《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學術研究的方向進行《支那文學史》的編纂，故無論是體例與收錄內容，皆是較為嚴謹的著作。

在篇章架構上，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是以總說為起始，接著將中國文學依時代分期論述，自春秋以前至清代，共分為九期，每期是以時代概述的總說起筆，再接續數個以人物或作品為主軸的小節。笹川臨風的分期方式，並非以文體為主軸，而是以時間為綱領，體現文學發展的歷時性。

在內容的選擇上，笹川以春秋以前的文學作為起始，體現對於文學的收錄與分期，是以實有的文獻材料為依據，避免就神話傳說進行時代的推論，是以科學實證的精神，處理上古的傳說。以中國傳說為例，文明源自於三皇一事，笹川謂此乃是支那史家的慣用手法，然三皇邈不可及，故司馬遷是以五帝作為《史記》的起始<sup>87</sup>。笹川大抵是依據此種精神，對於不具有事實證明的歷史與文學，質疑材料的真實性，以科學實證精神檢視傳統上受儒家推崇的上古聖王，企圖還原為傳說，不與史料混同。在書寫文學史時，笹川以能實際掌握的文獻材料作為基準，在方法上，已經與傳統漢學著眼於道德教化，推崇上古聖王的視角相異，再不以儒家道德教化為著眼點，純粹是以文獻為基礎進行文學研究，反映出在明治時期學習西洋文學史觀念的知識分子，逐漸產生與明治以前漢學家相異的研究方法。

### 三、體現「南北人種說」的書寫策略

---

<sup>8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69。

自《詩經》、《楚辭》以來，中國文學有南北文學之分，所謂北方文學質樸，南方文學靡麗，乃受地理環境差異造成文學風格的區別，也成為檢視文學作品的重要指標。《隋書·文學傳》載：「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以地理位置為區別，論南北朝文學差異之所在，此後以地域區分文學作品風格的習性，也為後世學者所繼承。梁啟超 1904 年發表〈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論北人、南人性情差異，影響文學作品的風格，在歸納南北文學差異時，謂：「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sup>88</sup>，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論南北戲劇差異時，亦有類似的看法，如：「元代南北二戲，嘉處略同。惟北劇悲壯沉雄，南戲清柔曲折，此外殆無區別。此由地方之風氣，及曲之體制使然。」<sup>89</sup>，民國以後，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亦以地理環境之不同，視作造成南方北方文人性格與作品風格差異的原因<sup>90</sup>。

論述南北地理與文學風格之關聯，亦可見於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中，則是承襲自《隋書·文學傳》的分論，笹川臨風提出南北人種說，作為文學風格差異的解讀，顯現其受到中國傳統文論影響，如同兒島獻吉郎、藤田豐八的《支那文學史》以地域南北評論文學風格。但笹川臨風對地域與風格有進一步的申說，並不限於歸納地理環境與文學的關係，也試圖釐清此現象的成因，以人類學、民俗學的角度，解釋此種差異，並以人種不同作為著眼之處，在文學史中，屢次提及南方人種、北方人種，用以解釋文學風格與地域之關聯。在《支那文學史》一書中，篇首的總說論及支那的文明、支那的人種、南北兩人種的差異，作為析論作家與作品之前的概說，都可視為笹川對文學南北分論的申說。其言：

支那其國既廣且大，各人種生息其中。計有漢、滿州、印度、契丹、西藏、土耳其、蒙古等，餘有諸多小種族，吾恐未能盡識。然開導支那古代文華

<sup>88</sup>轉引自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45。

<sup>89</sup>轉引自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46。

<sup>90</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46。

者，為居於黃河畔之漢族。漢人種居於北方，文化即由此先，故為古代歷史中心。……南方人種，所居非古代歷史中心，其於歷史上之活躍僅限於春秋。<sup>91</sup>

笹川此言，即是將中國文學的地域性特色，藉由種族的差異細論之，先就中國國土之廣大，各人種聚居其地的客觀觀察進行敘述，著眼於歷史上的行政樞紐。北方與南方相較，作為各朝歷代的首都，文化發展較早，處於政治的軸心也意味著資源的集中與建設的發達。因此造就居於北方的人種，在歷史上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南方遠於政治的核心，僅在春秋時期，具有一度的興盛卻未能長遠持續，因其遠離政治軸心，故影響性未若北方來得全面。

笹川以歷史的角度著眼，觀察南北方文學差異，其從社會層面推論文風差異的理由，並且進一步提出地緣關係產生了南北人種的差異，其言：

視南北之別，可知其種族全然相異。其相貌，其骨骼，其言語皆有所別。就其性而論之，南方人種重於想像，北方人種重於實際。燕趙古來多悲歌慷慨之士，其人常哭於時事，擊筑鳴其不平，持匕首挾秦人，皆為時事而發。老子太虛之說，莊生人世之觀，殆離實際遠矣，此南方人種屬之。楚地怪力亂神之說所在多有，辭賦起於南方，皆以南方人種想像豐裕之故也。

92

---

<sup>9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2。「支那の國たる、もと廣且つ大なり。從て其生息したる人種は單純なるものに非ず。之を概別する猶漢、滿州、印度、契丹、西藏、土其吉、蒙古等の大種族あり。若し之に加ふるに幾多の諸小種族を算せんか、恐くは僕を更ゆるも盡名きざらん。然れども支那古代の文華を開導したるものは實に黃河々畔に居るを占めたる漢人種にあります。漢人種は北方に居し、文化先づ此起り、古代歴史の中心を作り自ら古代の歴史的な人民之となりぬ。南方の人種は文化觀るべきものなきに非りしが如し雖とも北方の優且つ盛に若かず、終に古代歴史中心の外に委ねられ其歴史壇上に活動したるあるは僅春秋の終に於てす。」

<sup>9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2。

笹川臨風認為南北文學的差異性，起因為人種的不同。判斷的依據從當時人類學的角度著眼，以相貌骨骼作為判斷的依據，並且將南北方言的不同列入考量，作為南北人種相異的根據。姑且不論此說之正確與否，笹川以人類學的角度考量，是為受西學影響的思維，自幕末蘭醫傳來的醫學病理之書，人體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的譯介，明治日人對於人類的身體構造，已非停留於漢醫的筋脈之說。故笹川臨風對於人種差異的判斷，試由骨骼樣貌析論，帶有西方學說的色彩，並非難解之事。

對於南北人種的不同之處，是以生物、風俗、性情等各層面論證之，此書題名為文學史，是以中國的文學作為論述的軸心，然就篇首關於人種的論證，並非單一探討文學風格的區別，而是略涉有自然科學及人類學等領域的知識雛形，此現象反映笹川臨風文學史的特性，即是將文學與現實的現象進行連結，其文學研究的特性，則以現實為關注，並不限於就作品作家進行純粹的作品析論，在論述中常關注於社會風氣對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此亦呈現明治時期的文學觀，當時為文學定義建構的時期，將傳統漢學孔門四科用以指稱博學古文、文章博學的「文學」<sup>93</sup>，以及做為西方近代 *literature* 翻譯詞彙的文學，進行概念上的統合與轉換，文學的範疇從以經史和漢詩文為中心的文章<sup>94</sup>，擴展為明治時期柳田泉（1894-1969）所言：「文學即是 *science*，是論述百科之學的名稱。」<sup>95</sup> 這般融合西方近代義與中國古典義的文學觀。

就南北文學特性的分論，笹川是以人種的差異做為出發，就歷史人物的行止與文學作品的特性，進行南北分論的歸納。以北方人種為例，其列舉高漸離、荊軻之作，認為北方燕趙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其人多著眼於現實，擔憂時事，是為北方人種的性格特色。另一方面，南方人種在性情上與北方人種迥異，比如老子《道德經》第十六章：「致虛極，首靜篤」，後人以清虛以自守評其學問，莊

<sup>93</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 2。

<sup>94</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頁 103。

<sup>95</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 113。

子人世之觀，皆是著重思維論證，笹川認為此學說並非直指現實，發端於南方的成因，是因想像力豐裕為南方人種的特性。楚地多有怪力亂神之說，為民族性使然，至於重鋪排與想像的辭賦，笹川以南方人種的性格特性作為此種文類盛行於南方的理由。

中國文學反映了重視實際與重視想像的人種特性差異，笹川認為人種的差異與地理環境相關。北方自然景物「山岳崔巍，風光落寞」<sup>96</sup>物產未若南方之勝，加上氣候嚴寒，人民難以從自然環境中取得衣食，故其性格著重實際，以北方文學為主流，故造成了重實際的文學盛行的現象。就南北方人種的差異，笹川亦以風俗的不同進行論述，如南方人民信鬼神，北方多狐狸妖談，南方跣足，北方著襪，南方乘轎，北方用車馬，南方用床，北方用炕，南人食薑，北人食蒜<sup>97</sup>。笹川臨風認為南人北人風俗皆異，故其性情上亦有所差異，致使文學作品風格迥異。

笹川臨風於文學史篇首特意分論南北人種，以此析論南北人種差異造就文學風格迥異的成因，探查其書寫動機，是為論述戲曲小說的必要性進行理由的鋪陳。笹川以北方人種長居政治軸心，影響力較廣，故中國文學史上，著重實際的文學作品廣為接受，成為具有共性的文學評斷價值。南方人種於文學上具有豐富的思想性，此亦成為南方文學的特徵，然北方因政治與地理的因素，長期影響文壇的重心，故南方著重想像的文學，向來不為主流文學接受。此說乃笹川臨風對戲曲小說一向不受中國重視的成因推論。簡而言之，戲曲小說著重想像，與北方人種重視實際的文學觀有所差異，是故戲曲小說歷來不受重視。另一方面，對南北人種性情各異的論述，是作為笹川臨風文學史的重要主軸貫穿全篇。在論述各朝代的文學作品及文風時，南北人種說成為影響文風的源頭之說。

第一期春秋以前的文學言及《詩經》時，笹川即認為《詩經》的教化功能，乃是源於北方人種的實際傾向<sup>98</sup>，詩能興盛於中國，亦因具有治世的作用。第二

<sup>9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

<sup>9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

<sup>9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5。

期言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笹川的思維模式仍藉由觀察當時興盛的文學作品或單一作家，試圖從作家顯現的作品風格，以南北人種說歸類，進一步理解時代風氣。

以春秋戰國時代文學為例，笹川臨風以思想界為切入點，認為是南方人種躍入歷史舞台的時代，故有南北思想的衝突。「南方人種亦進入歷史的圈子裡競爭求生存。」<sup>99</sup>、「風俗、嗜好、社會心象、性情背離的南北人種，在相異的思想下有所衝突。」<sup>100</sup>南北人種說是笹川臨風論述時的軸心，故文學史選擇論述的人物時，常以南北分論的方式，選出代表一時代人物。比如春秋戰國分節是將孔子與老子並列討論、孟子與莊子並列的討論模式，是就行文上，就南北人種性情相異，呈現不同的文章風格。比如先秦諸子中，笹川以孟子、莊子作為南北人種兩種類型的代表，分別承襲孔子老子，「孟子紹述孔子遺教，莊子續老子餘韻，此為戰國時代南北兩思想相對之代表。」並且藉由對孟子、莊子行文風格的特性，作為人種性情體現於文學作品的例證，如：「孟子為能辯之士。其文辭快利波瀾曲折，雄渾明晰，極議論文之妙。」<sup>101</sup>、「莊子思想為南方思想，其文亦為南方文辭。以隱喻設問法言幽玄之人生觀，以寓言、重言、卮言論其本旨。其文神韻飄渺，異於孟子之莊重。」<sup>102</sup>由此類論述可知，笹川進行文學作品之風格與人種性格特質之間關連論述。大抵而言，笹川臨風論南北人種性格之差異，是以北方重實際與南方重幻想，兩者最為迥異的文風，以此分辨各朝代的文學家，由文風斷定其思想是近於北方抑或南方。

在整理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時，笹川臨風亦發現有時未能以南北人種說將作家明確區分，其因乃受中國歷史上政治環境的影響，致使南北思想融合，作家作品常有融會南北人種特色的狀態。就第三期兩漢文學，笹川則言漢代之代表性人物多是混合南北特質，司馬遷是「兼具北方人種與南方人種之思想。」<sup>103</sup>「其

<sup>99</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45。「南方人種も亦歴史の圈子裡に入りて其生存を争ひき。」

<sup>10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45。「風俗に於て、嗜好に於て、社會心像に於て、性情に於て背離したる南北兩人種は其異なる思想と相争ひたるなり。」

<sup>10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59。

<sup>10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59。

<sup>10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93。

史觀依儒教之見解而立」<sup>104</sup>、「司馬遷之文具情感之文辭……因支那文學之特性，於筆勢併發處有誇張之失。」<sup>105</sup>。大抵而論，笹川對漢代的史家與文風，自揚雄至司馬遷，東漢班固，皆有正面評價，並就其傳世之作，言蒼萃南北人種的性格所致。漢代盛行的文學有辭賦、樂府詩，以笹川臨風的觀點，辭賦極盡鋪陳為南方人種之特性，樂府之蒼勁古樸，則為北方思想之延續，此二種文類盛行於漢代，亦顯現漢代文學融會南北特色的狀態，笹川臨風對文學家與作品的審視，多以南北人種說作為立論基礎。

雖然笹川認為北方人種因位於政治軸心而使得中國重視實際的文學，但在歷朝歷代的文風彙整中，笹川亦不諱言歷史上常有融會南北思想人物與文學風潮，揚雄仿《論語》作《法言》，仿《易經》作《太玄》，是受儒家傳統影響，具有北方特質的一面，其賦體的靡麗，又是受南方思潮影響。揚雄、司馬遷、班固作品，笹川臨風視為漢代文風蒼萃南北思潮的結果，自漢至魏晉南北朝皆如此。

笹川謂：「唐代為支那文學極盛的時代」<sup>106</sup>，對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發達的時期，笹川臨風斷言為唐代。在論及唐代文運之盛時，特別分節討論李白、杜甫，謂此二人以絕才席捲文壇，不限於唐代，實為支那文學史中的奇觀<sup>107</sup>。將李白、杜甫析出而論，亦為笹川欲凸顯南北人種說所作的編排，認為李白放吟自然，其詩飄渺，杜甫感慨時事，其詩沉鬱<sup>108</sup>，分別具有南方人種與北方人種的特性。唐代以後的文學作品，笹川認為較難以南北文學作全面性的區分，在論述上有別於唐以前的文學，常以文學家作為南北代表兩兩並舉，指出作家作品，論述其性格中得自於南方或北方的部分，予以說明。最終以南北人種說，作為解釋戲曲小說於中國不受重視的原因。統體而言，南北人種說是笹川《支那文學史》之綱領，為論述戲曲小說而不斷提及此說。將白話的戲曲小說與傳統上的文言作品，並列

<sup>104</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00。

<sup>105</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00。

<sup>106</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63。

<sup>107</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65。

<sup>108</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94。

收錄，成為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最為特殊的部分，也獲得實際的迴響，無論是明治時期的日籍文學史作者，開始於論述中給予戲曲小說的地位，或者中國學者林傳甲的批評，無論是以褒獎或者貶抑的角度評價，皆反映笹川臨風以南北人種說為起始，著重戲曲小說的《支那文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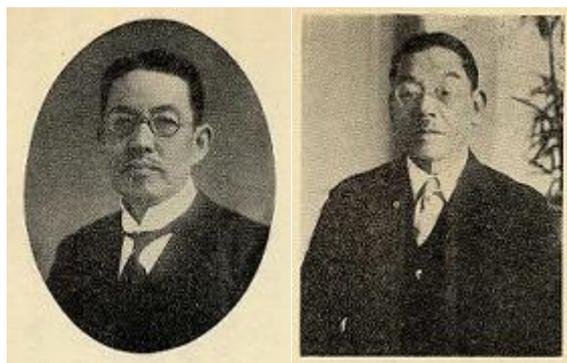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的成書，是歷經《支那文學大綱》、《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等專著書寫後的集大成之作，為笹川臨風一系列戲曲小說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作品。笹川在文學史的書寫體例的呈現，則是閱讀過同時期其餘文學史作者的著作後，於體例與思維上有所沿革的作品，可反映明治時期文學史著作的共性。但其文學史之中，最具特殊性之處則是在對戲曲小說的詳細敘述，其出發點是為了推廣在傳統漢學概念之中，因實用性不足而不受重視的文類，即戲曲小說。若說笹川文學史的體例與內容，大抵仍呈現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共性，展現當時對文學與漢籍的理解，那麼，對戲曲小說的關注則是出於笹川個人的研究喜好，為其文學史中最為特出的一環。藉由戲曲小說的納入，造成文學觀念的擴展，為文學定義仍處模糊的明治時期造成重大的影響，日後此文學觀的轉化影響至中國，對文學研究造成的進展不可略而不談。



## 第四章 憂時儒者：古城貞吉其人及其 《支那文學史》

明治三十年（1897）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一書刊行，作為明治時期那文學史著作之一，在內容與體例上，皆為較具有完整性的一本。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是與題名符合的通史著作，自先秦至清代，收錄各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此《支那文學史》出版於文學觀念尚不確定的明治時期，古城將西洋的文學史概念導入傳統的漢籍研究，是明治時期漢學家藉西洋方法研究中國典籍，以中國古典文獻作為方法的嘗試，無論是就文學的定義，或者對中國作家作品的選取，皆能體現時代特性。此外，明治時期大量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亦因作者自身的教育背景與研究喜好之不同，書寫出各具特性的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一書，即在選材上，顯現因古城教育背景所致的研究傾向。今就古城貞吉的出身背景，理解其書寫文學史的成因，以及教育背景所致的研究喜好。

圖 4-1 古城貞吉照片<sup>1</sup>



<sup>1</sup>圖片來源為《富山房五十年》（東京：富山房 1937）。

## 第一節 古城貞吉生平概述

古城貞吉作為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作者，一如當時的知識分子，具有深厚的漢學素養，但其學經歷中，亦有異於其他文學史作者之處，使得古城，顯現近似中國儒者的襟懷，其《支那文學史》是藉中國文學史中的種種現象，投注明治日本的關懷之情。以下將就古城的教育背景，遠赴中國遊歷的始末，以及其藏書等數個部分進行解析，作為理解其個人特質與文學史著作關聯的途徑。

### 一、年幼生涯，漢學啟蒙

古城貞吉（1866-1949），號坦堂，生於肥後國熊本（今熊本縣）。古城貞吉最初受業於竹添井井設立於寺原瀨戶坂（今玉名市伊倉町）之私塾，同於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是以漢學為教育的啟蒙。他於明治十四年（1881）入學同心學舍（後更名為濟濟齋）後，再進入熊本高等中學（後更名為第五高等學校），畢業後至東京就讀第一高等學校。然古城貞吉並未取得第一高等學校學位，是自學校退學後，返回濟濟齋就讀，且從濟濟齋畢業後，未繼續升學，幾乎是獨學中國文學及經學的相關知識<sup>2</sup>。

檢視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的教育背景，多是以漢學教育為啟蒙，曾受業於私塾，接受傳統漢籍的訓解教育，但此後多繼續升學，再於明治時期學科改制後，進入以西洋學制為主的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或至海外留學，直接習取西洋知識。以支那文學史的作者群來看，於明治十五年（1882）率先寫下《支那古文學史略史》的末松謙澄，即是留學於英國<sup>3</sup>；明治二十五年（1892）寫下第一本《支那文學史》的兒島獻吉郎，則是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古典講習科<sup>4</sup>；明治三十一年（1898）

<sup>2</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451。

<sup>3</sup>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史略史》（東京：文學社，1887 年），頁 5。

<sup>4</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565。

出版《支那文學史》的笹川臨風，也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科的畢業生<sup>5</sup>。和上述文學史作者大異其趣的是，古城貞吉不具有大學學歷，完全是以獨學的方式習取中國文學相關知識的背景，在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作者群中，顯得特出。古城貞吉是受到漢學影響較深的明治學人，在其文學史著作中，可見深受儒學影響的痕跡，此種現象，若由其教育背景來看，是有跡可循。

相較於自大學體制中習得西洋知識的明治知識分子，古城貞吉的教育背景是深具傳統漢學色彩的。古城貞吉的漢學教育是啟蒙於竹添井井（竹添井々），竹添乃是以考證學、古注學為學問依歸的傳統漢學者<sup>6</sup>，漢詩文的成就極高，他以漢文寫成的《棧雲峽雨日記》也聞名於中國日本兩國。古城貞吉對於竹添井井極其推崇，其所著漢文日記《巡禮日記》，即是在《棧雲峽雨日記》的影響下所成<sup>7</sup>。另一方面，古城所出身的熊本縣，是以程朱之學為官學，在此教育背景之下，古城貞吉的文學史受儒學影響的痕跡，是有其淵源。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對於文學家與其作品的關注，則依照儒家經世致用的價值觀，做出評判，特別是對於文學家的生平經歷，經常有道德上的褒貶。

古城曾就讀的同心學社，是以「皇室中心、國家主義」為建學精神。同心學社是為了培養於國家有用的人才，由佐佐克堂（佐々克堂）（1854-1906）於西南戰爭結束後，在明治十二年（1879）建立。同心學舍更名為濟濟齋之後，學校的宗旨則為「曰正倫理明大義、曰重廉恥振元氣、曰磨智識進文明」，將學校、國家、王家三方教育理念緊密結合<sup>8</sup>。在此之下，可呈現古城貞吉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是以「士當為世所用」作為最終目標，此理念亦呈現於古城的《支那文學史》之中。古城於《支那文學史》中，提及周代學制，曾有：「士尚全才，務為實材實

<sup>5</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 570。

<sup>6</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 卷 71（2003 年 3 月）頁 389。

<sup>7</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 卷 71（2003 年 3 月）頁 392。

<sup>8</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 卷 71（2003 年 3 月）頁 393。

學……其朝夕所聞見而服習者，無一非所以為治當時之家國。」<sup>9</sup>之語，亦反映其對於學問的態度，或可謂古城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亦有相應的成分是為了明治日本，在學制、人才任用、漢字存廢等相關議題中，藉由中國上古之事借鑒日本，為求其「治當時之家國」的理想。

若依照井上哲次郎對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序言中所載，古城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曾致書友人云：「今日是男子當有所為之時。」<sup>10</sup>赴朝鮮京城，隨軍往遼東，音訊暫絕。雖未能確認古城此次赴朝鮮、中國的始末，但可由此知其對於時事的關心，亦呈現其為君為國的抱負。如同古城就讀的同心學社建學宗旨，從皇室中心、國家主義，到正倫理明大義，皆呈現於古城生平與文學史中，成為《支那文學史》各章節裡，費篇幅寫政治、學制的書寫模式，文學史中的各節標題，如〈堯舜禹湯及武王周公之事業〉、〈周代學制之大成〉、〈武帝之治化〉、〈太宗之政策〉<sup>11</sup>等題目，皆是關注政治的治亂、君王的教化，呈現著眼於政治與社會背景的寫作。由文學史內容及古城之生平經歷，可知其並非將文學研究局限於書面資料之中，而是對現實保持一定程度的關注。因此古城對於文學的看法，並非如同笹川臨風對戲曲小說等文類的研究趣味為關注，而是圍繞著攸關文明的禮制、學制、君王賢臣的政治教化，以實用的學問著眼，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關注，具有作為明治時事借鑒的意圖。

## 二、赴中遊歷，任職報館

古城貞吉的生平經歷，現今仍有許多不明之處，在明治十九年（1877）至明治三十年（1897）之間的生平幾乎付之闕如<sup>12</sup>。但其生平極為重要的經歷前往中國乙事，確切的時間仍可藉由著作序言，以及與他人的書信往返得知。今檢視古

<sup>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頁10。

<sup>10</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4。

<sup>1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6。

<sup>12</sup>錢鷗：〈羅振玉・王国維と明治日本学界との出会い『農學報』・東文學社時代をめぐって〉《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97年，10月），頁88。

古城貞吉的生平，其於明治三十年（1897）就職於日報社（後更名為大阪每日新聞社）以記者身分活動，並於此年赴中國上海<sup>13</sup>。明治三十三年（1900）義和團事變發生時，古城貞吉與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等人，一同受困於北京日本大使館兩個月。對於古城貞吉赴中的原因，各家紀錄有所分歧。就宇野哲人（1875-1974）所寫的古城貞吉墓誌銘所載，其言：「閉門讀書，著《支那文學史》。後為日報社記者，遊於清國，偶遭拳之變。」<sup>14</sup>由是觀之，古城到中國似是出於記者的職務所需。但就《東方學》雜誌所刊載〈古城貞吉先生年譜〉明治三十年所言：「赴清國上海遊學」<sup>15</sup>，則古城貞吉赴中國必非出於職務，而是以遊學為目的。單就古城在中國的活動，即有報社記者與遊學兩種說法。

古城在上海期間所進行的活動，可自其與中國文人的交遊知其大略，現今所見的汪康年（1860-1911）、張元濟（1867-1959）、文廷式（1856-1904）等人的書信集中，可見古城貞吉之名，古城在上海的活動，可由此得知。古城貞吉在上海的時期，曾於《時務報》、《農學報》工作，以翻譯的身分，負責將日本新聞、書籍的資訊譯為中文。《農學報》是由務農會於1897年所創辦的報紙，構想為翻譯各國農業書籍，介紹各國農業相關制度與技術，由蔣黼（1866-1911）、羅振玉（1866-1940）擔任理事，負責總理庶務與潤色書報，並設有英文翻譯與日文翻譯，其中翻譯人才聘請一事，與古城貞吉相關。羅振玉、蔣黼曾去信向汪康年請求協助，推薦翻譯人才：

農學報及農學書已承代購，尤為神速、佩佩。將來翻譯之事，弟等意中竟無其人，尚乞代為延訪，或逕請貴館繙譯諸君兼辦此事，當酬送薪水，以資補貼，同乞尊酌施行。<sup>16</sup>

<sup>13</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卷71（2003年3月）頁397。

<sup>14</sup>轉引自李慶：《日本漢學史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52。

<sup>15</sup>轉引自錢鷗：〈羅振玉・王国維と明治日本学界との出会い『農学報』・東文学社時代をめぐって〉《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97年）（10月），頁88。

<sup>16</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927。

依據上文得知，羅振玉請託汪康年代尋翻譯，亦言或可直接引介「貴館繙譯諸君」兼職於《農學報》。所謂「貴館」是指汪康年所任職的《時務報》，當時《時務報》所聘請的翻譯，即是古城貞吉<sup>17</sup>。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時務報》第三冊有「本館辦事諸君名氏」，載有編輯人員的姓名「東文繙譯，日本東京古城貞吉」可見古城貞吉作為翻譯名列其中。由此可知，早在明治二十九年，古城貞吉即任職於《時務報》，以正職的翻譯人員身分受雇。

另外，由張元濟（1867-1959）寄給汪康年的信件中，亦可見關於古城貞吉的記述：

貴報嘗譯《東京日日新聞》暨《時事新報》二種，友人頗欲購閱，可否即託貴館古城貞吉先生代辦兩分（事倘可行，到後即附貴報寄京可也），該值即由弟處匯繳。敬乞轉商，至懇至懇。<sup>18</sup>

此處是張元濟的友人請求代買兩種日本報紙。就張元濟與汪康年的後續通信，亦見關於購買二種報紙的信函，就日後的信件內容來看，古城已為張元濟購得報紙兩種，並有關於報紙內容的記述：「東報早已到京，此本系夏虎臣所託，彼固不識東文也，此後不復閱。」<sup>19</sup>由此可辨明，尋求代購的友人為夏虎臣，在獲得日本報刊後，不解日文不能閱讀。由書信中的敘述，亦可知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資訊的取得上或需要藉助於外國的報刊，上海亦能藉由古城這類外國人士的活動，取得外國報刊之處。尋求古城代購報刊，卻因不解日文而未能理解一事，反映清末人士對外文的掌握有限，翻譯與翻譯人才的培育，具有一定程度的需求。

檢視汪康年的書信集，也可見此現象，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洋、東洋書

<sup>17</sup>錢鷗：〈羅振玉・王国維と明治日本学界との出会い—『農學報』・東文学社時代をめぐって〉《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97年）（10月），頁88。

<sup>18</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1676。

<sup>19</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1694。

籍報刊極感興趣，書信往來中，也有請託尋找書籍、地圖、報紙等內容。比如張元濟寄與汪康年的信件中，亦見「洋文圖籍未知購得幾種？日來想已在途，尤為企盼。」<sup>20</sup>、「三純文法代用尤迫，津河開凍，能覓便速寄，尤感。」<sup>21</sup>、「連冲叔交來洋書兩包，計文法六十本。」<sup>22</sup>，大抵而言，當時文人對於知識的知識來源，常得自日本、西洋的書籍報刊，中國本土的報刊，亦常譯介外國資訊做為刊載內容，故不僅外國輸入書籍具有市場，連同文法類書也具有一定的需求。在此背景之下，古城貞吉做為能通中日雙語的翻譯人員，適任日本書籍的採買，故兼任日本書籍代購而活躍。

古城貞吉於上海任職《時務報》、《農學報》擔任翻譯與代買一事，可見由羅振玉等人的信件往返中見相關內容。古檢視汪康年的書信集中，數見此類代買相關之信件，可知古城對於日文書籍傳遞的重要性，並可藉此理解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時事新聞與文法書的需求：

聞古城帶到農學書甚多，乞示細目，想是農學會所置譯者，此盛業也。...

乞古城先生函購勿遲誤，將來該價若干，照價奉繳。<sup>23</sup>

近又閱日清戰爭實記，後邊有各種地學書與物理書...價值該一清單，祈交古城先生去買。又東文文法書易通否，請聞古城。<sup>24</sup>

由此可知，古城貞吉並非只進行資料的翻譯，而是替農學會搜尋與農業相關之書籍，再進行譯介。他人所知書目，亦可請古城代為收購。古城貞吉於上海時，翻譯之外，亦負責資料的蒐集與傳遞，蒐集資料的理由，或出於報館的職務所需，

<sup>20</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681。

<sup>21</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679。

<sup>22</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頁 1696。

<sup>23</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2587。

<sup>24</sup>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2587。

或因私人的請託代買，成為將日本書籍運往中國的中間人，使得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藉此掌握西學相關知識，以及關於時事的紀實刊物，對於知識的傳遞，具有相當建樹。

檢視《支那文學史》的序言，可以確認的是古城貞吉首度赴中國，並非明治三十年（1897），至少能確定古城於明治二十九年，即赴中國。因《支那文學史》一書，附有井上哲次郎（1856-1944）的序言，文中言及古城撰寫文學史的情況。古城於日本時，曾攜《支那文學史》一書的部分草稿與井上哲次郎，井上表示讚賞，並期待全書的完成。但是就井上的敘述，亦可知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古城赴朝鮮，音信暫絕，井上不知《支那文學史》的書寫狀況。事隔一段時日，收到古城寄自上海的信，古城謂《支那文學史》初稿已成，請井上作序<sup>25</sup>。

井上哲次郎《支那文學史》序，是成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九月十一日<sup>26</sup>。據此古城貞吉赴中國的時間可推至明治二十九年九月以前，與年譜所載之明治三十年至上海遊學，具有時間上的誤差。另外，再版後的《支那文學史》中，收錄文廷式贈古城貞吉的近體詩〈贈古城坦堂兼謝其惠贈所撰支那文學史七律一首〉：

滄海橫流避此身，頭銜私喜署天民。豈知零落棲遲地，忽遇嶽崎磊落人。  
定論文章千古在，放懷世界一花新。停雲自此常相憶，何處桃源欲問秦。

27

此詩是文廷式受贈《支那文學史》後，贈詩與古城貞吉，對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以及人品具有極高的讚譽，古城亦於《支那文學史》再版後，將之刊於卷

---

<sup>25</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頁5。「已にして日清戦争起る、君乃ち袂を揮て蹶起、朝鮮の京城に赴き、書を友人某に寄せて、曰く、今や男子為すあるの時なり……後、音信暫く絶え君の情状如何をしらざりき、頃ろ偶上海より書を余に寄せて曰く、草稿正に成れり、今之れを印刷に付せんとす、請ふ為めに序を作れと、幾もなく君の友人某其草稿を攜へて来る。」

<sup>26</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頁5。

<sup>27</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頁2。

首。由是可知，文廷式受贈的是《支那文學史》出版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的初版，與明治三十五年（1902）已相隔一段時間。今就文廷式寄予汪康年的信件中，可見文廷式請轉交古城貞吉詩箋一事：「別有寄古城坦堂詩箋一，示乞轉交為盼。」<sup>28</sup>此信件登錄日期為六月五日。就杜軼文的考察<sup>29</sup>，以書信考證文廷式旅居上海的時間，推定西曆 1896 年七月時，古城貞吉確居於上海。由是證明古城貞吉最晚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七月初已到上海。

由《支那文學史》序言的井上哲次郎所署之日期，以及前人經由書信的考察，可對古城貞吉赴中國的時間進行時代上限的推定，並藉此修正《東方學》雜誌所載〈古城貞吉先生年譜〉，明治三十年「赴清國上海遊學」<sup>30</sup>古城赴中國的記載。對於遊學說，目前尚未有資料證明古城曾進行遊學，但可由羅振玉、汪康年等人的書信往來，確認古城擔任報刊翻譯一事，掌握古城貞吉前往中國的時間與大致的活動。

### 三、返日任教，以學名世

古城貞吉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離開中國，歸國後，辭去報社記者一職，於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後更名為拓殖大學）擔任講師。其生涯前半期以記者身分活動，自中國返日之後，則從事教職三十年，在拓殖大學之後，亦任教於早稻田、日本、立教、大東文化、慶應義塾、東京文理科等各校<sup>31</sup>，後半生是以學者的身分活動。

就其研究成果而論，古城貞吉著有《巡禮日記》、《支那文學史》、編有《肥後文獻叢書》等著作，考其內容，大抵與古城的經歷有關。比如以漢文書寫而成

<sup>28</sup>上海圖書館編輯：《汪康年師友書札（一）》，頁 20。

<sup>29</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 卷 71（2003 年 3 月）頁 389-409。

<sup>30</sup>轉引自錢鷗：〈羅振玉・王国維と明治日本学界との出会い『農学报』・東文学社時代をめぐって〉《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97 年，10 月），頁 88。

<sup>31</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452。

的《巡禮日記》<sup>32</sup>是古城「巡禮西國三十三靈場庶足以為先靈於冥漠」<sup>33</sup>巡禮寺廟以紀念其母，並仿效其師竹添井井以漢文寫成《棧雲峽雨日記》之意，以漢文寫遊歷過程。古城編寫的《肥後文獻叢書》<sup>34</sup>則是蒐集其出身地肥後國（熊本縣）的歷史、風俗、文學、制度、教育的相關古代文獻，共計六十六種，編纂為一套六冊的叢書。《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則是就其漢學背景，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介紹，並且自中國返日之後，再進行內容的增補，使得《支那文學史》不限於古典文獻，亦對清代的文學作品、戲曲有所收錄，並去除摘錄之漢籍內文中的訓點符號。

檢視宇野哲人所著之〈古城貞吉年譜〉，可知古城貞吉的經歷與著作之間，是具有極為直接的關係，今引年譜中述及著作的部分，其言：

先生為人純孝，其喪所持也，手寫般若心經，納之近畿名剎，以祈冥福。据環簡素自持，恬淡名利，甚惡銜學自售者。又有愛書癖，所藏數萬卷，而見善書則不顧家購之。夫人尤賢，自若無怨言。先生博覽多識，殊長於文。臨翰千言立就。壯年所著《支那文學史》，長為典據。<sup>35</sup>

將宇野哲人的敘述，對照古城的著作，可知描述「手寫心經，納之近畿名剎」一段，乃是古城貞吉寫下《巡禮日記》的背景。依照《巡禮日記》的序言來看，可見書寫巡禮寺院的著作，是為了紀念亡母：

自去年失恃，心緒荒落，感身世之蒼涼。讀禮之餘，偶涉僧愚庵巡禮日記。默念先妣在世時，每晚於佛燈前誦經，其聲今猶在耳。發願歷拜四國三十

<sup>32</sup>古城貞吉：《巡禮日記》（東京：古城貞吉自行刊行，1929年）。

<sup>33</sup>古城貞吉：《巡禮日記》，頁2。

<sup>34</sup>古城貞吉等編：《肥後文獻叢書》（東京：隆文館，1909年），頁2。

<sup>35</sup>轉引自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頁452。

三陵場，庶足以慰先靈於冥漠。<sup>36</sup>

由此可見，古城貞吉懷念虔誠禮佛的母親，藉由巡禮近畿一帶的三十三所寺廟<sup>37</sup>，此處所見紀念亡母，欲慰先靈的事由，也與宇野哲人「先生為人純孝」的記載兩相符合。至於「博覽多識，殊長於文。」亦藉由古城的著作內容體現，比如《巡禮日記》是以流暢的漢文寫成，內容上，對於所歷之寺廟具有詳細的描寫，不僅追溯寺廟的建造歷史，亦論及建築塔殿門廡的形制，對於殿中所供之佛像形制、擺放位置，皆有論述。在描寫方式上，確實與竹添井井《棧雲峽雨日記》中，對中國景物的詳細描寫相當類似。

#### 四、愛書成癖，坦堂文庫

宇野哲人撰寫的古城貞吉墓誌銘中，述及古城對於書籍的喜愛與蒐集。由古城的著作來看，可知古城對文獻蒐集的成果，顯現於著作之中，如《肥後文獻叢書》<sup>38</sup>的編成，是對於古城出身地熊本當地的文獻蒐集，乃六冊的大型著作。另外，古城的「愛書癖」亦可由現今留存之古城藏書略知一二<sup>39</sup>。今日慶應義塾大學設有斯道文庫，收藏日本與東洋古典相關資料，書籍來源有購入、寄贈、寄託數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數種特殊文庫是以日本漢學相關書籍為中心，包括得自古城貞吉舊藏的坦堂文庫。坦堂文庫是由永青文庫寄託於慶應義塾大學，現坦堂文庫藏書大多為中國刊刻的漢籍，日本刻本佔少數，亦有西洋裝幀的洋裝本，其藏書內容，特意蒐集以《楚辭》為中心的中國文學相關書籍<sup>40</sup>。論及古城貞吉對《楚辭》相關書籍的蒐羅，似是受到其師竹添井井的影響。竹添井井著有《左氏會箋》蒐羅各家箋注，是為其代表性著作，後世的研究者認為，古城貞吉對《楚

<sup>36</sup>古城貞吉：《巡禮日記》，頁2。

<sup>37</sup>古城貞吉：《巡禮日記》，頁2。

<sup>38</sup>古城貞吉等編：《肥後文獻叢書》（東京：隆文館，1909年），頁2。

<sup>39</sup>詳見附表三坦堂文庫史部藏書表格，列舉部分藏書。

<sup>40</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集，1993年12月，頁231。

辭》的關注，是有意寫成與《左氏會箋》相近的著作<sup>41</sup>。坦堂文庫中的重要藏書為清代初期的汲古閣本《楚辭》十七卷，內有古城貞吉詳細的案語。另外，由王韜著作，記錄上海風俗的《瀛壖雜誌》亦為坦堂文庫所藏，此版本為王韜的自筆稿本，較日後鉛印刊行的版本，更顯得貴重。

大抵而言，坦堂文庫所藏之漢籍，是以清代的刊刻本為主體，共計兩萬八千冊，經史子集四部皆有所蒐羅，其中集部的數量最為充實。也有清末民初的出版品，部分來自作者的贈書。古城貞吉的藏書，並非一般藏書家所追求的罕見版本，珍本、奇書等類一概未見，所藏皆為學者的常備用書。由是可知古城的愛書癖，大抵是以研究的趣味為主軸，具有蒐集資料以備參考的意圖，而非對於珍本的追求。藏書是用於研究上的查閱，據整理者所見，古城的藏書上，大都具有硃筆、墨筆、藍筆所寫的批語<sup>42</sup>，不論是漢籍或日本、西洋的書籍上，皆有古城的筆記與圈點，在藏書的取向及檢閱批註書籍的使用方式上，與其說是古城是藏書家，倒不如說是純然的學者性格，對於古城的藏書心態，研究者有：「並非僅是單純的藏書家、愛書家，而是確實的讀書家。藉由書本上的紀錄，可知藏書者精讀的軌跡，純然乎學者風範。」<sup>43</sup>的評價，可見古城貞吉對漢籍的蒐集，並非出於蒐羅古物的心理，而是以研究檢索為最高目的。

就古城貞吉的藏書來看，其所蒐羅之種類，也可反映其治學趣味。以四部而論，集部的數量較為充實，與其他類別相較，史部則較為遜色，若檢視古城貞吉研究生涯的發表著作，確實是反映古城對於不同領域的關注度不同。就古城貞吉的研究內容，一般認為其以經學為主軸<sup>44</sup>，經學則是被稱之為舊學的學問。然就史學一類的藏書所見，也可發現古城在治學上，對於受到西洋影響的新式學門分

---

<sup>41</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卷71（2003年3月）頁392。

<sup>42</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集，1993年12月，頁231。

<sup>43</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集，1993年12月，頁231。

<sup>44</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史部（上）〉，《斯道文庫論集》37集，2002年，頁354。

類，並未排斥，就其藏書中，可見考古學、歷史哲學、民俗學、民族學、史學方法論等著作，至於甲骨學、金石學的著作，則是由郭沫若(1892-1978)、闕鐸(1875-1934)等學者所贈，此可反映當時學者間的交遊，亦為古城對於新出土材料，以及考古學等新興學門的接受與理解。

古城貞吉藏書中，是以漢籍為主，歷時明治、大正、昭和長時間的蒐羅，反映其對於學問的堅持態度，亦由其藏書體現漢學者的身分。另一方面，古城身為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雖在其求學歷程中，漢學的影響一直佔有極大的比重，然在時風的影響下，具有舊儒色彩的古城，亦不排斥西學的習得。古城所處的時代，對應至中國的紀年，橫跨晚清至民國，在古城的藏書中，對於晚清民國學者的著作，亦有相當的數量<sup>45</sup>，古城藏書中受到西洋學問體系影響所成的著作，數量相當有限。此部分的藏書難以以傳統的四部分類，現今的整理者認為，另立新學一類，是將舊學與新學割裂，不符合明治時期學問的流行狀況<sup>46</sup>，是故在坦堂文庫的整理過程中，關於政治學、教育學、經濟學等新興學問的書籍，仍是列入史部<sup>47</sup>。就古城的經歷與著作而論，西學與漢學亦具有不可分割性，縱然漢籍是研究的主要範疇，但是在方法上，古城貞吉這一具有舊儒色彩的漢學者，仍是以西洋的文學史方法，審視中國典籍，將文學置於流動的歷史中進行研究。

宇野哲人「所藏數萬卷，而見善書則不顧家購之。」之言由今日坦堂文庫的藏品內容可見一斑。大抵而言，古城貞吉的博覽，以及對書籍的搜羅，多是反映其治學趣味。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撰寫，亦是其治學趣味的反映，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嘗試以西洋研究方法與學科分類，對舊有的文獻進行整理，就古城貞吉而言，其文學史書寫也體現了此時文風。必須注意的是，古城的教育背景中，漢學終究為其核心，今由坦堂文庫所藏書籍，可知古城對於漢籍的搜羅，仍

<sup>45</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集，1993年12月，頁231。

<sup>46</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史部(下)〉，《斯道文庫論集》38集，2003年，頁353。

<sup>47</sup>坦堂文庫史部部分藏書，詳參附表三。

是以傳統漢籍為主體，故其《支那文學史》之寫成，儒學的影響是最不容忽視的一環。

## 第二節 《支那文學史》版本差異之比較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初版刊行於明治三十年(1897)，明治三十五年(1902)再版。再版增補餘論一篇，是在古城自中國歸來後，產生文學觀變動的反映。初版與再版的最大差異，可體現於三方面，分別為戲曲小說、訓典移除、文字之學，今論述此版本差異之內容，以及造成改版的可能原因。

### 一、訓點移除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於明治三十年(1897)初版刊行，明治三十五年(1902)再版刊行，兩者相較，最大的差別在於引用的中國古典文獻，於再版中，消除了訓點符號。

訓點符號的消除，是反映古城貞吉意識形態的改變，亦為明治日本試圖建立一文明先進國，與中國進行切割的時代氛圍。訓點符號，是日人為理解漢詩文，以日文符號標記於漢詩文之上，改換語序，使漢詩文能以日文文法理解的手段。漢詩文上所標記的訓點符號，意味著日文與漢文區隔的模糊，作為外文的漢文，能藉由符號的標記，轉換為日文的理解，與直接將漢文譯為日文，是不同的處理方式。訓點作為理解漢文的方法歷史悠長，自十世紀起始，即有博士家家學的差異，訓點方法有所分歧。可說訓點符號，作為日本歷來理解傳自中國的漢籍，以及日人以漢文書成的文獻標記，可視為漢文的影響難以自日本論文學中完全分離的主因。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初版中，引用的漢文作品均有訓點符號，若理解日本以訓點理解漢文的歷史，自然是依照日本漢學的傳統方式理解漢文文獻。移除訓點，可謂展現明治時代特性的特殊舉動，是將中國文學的研究，逐漸自漢學抽離，轉往引進西洋研究方法的支那學、中國學研究的歷程。

古城貞吉在明治三十五（1902）年刊行的《支那文學史》再版著作中，將漢文的訓點去除，可視為使中國的歸於中國，日本的歸於日本的一種作法。於意識型態上，將中國典籍視作外國文學，亦是顯現日本與中國徹底區別的觀念。檢視井上哲次郎於古城《支那文學史》序言中所言，古城之所以研究中國文學的流變，進行《支那文學史》的編纂，是為了理解日本的歷史典籍。由此可知，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書寫風氣，具有日本國家意識的興起，以及理解本國文獻等意涵，尤其在理解日典文獻時，漢籍成為無法避去的歷史，使中國文學研究的必要性也在此顯現。由此可見，支那文學史的書寫，明治日人在建構國家意識以及民族主義概念的過程中，要以日本為本位。漢籍的流傳，以及以漢文書寫歷史的背景，使漢文成為中國與日本共通的書面語，要將中國自日本的歷史中抽離並無可能。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是在引入盛行於十九世紀西歐文學史觀後，再將中國文學置於外國文學視域研究的著作，無論在內容上對文學的重新定義，或就將中國他者化的思維，都具有明治時代的特性。

一般而言，漢文可用以指稱中國傳來的文言文，亦可為日人以中文書寫的文言文，漢文為中日兩國的書面語，也容易造成指涉內容的混同。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初版刊行時，漢文部分仍有訓點符號，再版時移除，此舉與古城的經歷有關，古城貞吉自中國返回日本後，移除訓點。檢視明治時期日人遊覽中國所留下的記述，可知現實中國與漢籍中的中國具有極大的差異，無論是竹添光鴻《棧雲峽雨日記》、岡千仞《觀光記遊》、內藤湖南《燕山楚水》皆有對現實中國的落後，與漢籍中國記述相違產生喟嘆的記載。比如岡千仞記於蘇州所見，乃是：「鞠為茂草，壞牆廢础，滿目蕭然。」<sup>48</sup>；而內藤湖南遊歷蘇州的見聞：「楓橋夜泊的詩碑嵌在半塌的牆壁上，幾乎要埋沒在塵埃臭穢中……聽說蘇州這樣可稱為文人的冀北的地方，竟然也沒有什麼人來憑吊這也應該看做中國衰敗氣象的一個徵兆吧。」<sup>49</sup>。小林愛雄於明治四十一年遊歷中國後完成的《中國印象記》則寫道：

<sup>48</sup>岡千仞：《觀光紀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8。

<sup>49</sup>內藤湖南著，吳衛峰譯：《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5。

「我向人打聽了張繼詩中有名的楓橋的位置。結果只是街道中一個骯髒的石橋，潮濕的地面散發濃濃的惡臭。寒山寺同樣荒廢到了極點，瓦礫散落，沒有一點往昔的影子。」<sup>50</sup>由此數名明治時期知識分子赴中國的遊記中，可見對漢籍與漢詩的熟習，當他們將文獻中的中國與現實中國對照後，不免產生落差。

與其他的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相同，古城貞吉在親身赴中國後，其所見所聞，與藉由漢學教育中的漢文典籍所認識的中國紀聞，也有差距。明治日人將理解的漢籍與現實中國的差異，化為移除訓點，遂將中國視為外國，與日本進行區隔。在歷史因素以及藉由漢籍理解中國的背景之下，明治以前的日人對中國常懷有憧憬，明治以後，明治維新以後日人將學習的對象由中國轉為西洋，並且親身至中國遊覽後，體會現實與典籍的差異，因而強化日本與中國間的區隔。或如同黃俊傑所言，「明治以後的日本人，一方面對近代中國頗為蔑視，但另一方面對古代中國卻又大加推崇。」<sup>51</sup>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漢學素養深厚，對古代中國具有親近之情，但是在接觸現實中國之後，逐漸理解典籍與現實的落差，對他們而言現實的中國已為異國，必須與古代中國有所割裂。古城貞吉在自中國返回日後將《支那文學史》引述的中文原文刪去訓點，或是在於此思維改換，對現實中國的重新認識，中國已非漢籍呈現的禮教端正，風俗淳厚之國，而是內憂外患下，民事凋敝的衰弱帝國。

可惜的是，古城貞吉並未留下中國遊記，故現今對於其為何前往中國的原因，以及在中國的活動，仍有未詳之處，中國之行對古城帶來何種影響，也未能藉由文獻得到直接的理解。若由明治時期日人到中國後所著的遊記中，可得知當時日人的中國見聞，以及與想像對比後的落差心理。或可自此推測，作為一個嫻熟於漢籍的儒者，古城貞吉的中國遊歷經驗，或可能極衝擊其思維，體認到於明治時期，中國與日本已是截然不同之兩國，無論就國體的政治制度，或是漢籍知識的

<sup>50</sup>小林愛雄著，李煒譯：《中國印象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8。

<sup>51</sup>黃俊傑：〈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詳參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295。

層面，早已兩相悖離。在此觀念的衝擊之下，將中國與日本進行區隔，以排除訓點意味中國已成為外國，極有可能是在古城遊歷中國後的具體行為。

## 二、文字之學

《支那文學史》的再版，除了訓點的移除，另增添餘論一篇，作為初版的補遺。餘論的書寫，是古城在遊歷中國後所增添，書寫的內容亦可展現古城赴中後的思維變化。今檢視《支那文學史》最末篇的餘論，可知其亦非對於部分篇章的補述，而是概述中國從上古至近代的文學發展，再一次以歷時方式略論，與文學史初版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時代最早的文字起源，以及時代較近的戲曲小說兩部分。在《支那文學史》的正文中，有關於文字起源，是以傳說時代為起始，言「有臣曰倉頡者，始製文字。」<sup>52</sup>。然而，至《支那文學史》再版收編的餘論內容來看，對舊說有所修正，其言：「文字之創始，絕非出於倉頡一人之手。」<sup>53</sup>就文字的起源這一命題，古城貞吉引用《說文解字》，關於六書造字法則的介紹，首先細論「象形指事先興，後有諧聲假借。」<sup>54</sup>造字法則的先後，再講述文字的規則，並且論經時代推移，文字產生的演變，包括篆書、隸書等各種文字通行背景。

古城之所以在餘論對文字的起源進行修正敘述，或仍可自其赴中國的遊歷進行推演，在古城所接觸的中國學者之中，包括擅長文字學的羅振玉，而羅振玉亦藉由與日本學者的交遊，將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廣傳日本學界所知悉。古城對文字學的理解，不能排除是在與當時的中國學者交遊之後的結果。在古城貞吉藏書的坦堂文庫中，可見金石、甲骨學相關著作，有不少作者的贈本。甲骨的出土，使得清末的文字學發生研究範圍的擴展，亦造就文字學的興盛，古城貞吉於此時前往中國，他與中國學者交遊，對於當時的學術風氣，以及新興的甲骨學，應有所涉獵，進一步修正文字學相關知識。檢視古城貞吉坦堂文庫的藏書，可見

<sup>52</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頁12。

<sup>53</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77。

<sup>54</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77。

小學類的書籍，尤其是關於文字學的藏書，大量收錄清人著作乃是其特徵。段注《說文》是在古城的藏書之中，其餘清人文字學著作則有：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馮桂芬《說文解字段注考正》、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李富孫《說文辨字正俗》、王筠《說文釋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葉德輝《六書古微》、丁佛言《說文古籀補》、張行孚《說文發疑》<sup>55</sup>等書，可謂說文學收集大家。古城貞吉到中國之後，對文字學有了新的理解，也是使餘論對文字的起源以說文為依歸的主因，所謂「俯仰回首，聊為補遺一二。」<sup>56</sup>確實體現於文字起源的論述之中。餘論有言：「古學以識字為始，謂之小學，以之為學問入門。」<sup>57</sup>顯示在小學的文字、聲韻、訓詁三個領域中，獨取文字學作為中國百般之學的基礎，反映古城對文字的重視。檢視坦堂文庫，亦不乏清人聲韻學相關著作，如顧炎武《音學五書》、戴震《古韻標準》、樊騰鳳《五方元音》、姚文田《古音譜》、龍啟瑞《古韻通說》<sup>58</sup>等著作。事實上古城小學類的藏書並不僅限於文字學，但其對於文字學的關注，卻最為明顯，餘論呈現對中國文字源流的詳論，而非對字音與字義的訓解。古城對文字的傾重，或源自與羅振玉的交遊，又或為日本古來即有漢籍流傳與漢文書寫，日本漢學的構成即是在日本人「未諳華音」的狀況下，以漢字作為書寫載體而成，古城貞吉對文字學的特別的關注，或是在明治年間的中國遊歷後，與中國學者交遊，加上日本漢學的傳統而成的結果。總體而言，古城貞吉於餘論中，引入說文學，修正《支那文學史》本論文倉頡造字之舊說，以說文學為依據講述文字起源，與其中國經歷或有直接關聯，此是古城餘論中，以新知識對本論文進行補遺的特點。

<sup>55</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 集，1993 年 12 月，頁 231。

<sup>56</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 年），頁 576。「俯仰回首、聊一二の補遺を為さるべからず」

<sup>57</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頁 579。「故古學は字を識るに始り、之を小學と謂ひいて、學に入るの第一門とせり。」

<sup>58</sup>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 集，1993 年 12 月，頁 340。

### 三、戲曲小說

就古城貞吉的教育背景與研究主軸而論，古城貞吉是受儒家影響較深的漢學者，在《支那文學史》所展現的篇章架構與切入點，皆可見傳統漢學的影響。文學史的研究，乃是受到西歐學科概念傳入後所形成的新式研究方法，但是以明治知識分子的教育背景，文學史內文中展現的漢學色彩難以忽視。文學的定義在明治時期進行再定義，西洋的文學觀與傳統上漢學即文學的定義相互混同，各種文類被列入文學的定義當中，是明治時期文學概念重組的特色。此前的江戶時代是將意味著儒學與和詩文的文章列為文學，產生漢學即文學的現象，而日本自有的文體和歌則地位低下，受到庶民喜愛的俳諧、小說則被視為下賤之物<sup>59</sup>。由是觀之，文學的概念由明治時期間一連串的文學史書寫，使得近代文學的定義逐漸確立。福地櫻痴列舉 *novel*、*drama*，譯為小說傳奇、演戲院本，於〈感嘆日本文學的衰落〉一文中加以討論，以日本的物語、戲作等通俗讀物，作為此西洋文體於日本的對應。在歷經三上參次、高津楸三郎《日本文學史》的書寫，和歌、俳句、戲曲小說納入文學的範疇。此後《支那文學史》的成書，也反映此種於現有文體中，尋求 *novel*、*drama* 之對應的現象。就如同川合康三所言：

相較於以戲曲和小說為中心的西歐近代文學，在傳統的中國文學觀下，這類俗文學作品尚未取得應有的地位。而日本可能因受西歐近代文學觀影響，對俗文學這塊全新的領域展開熱烈的探求。<sup>60</sup>

---

<sup>59</sup>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117。

<sup>60</sup>川合康三：〈中國文學史的誕生：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之一面〉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頁246。

實際上確立小說戲曲為文學的舉措，是藉由明治中期以後的文學史書寫。由西洋文學至日本文學至中國文學，戲曲小說作為全新的領域，引起明治時期文學史家相當的關注，就連古城貞吉這一舊儒色彩強烈的學者，也不免在此影響之中，產生文學觀的修正。古城的文學史中，也呈現與漢學即文學的舊式文學觀之修正，最明顯的部分在於餘論之中對小說與元曲的講述。

以篇幅分配來看，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並不專立章節論述小說與元曲，在論述元、明、清各個朝代時，仍是以詩文作為文學代表而詳述。餘論作為古最終章，是以不分節的體例論述，小說與戲曲僅在此論及，屬於概述性質的淺論，古城貞吉對戲曲小說的態度，以及戲曲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定位，作如下說明：

支那文學以儒教主義為開展，故其文辭儒雅切實，以實用為目的。據此標準，則詩賦以溫柔敦厚為旨，是故士君子未敢染指戲曲小說。<sup>61</sup>

古城貞吉認為，戲曲小說並未符合儒教影響下的實用儒雅的文學觀，故在中國文學史上，未能受到重視，在儒教標準下也造成士君子不敢創作此類文體的現象。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餘論對於戲曲小說俗文學的注目，亦為特出之處。古城貞吉的生平與經歷，常顯現其作為儒者的性格與治學傾向，古城認為戲曲小說不符合儒教影響下的文學觀，違背儒雅切實的傳統，而產生「士君子未敢染指戲曲小說。」，戲曲小說不為中國士大夫所重視的現象。但若檢視餘論的內容，古城言小說的起源，引述清人筆記所載「小說起於宋仁宗時」<sup>62</sup>等關於白話小說的記載，並且將近世以降的戲曲作品，納入文學的範疇之中，提及明傳奇《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等作品時，也認為清人白話小說中，以《紅樓夢》為

---

<sup>61</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83。「此の如く支那文學に於て儒教主義の開展せられたる結果、其文辭に於ては儒雅切實を以て用に適す為し、詩賦に於ては溫柔敦厚を以て教旨と為して、標準を此に取り、是に於てか戲曲小説等作に至りては、自らけられて士君子の敢えて指を染むるを有様と為れり。」

<sup>62</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83。

第一，眾人不會產生異議<sup>63</sup>。將明清的戲曲小說補白於餘論中，可顯現古城貞吉親歷中國後，對流行於民間的白話作品有所理解，也體認戲曲小說作為風靡近世的文體，原來自漢籍所理解的士大夫文學觀，親身赴中國後也造成其文學觀的修正。若以時代而論，古城所處的明治時期，正好對應中國的晚清，戲曲小說的流行，自是與古城藉由漢籍認知，以儒學為主的中國文學觀有所差異。縱然基於古城舊儒的性格特質與治學趣味，戲曲小說不會成為其研究的主軸，然而就文學現象的觀察，近世所盛行的文體，是古城在進行文學史書寫時難以迴避的一環，故戲曲小說也以餘論的方式，躋入文學的範疇之中。

#### 四、初版與再版差異之成因

對比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初版與再版之差異，其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是從原本得自書面材料的漢籍研究，轉換為親身遊歷現實中國後，理解當代學風與新出知識，將文獻裡的中國與現實兩相對應後，產生修正性補白的闡述。大抵而論，古城再版的《支那文學史》中，以中國文學發展時間最早的文字起源，以及最接近古城所處時代的戲曲小說，以文學的起始與末尾，進行論述的修正。關於此論述的修正，亦是在明治這一特殊的時代中，方有實現的可能。若溯及明治以前的日本學人，漢學家長期以推崇、效法的態度，鑽研中國文獻，並常將漢文寫成的著作輸往中國，以期望獲得中國人的實際評價。但因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使得日人無法自由出入中國，如同活動於幕末至明治的漢學家楠本碩水（1832-1916）所言：「德川氏承其後，終定鎖國之計矣，隋唐邈矣，來往使臣，人物學問，莫得而詳。」<sup>64</sup>，德川幕府於豐臣秀吉之後，日人僅可結交活動於通商口岸長崎的中國人，傳遞詩文著作，獲得詩文的評價與贈題。

<sup>63</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84。

<sup>64</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漢學家及其著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118。

隨著政策改換的明治時期，日人往中國遊歷變為可行，以明治時期的文學史作者而論，古城貞吉、藤田豐八、白河鯉洋、高瀨武次郎等人，皆曾赴中國。在明治知識分子的漢學教育背景中，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來自於漢籍，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兩相對應後，多數帶來強大的衝擊與幻滅，此乃明治時期日人赴中遊記的共性。古城貞吉的中國經歷，對其著作的影響，或可體現於《支那文學史》的再版。藉由現實中國的認識，古城將漢學研究的領域，中國與日本因共通書面語區隔模糊的現象，藉由移除訓點，宣示置中國文學為他者。漢文訓點的有無，之所以成為意識形態的體現，與日本吸收外來文明時，並非全盤效法的平移，而是有所改換的嫁接有所關聯。無論是宗教、哲學、文學、語言等各層面，皆是如此，所謂「和魂洋才」、「和魂漢才」等詞彙的生成，均為此種現象的反應<sup>65</sup>。但也正因為此文化上的嫁接，使得中國與日本在文學的範疇上，仍具有難以切割的共性。特別是訓點的標記，以之作為語序上的調整工具，使得外國文字產生日本化的解讀，也意味將他國的文字內化的必然性。故中國與日本，雖有共通的書面語言，然排除訓點的純粹的漢文，是與加上訓點，經過日本式解讀的漢文截然不同的存在。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之所以在初版與再版中，呈現細部的調整，與明治時代日漸強化的國家意識，以及古城個人的中國經歷有關，就社會氛圍的外部成因，以及古城個人體驗的內部因素，形成明治文學史著作的特殊風貌。

傳統上日本的漢學研究是以文獻為關注點，而非著重現實的中國，對現實的忽略，也加深研究上國界不明的現象。如同溝口雄三所言，漢學的領域上，中國與日本是混同的，甚至可說是沒有他者的，所謂內化的漢學概念是：「對日本漢學而言，中國堪稱為自己內在的世界。因此，日本漢學稱不上是一種外國學，在本質上，它只是日本學。」<sup>66</sup>在漢學的領域中，日本顯現出的學術特性，是與歷史上以中國為軸心的進程有關，不同於西方研究中將中國視為異國理解。

<sup>65</sup>王健：《神體儒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2。

<sup>66</sup>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頁129。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再版，則由訓點移除等措施對中國與日本產生區別，是以外國學的角度檢視中國文學。如此顯現明治時期的日人，逐漸擺脫漢學的藩籬，為國家意識提升的體現。也是將漢學上以中國為軸心的世界觀重組，將日本與中國區別，意味著將中國為中心的漢學，轉向以世界為場域的近代學問支那學。在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餘論當中，嘗言儒教對於社會風氣的影響，多半採取儒雅切實作為中國文學的取捨標準<sup>67</sup>。古城貞吉注意到中國傳統上對戲曲小說的貶抑，是出於政治需求與社會價值的緣故，遂將中國文學的發展傾向，歸咎社會需求，此觀念別於漢學研究中，將文獻與現實中國割裂，使得中國日本區分不明的現象產生。將中國文學視為生成於中國政治環境中的現象。只從漢籍中理解中國，是造成漢學中日區分模糊的主因，在研究中考量到現實中國與文獻中國的關聯，是古城貞吉作為明治時期漢學家，藉由西學的引入與中國遊歷的經驗震盪後，逐漸產生區別中日意識後的結果。

漢字作為日本古典籍的載體難以迴避，古城貞吉在《支那文學史》的再版餘論中，則藉由移除訓點的方式，將中國視為外國，體現中日間的區別。此舉是反映日本論文化自主性的提升，藉由加與中國異質性的方式，改換原本漢學研究中日不分的狀況。

單就漢字一事而論，以漢字作為共同載體，亦為促成是漢學上和漢不分的原因。若以明治時期的狀況而論，漢字改革成為彼時的議題，重野安繹、井上圓了於 1900 年前後，相繼發表漢字不可廢的議論，強調漢字不可廢除。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設置國字改良會，關注漢字議題。官方設立國字改良部，亦意味著文字的改革在所難免，漢字假名並存的現象，非有所改革<sup>68</sup>。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是對漢字存廢的討論有所議論，一方面亦是西洋文學史觀的傳入，使得對漢籍的研究逐漸與江戶時期產生異化，無論是漢字存廢論或者學術研究，其中顯

<sup>67</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 581。

<sup>68</sup>李慶：《日本漢學史（2）成熟和迷途》（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591。

現的去中國化傾向，亦顯現國際情勢改換的明治時代氛圍，使得彼時的《支那文學史》形成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學史著作。

### 第三節 《支那文學史》的時代議題， 以序文為線索的解讀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常關注於中國古代的制度與治亂，以作為文學作品解讀的方式。對於政治的關注，可謂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的特色之一，是與其他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著作最為不同的部分，有別於其他文學史是以文學作為關注重心，古城則是以政治與道德的批判，作為書寫的主軸，呈現對現實關注，並具有儒家式道德色彩的文學史。觀察古城貞吉書寫文學史的時代議題，可知《支那文學史》之所以具有這些特點，是因古城對明治時期的社會議題與學術風氣有其看法，藉由文學史著作呈現，欲了解古城《支那文學史》的書寫特點，需藉由明治的時代議題方能理解古城的寫作意圖。

#### 一、漢字廢止論

因明治時期對於西學的崇尚，當時漢學者須面對漢學是否應當廢除的質疑，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完成於這樣的時代，在書寫成因上，也可見古城對於漢學的態度，以及研究中國文學的動機。今檢視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井上哲次郎的序，可知漢學的衰微：

我邦文化本得自支那者甚夥，引入西洋學術後，邦人於支那人士輕侮殊甚。……人將支那文學放逐於研究領域之外，世之學者莫不以四書五經為

陳腐之物。<sup>69</sup>

此序文所載，是井上哲次郎對於明治時期的學術風氣進行的檢討。序文中說明日本受中國影響甚鉅，在明治時期西學大量傳入之前，具有數量上的優勢。然西學的影響，使得日本人開始對中國有輕侮之情，並將代表中國的學問排除於研究範疇，且對原本漢學教育基礎的中國古典籍四書五經，視之為舊時代的陳腐之物。

不僅是井上哲次郎對於明治時風有此體察，田口卯吉（1855-1905）以漢文寫成的序言，亦言：

世間或有修文學史者，未有以及支那文學史者也。我友古城貞吉君，毅然自任之……本邦文學半屬漢文，而漢文之淵源支那，故不俟言也。……故不知支那文學者，未可共語本邦文學也。<sup>70</sup>

在明治日本此一近代化的轉變期，對於西學在接受為全面性的，文學史的書寫亦為其中之一。但是與三上參次、高津楸三郎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寫成之《日本論文學史》相較，《支那文學史》的撰寫時間較晚，無怪田口卯吉論認為世間尚未有《支那文學史》的成書。受崇尚西洋風氣興盛影響，時人不重視中國文學的研究不難理解，故田口卯吉以作為共同書面語的漢文作為起始，認為須有中國文學的研究，方能理解本邦（日本）典籍。

欲研究中國文學作為理解日本論文學的途徑，是在西化的時風之下，產生《支那文學史》書寫風氣的成因，不僅田口卯吉的序文，以「不知支那文學者，未可共語本邦文學也。」作為研究中國文學的理由，井上哲次郎的序文亦是以同樣的

---

<sup>69</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我邦の文化は本と支那に得る所少しとせざるも、西洋の學術を引きて之れを入るゝに及んで、廻に支那に駕して上ぼるに至れり、是に於てか我邦人の支那を輕侮すること殊に甚しとなす…世の學者にして四書五經は已に腐敗せると絶叫せる。」

<sup>70</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頁3。

角度進行論述。如是看來，田口卯吉、井上哲次郎反映了明治時期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種可能，其研究動機並非出於對中國的喜愛，而是以日本為主軸。欲理解日本的歷史文獻，漢籍的研究是不可廢除的。今見井上哲次郎序文所言：

我邦古書重要者，多以漢文編成...為解我邦古來之典故，支那文學研究之必要不容質疑。……若無漢文則文章難以連綴，若廢漢字則未能書寫己之名姓。<sup>71</sup>

就此而論，古城對中國文學史的整理，是出自於以日本為本位的思考。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體認到漢學作為日本固有學問的一部份，難以自歷史中抽離，故須以明確的方法整理，作為理解日本歷史典籍的手段。

就此段序文中，「廢漢字則未能書寫己之名姓」是值得注意的論述，此或為井上對明治初期漢字廢除論的回應。明治二年（1869）前島密（1835-1919）曾向大臣岩倉具視（1825-1883）、大木喬任（1832-1899）提出〈國字改良相成度卑見書〉，認為應廢除漢字，改行假名文字，是為以國粹主義為出發的立場<sup>72</sup>。清水卯三郎（1829-1910）、柳川春三（1832-1870）亦提出支持此說的相關論述。直至明治十四年（1881）更有主張廢除漢字的團體形成。

除了主張改行假名文字，以國粹主義為出發的漢字廢除論支持者，亦有南部義籌（1840-1917）、西周（1829-1897）、森有禮（1847-1889）等人為首，主張以羅馬字替代漢字與假名。南部義籌提出修國語論，主張：「學問之道，西洋諸邦為易……唯知二十六字，解文典之義，則無不可讀之書。」<sup>73</sup>是以西學為主體，主張學習英文，習得二十六字母，則可理解外文書籍，對西洋傳入的學文加以熟

---

<sup>71</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我邦の古書中重要なるものは多くは漢文を以て編著せらる…是を以て支那文學を研究するにあらざれば、我邦古來の典故は如何にして討尋するを得ん…若し漢文を排斥せば普通の文章さへも綴り難かかるべく、若し漢字を廢せば自己の姓名さへも記し得ざるべし。」

<sup>72</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07。

<sup>73</sup>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07。

習，故需改換文字，以羅馬字作為書寫的文字。

漢字的存廢爭論，是早在明治初年即爭論不休，至眾多支那文學史相繼出版的明治三零年代，仍有相關議論，引起社會關注。在古城貞吉編寫《支那文學史》的時間前後，與漢字相關的爭論仍舊持續，然對於漢字的存續，已由明治初年的廢止論，逐漸發展為折衷的作法。以三宅雪嶺(1860-1945)明治二十八年(1895)於《太陽》雜誌發表的論述為首，重野安繹(1827-1910)、井上圓了(1858-1919)等人，皆認為漢字可減量，但是不可廢止，因漢字使用的時間已逾千年，貿然廢除所造成的弊端，更甚於使用漢字。

就古城貞吉在文學史中所言：「士尚全才，務為實材實學……其朝夕所聞見而服習者，無一非所以為治當時之家國。」<sup>74</sup>強調知識分子應對於現實社會具有責任感，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所以成書，亦有為明治日本闡發的抱負，漢字廢止論是其親身經歷的時代，藉由序言的線索，亦反應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明治初期漢字廢止論沉澱後，進行的檢討。如同井上、田口序文中，將整理日本古來的典籍，以理解歷史的脈絡為先務，藉由整理漢籍，了解漢文作為日本的歷史文獻的載體，具有重要的價值。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體認到西洋學問的引進不代表能對本國歷史與典籍略而不談，因此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蓬勃發展，亦與國家意識的提升有所關聯，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是在國家意識覺醒下所產生。

## 二、藉中國理解本邦

明治時期國家意識的興起，是歷經西化的鹿鳴館時代後的反思。明治初期凡事以西洋為尚的政策，固然於體制器物的層面積極引進西學，但就結果而論，追逐西洋多半流於器物制度等表層，因而引起知識份子的反省，逐漸對文明的本質進行批判。事實上，就明治政府派遣大型的岩倉使節團赴西洋諸國考察後，岩倉具視(1825-1883)對於明治政府的西化，有所評論：「我經歷歐洲，始知我國將

---

<sup>7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10。

來之方向。從來急進之開明，外人驚異以為非，大誤國是矣。自今當務存國體，維持風俗，漸次進於文明也。」<sup>75</sup>岩倉具視以右大臣的身分，於明治四年至明治六年（1871-1873）赴西歐諸國，但是考察西洋諸國後，岩倉對日本的文明開化，是具有疑問的，甚至評價日本政府的西化策略，有「誤國」的可能。對於改善的方法，岩倉以「務存國體，維持風俗」為解答。國體與風俗，並非是以西洋為學習的範疇，反是將重心由西洋諸國，回歸為日本國中，此乃國家意識的體現，也同時反映了明治知識分子對於西化的檢討，以及須以對本國的重視，取代冒然施行的西化，作為建構日本走向近代化國家的歷程。

在此狀況之下，教育方法上的檢討，成為明治知識分子的關注的重心，藉由法律《教學大旨》、《教育敕語》起草與修正，意味以日本為主體的近代教育改革，西洋的制度為日本所取法，但在教育的核心精神上仍是須以關注日本為主體，將對西學的關注，轉移至重提傳統漢學教育的德目，並以法律的訂定，從漢學中提取的德目作為教育的目的，成為維護天皇制的途徑。由是觀之，岩倉具視的「務存國體，維持風俗。」是藉由教育相關法律的訂定得到落實，漢學的德目之所以重新被提倡，並非出於對中國的關注，而是考量明治日本的政治需求而受重視。元田永孚擔任明治天皇的侍講，起草《教育敕語》，顯現政治與教育相連結的企圖。在其為明治天皇講進《論語》時，其對教育的批判，亦是以西化為軸心：

維新以來，俄而模仿歐美文明，教育方法亦用其規則，學科精密，生徒增多，全國面目一變。至近年，法律、理學、經濟、工藝，博識多藝之人勝維新之前百倍。然皆外面之裝飾，長於才思技能之洞而我邦之精神魂性乏，道德義勇之根柢薄，雖欲養成國家柱石之才而不復可得。<sup>76</sup>

模仿西洋為明治初期的日本社會帶來劇烈的變化，因政府的全面推行，使得西洋

<sup>75</sup>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81。

<sup>76</sup>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81。

知識傳入日本，並藉由學制的推行與學科的分化，培養各種領域的人才。但元田永孚的論述中，評論此僅為「外面之裝飾」，西學的作用僅限於表面，西學的引入也使得日本的精神為之削弱。

元田永孚以「道德義勇」等德目作為西學所無法給予的精神指標，他認為國家所需之人才，必須具有日本的精神魂性，作為教育應優先培養內在德目為目標。正因為明治初期的全面性的西化策略，使得明治中後期的知識分子，開始產生檢討，西化的策略降低日本的主體性，只有提倡日本的固有德目，才能使得傳統上和（日本）漢（中國）難分的漢學，重新為為政者所重視。故《教學大旨》所言：「自今以往，本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人人尚誠實之品行；然後各科之學，隨其才器日益長進。」<sup>77</sup>，重新提倡孔子之學，藉由儒教復興，將西學為尚改為以日本為本位。元田永孚與岩倉具視皆任職於明治政府高層，考察他們的論述可知明治時期的教育與漢學復興具有極大的關聯，漢學得到復興，並不是意味關注現實中國，事實上，如同井上哲次郎序《支那文學史》所言：「引入西洋學術後，邦人於支那人士輕侮殊甚。」對於明治日本而言，對中國的看法隨著西學的引進，變為落後而輕侮的對象，漢學亦隨之衰微。漢學之所以重新被提起，是因日本國家意識的興起，而非對中國的關注，在此狀況之下，日本漢學與中國更趨於分離，漢學成為日本理解本國歷史與典籍的途徑，亦成為政治上，藉由德目的忠孝一體觀，以鞏固天皇制的手段。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編寫，即是在明治中期以後，經過明治十幾年的西化風潮，逐漸產生反省與沉澱而成，漢籍曾被視為陳腐之學，但對於本邦（日本）文學的理解，仍有其絕對的必要性，由田口卯吉（1855-1905）為古城《支那文學史》所做之序言，亦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田口卯吉的身分是兼具學者與政治家，他曾於大藏省翻譯局修習英語及經濟學，著有《日本開化小史》，是受到西洋思想影響的明治知識分子。田口讚賞古城的文學史研究並以漢文為他作

---

<sup>77</sup>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83。

序。在這篇全以漢文書寫而成的序文中，對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也與井上哲次郎的觀點接近，是體認到日本與中國在典籍上，在文學上具有難以分割的特性，因此欲藉中國文學，理解本邦（日本）文學之說，有其必要，所謂：「本邦文學，半屬漢文，而漢文之淵源支那，固不俟言也。……故不知支那文學者，未可共語本邦文學也。」<sup>78</sup>中國文學之所以具有研究的必要，是為了理解日本論文學而生。事實上，早在末松謙澄寫《支那古文學略史》時，由河田熙（1835-1900）所寫的序文，亦提出：「漢土之學，實本邦文物之祖，苟志於學問者，不可不講究其書也。」之說，日人對於中國的關注，源自於中國對日本的巨大影響，《支那文學史》的書寫，則是出於對學問整體的關注，並不純然出於對中國的關注。

---

<sup>78</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5。

## 第四節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的文學史觀

### 一、中日文明論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編排，是以作為序說的序篇起始，再分為九篇，論述各朝代作家與作品，並以餘論一篇作結。

檢視古城貞吉的篇章配置，對於中國文學的起始，是自夏殷為起始，至清代為止，屬於通史性質的文學史著作，對各個時代，列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逕行論述。古城認為中國上古文學的價值，在於禮制的確立，使群眾脫離野蠻，帶來風俗上的淳化。或可謂古城貞吉對文學的價值定論，始終具有確立理智，端正風俗的儒家教化影響痕跡，文學與政治、時風、教化的關聯，可謂古城檢視中國文學時的關注重心。如《支那文學史》序篇中所言：

夏殷之際，其政治既成封建世襲之制度，其風俗全脫野蠻固弊之陋習。文學大有可觀。...其文學為帶政治的文學特色，此非獨夏殷之文學為然。中國歷代之文學，多有此現象，蓋亦不外伴政體之結果也。<sup>79</sup>

由此段序文可見，古城貞吉認為中國上古封建制度的確立，是以禮制帶來人民的開化，藉由禮制去除野蠻，使得中國文學具有可觀之處。就中國文學與政體相結合，造成日後的文學具有政治性，是古城貞吉的切入點，或可謂對於禮制的關注，是古城貞吉的書寫重心。

文學與政治的關聯是古城貞吉書寫《支那文學史》時的著眼點，就其教育背景所帶來的強烈儒家色彩，亦可見於文學史當中。一個時代的開展，治亂時風，

---

<sup>7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2。

影響一時代的文學家，在文學家的選擇上，古城的選取具有明顯的傾向。古城貞吉於文學史中，對於文運興盛的成因有所論及：

夏殷文學發達如此，即周世則風華愈開，更入於絢爛之境。……封建之制，愈益完備。自朝廷大典儀式，以至於列國之會同交際，結以和親，制以禮文，其影響所及，亦為文運發達之因。<sup>80</sup>

由此可知，古城貞吉觀察中國歷史上由夏殷過至周代的變化，於國體上在於封建的日趨嚴謹，藉由諸侯的分封，建構以禮制規範的社會，此封建禮制的完備，是文運發達的成因。對古城貞吉而言，文學是建立在禮制的基礎之上，或說就古城之論，禮制與文學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

若由此視角切入，則古城貞吉於《支那文學史》耗費篇幅，詳細敘述唐虞三代之沿革、周代學制等內容不難理解。與政治律令相關之詔敕、上書及書牘體，在古城的《支那文學史》中，亦佔有篇幅，此固然可視為日本以漢文為文學，並以書寫官方文書的對應思維，也可視為古城對政治禮制與文學緊密相關的處理方式。若探究古城專注於中國上古的禮制學制之成因，或可謂出於對明治日本借由西化政策以達文明開化的批評。中國上古已具有文明，日本既取法中國，故文明為日本已有之物，不須外求西洋。古城《支那文學史》中，對於中國與西洋的文明高下，是藉由歷史的追溯表達想法：

中國為東洋古國也。其人文開始，遠在五千年之前，如今日以文明雄視東西之歐西諸國，人文未起，尚無一線之光明。<sup>81</sup>

在他看來，今日西洋以文明著稱，日本效法西洋之風，殊不知早在五千年前，今

<sup>80</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11。

<sup>8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1。

日所謂文明的西洋猶似蠻瘠之地，當時中國則早已人文發達：「自宮室衣服婚嫁送葬之常事，以至君臣上下之理解……已漸進於人文發達之途。」<sup>82</sup>所謂人文發達，古城於此處數度提及之「人文」，或是相對明治日本「文明開化」一詞而生，認為古代人文與今日文明具有相同性質，追求文明未必須向西洋效法。

檢視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其對中國文學的起源，是以書契時代為起始。古城意識到上古神話傳說，多有荒唐不稽之處，故以確實的文字紀錄寫起，「書契時代」，是古城對上古時期的定名，反應其實證精神。

今故尋中國文學之起源，必於太古開化入於書契時代，不可不考其果在何時也。<sup>83</sup>

古城以可靠的文字紀錄做為文學的起源，反映在經過明治時期引入西學的文明開化之後，具有實證主義精神，他認為各國歷史中的神異之說，不應視為歷史的一部份，「適足以窺太古未開化之思想。」是以反映上古思想的角度切入，以遠古傳說為未開化思想的紀錄，僅觀察其思想層面，而非作為文學作品或可靠的歷史材料論述。古城貞吉藏書可見民俗學相關的書籍，其文學史中對神話傳說的處理方式，或可視為舊儒習得新學後的成果。

古城中認為禮制發達造就文學的興盛，藉由嫡庶的人倫規範與封建制度，禮制施行於中國，若說古城對中國文學的讚譽來自禮制落實後的表現，那麼，其對難以實證的神話，採取保留態度就十分理所當然。就上古中國的發展脈絡，古城以「窺開化之次第」<sup>84</sup>作為書寫時的方針，夏商周三代之中，周兼容夏代的「忠」與殷代的「質」因此具有文質彬彬的可能「遂以文為一代之國，是其所以教生民者，亦在禮文華美之上」<sup>85</sup>可為禮制集大成的時期。禮制上的完備造就精神上的

<sup>8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

<sup>8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

<sup>8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7。

<sup>85</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8。

開化，可使文學興盛，朝野名士能為文章詩歌，在盛世禮制下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如尹吉甫、召虎、方叔的作品，皆成為代表一時代的典範。由是觀之，古城貞吉的文學觀點，大抵承襲儒家的觀點，並以治世下的文學為佳作。

若論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的儒家色彩，其特別以一章的篇幅論周代學制，以及為孔子的弟子分別立傳，是為最重要的兩個特點。將周代的官制納入文學的範疇，這與日本古來將中國來傳漢籍、漢學視作文學，而未將日本自有的和歌物語納入文學，大抵反應明治以前，以中國傳來的事物皆為佳的心態。直至明治以後受西洋文學觀影響，以日文書寫的文類不受重視，如和歌地位低落、小說俳諧被視為下賤之物的種種現象，才被福地櫻痴、柳田泉（1894-1969）等知識分子撰文探討<sup>86</sup>。

田口卯吉論及江戶時期的文學時，有言「德川氏的文學至此為最盛」<sup>87</sup>此處文學是指朱子學，此是反映了江戶時期的學問趨勢，也意味著思想與文學的混同性。大抵而論與中國相關的典籍，皆納入文學的範疇論述，制度或思想層面的百般之學皆為文學，原因在於漢文作為書面語的歷史悠久，影響日本對文學一詞的定義，再加上傳統的漢學研究，多將漢文典籍與道德修身作連結，若以今日視點審視之，將上古禮制納入文學範疇中顯得特異，但以古城所受的教育背景與其所處時代而論，這樣的舉措並非不可理解。

古城貞吉在文學史的第二編諸子時代中，將中國春秋戰國時活躍的「文學者」<sup>88</sup>，分為儒、道、墨、法、名、兵、雜、賦八家進行討論。對諸子的活躍，古城謂「文學則與此社會之機運，相待而發達，互為因果，以致社會之活動者。故其變遷亦自不得不與社會之變遷相伴。」<sup>89</sup>也就是先秦時變動的社會，諸侯國的互相攻訐，禮法的鬆動，造成思想言論的「恣睢放騁，思而無不可言」<sup>90</sup>，立場不

<sup>86</sup>鈴木貞美：《文學的概念》，頁 117。

<sup>87</sup>鈴木貞美：《文學的概念》，頁 123。

<sup>88</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8。

<sup>8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8。

<sup>90</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7。

同的諸子活躍，為文學前進的最大原因。古城貞吉對先秦時代活躍的思想家，是以「文學者」<sup>91</sup>的身分定位，體現明治時期文學定義仍處於變動期，常兼容文學、思想、歷史各領域的現象，是其《支那文學史》流露時代特徵的部分。然就古城貞吉的文學史來看，其個人特色如論述諸子時，分為八家敘述，儒家最先論及，且論述的主要人物，不僅限於孔子、孟子，對孔門弟子亦立傳論述，有別於其他各家的論述方式。

古城貞吉論諸子的起源承襲《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家出於王官的論述，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掌邦之教化、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此反應古城對漢籍的掌握，以及其學問的源流，仍是傳統漢學系統。儒家在其文學史中的諸子論述中占有最大篇幅，是古城貞吉於先秦諸子中，論述也最為詳細。在編排上，是以孔子為首，接續論述孔門弟子冉耕、冉雍、冉求、仲由、宰予、端木賜等二十一人，依據《史記》、《孔子家語》中的記載，論孔門弟子之姓字與事蹟。孔門之後，次章再論及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孟子、荀子等人，其他諸子則簡列之。

## 二、推崇中國儒學

對儒家的傾重，特別是孔門弟子的單獨描寫，可反映兩項要點：一為古城教育背景的影響，二是以此為延伸，展現古城對教育的看法，乃以培育人才，作為發展國家主義的體現。古城貞吉其身於熊本縣，是以程朱之學為正統<sup>92</sup>，思維是與儒家一脈相承，古城《支那文學史》體現幕末漢學家以漢籍為重心的著作。另一要點，古城重視孔門弟子，或與其政治理念有所關聯，古城著書的明治中期，是知識分子對於西化有所省思，並且試圖強化國家意識，建立日本自主性的時期。因經歷過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西歐思想經由政府的提倡大量傳入，造成知識分子的危機感，如同宮城公子所言：「歐美現代思想已進步之名，毫無秩序的

<sup>9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8。

<sup>92</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 卷 71（2003 年 3 月）392。

傳入，為知識分子帶來一種所謂自我認同的危機意識。」<sup>93</sup>。在文明開化的省思之後，儒學作為重新架構、尋求自我認同的方法而有所復甦。若欲將此目標實現於制度層面，教育是必要的手段。

藉教育達到國家意識的提升、國家主義的提倡的目的，乃是以政治與文學為著眼。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序論中有言：「文學之盛衰，每與王家盛衰興廢互為表裡。」<sup>94</sup>他將國家治亂視為影響文學的關鍵，學制則是國家政策實現於民間的方法。他畢業的同心學舍，乃是以「皇室中心，國家主義」為建學精神，古城貞吉在文學史的書寫中，將學校、國家、王家（最高統治者）<sup>95</sup>三者緊密相連，是其教育背景的呈現，亦是受漢學影響與日本國家意識的相輔相成。故學校、國家、王家作為古城貞吉文學史敘寫時的切入點，呈現在詳述孔門弟子、周代官制的章節安排，也顯現於各個章節，以及對於皇帝治理政策的描寫之中。檢視篇目可知，古城對於儒學的偏重，是自上古時代為起始，在先秦諸子於儒家一章中細論〈孔子及五經〉、〈孔子之弟子〉，較其他諸子的論述更為詳細，於其他時代中，亦論及儒學的發展，比如第三篇論漢代之文學，第一章即收錄〈漢儒之學術及文籍〉，至第五篇唐朝文學亦於第一章論〈經術與詩文之消長〉，至第六篇宋朝文學，於第一章言〈宋儒之講學與佛教之消息〉、〈科舉與文學〉，更於第二章細論〈宋朝之儒學〉<sup>96</sup>。由《支那文學史》的篇章安排來看，古城常於每一時代的起始論述儒學的學風與傳布，即是反映在其掌握的中國文學的流變中，對儒家的關注始終居於中心，故先自儒學風尚入手，再論及詩文，即是依循傳統上志道、據德、依仁、遊藝的次第，也是古城儒者性格的體現。

古城貞吉以漢學者的身分活躍日本論文壇，就其文學史的內容而論，對儒家

<sup>93</sup>宮城公子：〈日本的近代化與儒教的主體〉，詳參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論文學史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年4），頁262。

<sup>94</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頁6。

<sup>95</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卷71（2003年3月）393。

<sup>9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18。

的偏重，以及對治亂與文學的觀察，皆反映於學術思想，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依照中國傳統的文學觀，戲曲小說未能列入文學的範疇討論，然古城對於士大夫未敢染指的戲曲小說，仍收進於文學史之中，體現舊儒也習新知。明治時期文學觀受西洋影響，對於文學的界定產生模糊性，戲劇小說為西洋所重視，也使得日人在書寫文學史時，自動從中國文學作品中尋求相對應的文類。古城具有漢學者的性情與思維，作為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亦反映受到西學影響的時代風氣，戲曲小說作為可列入文學範疇的文類，被古城收入文學史，顯現傳統儒學觀的鬆動。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的第一篇到第九篇，是以時代為劃分，進而論述各個時代的文體，內容編排上，基本上仍是排除戲曲小說，講述是以詩文為主。然餘論一篇，古城打破時代的區分，概述唐堯、虞舜等上古聖王，以至歷朝文學，在篇末的極短篇幅中，談及明清小說，此乃古城的突破之處。舊儒在時代風潮下，對於新知新學有所體認，也逐漸構築文學觀。整理古城貞吉舊藏所構成的坦堂文庫時，整理者認為西學書籍不能貿然立一「新學」類，因漢學與西學於明治時代的傳播，並非完全割裂，而是以併行的方式，作為現代化的嘗試流傳於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當中。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強烈體現了作者本人的思維，就其以儒學為依歸的保守性而論，反映古城為漢學者的個人特質，然就收錄文體論及戲曲小說一事，則顯現了明治時期共性。西學傳入，改變了既往的漢學研究視域，傳統上以道德修身為依歸的文學作品，開始納入不具有實用性質的文學，以文辭與性情為尚的戲曲小說，逐漸進入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的研究範疇之中，鋪敘從講究道德修身的漢學，到純然學術研究的支那學的發展歷程。



## 第五章 笹川臨風與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之比較

明治三十年（1897）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問世，隔年（1898）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發行。兩書皆於東京出版，且出版時間相近，均為明治時期體例完整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檢視兩者的編排體例與收錄內容，多有分歧之處，考其成因，乃與兩書作者的經歷與研究傾向有關，他們著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同面向，形成內容對比鮮明的文學史著作。本章將古城貞吉與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著作，就其章節的排序，檢視其內部選家、選錄作品的差異，並依照時間分期，以上古、中古、近古作為分節論述的體例。兩部文學史在章節架構，笹川臨風以期為綱領，再分點論述。古城貞吉則是以編為綱領，再分章敘述。就兩部文學史之章節安排，行文時將以作者名與章節名論述。如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第一期的第一節行文時簡稱為笹川 1-1。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第一編第一章簡稱為古城 1-1。

至於中國文學的斷代依據明治四十五年（1912）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的分期，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四個時代。因兒島獻吉郎與笹川臨風、古城貞吉等人一同活躍於明治時期，於明治二十五年（1892）著有《支那文學史》，此乃最早專注於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故今以《支那文學史綱》的時代劃分為依據，以同為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作者的斷代，作為比較笹川與古城《支那文學史》的基準。就《支那文學史綱》的劃分，上古為唐虞至秦（?-B.C206），中古為漢代至隋（B.C206-A.D618），近古為唐代至明代（618-1644），近世為清代（1644-），笹川與古城的《支那文學史》，皆依據此斷代分期。

## 第一節 上古時期（？-B.C206）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在上古時期的篇章安排中呈現極大的差異，在篇章的主題上，笹川與古城對秦以前的文學，章節的多寡差異甚鉅，古城的篇章較為繁複，單節論述中涉及社會背景以及制度的解析，笹川則單就文學作品而論，是以文學為主體的文學史。笹川與古城的章節簡繁差異，亦是兩部《支那文學史》的重要區別，古城之所以篇幅較繁，其原因在於古城對於學制與政治背景有較多的關注，與著重文學家與其作品的笹川有所區隔。今製表格對照笹川與古城《支那文學史》的篇章，並進行論述，對照在同一個時期裡，兩部文學史內容選擇與立論上的差異。

表 5-1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上古時期篇章對照

作者 分期	笹川臨風	古城貞吉
春秋 以前	總說 第一期 春秋以前的文學 總說 一、 書 二、 詩 三、 易	序論 第一編 支那文學的起源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第二章 書契的起源與文字的構成 第三章 唐虞三代的沿革及開化一斑 第四章 周代的學制 第五章 諸子時代以前的文學
戰國	第二期 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 總說 一、 孔子與老子 二、 孟子與莊子 三、 屈原 四、 韓非子	第二編 諸子時代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儒家 第三章 道家 第四章 墨家 第五章 法家 第六章 名家

		第七章 兵家
		第八章 雜家
		第九章 賦家

作為初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古城貞吉與笹川臨風皆論述中國文學起源，以上古時代為起始。就古城貞吉與笹川臨風兩人所著之文學史，對中國上古時期的斷代，是具有一致性的，雖兩者細部標題有所差異，然對中國上古史的分期，皆以春秋以前、戰國進行區分。兩者在書寫時，皆將中國文學溯及史料與神話混同的時代，以民族的起源、書契的起源進行回溯。文字作為思想與情感的載體，歷代文學作品的作者，以文字寄寓感懷。在文學史書寫的初期，尚未有語言文字分科探，置於語言學領域的概念，是純以文學作品載體的考量，納入文學史的書寫當中。文字即文學，可謂明治時期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共通概念。

針對中國文學史，兩者皆於上古時代的開展前，對文學的起源進行概述性的書寫，言中國文學之重要性以及研究價值。笹川言中國文學：「文華燦爛，花開四千載，光被四億萬大眾。其文入朝鮮、更及極東島國，與印度、歐洲文明相對，形成特殊的東亞文明。」<sup>1</sup>以東亞為整體視野考量，在明治以後日本學人對西洋認識日深，也因西洋的勢力，而體認到東洋的存在，並欲找出東洋的價值，笹川提出東亞文明具有足以與西歐、印度抗衡的價值，是試圖就當時的世界局勢中，擇出東亞的優勢，文明是笹川所選擇提出的東亞優點，而文明的體現，即為文學。中國更是作為世界最古文明的一種，於東亞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古城貞吉也與笹川相同，在書寫文學史時，也具有尋找東洋足以與西洋抗衡處的意識，就明治時期的日本而言，被納入世界史的視野，是受到西方諸國的強制寫入，如同竹內好所言：「東洋的近代是歐洲強制的結果。」<sup>2</sup>在此狀態之下，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省思東洋之價值時，必自歷史與文化中求索，故古城言：「中國為東洋古國也，其人文開始，遠在五千年之前。今日以文明雄視東西之歐西諸

<sup>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1。

<sup>2</sup>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182。

國，人文未起，尚無一線之光明。」<sup>3</sup>是以中國作為東洋諸國中，文明起源甚早的古老國家，其文明、人文，是足以與西洋抗衡，甚至有更勝於西洋之處。

由兩部文學史篇首的概論來看，以中國為主軸，試圖發掘東洋的價值，是兩位文學史作者的共同企圖。另一方面，提出文明一詞，作為東洋足以與西洋抗衡的內容，大致與當時西洋技藝，東洋道德的社會評價相同。

就概論性的序言當中，兩位文學史作者的性情各異，關注領域不同反映於總論中。笹川臨風於篇首即言南北人種的差異，作為貫串各時代文學風氣的綱領，亦為論述戲曲小說於中國文學史上不受重視的鋪陳。古城貞吉則以禮制作為文明的體現，稱「自宮室衣服婚嫁送葬之常事，君臣上下之禮節。」<sup>4</sup>成為古城判斷上古社會「人文發達」的依據，反映古城貞吉對儒家的冠葬婚祭禮制的重視，文學史中對儒家特別費筆墨，對官制與政治治亂的著重，儒學者的性格顯現於此。

## 一、《尚書》上古史事與開化之源

對中國文學起源的論述，兩部文學史著作中，皆自文字起始，並於論述時，提及神話傳說，皆稱為不稽，但仍納入範疇概述之。古城認為「足以窺太古未開化之狀況」的上古人民思維體現。笹川則謂「支那之太古以三皇為始，然三皇之事渺遠未可至。」<sup>5</sup>對於文學史書寫，應自信史起的概念，兩者皆遵從此原則，故對於上古的神話傳說，僅是略論，以作為體現古人思維的載體。值得注意的是，因兩位文學史作者的性情相異，研究重心不同，載上古的文學作品時，產生順序與繁簡的不同。文學史的斷代，兩人皆以春秋以前為第一章論述的主軸，然古城貞吉於第一編裡，以五章的篇幅敘述之，笹川則以三章論述，在繁簡上具有差異。並且在排序上，笹川臨風是以《書》、《詩》、《易》的順序論述，並非傳統上的《詩》、《書》、《易》，以詩經為始的排序。兩部文學史的差異，仍是以作者的性情作為

<sup>3</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頁1。

<sup>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1。

<sup>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19。

考量。笹川之所以置《尚書》為篇首，因其以信史的概念審視《尚書》，認為是最古老的文獻，「不獨有文學上的價值，亦為中國歷史上值得珍視的古文獻。」<sup>6</sup>由此觀之，笹川臨風在文學史的內容選擇上，上古的部分是以可靠的文獻為收錄的考量，並非由神話作為最初的内容，而是具有歷史的文獻：

古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代官府多藏有此類文獻。孔子周遊列國，收納治古聖國之大經，上起唐虞，下至秦穆，收典謨訓誥之文數百篇，即為尚書。後世稱為《書經》者即是。<sup>7</sup>

收納於官府的歷史文獻，是笹川審視《書經》的角度，以其代表官方紀錄的可靠性，將之作為上古的文學。笹川對《尚書》中文獻的書寫年代，有夏書雄渾，商書簡明的評語，對於成書的時代判斷，以今視之是其誤判。但就選材角度而言，古城是以《尚書》官修史料的價值，將之列入文學史。

檢視古城貞吉的文學史，是將《詩經》的排序置於《尚書》之前，就古城貞吉之論述，言：「上古之文籍，今猶存在者，除《詩》、《書》二書外，殆屬於絕無。」<sup>8</sup>亦是考量文獻的可靠性後所做的排序，有關〈擊壤歌〉、〈康衢〉、〈卿雲〉等上古歌謠的流傳，古城判斷皆為後人補作。至於古城將《詩經》的順序置於《尚書》之前，據其教育背景受儒家影響之深，或為依照傳統《詩》、《書》、《易》、《禮》、《樂》的排序，也顯現其書寫佈局以儒家為重的觀念。

古城與笹川的審視《尚書》的角度有所差異，古城是以最古之散文定義《尚書》，節選〈大禹謨〉一篇，認為「敘其君臣之情意，與嘉言善政者也。」<sup>9</sup>選擇禹、舜、伯益、皋陶等上古聖王賢臣的對話內容，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著眼於「嘉言善政」。笹川將《尚書》視作可靠的上古史料，認為《尚書》傳達上古聖王的

<sup>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7。

<sup>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5。

<sup>8</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2。

<sup>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7。

治世之道，亦顯現北方人種的敬天性格，節錄〈甘誓〉、〈湯誓〉、〈多士〉的內容，「夏氏有罪，余畏上帝，不敢不正」<sup>10</sup>則認為北方人種觀察夏、殷、周歷朝統治權變遷，對天產生敬畏之心，有敬天之情，並且以失去天命而亡國，故周代為政號令嚴肅，較前代更為專制。在兩部文學史中，古城著重中國上古文獻的教化功能，以及反映君臣敦篤的聖王之治，體現儒家傳統上政治與道德一體的觀念，此與笹川臨風以南北人種說審視史料的觀點相異。

古城《支那文學史》第一章的安排，四節中又以 1-3 以及 1-4 兩節最具特殊性。古城以中國上古的制度做為論述中心，言唐虞三代的沿革，以及周代的學制。此不僅為笹川完全未論及的領域，亦為明治時期為數眾多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中，唯一論及制度沿革、周代學制的著作。如此編排反映古城對於文學的關注重心，乃與教化有關，是以儒家為其關注的出發點，言周代學制，亦是成為後續章節中，論述《詩經》的銜接。古城貞吉在上古時代裡，選擇以唐虞作為開化的時期，「開化」一詞是與明治時期的政治策略「文明開化」有所關聯，西洋技藝制度的引入，乃明治政府達到文明開化的手段，時人亦以西洋習慣的模仿，做為文明的表徵，無論是剪髮、食牛肉，皆為明治時期開化的表徵。「開化」一詞在明治時期的意涵值得注意，是意味著西洋文明的傳入，達到日本的開化。古城在論述中國上古的文學時，拈出「開化」一詞，將習得文明的對象，由西洋諸國轉向中國，由當代轉向古代，此或為古城試圖說明文明開化日本早已藉由中國習得，非自當代引入西學後才有。其藉由論述古典中國，尋求日本主體性，減低西洋影響的做法。自然與其出身，漢學教育背景，以及未像大多數的文學史作者，經歷過西式的大學教育的結果。

就古城而言，「開化」的內容與教化有關，堯舜之時「四岳百官，各盡厥職，治化愈益揚。」<sup>11</sup>百姓能在上位者的治理下耕食自足，古城認知為政治安定帶來社會安定，是開化的實際內容。故後一節論述體制的重要即是出自於此。第一章

<sup>1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28。

<sup>1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

的內容，古城之所以與笹川極具有差異性，是因對於文學的關注點不同，古城較具有政治上的引申，以古論今，藉由儒家所推崇的上古聖王治世，禮樂制度完備的文明，與明治時期的西洋器物文明進行對比。即使中國古代的開化與明治時期的開化有所差異，但古城貞吉對於明治政府並非持反對的態度，而是藉由論述中國古代的學制，以教育為關注重心，寄望學校能成為培養人才的場所。在古城的論述中，可見其以人才的培養，是以報效國家為最終目的，故言上古學制，亦是對明治政府的期許。在古城 1-4 中，其言周代學制，是以虞舜之時，即有學校，敘述虞舜至周代的學制，言學制的內容與教育的目的，有如此論述：

當時尚無一科專門之學，士尚全才，務為實材實學，故上自智仁聖義，下至一技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之所聞見而服習者，無一非所以為治當時之家國。<sup>12</sup>

此段論述，言上古學制的不分科全才之學，與明治時期引進西學後，漢學自統括性的學問始分為文、史、哲三科，以及專門學校，如農學校、法學校、商業學校、航海學校的相繼設立<sup>13</sup>，恰成對比，顯現學科分制對古城這一習漢學的舊儒而言，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異質性。並且就上古學制中，教導「智仁聖義」的道德條目，與西式學制傾重技藝，造成當時產生西洋技藝，東洋道德的概念有所差異。

就古城的論述，中國古代之士人，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以「治當時之家國」為目的：

天下何世無奇才，後世蓬蒿之下，不聞有窮死偃蹇抑鬱之士。亦曾見盡其才而成其器者，未嘗非其學制之適合於社會風俗也。…雖然古今時俗不一，

<sup>1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1。

<sup>13</sup>天野郁夫著，黃丹青譯：《大學的誕生》，頁 20。

古制必不適於今，今制亦豈不優於古乎？<sup>14</sup>

在此論述中，古城對古今學制有所批評，他認為上古學制，畢竟時代相隔久遠，與今世未能適用，但對於引進西洋制度的學制改革，亦提出今日未必優於上古的意見。由此段來看，古城特意於文學史增加學制的內容，是關注於明治時事所產生的內容。就明治這一政治上的轉型期，古城認為人才的培養是極重要的，故言學制的重要性，在於能培養可用於國家的人才。然教育體制學習西洋分科制度，是否為培育人才有所助益，古城於此則是持保留態度。

大抵而論，古城認為學校的價值並非僅限於獲得知識的所在，應是發揮才能的場所<sup>15</sup>，學校教育的完善，能為國家培養必要性的人才，故言「不聞有窮死抑鬱之士」，認為受教育是為了實際運用為最終目的，並非僅限於文獻上的知識習得，而是將知識用於國家社會。這樣的觀點亦有跨越時代的，無論是中國古代或至明治日本，受教育並且用於時政，皆是極為重要的目標。古城貞吉的文學史中，之所以言學制，並將之與明治時政結合。由古城的教育觀點看來，可見其國家意識的體現，以制度技藝上皆傾倒於西學的明治日本，古城試圖追溯漢學本源時，透過中國古典籍傳入，已經內化至日本的文明開化。

古城與笹川的《支那文學史》差異性，由第一章即體現極大的不同。縱然兩者皆以春秋以前的文學為第一章，然因為關注目標的差異，在篇章安排以及敘述內容上出現分歧。笹川臨風是以南北人種說作為書寫《支那文學史》的綱領，在篇首闡述此說後，即以此為切點，論各時代之文學特性，為書寫在北方人種得勢的狀態下，戲曲小說不被重視的現象。可說其出發點是源自自身對於戲曲小說這一文體的興趣，而以這種俗文學作為文學，藉由文學史的書寫，擴展文學的範疇。笹川性格具有江戶文人特質，他喜愛庶民文化，在習得西洋學問後，以文學史的

---

<sup>1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2。

<sup>15</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 卷 71（2003 年 3 月）頁 394。

研究審視中國文學時，較能不受限於漢學的藩籬，是將漢學研究逐漸轉化至支那學研究，淡化傳統漢學中的道德教化意涵。

但是古城貞吉是以漢學教育為背景，並不像畢業於文科大學的笹川臨風，兼容漢學與西學，古城受以儒學為主體的漢文教育。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聯，是古城所關注的核心，故在文學史中特別注重政治與文學的關聯。並因著其漢學背景，政治與學問是為一體兩面，漢學中學而優則仕的概念，移轉至古城所處的明治日本，即成為學制應以培養人才為重，人才應為國家所用的觀念。故古城的中國文學研究，帶有強烈的儒學色彩，花費篇幅論述周代學制、唐虞時期的文明，即是出於對明治日本的關照。由此而論，古城與笹川在篇章架構上的差異即可理解。

笹川在第一期中，總說之外的內容簡化為《書》、《詩》、《易》，是從可靠文獻的角度審視，故以代表官方歷史的《尚書》置於首位。古城則是於 1-5 方論及《詩》、《書》，兩者置於同一小節中，並且引述毛詩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sup>16</sup>認為文學是政治治亂的反應。兩者皆認為政治與文學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然在立論上，笹川將文學與政治結合，無非是為了闡述南北人種說，認為北方人種的務實性格反映於《詩經》上，而北方人種具有政治上的優勢，故中國重視文學的實用性而輕視戲曲小說。同樣以春秋以前的文學為範疇，古城貞吉將泰半的篇幅用於學制與唐虞文明的考察，是欲藉著上古對明治現狀提出省思。

## 二、《詩經》治亂的反應與情感的流露

選擇的篇章，同樣以《詩經》為範疇，古城列舉篇名是以頌、雅、國風為次序，引述篇名者，有商頌五篇〈那〉、〈烈祖〉、〈長發〉、〈玄鳥〉、〈殷武〉<sup>17</sup>，節錄〈殷武〉的內容，認為是「古代的神歌」<sup>18</sup>是最早的殷代歌謠。再節錄大雅〈文

<sup>1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6。

<sup>17</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3。

<sup>18</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3。

王〉、〈清廟〉兩詩，認為是詩人所做的歌詞。對於詩的評斷，以大雅兩詩的創作背景為「周室成功之初，其詞雍容正大」<sup>19</sup>以及「天下方致太平，周室之德聲，漸漸洽洽，於是即有頌聲之作」<sup>20</sup>是以周代政治太平清平，反映於詩歌的雍容正大。大抵是以文學反映政治的治亂，並且取雍容雅正的詩歌。至於國風，古城僅節錄〈野有死麋〉一詩，言：「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凌，淫風成俗。為二南之地，被文王之化特深，故雖當亂世，而猶能惡無理。此篇之意，蓋為貞女惡無理之辭也。」<sup>21</sup>是以〈詩序〉之說為依歸，不脫舊儒言詩之本色，以《詩經》為反映治亂，寄寓道德評判的作品。

笹川對詩經的篇章選擇，與古城差距甚大，其節錄四篇〈小星〉、〈綠衣〉、〈蟋蟀〉、〈早麓〉，除了〈早麓〉出於〈小雅〉，其餘篇章皆自〈國風〉，與古城以雅、頌為主的選擇相異。在詩經的背景交代中，笹川引述〈詩序〉之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sup>22</sup>然笹川並非以周代治世先王教化醇厚作為論述重心，而是引用〈詩序〉作為北方人種注重實際的性格反應。笹川注意詩作是因感興而成，並引述孔子「思無邪」之說，認為是以道德羈軛情感，使情感不至於淫猥狂縱，而成就《詩經》三百篇的悠揚洵美<sup>23</sup>。比如〈綠衣〉一詩，笹川謂「此詩謂妾上僭，夫人失位。」<sup>24</sup>此是引述鄭箋的解讀，但笹川言此詩是：「夫人有怨嗟之情，然思古人以慰己。是以意志之強，羈軛縱放之所。」<sup>25</sup>認為是情感流露與節制的體現，而非單純以〈詩序〉儒家道德教化式的眼光審視詩作。笹川對《詩經》的觀察，反注重《詩經》體裁對後世文學作品的影響，《詩經》以四言為主，亦見三言、

<sup>1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4。

<sup>20</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3。

<sup>2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3。

<sup>2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6。

<sup>2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6。

<sup>2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6。

<sup>2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37。

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式，笹川認為這對樂府、俳諧、倡樂產生影響。大抵而論，笹川對《詩經》的觀察是以文學作品的文辭內容，以及情感的發揚做為出發，並非以著眼道德教化功能，無論是選取篇章或論述角度，皆與古城有極大的差異。

在文學史第一章裡，笹川、古城皆言《詩經》、《尚書》、《易經》，但是在實質的內容上，古城第一章並未細論《易經》，僅言：「上古之文籍，今猶存在者，除《詩》、《書》二書外，殆屬於絕無。」<sup>26</sup>以《詩經》、《易經》兩者皆為可靠的上古典籍，卻未如論《詩經》一般，擷取《易經》的內容，進行解說。實際上論及《易經》的篇章，是置於 2-2 儒家篇章，特闢一節論孔子及五經，細論《詩》、《書》、《易》、《禮》、《春秋》的成書，以及五經與孔子的關聯。笹川論《易經》是由其流傳與各家解讀著手，象辭、爻辭、十翼成於伏羲、周公、孔子之手，漢代有田何、施、孟、梁丘；東漢末期則有王弼、何晏，就《易經》一書，笹川臨風是以歷史文獻的流傳作為關注的重心。笹川看待上古文獻是以南北人種說作為考察的重點，《易經》的文辭內容是「莊重崇嚴，有北方氣格風韻。」<sup>27</sup>為北方文學的風格體現，無論是文學史內文細論的《詩經》、《尚書》、《易經》，或未分配篇幅論述的《儀禮》、《周禮》，皆文辭蒼古簡勁，內容上關於冠婚葬祭等禮制的記載，從文辭與內容，皆反映北方人種的特性。

### 三、儒家本位與南北人種說

古城、笹川文學史第二章，同樣以春秋戰國作為討論範疇，笹川是以春秋戰國時代作為章節的名稱，古城則不以具體的歷史朝代作為章節名稱，稱為諸子時代，論述各家。檢視兩者的架構，笹川將孔子與老子、孟子與莊子兩兩相對而論，無非是為了南北人種說的申論，在同一小節中選取南方代表與北方代表，凸顯南北人種在文學上的風格差異。單就兩部文學史著作中，關於孔子的論述，即能體

<sup>26</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頁 12。

<sup>2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42。

現兩位文學史作者的性格與研究重心差異。古城在 2-2 中，耗費篇幅寫孔子、五經、孔子弟子，顯示出對儒家的重視，以儒家式價值觀審視文學。古城這種不以時代分段的寫法，使得上一章節中略而未談的《尚書》在此有所發揮，《尚書》附於孔子之下，顯示古城並非以單純的歷史文獻視《尚書》，而是用儒家教化觀的觀點檢視，古城有言：

《書經》為彙纂古代之布告命令，成自典謨訓誥告誓命之六體，而其筆者為當時之史臣，編纂之者則為孔子也。編纂之當時，猶如刪定其詩。以流風美制而為後世法者。<sup>28</sup>

古城有別於笹川，未將《尚書》置於獨立的章節，而是收錄於儒家一節中，先敘述孔子的生平，再講解《尚書》的價值。其以孔子及五經<sup>29</sup>作為標題，顯示出孔子與上古文獻的重要性次第，孔子為主，《尚書》為輔佐。如此安排與笹川單純將《尚書》視為北方人種思維的上古文獻的論述，大相徑庭。古城認為《尚書》作為孔子刪減後的古文獻，能體現儒家教化觀，古城提及《尚書》的價值有「流風美制而為後世法者」是自政治性為著眼，上古文獻中的古聖王遺制，為古城認知中的文明表徵，能跨越時代的藩籬，為後世效法，如其言：

上代之風俗政治，君臣遭遇之一斑，亦得於彷彿之間見之，此是書之所以最足珍重也。<sup>30</sup>

古城強調閱《尚書》能知上古君臣遭遇，與其教育理念中，以學校並非僅具傳達知識的功能，應是以培養為國家所用的人才為目的的想法有連貫之處。古典文獻

<sup>2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46。

<sup>2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1。

<sup>3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47。

中的君臣關係，或為古城對當世政治的理想，考察古典文獻，是以明治時勢為出發，企圖由漢學的領域尋找理想的道德教化。

論述《易經》時，古城別於筮川以反映上古人民特性的審視角度，是將《易經》依附於孔子之下，並且注重《易經》在儒家中的地位變遷。論《易經》為「後世言理氣者，引為聖門第一之書，以置於五經之首」<sup>31</sup>就此說考述孔子與《易經》的關係。古城斷定《易經》並非後世用以卜筮，是由古聖人草創「聖人畫八卦以明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從伏羲畫八卦至孔子寫〈十翼〉的長時間編纂，方確立《易經》的內容。古城對《易經》的作用，是引述〈四庫全書總目〉的看法，認為《易經》是聖人用以「進退存亡所由決也。」<sup>32</sup>他強調《易經》與古聖王的連結，關注統治階層藉由《易經》達到的政治性目的，以及孔子對《易經》的理解進行論述。古城對上古文獻的關心點，皆以孔子為出發，故其內容安排上，將《易經》置於孔子的生平之下，在古城 1-2 已經費篇幅講述的《詩經》、《尚書》，在此又做為與孔子相關的文獻再度論述，並且對《禮記》、《春秋》兩書，古城亦非以文獻為敘述軸心，是著重此兩部著作與孔門的關聯，前者是孔子後學所記，後者則是孔子筆削，為「孔子心血之流溢，又名教所賴以維持者也。」<sup>33</sup>。古城對文學史的選材之所以儒學色彩強烈，與他特別推崇孔子，「名教的維持」不無關連，古城的背景使其對明治政局具有一定程度的期待，在西學東漸改換學問體系，以及明治政府破除階級的政策下，仍無法消除社會問題，儒家強調的禮制與規範，自然易為古城關注的治化良方。

古城的《支那文學史》書寫策略，在論述儒家點及的上古時期中，最能體現其針對時事的社會性，筮川臨風則為古城的反面。筮川以單節論述，《書經》、《詩經》、《易經》認為僅是上古民風的寫照，並不著眼於儒家的教化方面，而是藉由選擇這些古典文獻，試圖作為南北人種說的例證，以便於講述筮川最關注的戲曲

<sup>3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7。

<sup>3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7。

<sup>3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51。

小說，強調文學作品中著重現實的一面，乃為了解答戲曲小說，在北方人種的強勢之下未受重視。由是觀之，笹川的文學史著作，乃出於個人趣味的書寫，而非試圖以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或者三代聖王的禮制，為明治日本提出具有治世的解讀。顯現了將道德修身與學問混同的漢學家性格，與喜愛戲曲小說的江戶文人性格差異。

在兩部文學史中，論及先秦諸子的部分，篇幅簡繁差異甚鉅，笹川擷取少數文學家作為論述的主角，以人為核心；古城則具較明顯的派別意識，將先秦諸子依照派別獨立論述，然古城的分類法，卻有異於傳統上《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所呈現的劃分，今列表對照。

表 5-2 《漢書·藝文志》與古城貞吉諸子分類對照表

《漢書·藝文志》	古城貞吉
儒家	儒家
道家	道家
陰陽家	墨家
法家	法家
名家	名家
墨家	兵家
縱橫家	雜家
雜家	賦家
農家	
小說家	

就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的分類，先秦諸子可分為九流十家，以儒家為首，小說家列於最末。古城貞吉的分類，則以儒家為首，共分為八家，與《漢書·藝文志》中的分類有相同者，亦有古城獨創，不見於中國文獻的分類，比如

列出賦家，言屈原以賦為代表的文學作品。

無論是《漢書·藝文志》九流十家的分類，或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分類，皆與古城貞吉的分類不同。就古城的漢學背景以及其藏書情況而論，不知中國分類法是不可能之事，古城的分類法，或體現其對先秦諸子文學派別的創見，是自傳統中脫胎的論法。

古城將文學史的第二篇命名為「諸子時代」，並未以時代上的春秋戰國作為劃分，而是以活動於春秋戰國時的諸子，作為篇章命題，顯現以諸子為探討對象的論述主軸。古城是以「文學者」<sup>34</sup>的身分定位先秦諸子，並非以思想家、哲學家的身分著眼，此現象反映明治時期文學定義尚處於流動的狀態，未能明確區分文學、史學、哲學，以文學作為一切學問的代稱的使用例。當時帝國大學的體制是將文科細分為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sup>35</sup>。若以古城的教育背景而論，他未就讀於學制改革後採取西洋分科制度的大學，極有可能是造成其《支那文學史》中，對先秦諸子的身分定位，未能以思想層面切入的成因。

在古城的文學史觀裡，社會與文學是有絕對關係的，政治的治亂是影響文學發展的重大因素，故言「文學則與此社會機運相待而發達」<sup>36</sup>。及論諸子時代時，古城花費篇幅敘述先秦的社會狀況，細分為春秋、戰國、秦，論述著重於周室制度的崩壞，以致諸子各以其說，提出治世之法。古城貞吉以先秦諸子的文學發達具有五種原因，認為其發展成因在於禮法儀式之崩壞、救世濟民之急、人才登用之容易、列國之相對峙、流派競爭之猛烈共計五種。古城對先秦諸子的關注，或與明治時期的時勢有關，明治政府破除四民階級，舊有的體制受到破壞，造成新興官僚階級的產生。在法治的制定以及《教育令》的修正上，國學者與洋學者的角力，也反映政治派系競爭的一面。由是觀之，古城貞吉對先秦諸子的文學熱絡成因，大抵與明治時期的社會狀況有所關連，其對文學史的關心，或反映以史為

<sup>3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51。

<sup>35</sup>天野郁夫著，黃丹青譯：《大學的誕生》，頁 272。

<sup>3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0。

鑑的意識。

古城貞吉的諸子分類中，與中國傳統區分相異的部分，在兵家、賦家兩者。兵家是以孫武、吳起、尉繚為論述對象，認為是出於「古司馬之職，掌國之軍備者也。」<sup>37</sup>古城提出兵家，或是與明治時以西洋技藝為尚，於軍事制度上，仿效西方建立現代化軍隊的現象有所關聯。古城或欲以古鑑今，自中國古典文獻中，尋求治國良方。故以上古時期的兵家，列於文學者之流。

古城又以賦家一篇，言屈原、宋玉與其賦體作品，亦為與其他文學史不同的分類方式，比如笹川臨風是用一個章節單論屈原，而非以賦家的派別論述。就選取的篇章來看，古城錄的是〈懷沙〉一篇，將屈原的為國為君的德性加以強化，言其「含忠履潔，不容於世。耿介之至無所淺，竟發之於辭。」<sup>38</sup>道德品行的高尚，是古城對屈原的評論。與之相較，笹川對屈原的關注點，則不著重於其政治性以及道德層面，純就作品而論，關注屈原的文辭成就，不著重屈原的政治家身分。在作品的選擇上，笹川是錄〈湘君〉一篇，與古城所選的具有政治抱負的絕命詞〈懷沙〉，立意有別。

笹川選錄〈湘君〉一篇，言屈原「文辭婉麗」<sup>39</sup>，對屈原政治上的遭遇以本傳的方式處理，並無太多對政治得失以及道德操守的評斷。以屈原的文學成就為主，特推崇言屈原作品的價值：「屈原因時事之非而失志，其怨悱弗能禁，賦二十五篇，為錦心繡腸發露之處，為南方文學添陸離之光彩。」<sup>40</sup>以屈原出於情感的詩賦，足以成為南方文學的代表，為屈原最具價值的作品。由是觀之，笹川所建構的屈原形象，是一位錦心繡腸的詩人，異於於古城著重於屈原憂患於時事的政治家身分。笹川臨風之所以強調屈原賦體的價值，乃出於其研究趣味，對屈原的書寫，仍不脫離南北人種說的立論。

總體而言，笹川對於先秦時代的文學家，是作為南北人種說的闡說，而以孔

<sup>37</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17。

<sup>38</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29。

<sup>39</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68。

<sup>4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65。

子與老子、孟子與莊子兩兩一組，作為南北文學的代表論述。對屈原、韓非子的分章書寫，亦是以此二者反映南北人種的特性，而多家論述，比如屈原的性格：「多情多恨，不背南方人種之感性特質。」<sup>41</sup>足以體現南方人種的共性。南方人種的性格，更反映於屈原的文學作品中，如：「其思想，其辭句，其所用之材料，皆可明屈賦為南方之生產物。見其九歌、天問，是具有實際傾向之北方人種，未能想見之文辭。」<sup>42</sup>笹川將南北人種分別著重情感與實際的性格差異，作為論述的主軸。可謂笹川臨風對先秦諸子的論述，乃以其研究喜好做為出發，檢視中國文學家時，亦試圖以此解釋文學作品中的風格差異。

兩部文學史中，單就先秦的部分，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收錄相同的文學家，但對作者的評斷標準，以及其作品的選取，則呈現兩種類型的極端。大抵笹川臨風純以學術的趣味檢視中國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注重情感流露的文學創作，認為文學為作者性情的流露，反映南方人種與北方人種的性格特性。古城則隱含對明治政府的期待，試圖就上古禮制與道德，對應明治時事，故常就文學家的道德性與政治事功，作文學史書寫重點，對文學作品的文辭賞析篇幅有限。誠如古城所言：「社會之現象，即與文學之光影而照映之。」<sup>43</sup>。社會現象與文學互為表裡，兩者不可分割，乃古城貞吉的文學觀，其文學史的書寫重心亦是依循此原則。

## 第二節 中古時期 (B. C206-A. D618)

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在敘述兩漢至魏晉南北朝的中古時期時，以截然不同的章法論述，笹川臨風以人物為主軸，就文學家的作品研究其受到南方思想或北方思想影響，作為南北人種說的申論。古城貞吉以文學家為主軸進行敘述，但在各節標題的呈現上，並非以文學家為題，乃以文體作為區別，分為議

<sup>4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67。

<sup>4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65。

<sup>4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6。

論、敘事、詔敕、韻文等數種進行論述。不同的章節命名模式，顯現兩部文學史在敘述同一時期的文學家時不同的敘述面向。今列表以呈現兩部《支那文學史》中古時及的章節差異。

表 5-3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中古時期篇章對照表

	笹川臨風	古城貞吉
兩漢	第一期 兩漢文學 總說 一、 賈誼與揚雄 二、 司馬遷與班固 三、 司馬相如 四、 詩與樂府	第三編 漢代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議論體之文 第三章 敘事體之文 第四章 詔敕、上書及書牘體之文 第五章 漢代的韻文
魏 晉 南 北 朝	第二期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 總說 一、 建安的詞人 二、 陶淵明 三、 南北朝	第四編 六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六朝的韻文 第三章 六朝的散文 第四章 六朝詞人傳

在第三章第四章所選錄的作家與作品中，兩部文學史皆以兩漢、魏晉南北朝劃分時代，實際內容編排上則呈現極大的差異，試究其成因，仍因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對現世的關注不同，以致在處理中國古典文獻時產生相異的評斷基準。笹川著重研究的主體性，以南北人種說為綱領，關注文辭中的情感流露。古城則著重儒學的道德教化，以禮制治亂為關注重心。故於兩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文學作品中，為兩部《支那文學史》中選材最具差異處。

## 一、漢代：《史記》兼容南北思潮的史書，寄寓針砭的憂憤之作

在兩漢文學一章中，笹川接續上一章的體例，仍以個別文學家為主體，偶見以兩位文學家並列於一章節中的現象。3-1 至 3-3 皆以人物為主，3-4 則論述文體。古城貞吉則以文體為各節標題，未延續上一章以人物為標題的編排模式。並且在文體的劃分上，於 3-4 論述「詔敕、上書及書牘體之文」，對文體的區分也非一般散文、韻文的區別方式，而將公文書作為一種文體單節論述。

就笹川臨風論兩漢文學的篇章來看，可知南北人種說仍為笹川區別文學風格的方式，但就文學史上的作品來看，完全以南北人種說為框架審視作品，仍存在問題，有些作品難以藉南北人種說分化分清楚。笹川臨風在書寫文學史的過程中，亦面臨此問題，特別是兩漢時期以後的作家作品，較難如同先秦時期的作品，能以地域的南北進行人種特質的區別。故笹川在論述漢代以後的作家作品時，提出作品中反映南北方特質的部分，認為其中反映創作者兼容南北人種的特質。比如笹川以賈誼祖述申韓之學，亦受儒學影響，精通左傳，是混合南北思潮的文學家<sup>44</sup>。楊雄靡麗的賦體以及折衷孔孟之說的著作，顯示其混合南北人種的特質<sup>45</sup>。對兩漢的文風，笹川臨風以文學、策論之士視賈誼，《弔屈原賦》悲婉，《過秦論》雄渾高古，皆為笹川稱道；以策論之士視楊雄，稱楊雄博覽能文，認為楊雄以後的漢代策論之士一無可觀<sup>46</sup>。

檢視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可見與笹川不同的書寫模式，古城以文體做為章節標題，於其中探討擅長該文體的作家。3-2 以議論體之文為標題，內容論述賈誼，與笹川相同，舉賈誼曾寫《弔屈原賦》，然非著重於文辭，而是「是言

<sup>4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84。

<sup>4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87。

<sup>4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88。

弔原而因以自喻也。……既數百年，誼所遭之境遇，殆有不期然而然者。」<sup>47</sup>著眼於賈誼的政治抱負，以及與屈原相同，不受重用的仕宦歷程。賈誼的文辭古城未嘗不讚許，比如《過秦論》是「文心靈活跌宕排闥」<sup>48</sup>，但是多著墨賈誼與國事有所關聯的文章，古城特別強調文章與政治的關聯性。古城收錄楊雄的原因，亦非以文辭為出發點，乃關注楊雄思想上與儒家的關聯，以及其政治性為重點，古城言：「董仲舒之後幾七八十年，於元成之間，有劉向者以儒顯，是在傳記之文章，又二十年而有楊雄，亦以儒顯。」<sup>49</sup>，強調儒學的部分，與笹川臨風將楊雄視為折衷孔孟，擅長靡麗賦體的形象大異其趣，將楊雄上溯劉向、董仲舒，建構以儒學為主的傳承路線。古城選錄的文學家，著重文學家與時事的關聯與作品為陳情諷諫而發的政治性，嘗言「文章之存在者，多系書陳當時之政務。」<sup>50</sup>古城強調政治環境，因此章節的命名，以文體而非以人物作為標題，與笹川的《支那文學史》對照，可知作者立意讓文學家與作品有不同評價，呈現了笹川關注文辭，古城關注政治的差異的不同樣貌。

笹川在兩漢時期的文學家裏頭，以司馬遷、班固作為軸心論述，笹川以司馬遷為史家，其學問源流在於：「不僅止於儒家，又窺老莊之學。既得北方人種之思想，又汲南方人種之思想。」<sup>51</sup>兼容南北。對《史記》的價值，笹川認為是史料的可靠，將黃帝以後的事蹟載入史書當中，落實歷史紀實的性質<sup>52</sup>，相較於《春秋》記寓個人針貶的書寫模式，《史記》較符合笹川對史書標準。

古城貞吉以文體劃分兩漢時期的文學作品，3-2 議論體之文收錄賈誼、楊雄，3-3 敘事體之文則收錄司馬遷、班固。評價《史記》為正史之起源，訂定體制，筆力雄健，內容上「蒿目當世者，則應其所病而為矯俗砭心之言，有以洩其憂憤

<sup>47</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47。

<sup>48</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48。

<sup>4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63。

<sup>50</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49。

<sup>5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93。

<sup>5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96。

忼壯之意思。」<sup>53</sup>是推崇司馬遷《史記》針砭時事。古城也認為《漢書》中寄寓班固的褒貶意圖，如同孔子作《春秋》「筆削頗勤」<sup>54</sup>，班固藉由史料的選擇，流露一定程度的價值判斷，只是在文辭上略遜司馬遷，行文風格「為文平淡直敘，顯乏跌宕」<sup>55</sup>與《史記》有所差距。古城擷取司馬遷與班固兩人，在歷史的書寫中對於時事的批判出於古城對中國古代文學家之作品常針對社會而發，藉作品關注時局的傳統，儒者性格的古城亦藉由《支那文學史》成書，褒貶明治時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現實性極強，是笹川、古城兩人都注意到的現象，但笹川將文學作品中的現實性作為為北方人種的性格特質，並認為在北方人種的政治優勢下，成為影響中國文學文章風格的重要成因，別於古城將文學中的政治性，進行道德上的解讀。

笹川 3-4 謂漢代的詩作結合北方的詩與南方的賦，乃南北文學的調和，錄李陵與蘇武詩、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飲馬長城窟行〉、〈長歌行〉、〈怨歌行〉、〈四愁詩〉等作品。古城 3-5 則將詩細分古詩與樂府，謂詩作「俱皆出於六義之旨。」<sup>56</sup>對樂府詩古題〈江南曲〉、〈薤露〉、〈平陵東〉、〈秋胡行〉等詩作，僅題解而未選錄內文，〈有所思〉、〈艷歌行〉、〈天馬徠〉、〈古詩十九首〉則選錄詩作內容，大抵就詩作內容與成詩背景敘述，是較為簡略的論述。

## 二、魏晉南北朝：清談，佛道風氣的反應與醉生夢死的避世

笹川論述魏晉南北朝時以政治與思想為切入點，關注魏晉南北朝時佛教、道教興盛，社會風氣浮華等現象。笹川認為清談的風氣對文學作品有直接影響，劉

<sup>5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75。

<sup>5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79。

<sup>55</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79。

<sup>5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22。

伶的〈酒德頌〉、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皆為此風氣下的產物，對當時士大夫的清談，笹川論述如下：

晉代山濤、嵇康、阮籍、阮咸、向秀、王戎、劉伶等竹林七賢，好清談。

崇尚老莊虛無之學，輕蔑禮法，縱情於酒，遺落世事，謂之放達。<sup>57</sup>

笹川對竹林七賢並無強烈的道德判斷，仍以陳述歷史的方式記載時風與文學的關聯，注意到魏晉人士對老莊之學的取法，以及縱情於酒的行為。對於這類作品中流露的思想，笹川仍歸結於南方思想的影響，存在南北人種說的意識。在魏晉南北朝時，佛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亦為笹川所注目，比如沈約的《四聲譜》，是受到印度聲韻學的影響而成，沈約〈懺悔文〉，王巾〈頭陀寺碑文〉，亦為佛教影響下的文學作品<sup>58</sup>。

同樣以魏晉南北朝作為論述內容，古城論及竹林七賢以及清談之風氣，與笹川臨風觀點相異。古城對魏晉的政治紛亂，確實有所體認，然對於士大夫清談避禍似未能贊同，古城有言：

當時之學者，多逞於漢季黨錮之慘，無後修立名節，以談笑無事為處身之術，藉口於虛無幽玄，了一世於醉生夢死之間。<sup>59</sup>

縱使古城理解清談的風氣與政治紛亂有所關聯，他仍以「了一世於醉生夢死之間」批評清談風氣。古城的教育觀是「士應為世所用」，在此之下，魏晉名士以飲酒清談作為避世的方法，自然成為古城的批判對象。在古城的觀點中，儒學的濟世方為士大夫應有的處世之道，因此如魏晉南北朝時的王肅、何晏、王弼等人皆為

<sup>5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頁133。

<sup>5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頁137。

<sup>5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261。

古城的批判對象，他認為「儒學雖有王肅、何晏、王弼之徒，然皆不過訓詁章句之流。」<sup>60</sup>由此可知在古城的認知中，儒學必須具有濟世的作用，並不以名物訓詁作為研究的最終目的。

笹川與古城對魏晉南北朝風氣的評斷，可見前者以南北人種說作為關注的重點，盛行的清談風潮以及文學風格乃南方思想興盛的產物，笹川以南北人種說為切入點，認為：

宋以後詩愈趨婉麗清巧，經齊、梁益趨極致。…以文學而論，北方雄勁，南方清婉。據此說，可知六朝文學毋寧為江左文學，河北殆無。<sup>61</sup>

笹川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學風氣的考察，著重於風格的變化，以婉麗文風作為南方文學席卷北方的論證，對此現象並不寄寓道德判斷。

反觀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則可見其對魏晉南北朝風氣的不同解讀。古城以儒家思想為背景，常批評避世的魏晉風氣。古城謂：「好清談者，滔滔輕薄之風，蕩然相模仿，而其俗大壞。」<sup>62</sup>他是以道德教化的標準審視歷朝文學，並以儒家濟世的文學觀為基準，因而對魏晉南北朝的文風常有貶意。古城認為學校的設立在培養人才報效國家，故關注魏晉南北朝的學制，有言：「宋則嘗置玄史文儒之四學，教養諸生。齊則雖立國學，置生員，而開廢無定，皆不及十年而廢之。」

<sup>63</sup>古城論各朝的學制存廢，延續第一章上古時期論周代學制的書寫模式，著重於文學的教化以及經世濟民的目的。

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也注意到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古城認為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體現於聲律上，沈約的《四聲譜》是受印度聲韻學影響而成，聲律觀念的建立，更影響後世中國詩學，此為古城與笹川的文學史中論述較為統

<sup>60</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61。

<sup>6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39

<sup>6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62。

<sup>6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64。

一的部分。大抵而論，文學史中較不具政治性的部分，笹川與古城的見解較無差異，然一旦涉及時事，古城的著作即顯現較強的批判性。

論述魏晉南北朝的詩文作品時，笹川與古城的篇章架構上有所差異，前者以人物為主軸論述，後者則以文體為主軸，對單一的詩人亦有篇幅繁簡的論述差異。此亦是兩部文學史作者研究趣味相異，文學觀亦有所差別的體現。

笹川 4-1 的標題是「建安的詞人」，列舉了魏武帝、魏文帝、鄴下七子。以詞人作為標題，然實際收錄的文學作品，是魏武帝的〈短歌行〉、〈苦寒行〉，魏文帝〈善哉行〉、〈芙蓉池作〉，曹植〈宮讌詩〉、〈雜詩〉、〈七哀詩〉皆為詩作，而非詞作，並且在論述上，亦言詩不言詞。論魏武帝曹操的詩作：「其感興所作之詩，雄勁且自溢英氣。」<sup>64</sup>，論魏文帝曹丕喜好文學，有言：「帝亦好文。所作詩文溫裕美瞻。」<sup>65</sup>，論曹植：「植之詩風骨尤高，氣象潤澤。」<sup>66</sup>對於建安時期的文學家，以詩作為軸心論述，並未提及詞作，是笹川標題與內文的差異。另一方面，僅論述篇目而未引錄的作品，則涵蓋詩作以外的其他文體，比如王粲的〈登樓賦〉，徐幹〈玄猿賦〉、〈團扇賦〉，陳琳、阮瑀的「章表書記」<sup>67</sup>，以詞人作為章節的標題，然就論述內容論之，則笹川的詞人定義，或為擅長各類文體者的代稱，並非以後世「詞人」的定義論述魏晉南北朝時的文學家。就建安時期的文學家，三曹父子政治上的建樹並非笹川所著重之處，其個人的詩作風格，以及雅好文學，方為笹川所重視。笹川認為「武帝父子兄弟皆好文學，故鄴都文士自然雲集。」<sup>68</sup>笹川臨風注意到當權者的喜好，造就文學的興盛，然對時事與文學的關聯，並無政治與道德的批判，僅客觀陳述現象。

以詩人為詞人的現象亦出現於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中。古城 4-4 一節題為「六朝詞人」實際上論述的文學家為三曹父子、鄴下七子，古城立傳論述此

<sup>6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42。

<sup>6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43。

<sup>6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43。

<sup>6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45。

<sup>6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43。

文人群體，然並無選錄著作，僅略論生平，並具有一定程度的人物品評意識，古城評價曹操：「譎詐權略，收用人才，遂行非望。」其以儒家的君臣倫理，審視曹操的政治作為。論及文學作品時，古城是詩文為主，比如論曹操：「於戎馬倥傯之間，猶執筆賦詩為文，而其音節強健跌宕。」<sup>69</sup>，論曹丕則言：「又篤好文學。…其所勒成之文詩亦甚多。」<sup>70</sup>，論陳琳則言：「軍國之書檄，多成於其手。」<sup>71</sup>。由是觀之，古城以「詞人」視之的文學家，所擅長的文體涵蓋詩作與文章，此處的詞人，或為文詞的代指，並無特定的文體區別意識。笹川與古城在論及南北朝時的文學家，將詞人作為擅長詩文者的代稱，與後世依照擅長「詞」這一文體而劃分的詞人，具有定義上的差別，反映明治時中國文學史書寫時，在詞彙使用時反應與現行義相異的時代性。

### 三、陶潛：建安風骨的延續與道德的高峰

論及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家時，笹川與古城的最大區別，並不在選取的文學家有所不同，兩人皆選擇鄴下七子、三曹父子，顯現對代表性文學家有相同看法，兩部文學史的最大差異顯現在評判標準上。笹川以文辭為著眼之處，試圖就文辭反應的風格進行南北人種說的申論，古城亦言文辭，然多就由政治上的表現，進行道德性批判。在兩人的選材上，唯有論述陶潛時較具有差異性，笹川以單一小節論述陶潛，古城則於 4-2 論六朝韻文時，略論陶潛，與阮籍、傅玄、左思等人並論。古城認為晉代的詩作成就一般，言：「晉多清言之士，是詩本無有可言之物也。」<sup>72</sup>這可能是笹川對六朝時的詩人，未以單一章節論述單一詩人的原因，然古城對陶潛，仍持正面評價，並認為陶潛在六朝詩人中是極為傑出的一位。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在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家，獨選陶潛單一節討論，並

<sup>6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20。

<sup>70</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20。

<sup>7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22。

<sup>7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74。

且給予極高的評價，與古城的《支那文學史》具有極大差異。論陶潛之前，笹川先論阮籍、太康體，以阮籍為建安風力的繼承者，其詠懷詩高古，為建安後的高手。笹川對陶潛的評價，亦出於對建安風骨的推崇，是藉由內容與文辭，評斷陶詩的價值，笹川有言：

建安風骨漸微，六朝排偶之弊漸成。…未免有建安以後詩運日漸衰微之嘆。  
晉末，獨陶淵明詩格調沖淡，氣韻清高，適其性情，是為神品。…為六朝文學中最為精采之奇觀。<sup>73</sup>

由此段論述，可見笹川對陶潛詩的取法，乃以對建安風骨的取法為出發，注意到六朝詩文講求聲律，內容上趨向貧弱，與建安風骨相去甚遠，唯有晉朝末期的陶潛，在內容上與清勁的建安風骨相近，故有佳評。

笹川並非以陶潛的道德與政治，作為評價的標準，乃以詩作的文學價值判斷。笹川對陶詩的推崇在於格調、氣韻等抽象的風格，言陶潛的詩「適其性情」顯示笹川將性情視為論文學作品的要旨。笹川認為六朝排偶的弊病，在於對文辭聲律的重視勝過性情的表現，故重提建安風骨，讚許陶潛的詩作，反映笹川對文學作品判斷出自作品中的性情流露，而非濟世與否的道德判斷。

笹川對陶潛的推崇，或為建立於對魏晉南北朝這一時代的理解之上，前述對排偶的評價，著重於聲律形式的外在批評。笹川對詩作的評價，亦顯現其文學觀：

晉宋之間，奉老莊虛無之道者甚眾，唯淵明之間曠高遠，眾人未逮。不乏縱酒放逸，罵倒人事者，然能及淵明天真爛漫者幾稀。<sup>74</sup>

由上文可見，笹川認為晉、劉宋時的文學風氣，在政局的混亂下，文人多尚莊老

<sup>7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50。

<sup>7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51。

虛無之學，寄情於酒，作為避世遠禍的方法，在詩文內容上顯現虛無幽玄之風。但笹川對此風氣並未有正面評價，乃以陶潛詩文中顯現的真情，作為稱道之處。笹川認為文學作品是情感傳達的途徑，故崇尚陶潛詩文的率真性情，認為陶詩勝過喜言老莊虛無之學的晉宋文人，也勝過追求形式聲律之美的六朝駢偶。

笹川用去許多篇幅引錄陶潛詩作，與古城僅錄〈飲酒〉詩一首的選材相異。笹川選錄〈問來使〉、〈飲酒〉一首、〈雜詩〉一首、〈歸去來辭〉在選錄作品的篇數上遠多於古城，且選錄文體包括詩與文，顯示笹川對陶潛文學作品理解的全面性與重視。

古城貞吉對陶潛的論述，是列於晉代的最末一人，將陶潛視為近代文學的壓卷，就人格層面對陶潛有極高的讚譽，其言：

最後復有一人，雖眾人囂囂而我獨寂寂。雖眾人趨炎，而我獨守真。是為隱士陶潛。淵明之詩以清遠勝，為後世韋應物、柳子厚等之詩所原本也。

75

由此段可見，古城對陶潛的推崇以道德為基準，在晉代亂世中，陶潛辭官歸田，不趨炎附勢，因此成為古城貞吉推崇的對象。陶潛雖置於晉代文學家的最後一人，但古城的評價是相當的正面。對照先前論及的晉代的文學家，古城評左思為「胸次高曠。而惡之者則曰其氣粗。」<sup>76</sup>，潘安雖與陸機並稱，但古城評「陸機之才，則非安仁所能匹敵。」<sup>77</sup>皆兼具正面評價與負面評價，然對陶潛皆為正評。

古城貞吉對陶潛的評價，是以道德為起始，文辭則置於道德之後。在篇幅上，對陶潛之詩僅以「清遠」概括，並未多做描述，僅客觀陳述陶詩在文學史上的影響，成為韋應物、柳子厚的師法對象。節錄的作品僅有〈飲酒〉詩第五首，並未品評文辭。但陶潛的道德性，卻是古城費筆墨陳述的部分，是具有情感性的的評

<sup>75</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76。

<sup>7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76。

<sup>77</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276。

價。古城之所以未將魏晉南北朝的詩人單節論述，是因其認為魏晉南北朝的詩作，並非詩這一文體的巔峰，當時人物受清談的風氣影響，並不以詩為擅長。古城對陶潛的論述，亦在此原則之下沒有多作著墨。陶潛之所以成為古城文學史中，晉代文學家的壓卷，乃因古城以道德教化的觀點審視中國文學，陶潛未趨炎附勢，辭官歸隱的經歷，成為古城讚許陶潛的原因。

在兩部文學史中，同樣論述魏晉南北朝，笹川以時代順向論述，古城以文體論述，但檢視其中所選的文學家與其作品十分相近。笹川臨風 4-3 南北朝選錄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再選永明體謝朓、沈約、江淹，古城 4-3 以六朝韻文為標題，不另立子題，選謝靈運、梁武帝、沈約、江淹、鮑照，選錄的作家具具有重複性。總體而言，篇幅笹川在此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獨就陶潛的詩文進行大篇幅的論述以及引錄。古城的篇章略論各家，比重較為均衡，並在時代上，略論及隋煬帝興起之初詩文的梁陳餘風，以及當時宮闈中的婦女詩作，認為宮體詩淫靡，造成隋朝衰弱：「隋朝未遂一統之業，亦起無因哉」<sup>78</sup>，以道德的判斷，評論內容上艷麗纖巧的宮體詩。

古城以文體區分章節，在散文的部分不僅限文人所作散文，更論及宮廷詔書，「隋之文則以煬帝之詔書最為雅，深而且美。」<sup>79</sup>錄〈再伐高麗詔〉稱隋煬帝詔書正大雄偉，給予極高的評價，古城對詔書的稱許，並不單就文辭，仍是離不開內文的政治性，大抵古城貞吉的文學評斷標準，是與政治教化有關，故收錄詔書至散文論述，亦可反映其對時事的關切。

<sup>78</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頁 143。

<sup>7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75。

### 第三節 近古時期（618-1644）

對唐代到明代的近古時期，兩部《支那文學史》皆對唐代的文學有極高的讚譽，但因笹川與古城兩位文學史作者的性格差異，顯現不同的書寫方式，不只對同一時代的文學家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對作品的選錄亦顯現極大的差異。就章節而論，笹川在書寫時，仍是維持以人物為主體的方式，古城則是秉持對時事的關注，專立章節言儒學的流變。近古時期為戲曲小說興盛的時期，但因兩位作者的研究重心相異，導致描述戲曲小說的章節差異甚遠，笹川是以單獨章節大書特書，古城則僅於概論中約略提及，今以表格兩相對照，可知兩部文學史在近古時期的章節差異。

表 5-4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近古時期篇章對照表

	笹川臨風	古城貞吉
唐代	第三期 唐朝文學 總說 一、 初唐的詩 二、 李白與杜甫 三、 韓與柳 四、 白樂天 五、 晚唐的詩	第五編 唐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唐朝的儒學 第三章 唐朝的詩 第四章 唐朝的散文 第五章 唐朝的佛教文學
宋朝	第四期 宋朝文學 總說 一、 蘇東坡與其前後 二、 陸放翁	第六編 宋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宋朝的儒學 第三章 宋朝的散文 第四章 宋朝的詩
金朝元	第五期 金元的文學	第七編 金元間的文學

朝	總說 一、元遺山 二、小說與戲曲的發展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金朝的文學家 第三章 元代的文學
明朝	第六期 明朝文學 總說 一、高青邱 二、李何七子與李王七子 三、小說與戲曲	第八編 明代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明代的散文 第三章 明代的詩

在唐代的論述上，兩部文學史皆表述唐代為中國文學的興盛期。笹川臨風謂：「唐朝為支那文學最興盛之時代。文學一道至此為高潮，觀其前後未有盛運如此時者。太宗以武功治天下，以文德綏海內。」<sup>80</sup>評價政治與文學的關聯。古城貞吉謂：「唐有天下三百年，文華蔚然而興，因而各種文學亦燦然。」<sup>81</sup>也是由唐代政治安定著眼，論文學興盛的原因。兩者皆以唐代為文學的高峰，是在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時期，並且文學的興盛，是在各類文體皆然。兩部《支那文學史》，皆言學官的設立，笹川臨風對一朝代學制的書寫，在文學史中並非多見的現象，但在論唐代的總說裡，罕見的對唐代的學官有所論述：

延天下名儒，至國子監講諭。學生能明一經以上者，可補官位。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學生增至三千兩百六十員。延博士授經書，貢舉能通經者。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至，並遣子弟入國學。<sup>82</sup>

<sup>8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50。

<sup>8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43。

<sup>8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64。

由是觀之，笹川臨風對唐代文風的興盛，是與統治階層對文學的看重有所關聯，而此處的文學，亦是傳統上漢學即文學的概念。古城則是維持一貫的書寫模式，論各朝文學時，著眼於政治的治亂，言太宗獎勵文學：

開文學館言文學之士，又盛致前朝凋殘之遺老碩儒，以助治化，為立一代之基礎。猶如日本當德川家康之定幕府，台五山之僧徒，大興學術也。<sup>83</sup>

將中國唐太宗的政策，以日本江戶時期作為對應，政策上皆為廣納博學之士，促使文學興盛。唯有兩國體不同，江戶幕府的幕藩制度與中國中央集權的專制，是不同的運作模式，中國儒者的身分是可藉由科舉入朝為官，日本則無科舉制度，僧侶是在五山時期是具有學識者，江戶初期對五山僧徒的延攬，意味著將廣納地方的人才為幕府所用。

兩相對照，同樣論及唐太宗延攬碩儒，使文學興盛為兩部文學史共同的論點，唯有古城是以中國與日本兩相對應，而笹川則是純然交代歷史上的背景，較無對現世政治的影射。

### 一、唐代：以李杜優劣為中心的探討

就唐代而論，笹川與古城對李杜的書寫方式以及評價，具有極大的差別。笹川對李白、杜甫是置於同一章節描寫，將之作為互相對照的對象，先概述生平，在以其作品中顯現的不同人格特質，進行闡述，引入南北人種說作為例證。並且歸納李白是在詩才上勝過杜甫，笹川謂：

若以詩才而論，則李勝於杜。可謂天才與地才之別。然李杜優劣尚待深刻鑽研。縹緲果優？沉鬱果劣？昔中唐元稹謂李未能窺杜之藩籬，況堂奧乎？

<sup>8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44。

此是未知李之言<sup>84</sup>。

由上述可知，笹川認為前人在李白、杜甫的優劣比較中，將杜甫置於李白之上是出於儒家式的思維，故以杜甫詩作中的現實性，以杜詩優於李詩，笹川強調此評價「僅是儒家見地的僻論」<sup>85</sup>，並非就文辭上的水平而論，若以文辭來看，不應有此評斷。笹川此段言「天才與地才之別」，是以李白作詩的迅捷「李白斗酒詩百篇」其作詩筆急與豪與杜甫「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做詩苦。」作詩的遲吟刻苦相較，認為李白之才，是「出於天授，非人力所及」<sup>86</sup>故以天才地才評價。笹川臨風言天才與地才，卻非為李杜排出絕對性的次第，而是以其詩風不同作為論述中心，認為李杜「未可強論其間優劣。一以才勝，一以工勝，是各擅一方。」<sup>87</sup>仍以兩人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大詩星」<sup>88</sup>並論，並非欲為李杜進行排序。

笹川對李杜評價亦著眼於文學，而非道德與事功，試論述李白的部分，可知其著眼的李白形象與古城有所差異。笹川是平鋪直敘李白生平，就史實的部分敘寫，並無參雜個人情感。其中李白於翰林院供職一段，是言李白受唐玄宗賞識「不可不謂之殊遇」對李白與唐玄宗的互動有所描寫，笹川謂：

太白於翰林院時，常代王起草。然性沉醜於酒，帝召其撰述時，常在醉中，左右以水沃面，方稍解。即乘筆傾刻而成，帝甚愛其才，數召其侍宴飲，而有白沉醉使高力士脫靴之事。<sup>89</sup>

笹川於此段中描寫的李白，是好酒放任，以才得玄宗賞識的詩人形象。對李白唯一任職於中央的仕宦經歷，並非以事功、職位為著眼，而是以才與酒做為形象的

<sup>8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95。

<sup>8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95。

<sup>8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95。

<sup>8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96。

<sup>8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96。

<sup>89</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 176。

特寫，對於任職翰林院一事，亦自唐玄宗愛才、殊遇李白為著眼，呈現國君的寬容，對李白好酒的種種行為，因賞識其才華未有懲罰。

笹川謂李白少時欲有一番作為，然終究未得功名，是以詩人的身分活躍於當世，李白的性格是：「道家的影響與其詩人能力相合，遂超世俗，隱於酒，抑其功名之心，以詩人生涯。彼不得志於功名，然其霸氣現於文學上。」<sup>90</sup>由此觀之，笹川對李白其人，是客觀陳述李白未得功名的生平，純以文學成就評判，認為李白縱使沒有功名，也能以詩名傳世，成為「席捲支那文壇，為支那文學史上之將星。」<sup>91</sup>笹川認為文學上的成就，可使得李白以詩人身分不朽於文學史之中，以將星比擬之，亦流露笹川對文學與事功之間的價值評斷，顯現文學是足以與事功上的成就相對而論，並且足以傳世。

對李白的評價，笹川是以天才、仙才稱之，笹川言：

彼非情之人，是為氣之人。其學非得之於人，是直悟所得。其以氣韻勝，可嘆為千秋逸調。其有天馬行空之勢，不可為羈勒<sup>92</sup>。

笹川所謂情之人與氣之人，亦是對李杜的區分。笹川此處所言「情」是出於對現實的關照，著眼於現實，可自人間中得來處。「氣」則是強調受之於天，非所學而能的部分，以李白之才，即來自於直悟，得於上天的賜予。因李白的才情，是尋常詩人需要刻苦為之的，李白則否，故強調其非情之人，非得自人世的觀察與苦學。在詩作上，笹川選錄〈烏夜啼〉、〈襄陽曲〉、〈鳴皋歌頌岑徵君〉、〈塞下曲〉等詩作，作為其代表性作品，李白詩作的變幻莫測處，為笹川所稱道，其言：「天縱逸才，落筆驚挺，其歌行跌宕自喜。」<sup>93</sup>，由此可見笹川將李白視為天資英邁的詩人形象，收錄於文學史中。

<sup>9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81。

<sup>91</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81。

<sup>92</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83。

<sup>93</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85。

檢視笹川所營造的杜甫形象，則可知「情之人」是著眼於現實，得自於沉吟刻苦，非得自天，笹川謂：

杜甫為情之人，為世間之人，未能離於世間。其性未能超絕俗世，乃發忠君之情，懷鄉之念，妻子眷屬之念。未能離於此。其為情之人，故寬厚有長者之風，未能成樂天之士<sup>94</sup>。

此段可知，笹川所謂情之人，是能關心現世，故杜甫多感憂時事，是情之人的證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笹川將懷鄉之念、妻子感懷之情，與忠君愛國之情並稱，是不以事功、濟世的情，勝於人倫之情，並不將事功視作高於人情一等的存在，是將兩者置於同一層次。若說儒家傳統倫理忠孝不能兩全，是將國家、國君置於家庭之上的優位性，笹川是將兩者並置，以無分優劣的方式審視之。

故杜甫仕宦的歷程，並非笹川擷取的重心，而是以其關注世間，為他人的際遇吟詠悲歎的層面著眼。笹川錄杜甫的〈哀王孫〉、〈玉華宮〉、〈詠懷古蹟〉言皆是為人為時而作，三吏三別中為他人哭泣，皆為杜甫「為他人拋己炎烈烈之熱血」<sup>95</sup>以杜甫對世間的關懷，感懷時事作為其性格擷取的重點。杜甫的詩才，笹川評為「才思煥發，加之筆力豪勁，苦心經營。其音鏗鏘，若金玉之響。」<sup>96</sup>笹川讚許杜甫對文辭與聲律上的苦心經營。笹川所擷取的杜甫形象，是憂時的文學家，詩作沈鬱，與李白的飄渺為對比，呈現南方人種與北方人種的差異，是與李白各擅一方的中國代表詩人。

古城謂：「唐三百年之天下，詩運之天下也。」<sup>97</sup>認為唐詩為文學之高峰，其中李白、杜甫為其中佼佼者，是：「立於詩壇最馳其雄聲者，則洵李太白杜子美

<sup>9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86。

<sup>9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93。

<sup>9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193。

<sup>97</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82。

兩人，然則為三百年詩人之冠冕者，捨兩家豈復有其人哉。」<sup>98</sup>視李白、杜甫為唐代詩人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在古城的文學史中，對此兩人皆有極高的評價，但觀察古城對兩位盛唐詩人的形象擷取，可見與笹川截然不同的形象塑造。

古城以李白〈與韓荊州書〉作為論李白生平的起始，由李白志氣宏放，欲為世所用作為出發，認為李白具有雄心壯志，不以腴辭干祿，〈與韓荊州書〉「願委身國士」<sup>99</sup>的陳述，成為古城所擷取的愛國李白形象。對歷史上李白為唐玄宗賞識，任翰林學士一事，在同一段歷史的記載中，其視點亦與笹川差異。李白醉酒放浪形跡，在古城看來是：「丈夫抱有為之才，而不得志於一時者，往往縱酒匿跡，以全此偃蹇之節操。」<sup>100</sup>以李白沉醉於酒，是因為有志難伸，藉酒退隱，不願與世浮沉的舉動。別於笹川不具有道德評斷的敘述方式，古城對李白好久的行為進行道德上的延伸解讀，不以縱情於酒的詩人形象描寫，而是以心憂時事卻有志難伸的形象敘述，古城謂：

古來光明特絕之士，往往欲學先人入禪，藉以消磨其壯志，意太白亦不過欲藉仙以自況，而消其雄心。若徒以學仙入禪稱之，則又何足以知太白之心事。<sup>101</sup>

此段論述中，古城認為李白學仙學佛，是為了抑制有志難伸的雄心，對同樣的經歷，笹川則認為反映李白的性格上具有受到南方思想影響的一面。兩部文學史對李白經歷的解讀大相逕庭。在古城的觀點中，若批評李白學仙入禪，是未解李白心事的妄斷之舉，完全無法掌握李白思想中濟世的積極性，僅就李白寄情詩酒，學習仙佛的表現，是對李白了解太過片面。

總體而論，古城讚許李白杜甫兩人於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李杜詩風一為飄

<sup>98</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82。

<sup>99</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87。

<sup>100</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91。

<sup>10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392。

逸，一為沉鬱，兩相輝映是唐代詩人之冠冕。但古城的文學成就之評定基準，具有極高的成分是由道德為出發，比如李白的評價，古城謂：

太白之於二三子，清矯拔俗，洵可謂一代偉人。其玩世之意，則有匪夷所思者，彼世之無眼識之人，僅以飲仙呼之，又烏足以窺飲中諸賢之消息乎。

102

是將李白視作不願與世同流合污的偉人，將其遊歷各地，未取功名的際遇，認為是寄寓高潔之志的體現，並對將李白稱為飲仙的普遍評價予以否定。古城的評價是具有特殊性，就古城個人而言，亦對此與傳統迥異的李白評論有所自覺，而以彼世無眼識之人稱呼一般對李白學仙佛、好飲酒的評斷者。

若觀察古城對杜甫的評價，亦反映此相較文學，更重視道德的評斷基準。是在不否定文學成就的基準上，加以道德的判斷，使得古城與笹川的《支那文學史》在選錄同樣的文學家時，呈現不同的敘述風格。古城對杜甫詩作的選錄有〈春望〉、〈月夜〉、〈哀江頭〉等詩，古城謂此數首詩為杜甫歷經安史之亂、玄宗幸蜀等歷史事件後所作，其詩作內容反映國家亂離後，詩人對君對國的憂思，古城謂杜甫：

不堪亂離之感，仰憂君國，不知日月之何時復明，俯思家族，則悲兒女之為何。千愁百緒，一時集於心目，不勝其感，遂一一洩之於微言幽旨耳。

103

由上述可知古城對杜甫的形象塑造，是憂君憂國的詩人。古城論杜甫其他成於開元天寶之際的作品，如〈述懷〉、〈喜達行〉、〈北征〉、三吏三別等，古城解讀內

<sup>10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14。

<sup>10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14。

容為「惓惓君國之情」<sup>104</sup>。在杜甫被貶官後的詩作，古城亦有此解說：「其身放逐而不敢歸一毫之怨於君，明知遭讒毀之貶黜，而以無才之解。」<sup>105</sup>可知古城是以思君思國之情，作為對杜甫性情與作品的敘述重心。

古城與笹川的《支那文學史》中有一共同現象，比如杜甫的詩作中，有言家族者，有言君國者，古城描寫時，是言「仰憂國君，俯思家族」將國君與家庭並舉，謂詩作中有杜甫所寄託之微言幽旨。笹川謂杜甫：「其性未能超絕俗世，乃發忠君之情，懷鄉之念，妻子眷屬之念。未能離於此。其為情之人，故寬厚有長者之風，未能成樂天之士。」<sup>106</sup>論述中對國家與家庭並無等差，在情感流露時，國與家是並列的，並未因為國家公共事務具有超越家庭的優位性。

將家與國並舉是見於笹川與古城文學史的共同現象，或出於日本對儒學的接受，中國傳統上的「忠孝不能兩全」，在日本可藉由「移孝易忠」，達到忠孝一體的圓滿現象<sup>107</sup>。若以歷史的溯源而論，「孝」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概念，在漢字傳入前，並未有「孝」的道德概念。至明治時期，在作為教科書使用的《幼學綱要》中，則將「孝」作為與「忠」並重的人倫大義，作為儒學的兩大綱領，並且藉由教科書列舉中日兩國足以為「孝」之代表的歷史人物，作為道德上的範本。明治時期之所以提倡「孝」的德目，是欲以此做為家族關係到社會關係的延伸，教科書中列舉舜、閔子騫、王延等中國人對繼母的孝行，是欲強調沒有血緣的聯繫，亦可有孝行的產生。明治時期近代化國家建立，自由民權主義不利於天皇制的維繫，故以此無血緣的「孝」將家族的倫理擴展為對天皇的「孝」，即國家社會的倫理。故明治時期的道德修身教育，由教科書的編纂，強化「孝」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藉由強調忠孝，進行政治的感數，是：「克服了血緣關係紐帶的孝順，培養國民對天皇的崇拜與忠誠，從而建立忠孝一本以天皇為頂點的道

<sup>10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20。

<sup>105</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420。

<sup>10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 年），頁 186。

<sup>107</sup>譚建川：《日本教科書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115。

德論服務。」<sup>108</sup>為鞏固天皇制而產生。

笹川與古城的《支那文學史》在對文學家的選取上，大都具有共同性，但是對文學家性格的擷取，以及作品的選錄上，反應截然不同的個性，笹川是以研究趣味為出發，古城則是以道德評斷為著眼點。兩位性情相異的文學史作者，同為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反映了時代的共性，顯現於文學史中，明治時期出於國策須求，忠孝一體藉由教科書傳遞的概念，笹川與古城在文學史中，將文學家對家與國的感懷，以並列方式呈現，不以中國傳統上忠孝不能兩全的概念，對兩種德目作出排序，反映明治時代特色，故兩本文學史中，在盛唐詩人杜甫的詩作裏，寫妻子兒女的詩作與憂君憂國的詩作，皆可並列，同為幽言微旨的寄託。

## 二、宋代：詞作缺席的文學史

兩部《支那文學史》在宋代的部分，具有相同之處，在於文體上僅收錄宋代的詩，並未收錄詞，對文學家的介紹，亦是以詩作為主軸兼論散文，與後世文學史著作中，以詞作為宋代文學之代表的內容大相逕庭，此顯示明治時期的漢學者，對中國宋代文體的掌握狀況。

今檢視笹川《支那文學史》對宋代文學的概論，可知其是以宋代為南北思潮的混合時期，以思想上的變遷為著眼點，認為宋儒學的性理之所是與漢學的訓詁相較，更為活潑的學風。但宋代理學的興盛妨礙了詩的發展，北宋時有詩文雙絕的蘇東坡、修《五代史》的歐陽修、撰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但到了南宋，理學更為興盛之後，僅有黃山谷、陸放翁可稱宋代的大詩人，幾無詩文兼擅的文學家<sup>109</sup>。笹川書寫宋代的文學家時，是以詩文作為代表著作，並藉由詩文風格，進行南北人種說的闡述，比如以歐陽修的文章有北方人種的雄勁性格，是宋代文運的開創者<sup>110</sup>，引錄其〈周臣列傳贊〉為說明。宋代重要的文學家，笹川是以蘇

<sup>108</sup>譚建川：《日本教科書的中國形象研究》，頁 115。

<sup>109</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35。

<sup>11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35。

東坡為核心，略論其前後，至南宋則以陸放翁為主軸，在宋代的篇章安排上，標題僅見此二人，與古城以儒學、散文、詩三種主題分列的編排有所差異。

對文體的選擇，是以詩文為中心，是兩部文學史的共同內容。古城對宋代文學的發展，提出「其文學之所長，則存於詩歌乎？亦又在於散文乎？」<sup>111</sup>的提問，由此可知，古城亦以詩與散文，作為宋代文學的代表性文體。古城以宋代的科舉制度有別於唐代，科舉不以詩作為取士的標準，使得士人並不以詩為擅長，以策論開登科之門，為宋代的散文發達的原因。對於宋代的詩，古城言：「詩則非宋人之所長。」<sup>112</sup>雖章節內容上，為詩作闢一節討論，但仍是以宋代的詩作成就未過於散文。對此，兩部文學史作者亦有相同見地，是以理學的興盛，作為詩作發展受限的原因，古城認為宋代的文學風氣成因是：「當時儒佛之學甚盛，故說理之風被及於一般，因而其文學以義理為主，遂解美好之果於散文。」<sup>113</sup>與笹川：「宋代性理之學盛，而有礙於詩之發展。」<sup>114</sup>見解相同，顯現兩部文學史都認定宋代的詩不如唐代，因制度及學風的改換，使得宋代文學家是以散文見長。

若以章節安排而論，笹川僅就緒論中論及宋學性理之風，未如古城另闢一節單論宋儒與漢儒的差異與各學派的變遷。此是兩部文學史作者關注點不同所造成的差異。江戶氣性的笹川，與舊儒習氣的古城，在論述時偏重不同，古城對理學家對儒家典籍的詮釋是其關注重點。

若以選錄的文學家而論，兩部文學史皆論及梅聖俞、蘇老泉，概述生平與作品，然北宋文學在兩部文學史中，皆以蘇軾作為敘述重心，篇幅較多。在笹川的敘述中，蘇軾博學能聞，穎悟通經史，生於北宋的文學絕頂期<sup>115</sup>。笹川特別關注蘇軾的出生地，以蘇軾為蜀人，是「兼有南北各人種特質的西方人種。」<sup>116</sup>蘇軾學問源流兼及釋道兩家，與南方出世思潮不無關聯，蘇軾策論中又有北方人種的

<sup>11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512。

<sup>11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513。

<sup>11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513。

<sup>114</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34。

<sup>11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39。

<sup>11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42。

氣象，笹川因此認為蘇軾兼容南北，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文章家」<sup>117</sup>。笹川對蘇軾文章的選錄，是〈議學校貢舉狀〉、〈上神宗皇帝書〉等奏議文，詩作則選〈金山妙高臺〉、〈遊金山寺〉、〈新城道中〉、〈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等作，詩作題材是寫景言禪，並非特別寄託政治抱負的內容，笹川又謂蘇軾詩作飄逸豁達處近李白。蘇軾識力卓越，文章精銳，與父子兄弟相並列，以三蘇之名聞於天下。是以文學成就著眼的敘述。

古城則謂蘇軾「宋朝之文章以蘇軾為第一」<sup>118</sup>，對詩作的選錄有〈東坡八首〉其一，認為是「東坡窮苦危拂之際，栽植樹木，猶出怡然獨得之豪語……蓋見東坡之卓犖也。」<sup>119</sup>的窮厄之作，就選擇的詩作進行道德的解讀。古城藉由引述的詩文，行文間著重於蘇軾的節氣，在黨爭嚴重的政治環境中，能讜言直論，襟懷坦蕩，古城選錄蘇軾〈論范增〉、〈倡勇敢〉、〈表中觀碑〉、〈方山子傳〉等文章，作為蘇軾節氣襟懷的代表。同樣是選錄蘇軾作品，笹川重詩，古城重文，古城選錄文章上遠多於笹川，且選錄內容多是具有政治性的策論。古城以政治上的進退與道德操守，作為蘇軾其人的描述重點，與笹川選錄蘇軾詩作多於文章的選錄方式有所差異。

在描述蘇軾所處的政治環境時，笹川論及蘇軾於黨爭中的政治進退，被貶官的仕宦歷程，僅是作為生平概述，平實敘述之，並未如古城以氣節、忠孝大節等道德判斷用於敘述。兩者皆未論及蘇軾的詞作以及風格擴展的成就，亦顯現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作家，對於宋代文學作品的理解，是以文為代表。若檢視笹川臨風與白河鯉洋、大町桂月、田岡嶺雲、藤田劍峰等人所編寫之《支那文學大綱》總序，可見明治時期有部分的文學史作者，對宋代文學代表文體的看法：「唐之詩、宋之文、元以後之小說戲曲。」<sup>120</sup>唐代是詩作發展的最高峰，此是與當今的文學史著作有相同的見地。但對宋詞的成就，明治時期的文學史著作中，並非如

<sup>11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47。

<sup>118</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頁 545。

<sup>119</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頁 548。

<sup>12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大綱》卷 3〈李笠翁〉（東京：大日本圖書，1897 年），頁 2。

同現今以宋詞作為與唐詩並稱的文體，是以文章為代表，認為宋代性理之學的發達，顯像宋人思辨能力的提升，亦因此說理的思維，造成詩作發展的限制。以文章為宋代文學之代表，可見於其他文學史著作中，比如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是以文為宋代文學代表，久保認為：「唐之文學在詩，宋之文學在文。蓋宋人於政治學術上富研究精神，長於思索，短於想像。」<sup>121</sup>以宋代的政治與思想，作為宋人擅長文體別於唐人的原因。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載：「唐之文學特色在於詩歌，宋與之相異，在於經學文章之進步發達」<sup>122</sup>列舉文章作為宋代文學的代表，亦自宋代的思潮為出發，以宋儒對經學的理解，性理之說的盛行，作為文章發達，足以為一世代表的成因。由數種文學史著作所載，可見對宋代的文學作品，明治時期的文學史作者，並不著重於詞的討論，而是以文章為論述重點。

關於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之所以對詞的收錄呈現缺漏，其原因可由神田喜一郎的論述推知：

填詞是特別重視聲調與音律美的文學。而我國文然鑑賞漢本土文學時，專門注意以文字為表現形式的表意，而把另一方面的表音幾乎全忽視了。總之，對我國文人來說，填詞一開始就是難以接近的文學。<sup>123</sup>

由神田喜一郎的論述中，可知「詞」這一文類與其他文類相較，在日本並不受到特別重視，在學習上具有較高的門檻，在鑑賞的趣味上，又不如表意行事的文學受到歡迎。就神田喜一郎的考察，日本最早的詞作是弘仁十四年（823年）嵯峨天皇所作的〈漁歌子〉，其內容是模仿張志和大曆九年（774年）所作的〈漁歌子〉，神田表示填詞傳入日本時代甚早，卻未能引起風氣，甚至在日本歷史上，

<sup>121</sup>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3），頁122。

<sup>122</sup>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東京：富山房，1912），頁232。

<sup>123</sup>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

對於詞這一文體的創作，也是十分寂寥的，其謂：

唯有對這填詞不但不模仿，而且也不太欣賞，一點也不讀。……在我國寫填詞的人除了平安朝的嵯峨天皇和兼明親王以外，從江戶直到近代的明治、大正時代只有寥寥不到一百人，而且也不過是一些寂寞的好事之徒；而且這些人大多數只不過是由於一時的好奇，遊戲般地嘗試一下。<sup>124</sup>

無論是與唐代時間相應的平安時期，或是在此之後的任一朝代，對詞作的理解顯得缺乏，在創作與鑑賞風氣上亦如此。日本的五山文學受到宋代影響甚鉅，宋代是中國詞風最盛的時代，此種風氣卻未能影響至日本。神田喜一郎引述前人說法，認為由僧侶主掌的五山文學，對「狂言綺語」般的詞作加以禁止，是能讓人首肯的說法。<sup>125</sup>而明治以後，縱使有森槐南（1863-1911）、高野竹隱（1862-1923）兩位填詞的大家，但是在明治三十年以後森槐南絕填詞之筆，高野竹隱也無大作，詞壇遂走向衰微<sup>126</sup>。

明治日本填詞風氣衰退，除了大家相繼詞作日趨稀少之外，亦有一直接原因。神田喜一郎謂：「日清（中）戰爭的結果，使我國人一般對中國文化與其說開始輕視，不如說誘發起輕視的風潮，自然漢學和漢詩文受到了極大的打擊。」<sup>127</sup>即世界局勢的改變。日本於明治維新後軍事上經濟上的強勢，成為中國蔑視的發端，連帶影響漢學的衰退。在此背景之下，詞作的衰退成為不可避免之事。而明治時期成書的《支那文學史》，在日本向來不重視詞作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政治情勢等雙重原因之下，文學史著作中不納入詞作，也成為反映時代的現象。

<sup>124</sup>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3。

<sup>125</sup>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13。

<sup>126</sup>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650。

<sup>127</sup>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650。

### 三、金元：時代創制戲曲小說

笹川臨風論元代文學，同於其他章節的書寫模式，以詩作起始，然僅是以元遺山作為代表，論述其詩文，並略舉其他元代的作家。笹川《支那文學史》與古城《支那文學史》皆金朝元朝合併而論，但古城是以兩朝代分述，笹川則是將重心置於元代，以 7-2 一節專門論述中國戲曲小說，以元代為其興盛時期，有如此論述：

元詩有纖弱之誚，元代最可誇者，為戲曲小說之盛行也。具實際傾向之支那人種，戲曲小說之發達，實於此時代之屬，豈非於支那文學須特筆大書之事耶。<sup>128</sup>

由此段論述，可知笹川對各朝代之文學，仍是以詩作為出發，如同論述宋代時，是先論詩，再論笹川認為是宋代代表文體的文章。但就元代的詩作，笹川並未有太高的評價，論元代詩風纖弱，並以戲曲小說作為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學作品。

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最特出的在於戲曲小說「特筆大書」，笹川文學史中屢見的南北人種說，無非是為了解答戲曲小說不受中國士大夫重視的理由。具有幻想性質的戲曲小說，在性格實際的北方人種占有政治上優勢的中國歷史中，顯得珍貴。笹川對如此特殊的戲曲小說，是十分喜愛，甚至在 7-2 小說戲曲的發展一節，第一次出現近似於說話者的口語，產生於與讀者的提問互動，笹川謂：

觀先秦至宋代文學之歷史，讀者或起異樣之情，謂余竟未以一章言戲曲小說。若展歐洲之文學史，見我國之文學史，與支那之文學史對觀之，則何故支那文學此等產物何等寂寥。<sup>129</sup>

<sup>12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53。

<sup>129</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59。

上段敘述中，可見笹川對宋代以前中國戲曲小說不興盛的現象提出疑問，並可知笹川之所以重視戲曲小說，是在閱讀歐洲與日本的文學史著作後，對其中收錄的戲曲小說文體，不見於中國一事有所疑惑。笹川的疑惑，在其《支那文學史》是以南北人種說作為解答，笹川一再於各朝代的文學作品中，試圖以南北人種區分，無非是就戲曲小說於中國不受重視，記載甚少，以至於材料蒐集困難的現象，進行解讀。

在笹川的觀察中，北方人種的政治優勢，儒教的盛行，使得戲曲小說不被重視，其原因在於戲曲小說被視為「末技」在中國傳統概念裏，文章是經國之盛事，小說因其內容，自成為被排斥的對象，笹川謂：

北方思想純然乎儒教之勢力，故小說戲曲為世所輕侮，其作者亦自謂小說為末技小道。儒者之眼以文章為經國之偉事，故小說戲曲有如塵芥，為敗壞風俗之害物也。<sup>130</sup>

上述可知，在儒家的道德基準之下，戲曲小說因為內容上的性質，不受重視，戲曲小說的作者亦有此自覺。笹川將戲曲小說置於文學史詳述，亦為與中國傳統相異，或說在習取歐洲、日本的文學史著作後，審視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察覺戲曲小說的敘述後，才有此創見。

笹川《支那文學史》的特點是淡化儒家的道德觀，以文辭審視中國文學作品，將作家的性格與作品相連結，不以道德或事功對文學家評斷。在此書寫角度之下，故能客觀地審視戲曲小說，細述其源流與發展。

古城貞吉論金元的文學時，則與笹川臨風的著作有所區別。古城以詩作為著眼點，承襲先前的書寫體例，金元兩代皆論詩歌的成就：「兩朝之聲詩，亦非無

---

<sup>130</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59。

其特色，試觀之金詩則以悲壯勝，元詩則失於纖弱。」<sup>131</sup>，在論及元詩時，是與笹川見解相同，認為元代的詩作較為纖弱。在代表作家的選擇上，亦擇元遺山，其餘作家僅是選錄作品，對詩人生平僅略有論述，且未對單一詩作品評。古城以儒家的道德評斷，論述中國文學家，在金元兩代的敘述中，亦是如此：「金朝之文者，如宇文虛中馬定國諸人，其臣節大有所缺。」<sup>132</sup>是以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判斷審視文學家。

對於元代所盛行的戲曲小說，古城是與笹川的見解略有差異，古城注意到元代戲曲小說的興盛，並視之為創制，然並未耗費太多篇幅描寫，僅是概論性質，對於小說的書寫背景，亦賦予道德的判斷，古城謂：

又於元代，尤不可不記臆者，即詞曲小說之發達也。彼如有名之西廂記，則實係此時代之創製者。其他詞曲小說之絕佳者甚多，金不一一及之。意風流才人，不得志於當世者，一轉而馳情於絲竹之場，寄意於聲伎之巷。

133

上述可知，古城以戲曲小說為一時代之創製，對其書寫成因，認為是不得志才人的馳情寄意之筆。但在此段論述之外，古城並沒有花費篇幅論述此「時代之創製」，其他絕佳之詞曲小說，亦略去不談，僅錄詩文作為金元文學之代表。其成因或可以此為不得志才人馳情之作，終非儒家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實用性文學，故以古城的舊儒氣性，僅對戲曲小略略論述。元代的戲曲小說雖然極其興盛，但依照古城的書寫模式，不特意論及戲曲小說，是最能反映文學史體例與古城性格的編排。

兩部《支那文學史》在金元時代的文學作品上，對詩文的取捨共同拈出元遺山作為重要作家，但在書寫的角度上，仍是有所分歧。笹川重視文學家的詩文成

<sup>131</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630。

<sup>13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632。

<sup>13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631。

就，文辭的優美與否，古城重視文學家的道德與詩文中所寄寓的抱負。對戲曲小說的論述，則呈現簡與繁的極端對照，笹川由戲曲小說的源流起始，以至重要作品《西廂記》、《琵琶記》、《水滸傳》的介紹與內文節錄。古城僅在一段論述中，提及戲曲小說這一文體，並未多作著墨，呈現兩部《支那文學史》作者的性格特質以及研究重心的差異性。

#### 四、明代：詩人代表高青邱，江戶詩學的延續

在明代的論述中，兩部《支那文學史》皆論及高青邱，做為明代詩人之代表。高青邱即高啟，字季迪，號青邱，長洲人。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時人比做初唐四傑。洪武初，召修《元史》，後因詩作有所諷刺，遭洪武帝腰斬於市<sup>134</sup>。兩部《支那文學史》皆論及高青邱，不稱高啟，而稱其號高青邱。雖選取同樣的詩人，但因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因作者性格不同，顯現對作家與文體的不同偏重，在論及高青邱時，亦有差異。笹川臨風是於 8-1 闢一節論高青邱，選取高青邱，或與笹川先前參與《支那文學大綱》的編寫有所關聯。明治三十二年（1899）《支那文學大綱》以高青邱為主軸的第十卷發行，負責此卷的田岡嶺雲，對於高青邱有極高的評價：

明至中葉人才蔚然而起，終成復古氣韻，皆一時之雄也。唯求其詩才，皆未能與國初高青邱並駕。……其人天才流露於詩，其所作咳唾悉為珠，真明代之冠冕。吾人今日所欲傳者，即此不幸之詩人高青邱。<sup>135</sup>

由是可知，笹川所處的明治知識分子群體中，是對高青邱的文學成就有所體認，對於當時的文學，支那文學大綱的編纂者皆知明代擬古風氣興盛，前後七子繼起，

<sup>134</sup>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台北：華正書局，2011年），頁995。

<sup>135</sup>田岡嶺雲：《支那文學大綱》卷十〈高青邱〉（東京：大日本圖書，1899年），頁2。

是文運之昌隆，但卻擷取明初的詩人高青邱，視為為天才詩人，明代之冠冕，於《支那文學大綱》單獨成冊，作為「吾人今日所欲傳者」，是具有共識的選取，將高青邱做為明代詩人的代表。另一方面，對高青邱的重視，亦與笹川臨風的江戶文人性格有所關聯。在田岡嶺雲的描述中，笹川的性格為：「純然乎江戶之子，意氣洋洋，其情醇粹…瀟灑一箇風流才子，閑雅整飭，兼之多能。」<sup>136</sup>是具有江戶文人習氣的才子。高青邱的詩文，在江戶時期受到日本人的喜愛，至明治時期，仍有《高青邱詩鈔》<sup>137</sup>、《高青邱詩醇》<sup>138</sup>的出版，而曾寫《支那文學史》的明治知識分子久保天隨，亦對高青邱詩集全集，進行日本語的譯註。故笹川臨風在文學史明代的部分，選取高青邱以一節的篇幅單獨論述，是反映江戶到明治的時代裡，對漢詩的喜好傾向。

笹川臨風對高青邱有極高的評價：「有明一代最為卓越者，高青邱也。」<sup>139</sup>，是同於《支那文學大綱》的論調，以高青邱為明代詩人成就最高者。在文學史的篇章架構中，亦可見對高青邱的推崇，8-1 單論高青邱，8-2 則於一節中論李王七子、李何七子，以高青邱一人，與前後七子同樣作為單節的內容，在論述的比重上，是具有極大的落差。高青邱之所以為笹川所喜愛，是出於詩作情感真摯，文辭雄健：

青邱嗜詩，為情感之人，受南方之血脈，故其詩感情勃發。其詩才得自天賦，矯逸而才氣縱橫。穠麗而未有粉澤，清新復高古，可躋入盛唐。…其辭偉麗雄健，絕無纖弱之氣。<sup>140</sup>

笹川對高青邱的重視，是純以詩文成就為出發，反映笹川自身喜好的詩風，並且

<sup>136</sup> 笹川臨風、白河鯉洋編：《嶺雲文集》（東京：玄黃社，1913年），頁352。

<sup>137</sup> 山本重助編：《高青邱詩鈔》（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1879年）。

<sup>138</sup> 齊藤拙堂編：《高青邱詩醇》（東京：桂雲堂，1883年）。

<sup>139</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276。

<sup>140</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277。

以南北人種說審視高青邱的性情，認為高青邱有南方人種重視情感的特質。或可謂笹川對文辭的喜好與文學作品中情感的流露，是其評選詩文作品的標準。《支那文學大綱》所言「其人天才流露於詩。」<sup>141</sup>、「不幸之詩人高青邱。」<sup>142</sup>是對詩人的橫死寄予同情，以其詩才作為選錄的依據。此選取標準，亦見於笹川《支那文學史》，笹川與其交友圈中，曾接受西式大學教育之知識分子，對於高青邱的稱許是具有相近的標準，與古城道德事功為優先的文學觀有極大差異。

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選錄高青邱，然受限其以文類分節的書寫模式，於論述明初詩家時有所論及，謂：「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sup>143</sup>高青邱與劉基、袁凱等明初人並列，並未多做論述。末段方引述前人評語，言高青邱之詩才「諸評無不稱其天分甚高。」<sup>144</sup>認為高青邱為天分極高的詩人，以別於笹川以南北人種說的寫法，闡述高青邱的詩作風格特色。對於文學家的評價，古城常以道德作為基準，同樣選取高青邱，古城在述及青邱之死時，別於笹川僅客觀陳述詩人之橫死，是藉由高青邱之死批判明太祖時政治，古城謂：

嗚呼甚哉！明祖之暴也。私行亂而詩人諷刺之作興，古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於是良風美俗亦因而成。今也不然，刑言者而徇一己之慾，朱明之社稷，得血食於二百七十餘年者，可謂僥倖極矣。<sup>145</sup>

上段敘述中，古城由高青邱的死亡，延伸至政治的治亂。古城憧憬古時聖王賢君的察納雅言，評論明太祖的施政暴行，對國君政治施行賦予史家式的道德判斷，並將對文學家的選錄原因，由詩文的成就，擴展至道德的層面。古城以高青邱的

<sup>141</sup>田岡嶺雲：《支那文學大綱》卷十〈高青邱〉（東京：大日本圖書，1899年），頁2。

<sup>142</sup>田岡嶺雲：《支那文學大綱》卷十〈高青邱〉（東京：大日本圖書，1899年），頁2。

<sup>14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683。

<sup>14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687。

<sup>145</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686。

敢於諷刺時事，作為詩作之外的選錄原因。

古城論及明代時，是以詩文為綱領，以文類分列文學家。兩部文學史的差異，在文體的分類上顯現。古城以詩文為文學史的兩項綱領，在論及明代的文章時，論及八股文，將之與李王的古文辭並列，闢一章節單論八股文。因八股文是科舉取士的途徑，是與古城所關注的學制有所關聯之議題。以儒學為依歸，考察中國文學史治亂與文學的關係，禮制與學制，無非是古城欲對明治時事提出治理方法的研究。古城對八股的關注，是出於其研究重心，以儒學為主軸的舊儒氣性，而別於笹川江戶文人式，以情感與文辭為重心的研究傾向。

古城認為：「科舉以經義取士，真正之儒學，則反不能興，其治舉子業者，惟據前人之遺篇。」<sup>146</sup>是反映其考察明代文學，對八股文是否有利於人才的選取，並且是否能成為儒學流傳助力的評斷。在文學作品中無論詩文，在古城的選取標準下，終究是以是否為治世的實有學問為價值所在。

由是觀之，笹川與古城在明代的文學的作家作品選錄上，雖選擇的作家有重疊之處，但對於作家之形象塑造，以及文學成就，是以不同的面向為切入點。笹川是以情感與文辭進行評斷，遠離政治，純以詩文價值作為選擇的依據，並且以南北人種說，就詩作中顯現的風格進行解讀。古城則以社會性的標準，作為選取的基準，外部社會的治亂，詩人的事功與道德成為古城著眼之處，在書寫時也就此基準，對詩人與政治狀況進行評斷，古城對詩作的文辭與情感，並未有太多的著墨，與笹川著重個人內在的文學觀相較，古城的文學觀，流露的是儒家經世致用的取舍標準與強烈的道德判斷。因此各朝的儒學成為古城的關注重點，對文章的選錄都顯現古城《支那文學史》，具有舊儒的色彩。

---

<sup>14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660。

## 第四節 近世時期（1644-1814）

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於明治三十年代書寫《支那文學史》，對應中國相當於晚清，對兩位文學史作者而言，清代所代表的是中國的近世，但是兩部文學史所論及的清代文學，卻仍停留於盛清。笹川臨風、古城貞吉所選錄的詩人，為活動於乾嘉盛世的查慎行（1650-1727）、趙執信（1662-1744）、袁枚（1716-1798）、趙翼（1727-1814）、張問陶（1764-1814）等人，與《支那文學史》成書的 1890 年代末期有所差距，故以收錄詩人中，卒年最末的張問陶、趙翼之 1814 年（嘉慶十四年）作為約略的時代下限。對於清代所流行的文體，兩部文學史亦因為作者的研究喜好相異，而呈現分歧。笹川延續論述元代以來，對戲曲小說的傾重，古城則仍是以文體做為劃分章節的依據，再於其中論述代表性的作者。今制表如下以對照兩部文學史論述清代文學的章節差異。

表 5-5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近世時期篇章對照表

	笹川臨風	古城貞吉
清朝	第七期 清朝文學 總說 一、詩人與文章家 二、小說與戲曲及批評	第九編 清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清朝的古文家 第三章 清朝的詩家

### 一、清代：詩名或醜名，錢謙益評價之異論

明治時期（1868-1912）是對應中國的晚清，亦為《支那文學史》作者笹川臨風（1870-1949）、古城貞吉（18766-1949）所處的時代，在論及清代的文學時，兩部文學史是以截然不同的選取，呈現作者所關注的文學現象。對笹川與古城而言，清代是「現代」在關注清代的文學時，不免於現實的國勢有所連結，是在整部文學史著作中，與前代最大的差異。

笹川對清代的文學，首先著眼於乾嘉考據之學，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四庫全書總目》、《大清一統志》等官修類書的編纂，以及碩學名家的活躍，為考證學風的興盛奠定基礎，清代學風可以考證學為代表，笹川謂：「若夫有清一代之學風以考證學派為代表，則閻若璩這般學者，為時代精神之表徵。」<sup>147</sup>笹川是以閻若璩作為清代學風的代表，認為考證學的興盛，是使得性理之學較不發達的原因。

笹川雖以考證學為清代學風之趨勢，然其清代一章最費筆墨處，仍是詩文小說。笹川選錄了侯方域（1618-1654）、魏禧（1624-1681）、汪琬（1624-1691）、廖柴舟（1644-1705）、錢牧齋（1582-1664）、吳梅村（1609-1671）、施愚山（1618-1683）、宋荔裳（1614-1674）、王漁洋（1634-1711）、朱竹垞（1629-1709）等人，在論述中常稱詩人之字號，而不以名稱呼。其收錄的詩人是活躍於明末至盛清，與笹川所生活的晚清具有時間上的落差，或為中日兩國詩文流傳的時間差。所收錄的詩人，身分上或為明遺民，或仕清，笹川並未以道德層面著墨，是概述詩人生平與詩風，再引錄詩文。就明清之際的詩人與其作品，笹川謂：

明季多不遇之士。此等士人未售節於愛新覺羅氏之庭，多熒熒自守。…此當世不遇之才子，隱身於文，立一種嶄新之格調，其牢騷鬱勃之氣，顯於文章。<sup>148</sup>

此段以明遺民「未售節」於清廷，是笹川《支那文學史》中，少數具有道德意謂的用詞，但笹川並未繼續論此，而是以文章風格為關注之處。並對清初文章家的活躍，與元初不得志士人，多以劇作家身分活躍，於文體上有所差異的現象表示趣味。

對戲曲的關注，使笹川得在清代的文學作品中，闢一節論戲曲小說，亦是延

<sup>14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276。

<sup>148</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301。

續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中的論述範圍，選取李笠翁、《桃花扇》、金聖嘆，並較戲曲小史增加一部《紅樓夢》，以「小說戲曲為清朝之出色作品。」<sup>149</sup>而詳加論述。對於中國未重視戲曲小說的狀況，亦言：「支那向來蔑視小說，故作者多匿其名，以致傑作名篇之作者茫茫乎為世所知者甚少。」<sup>150</sup>笹川將戲曲小說之作者單一論述，將之置於文學史中，是對中國傳統上以儒家經世的文學觀為主體的反動，亦為笹川了解中國文學流變後的大膽之舉。以不受重視的文體列入文學史，並將詳論劇作家之生平，是顯現笹川與傳統不同之處。將文學家以別於中國的價值觀評斷，亦顯現於明清易鼎之際的文學家論述中，比如錢謙益即是一例，若對觀笹川與古城對錢謙益的論述，可知其特殊性，在理解儒家道德評斷的傳統後，笹川能以文學的角度檢視其人。

論及錢謙益時，笹川謂：「牧齋才思之雄，當世未有能及者。然其所著詩集箋著，於康熙時盡為焚毀，以其為名教之罪人故也。」<sup>151</sup>是著重於錢牧齋的詩歌成就而非政治上的進退，認為錢牧齋是「詩人而論，為清代有數之大家。」<sup>152</sup>以詩人而論，錢牧齋是清代重要的文學家。笹川《支那文學史》對錢牧齋其人之成就，乃以文學為出發，並非以儒學、名教的觀點論述，此種評價的基準也貫串整部《支那文學史》。

檢視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在清代的文學家與其作品的論述中，即顯現與笹川臨風相異的視角。同就清朝學風而論，笹川純是以清廷的類書編纂，與民間考證學家的活躍，進行考證學興盛的原因探究，古城則就學風具有道德與政治亂上的引申。比如論清代的學風時，溯清代起源，古城屢以蠻族稱之，如：「清朝之起源頗遠，為北方蠻族之一部。」<sup>153</sup>、「清朝之起源，雖如此其遠，而北方蠻族，其文學固未發萌芽。」<sup>154</sup>古城屢言「蠻族」，是具有中國之外皆為蠻夷戎狄的

<sup>149</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310

<sup>150</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310

<sup>151</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頁301。

<sup>152</sup>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頁301。

<sup>153</sup> 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709。

<sup>154</sup> 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710。

儒家式華夷觀。古城以此視入主中原的滿人，或可溯及明亡之後，東亞一代朝鮮、日本等本朝貢中國的國家，產生「華夷變態」觀點轉換，受儒學影響甚鉅的古城，以此論清代的統治階層，是儒家式論述觀點。

論及古城的儒學背景，則未能忽略儒學於江戶、明治的門派與流傳。江戶時期的儒學，在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的推獎之下，朱子學受到推獎而興盛，但隨著朱子學的興盛，批判其說的貝原益軒（1630-1714）、新井白石（1657-1725）相繼而起，後有荻生徂徠（1666-1728）、伊藤仁齋（1627-1705）等人，以古學派的立場，批判朱子學說，使得受到幕府推獎的朱子學，漸失權威地位<sup>155</sup>。時序推移至幕末天保（1830-1844）年間，陽明學、水戶學日漸興盛。陽明學之所以興盛，是與時代風氣有所關聯，正因為幕末政治狀況的紛亂，導致陽明學學風的活絡，此學說對於明治維新的影響，更是受到研究者的肯定，如同王建所：「陽明學倡導人的主體精神和勇於改革的實踐勇氣，從而為即將到來的明治維新運動注入新的精神動力。」<sup>156</sup>不僅後世的研究者就思想與歷史的角度得出此結論，章太炎早已有「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sup>157</sup>的體認。大抵而論，此種知行合一的精神，成為維新的原動力是獲得共識的。幕末的陽明學之興盛，其影響範圍是涵蓋民間與官方。縱使是幕府直轄的教育機關昌平黌，其儒官如佐藤一齋（1772-1859），也是以朱子學為表，實則以陽明學為內裡<sup>158</sup>，而被稱為陽朱陰王<sup>159</sup>。更遑論此時水戶學得勢，其忠孝一本、尊王攘夷的主張，更成為明治維新的原動力<sup>160</sup>。

古城貞吉生於幕末的肥後藩（今熊本縣），肥後的藩校時習館由藩主細川重賢（1721-1785）於寶曆三年（1755）設立。其以朱子學者秋山玉山（1702-1764）

<sup>155</sup>阿部吉雄、相良亨、宇野精一著，許正雄譯註：《日本儒學史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30。

<sup>156</sup>王建：《神體儒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193。

<sup>157</sup>轉引自王建：《神體儒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193。

<sup>158</sup>阿部吉雄、相良亨、宇野精一著，許正雄譯註：《日本儒學史概論》，頁30。

<sup>159</sup>三宅正彥著，陳化北譯：《日本儒學思想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數176。

<sup>160</sup>阿部吉雄、相良亨、宇野精一著，許正雄譯註：《日本儒學史概論》，頁32。

為初代教授。時習館學風興盛，培養出許多著名的漢學者，古城貞吉之漢學啟蒙師竹添井井也曾受業於此，但時習館於明治三年（1870年）廢校。檢視古城貞吉（1866-1949）的生卒年，可知其教育並非來自於藩校，古城就讀的同心學舍，是以「皇室中心、國家主義」為建學精神<sup>161</sup>，仍可顯現對國事的關心，而此種以皇室為中心的尊王思想，則不脫幕末時風的影響。若以熊本藩的學風來看，是趨向朱子學，但必須注意的是，日本的朱子學並不同於中國的朱子學，在山崎闇齋（1619-1682）之後，是具有修養主義、行動主義特色的日本式朱子學，就阿部吉雄的說法，是：

朱子學到了山崎闇齋的時候，已經發展到擁有獨自特色的日本式朱子學。他同時也是將神儒合一說加以提倡而變成垂加神道的祖師爺。這個垂加神道從最初倡導尊皇論的先驅者淺見綱齋等人開始，到了以編纂《大日本史》為核心的代表人物水戶光國等人陸續的出現，使它變成尊皇論的啟蒙。

由此而論，幕末時的朱子學與講求知行合一的陽明學，並非具有絕對的衝突性，而是在學說內部的日本化，以及在幕末局勢的外力衝擊下，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古城於熊本藩內的教育背景，也具有尊皇論的特色，再加以對時事的關注，使得古城的《支那文學史》，顯現「士尚全才……其朝夕所聞見而服習者，無一所以為治當時之家國。」<sup>162</sup>的時事關注。此理念也呈現在文學史內文中，注重每一朝代政治與文學間的關係。在文學史中，關於清代的論述，古城與笹川的敘述角度相異也源自於此。古城並非單純描寫現象，即官修《佩文韻府》等書，更是對此做出政治策略上的解讀，古城謂：

<sup>161</sup>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卷71（2003年3月）頁397。

<sup>162</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10。

牢籠諸臣於詩書筆研之間，而不使閒居企圖不善，遂詔令修《明史》，成《佩文韻府》，成《淵鑑類函》，又編寫《康熙字典》，其裨益於文教，亦非淺鮮，清朝考據之學蓋與此等事業相關聯。<sup>163</sup>

敘述中是著重於清太祖為使士人不「企圖不善」而下詔使編纂各式書籍。考據事業的興盛，是在明清之際，政局的緊張之下而成，為使得士人無閒居之暇，而有諸多文教上的措施，政治的因素成為考據之學興盛的背景。

笹川與古城編纂文學史時，所關注的重心有異，因此在文學家的生平敘述與詩作的選取上，多有差異，以清代而論，對錢謙益的評價可見一斑。古城在清朝之詩家裡頭，以錢謙益為首，然對其生平與詩風有此論述：

其詩以少陵為宗，出入於韓白蘇陸元虞諸家，尤見才力之富健。特晚節不終，聲色溺其志，利祿縈其情，而貽身後之醜名。乾隆朝雖詔令燬棄其集，而今其集猶存也。<sup>164</sup>

以詩作的風格與成就而論，古城提出正面評價，錢謙益才力之富健，為「一代之先聲」<sup>165</sup>。但是古城對錢謙益其人，是以儒家忠臣不侍二主的道德判斷審視，以明遺民仕清，評斷為晚節不終。聲色與利祿，大抵是古城對於錢謙益仕清以及迎娶柳如是一事，寄予道德批判，以「貽身後之醜名」終結錢謙益的生平論述。古城的評論與笹川純就詩文上的成就論文學家，產生極大的分歧，是以士君子的道德操守審視文學家。

<sup>163</sup> 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712。

<sup>164</sup> 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743。

<sup>165</sup> 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712。

## 二、停滯於盛清的詩作選評

笹川與古城對清代文學的論述，仍是停留於盛清，對於與文學史成書時代相當的晚清文學家，並未論及。古城言：「本編所敘述者，則清朝，即現代之文學也。」<sup>166</sup>但《支那文學史》成書的「現代」，與古城所言之「現代」，已具有一段距離。古城選錄之文學家，以張問陶、趙執信、陳文述等人置於《支那文學史》最末段，彼為乾嘉時的作家，古城文學史成書的明治三十年（1897），換算為清代年號，已是光緒二十三年，距乾嘉之世遠矣。由是觀之，《支那文學史》中，對應於日本明治時期的對於清末文學作品所知有限。

對於清代的文學與現實中國的關聯，較文學作品而論，對於時事的理解，更勝於文學，笹川就時事有數語評斷：

清朝國初至乾隆嘉慶間，為國運隆盛，文運隆盛之時。後未有英主，外患內闕交至，家國日日事多，保守固陋，未能伴世界文明之趨勢，兼之科舉之弊未終，終至今日之否運。<sup>167</sup>

《支那文學史》收錄的文學作品，大抵是「國運隆盛，文運隆盛」的乾嘉時期，對於現實中國的關注，則是與明治相應的晚清。或可謂《支那文學史》成書之時，兩部文學史作者所理解的中國文學，與現實中國是有所脫節的，在時勢的考察上，能關注與明治相應的晚清，然在文學的考察上，仍是以盛清為範疇，如同漢學者安井小太郎（1858-1938）：「本邦經術盛衰，與漢土同其撤，而每後於彼或百年或二百年。」<sup>168</sup>日本對於中國的學問典籍，是具有時代上的延遲，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在清代文學作品的收錄上，亦有此現象。

事實上，笹川臨風與參與編寫的《支那文學大綱》，其中文學家的收錄時代

<sup>166</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709。

<sup>167</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 年），頁 295。

<sup>168</sup>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頁 108。

下限，是以第十三卷王漁洋（1634-1711）為最末，同於《支那文學史》止於盛清。其他的文學史著作，如明治三十三年（1900）中根淑（1839-1913）《支那文學史要》刊行，對於清代詩人的收錄，是以張問陶（1764-1814）置於最末<sup>169</sup>。明治三十六年（1903）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對於清代的詩人收錄，亦是不言晚清。收錄了乾隆三家袁枚（1716-1797）、趙翼（1727-1714）、蔣士銓（1725-1784），嘉慶以後則收錄王夢樓（1730-1802）、吳穀人（1746-1818）、吳澹川（?-1795?）、張船山、舒鐵雲（1765-1816）、郭頻伽（1767-1831）、吳蘭雪（1766-1834）、蔣敦復（1808-1867）<sup>170</sup>等人，亦顯現時代上的延遲性。直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成書，以〈嘉慶以後之文學〉作為整部文學史的最末節，僅列詩人陳文述（1771-1843）蔣敦復、吳嵩梁（1766-1834）之名，未有論述<sup>171</sup>，此時已是明治最末一年，對於《支那文學史》所收錄的詩人時代下限，猶未能與明治時期（1868-1912）對應。通觀成書於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在收錄的時間範圍上，皆未能擴及與明治對應的晚清，此種對於清代文學所收錄時代下限的現象，中根淑所言或可究原因之一斑：

康熙帝時，猶太平極盛。且帝英邁，好於文學，諸名家並出，帝命群臣著書甚多……嘉慶中葉以降，學問詩文未有能接踵前人者，是氣韻使然乎？或有其他原因，待來者究之，我知之甚尠，弗能論也。<sup>172</sup>

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著作，若為通史性質論至清代者，多止於乾嘉盛世，其原因或如中根淑所言「知之甚尠」是資料收羅困難之故。中根淑認為盛清時皇帝獎

<sup>169</sup>中根淑：《支那文學史要》（東京：金港堂，1900年），頁166。

<sup>170</sup>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年），頁411。

<sup>171</sup>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東京：富山房，1912），頁380。

<sup>172</sup>中根淑：《支那文學史要》，頁168。「康熙帝ノ時ハ、尤モ太平チ極ノ、且帝英邁ニシテ文學好ミシカバ、諸名家並ビ出デタリ、帝又群臣ニ命ジテ作ラシメタル有用ノ書多シ……嘉慶ノ中頃ヨリ以後ハ、學問詩文トモ、曾テ前人ニ踵チ接スルニノ者アルチ見ズ、是氣運ノ然ラシムル所カ、將タ別ニ因シテ來アル所ノ者アルカ余未タ之チ詳ニスル能ハザルナリ」

勵文學，編《康熙字典》、《佩文韻府》<sup>173</sup>等書，皆有助於文運，其所論及之字書，皆與古城、笹川相同。清代嘉慶中期之後的學問詩文，水平未如盛清時，中根淑僅作出推想，並不知詳細原因，並寫明知之甚少，未能詳論。由是觀之，對於嘉慶以後的文學作品，似是有資料蒐集的困難，使得文學史的作者，未能親見不敢詳加論述。

詩作之外，盛清以後的其他文類亦是略知一二，未加詳論。笹川臨風論及《紅樓夢》、李笠翁、《桃花扇》、金聖嘆，最為清代小說戲曲之代表，在收錄範圍上已多過古城初版中未論及戲曲小說的清代。但即使對照其他作者之《支那文學史》，亦可見對清代文學作品理解有限的現象。中根淑、久保天隨的文學史著作中，論及清代其他文類，如戲曲、小說、雜文等，列舉李笠翁、小說十二樓、芥子園圖書<sup>174</sup>時代皆為盛清。總體而言，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在《支那文學史》中，對清代詩作收錄停滯於盛清的現象，是明治時期所著《支那文學史》著作中的共性，皆認為對於清代文學的發展，是以康熙乾隆時為最盛。笹川所謂：「康熙、乾隆時是為支那文學上印下一大功績之時。文質彬彬，經術詩文皆盛。上有英主聖祖、高宗，下有碩學名家輩出，洵美乎！」<sup>175</sup>是對盛清文學的肯定，亦有可能是出於對盛清文學的極高評價，而未選錄晚清的文學作品。再加上晚清國勢日漸頹唐，明治二十七年（1894）甲午戰爭敗給日本，使得日本國內的中國蔑視之情，更趨於嚴重。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或有可能出於對漢籍中國與現實中國的落差理解，以及清朝國勢的衰弱，因而不收錄對應明治時期的晚清詩文作品。。

### 三、小結

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兩部著作，作為成書時間相近的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在內容上因作者的性情與研究重心的差異，呈現

<sup>173</sup>中根淑：《支那文學史要》，頁 168。

<sup>174</sup>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頁 417

<sup>175</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91。

極大的不同。笹川臨風出於性情上的江戶文人特質，醉心於戲曲小說的研究，在研讀歐洲與日本的文學史之後，對中國向來輕視戲曲小說一事感到奇怪，在編纂《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大綱》時，屢屢關注戲曲小說與劇作家，終於文學史中，納入「支那文學之特色所在」<sup>176</sup>的戲曲小說。對中國歷朝的文學家純然以作品的優劣檢視，並未以道德、事功作為文學家生平的敘事重點。與之相較古城貞吉的文學史，則呈現儒家色彩，依古城的舊儒特質，是以道德事功作為文學家生平的敘述重點，使其文學使具有道德批判的意味，對於中國歷代學制的關注，亦寄託其對明治日本時事的期望。試見明治時期的《教學大旨》批判習取西洋之學風，無非是出於西洋技藝、東洋道德的論點，提倡傳統德目，作為漢學復興的成因：

教學之要，在明仁義忠孝，究智識才藝，以盡人道。…因維新之始，首以破陋習、廣知識之卓見，一時雖取西洋之所長，奏日新之效，其流弊在於後仁義忠孝，唯洋風是競。將來之所恐，終至於不知君臣父子之大意，也未可知。<sup>177</sup>

由上述可知，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之所以探求中國歷朝的學制，亦如同《教學大旨》中所傳達的意圖，以學習忠孝仁義，作為教育的要務。道德與教育，成為古城文學史中的著眼點，體現於文學家的生平以及關於儒學、學制的描述。古城貞吉教育背景純然以漢學為主體，未如笹川臨風曾就讀於教育改革後的新制大學，未有與新式學者一同編纂文學史的經歷，使其文學史呈現較為封閉。

但無論是新式文人或是舊儒，活躍於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終究在國際情勢改變的狀況下，以別於明治以前漢學家的思維，審視中國文學。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井上哲次郎或是田口卯吉的序言，皆提及漢文與日本的關聯性：「我

<sup>176</sup>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頁 259。

<sup>177</sup>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182。

邦之重要古書多以漢文編寫……不進行支那文學研究，則如何討尋我邦古來之典故。」<sup>178</sup>、「本邦文學半屬漢文，而漢文之淵源支那，俟不待言。」<sup>179</sup>日本的歷史常以漢文記載，文學作品亦然，漢文與日本具有難以分割的性質。就此而論，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卻是出於對日本的關心，自覺的意識增強後，以漢文作為理解本國文學與歷史的途徑，進一步關注中國的古典文學，支那文學史的編纂風潮，亦是出於此成因。笹川臨風參與編寫的《支那文學大綱》序言：「研究支那文學，非徒戀舊物也。是欲參可謂第二國文學之支那文學之精隨，以資古文學研究者參考，貢獻於將來日本論文學之進退。」<sup>180</sup>顯現當時的文學史作者，以中國文學為研究範疇，實是以貢獻於日本論文學為目的。

關注日本因而溯及中國，後世的研究者亦注意此現象，比如溝口雄三有言：「日本對中國的古代、近世之關心，並非源自對中國的關心，而是基於日本境內的理由或情懷而誕生、又基於日本境內的理由或情懷而消除的。」<sup>181</sup>若以此說審視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編纂，亦可得印證。明治知識分子出於對現世日本的關注，而溯及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若以笹川臨風、古城貞吉各自成書的《支那文學史》亦是如此，無論是自歐洲、日本論文學史中對戲劇小說的論述，以及明治時期的政治情況，皆為文學史作者觀察中國文學流變時的對觀立場，作者是以日本為主體的思維，審視中國這一他者。

---

<sup>178</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頁4。

<sup>179</sup>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頁3。

<sup>180</sup>笹川臨風等：《支那文學大綱》卷一（東京：大日本圖書，1897），頁5。「茲に支那文學の研究を力むるものは、徒に舊物に戀々たるに非ず、我國文學と共に、第二の國文學とも云ふべき支那文學の精隨に參し……支那文學を攻めむとする初學の士に資し、我古文學を研究する者の參考に供し、併せて將來の日本論文學の趨舎に就て貢獻する所あらむと欲すれば也。」

<sup>181</sup>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頁102。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檢討

在日本明治時期（1868-1912）的《支那文學史》書寫風氣興盛，在此四十四年間，計有二十種相關著作刊行<sup>1</sup>。為何當時的日本學者，以「異國」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因而產生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風氣，是本論文研究旨趣的形成。在理解文學史的書寫背景時，明治日本的社會與風氣，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故本論文就明治時期的學問風氣進行探討，以釐清為何於文明開化的西化時風中，被視為陳腐之學的漢學何以在日人筆下復興，使得中國文學的研究，重新進入明治知識分子的視域之中。

大抵而論，在東洋道德、西洋技藝的意識之下，明治日本對於西洋的效法，是著重於制度與器物的層面，藉由引進西洋文明，殖產興業，使得國家富強，終於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實際的戰役中取勝。但是在幕末至明治的過渡時期中，社會動亂仍頻，使得明治政府的鞏固存在隱憂，廢藩置縣、稚錄處分等一連串的措施，是破除階級，使國家體制轉為中央集權的必要手段。在此背景下，失去俸祿的舊武士階層產生不滿，造成一連串針對明治政府的土族反亂，武裝暴動頻傳，明治十年（1877）更爆發最大規模之內戰西南戰爭。西南戰爭之後，土族改以非武裝的方式與政府敵對，興起自由民權運動。

由明治時期的社會狀況而論，文明開化之後，社會問題仍頻，破除階級制度之後，以薩摩、長州出身人士為主的新興官僚進入政壇，形成新的階級，此乃時人有所不滿的原因。自此之後，時人逐漸產生文明開化的反思，在全盤西化的政

---

<sup>1</sup>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期，2013年4月，頁23。

策之下，全面政策上推的西洋文明，著重於器物，於思想上較為貧瘠，故傳統漢學與倫理道德相關連的內容，為漢學者所大力提倡。出於政府對於天皇制的維繫、對自由民權運動的抑制，具有倫理與階級的漢學，也因具備政治上的功能而受到政府的矚目，藉由教育相關法規的制定，《改正教育令》、《教育敕語》的頒行，將忠君愛國的倫理觀置於法規之中，是為漢學復興的助力。

本論文由官民兩面探討漢學復興一事。政府對法律的制定，在學制中，將漢文納入必修科目，以及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設立等，均可視為官方對於漢學的推行的具體模式。另一方面，民間則有斯文會的活躍，由民間學者發起，進行漢學相關著作的刊行，並藉由演講推行漢學。而斯文會獲得政府提供的場地及金援，亦可作為明治政府對於民間漢學研究相關風氣推行的鼓勵，提供中國古典文獻為研究主題的風潮極佳的發展環境，此乃官方、民間兩方的提倡，遂使漢學得以復興。其中更有一事是漢學復興發生的的要素。值得一提的是，明治時期距離江戶時期未遠，當時知識分子猶以漢學作為教育基礎，漢籍掌握具有相當的程度，故在研究上具有先天優勢。漢文作為日本自古書寫的載體，在以漢學為學問概稱的江戶時期，達到空前的繁盛，而明治時期承襲江戶漢學的餘緒，為研究的背景奠定基礎，漢學塾、漢詩文團體的繁盛亦在明治時期達到巔峰，二松學舍、雙桂精舍、綏猷堂、下谷吟社、茉莉吟社皆為此時期代表。此現象形成主因在於，明治以後失去俸祿的武士階層，開帳授徒，造就漢學延續的基礎。故可作此結論：明治去江戶未遠，漢學素養猶存，與此時期著眼於中國古典文學，形成支那文學史風潮的書寫背景有極大關聯。

在眾多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中，本論文選取古城貞吉與笹川臨風兩人之《支那文學史》進行探討，擷取文學史作者中的兩種類型，以憂時的儒者古城貞吉與優遊文人笹川臨風為切入點，觀察其性格於文學史之中的體現，以及其文學史中所反映的時代問題。笹川臨風與大町桂月、白河鯉洋、藤田豐八等人，合寫《支那文學大綱》，反映明治時期知識分子，書寫《支那文學史》的風氣，藉由交遊

對話而互相影響，笹川在書中亦推薦他人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的現象，從中反映文學史體例承襲、收錄內容相關的背後成因。

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提倡小說戲曲的價值，將之納入文學史中，意味著文學定義的擴展，將中國歷來不重視的小說、戲曲等文體，作為中國文學之精華所在，藉由《小說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大綱》等著作的編寫，最終體現於《支那文學史》中。笹川對於戲曲小說的喜愛，可追自其性格中雅好戲曲的江戶文人趣味，他在檢視中國文學時，發覺戲曲小說長年不受重視，以致於資料難以獲取，故試圖以南北人種說解讀此種現象；認為中國北方人種主導政治權力，多數著重經世致用的學問，致使得戲曲小說難入文學殿堂。大抵而論，笹川是出於興趣而關注戲曲小說，在《支那文學史》成書之前，他持續發表關於戲曲小說的著作，最終《支那文學史》成書，為集其大成之作。此後將戲曲小說視為「文學」，逐漸為日本學者所認知，在諸多《支那文學史》中，戲曲小說入列遂為常例。再者，此現象亦受中國人注目，在林傳甲書寫《中國文學史》時，即對笹川於文學史中收錄戲曲小說一事有所批評。笹川臨風對於戲曲小說的研究，早於中國王國維，這也使得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序言中「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sup>2</sup>」之說有再檢討之必要。笹川臨風以優游文人之姿，關注於興趣所在的戲曲小說，將之由一般文人士子所不恥的文類，納入文學的一環，不僅是對於戲曲小說地位的提升，也是研究風氣的開創，有極大貢獻。其後的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作者，將戲曲小說納入文學史中，使得戲曲小說為文學一事不受質疑，日本漢學界對戲曲小說持續關注，如青木正兒（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人，皆以戲曲小說作為中國文學重要的文類，後繼者持續研究，笹川之功不可不談。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1897）一書刊行，作為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著作的一種，也頗有開創之功，此書是真正符合中國文學史通史意味的第一本《支那文學史》。古城自上古至清代，論述中國文學，在書寫體例上，是以文體為分類，

---

<sup>2</sup>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2。

並施以訓點，使得日本讀者容易理解。此書於出版後受到歡迎，刊行後十年間再版數次，反映時人對於中國文學的關注。檢視古城貞吉文學史內容，可知其是以較為保守的角度處理中國文學，其關注明治日本的憂時儒者性格，顯現於文學史之中。在古城的文學史中，採以極大的篇幅寫儒家：自先秦時言孔子、為孔子弟子列傳等內容看來，反映與其他流派篇幅差異甚鉅的偏重，在論述五經時，仍是以孔子為主軸，闡篇幅研孔子與五經的關係。此種以儒家為中心的論調，貫串文學史全書，在論及各朝代時，古城亦常將儒學的發展至於篇首。與笹川臨風以研究趣味為出發的文學史不同，古城的文學史之中，常流露強烈的道德批判，對於文學家的生平與事功，皆有所關注，此無非是儒家經世致用文學觀的體現，亦為古城對明治日本的社會現狀，產生的種種寄寓。古城對於知識份子的抱負，有言：「士尚全才，務為實材實學……其朝夕所聞見而服習者，無一非所以為治當時之家國。」<sup>3</sup>其對中國文學的關注，亦是如此，藉由省察古代諸國，以借鑑明治日本，為「治當時之家國」而發。在破除階級制，逐漸近代化的明治日本，西化為當時的時代風氣，但是偏頗的政策產生某些社會問題，故古城藉由文學史提出對時代的看法，言：「雖然古今時俗不一，古制必不適於今，今制亦豈不優於古乎？」<sup>4</sup>，在他看來，西化的時風未必勝於以往，古典中國亦有值得取法之處。而中國這一「其人文開始，遠在五千年之前」的古老帝國，在文明上未必可以蠻荒視之，與明治時期部分知識分子的支那蔑視論，呈現極大的對比，而此乃古城與「東洋道德，西洋文明」的口號視角歧異的持論法。憂時的儒者藉由《支那文學史》體察明治日本，在政治與制度上，提出反思，表面上看似以中國最為研究重心，實為古城懷以儒家的濟世抱負，反思時事的寄寓之作。

在古城明治三十年（1897）親身遊歷中國之後，其《支那文學史》進行改版，也反映了思維的轉換。以漢學為背景的儒者古城，意識到所學的典籍中國已與現世中國割裂，因而去除文學史中的訓點，使得《支那文學史》歸於外國文學，不

<sup>3</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0。

<sup>4</sup>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頁 12。

再是由共通書面語所聯繫，國別邊界不明的文學。就其他的細部更動而論，古城於再版文學史的餘論中，介紹戲曲小說，進一步補充金石之學入內。

本論文以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之比較，理解優游文人與憂時儒者兩種作者典型，因兩部文學史作者性格的差異，成為文學史評述文學家與作品時有所差異的原因，同步影響書寫架構。笹川所注重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學性，以南北方人種性格不同，解讀作品風格的差異，並從優游文人之視角，著重作家作品與風格的評析，特別關注於戲曲、小說的發展。古城則始終著眼於文學家的道德性，常就文學家的生平事功進行道德評斷，於書寫單一朝代時，常以政治的治亂，儒學的流變作為起始，反映其儒者襟懷，與政治相連的文學觀。總體而論，笹川與古城之文學史著作，源於兩人性格的差異，於論述上有極大的不同，但內容上亦呈現時代的共性。無論是收錄內容上，同樣已盛清為時代下限，與明治時其所對應的晚清具有延遲性，或者成書動機中，具有理解我邦（日本）文獻，貢獻於將來日本論文學之意圖<sup>5</sup>，呈現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的特色。

## 第二節 未來研究展望

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數量繁多，本論文選取笹川臨風與古城貞吉作為主軸，對於其他作者之文學史著作未詳論。事實上，在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作者群中，仍有許多持續關注中國文學的研究者，比如藤田豐八、兒島獻吉郎、久保天隨等人，皆有數種文學史著作傳世，作者背景的差異於文學史如何呈現？是否對不同文類有所偏重？選錄之作家作品如何評判？皆為值得探究的主題。且單一作者為何於數年之間持續文學史之研究，不同著作中，是否具有文學觀的變化，可為日後筆者從事《支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議題。

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可視作一個整體，反映當時的整體研究氛圍。但

<sup>5</sup>笹川臨風等：《支那文學大綱》卷一（東京：大日本圖書，1897），頁5。

《支那文學史》的書寫並非終於明治，而是歷經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直至當代持續成書。著有《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之學者，有鹽谷溫（1878-1962）、鈴木虎雄（1878-1963）、青木正兒（1887-1964）、長澤規矩也（1902-1980）、倉石武四郎（1897-1975）等人，皆為專注於中國文學之重要學者，為何其人皆涉及文學史研究，此亦是可再申論的議題。此外，不同時代的文學史著作具有何種共性？與上一個時代的有何差異？皆為可擴充的研究範圍。自明治時期的《支那文學史》，至戰後的《中國文學史》，呈現了「題名」的改換，此現象與意識形態上的變化有何關聯？觸及何種政治與社會背景？其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又顯現於何種層面？皆可由文本研究為基礎，擴及社會層面探討的重要議題。

無論是就《支那文學史》的作者及書寫風氣，或論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內部書寫問題，仍有極大的空間可供展望。若將視野返回中國，亦可探究《支那文學史》與中國人所著《中國文學史》之關聯。自黃人、林傳甲於1904年分別寫成《中國文學史》以來，文學史著作持續成書，其中受到日人影響的著作甚多，1915年曾毅的《中國文學史》是襲自兒島獻吉郎的著作<sup>6</sup>，1926年顧實的《中國文學史大綱》多引日本學者之論述<sup>7</sup>，早期的《中國文學史》之內容體例，大抵效法日人所著《支那文學史》。若以中國學者所著之文學史為起始，考察與《支那文學史》之關聯，無論是就文學史觀的建構，或文體與作家作品的評選，皆可為中國文學史研究提供新的視野。由是可知《支那文學史》研究的未來展望，乃是橫跨中日兩國，可由單點擴展至整體的全面性研究。

---

<sup>6</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142。

<sup>7</sup>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頁133。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中文之部：

- 三宅正彥著，陳化北譯：《日本儒學思想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小林愛雄著，李煒譯：《中國印象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內藤湖南著，吳衛峰譯：《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天野郁夫著，黃丹青、竇心浩等譯：《大學的誕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王建：《神體儒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年。
-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台北：五南圖書，2012年。
- 全婉澄：《日本明治大正年間的中國戲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 加藤周一著，葉渭渠、唐月梅譯：《日本文學史序說（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 古城貞吉著，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
- 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 吳廷璆主編：《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 李漁著，單錦珩點校：《李漁全集》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李慶：《日本漢學史（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李慶：《日本漢學史（2）成熟和迷途》，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汪公紀：《日本史話 近代篇》，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
-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台北：學生書局，2002年。
- 岡千仞：《觀光紀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
- 阿部吉雄、相良亨、宇野精一著，許正雄譯註：《日本儒學史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倉石武四郎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北京：北京大學，2013年。

- 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馬哥東編：《日本詩話二十種（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文學史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
- 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
- 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67年。
-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陳弱水：《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台北：聯經出版社，2005年。
- 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中）》，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
- 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楊芾：《扶桑十旬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
- 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
- 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
- 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台北：華正書局，2011年。
- 劉予葦、趙建民主編：《日本通史》，台北：五南出版社，1991年。
- 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劉岳兵：《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
- 譚建川：《日本教科書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 日久之部：

- 三上參次、高津楸三郎、落合直文：《日本文学史》，東京：金港堂，1890年。
- 久保天隨：《支那文学史》，東京：人文社，1903年。
- 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上）》，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3年。
- 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0年。
- 大橋蘆洲、北稻香：《東京新詞》，東京：松柏堂，1875年。
- 山本重助編：《高青邱詩鈔》，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1879年。
- 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觀》，東京：創文社，2003年。
- 中根淑：《支那文學史要》，東京：金港堂，1900年。

- 木下彪：《明治詩話》，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富山房，1902年。  
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年。  
古城貞吉：《巡礼日記》，東京：古城貞吉自行刊行，1929年。  
古城貞吉等編：《肥後文獻叢書》，東京：隆文館，1909年。  
平山果、宮内貫一：《日本開化詩》，東京：中邨熊次郎，1876年。  
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学略史（上卷）》，東京：文學社，1887年。  
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史略史（上）》，東京：末松謙澄，1882年。  
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史略史（下）》，東京：末松謙澄，1882年。  
田岡嶺雲：《支那文學大綱》卷十〈高青邱〉，東京：大日本圖書，1899年。  
安井息軒：《辯妄》，出版地不詳：中西源八，1873年。早稻田大學電子資料庫

#### 照相本

- 成島柳北：《柳橋新誌二編》，東京：奎章閣，1874年。  
兒島獻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編》，東京：富山房，1909年。  
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東京：富山房，1912年。  
林泰輔：《支那上代史研究》，東京：光風堂書店，1927年。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東京：国光書房，1902年。  
笹川臨風、白河鯉洋編：《嶺雲文集》，東京：玄黃社，1913年。  
笹川臨風：《支那小説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大綱》卷三〈李笠翁〉，東京：大日本圖書，1897年。  
笹川臨風：《支那文学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  
笹川臨風：《時代と人物》，東京：春陽堂，1898年。  
笹川臨風等：《江戸と上方》，東京：國史講習會，1922年。  
森春濤編：《東京才人絕句》，東京：小江湖社，1875年。  
齊藤拙堂編：《高青邱詩醇》，東京：桂雲堂，1883年。

## 二、期刊論文

### 中文之部：

- 李群：〈早期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日本影響因素〉《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6卷2期（2009年5月），頁63-69。  
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2007年12月），頁45-66。  
郝蕊：〈試論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譯本《歷朝文學史》的動態〉《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Vol.9-1（2016年），頁1-15。  
黃霖：〈談談1900年前後的三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古典文學知識》，（2005年1月），頁44-50。  
趙苗：〈20世紀初期日本的中國文學史〉《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9卷3期（2010年5月），頁86-88。

### 日久之部：

- 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子部〉《斯道文庫論集》47集，2003年，頁239-318。
- 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史部（上）〉，《斯道文庫論集》37集，2002年，頁253-304。
- 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史部（下）〉，《斯道文庫論集》38集，2003年，頁353-393。
- 山城喜憲：〈永青文庫寄託坦堂文庫目錄稿 漢籍 經部〉，《斯道文庫論集》28集，1993年12月，頁229-344。
- 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期，2013年4月。
- 吉田悦志：〈笹川臨風的位置〉《大学史紀要》卷七，2002年12月。
- 杜軼文：〈古城貞吉と『支那文学史』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17卷71（2003年3月）頁389-409。
- 杜軼文：〈児島献吉郎の支那文学史研究について〉《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71（2003年3月）頁179-199。
- 杜軼文：〈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80（2008年3月）頁125-144。
- 杜軼文：〈藤田豊八の中国文学史研究〉《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卷73，（2004年10月），頁94-117。
- 陳瑋芬〈「斯文学会」の形成と展開〉《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国哲学論集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21) 86-100, 1995-12》頁92。
- 陳廣宏著，伴俊典譯：〈齋藤木の「支那文學史」講義録について -東京専門學校文學科成立初期の中國文學史講義〉《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 中国文学研究》，卷36，（2010-12），頁1-26。
- 錢鷗：〈羅振玉・王国維と明治日本学界との出会い—『農学報』・東文学社時代をめぐって〉《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97）（10月），頁84-126。
- 藤田大誠：〈明治国家形成と近代的国学構想--古典講習科の展開・終焉と國學院の設立〉《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卷40，頁100-139，2004年12月。

### 三、電子資料庫

Cinii 電子資料庫（CiNii Articles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

<http://ci.nii.ac.jp/>

早稻田大學古典籍電子資料庫（早稻田大学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

## 附錄

附表一：日本明治時期《支那文學史》相關著作出版表

西元	明治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出版地
1882.9	15	末松謙澄 (1855-1920)	《支那古 文學略 史》	文學社	東京
1892.2	25	兒島獻吉 郎(1866-1931)	《支那文 學史》	同文社	
1894.5	27	兒島獻吉 郎	《文學小 史》	漢文書院	
1895~ 1897?	28-30	藤田豐八 (1869-1929)	《支那文 學史》	東京專門 學校講義 錄	東京
1897.5	30	藤田豐八 (1869-1929)	《支那文 學史稿 先 秦文學》	東華堂	東京
1897.5	30	古城貞吉 (1866-1949)	《支那文 學史完》	東京經濟 雜誌社	東京

1897-1904	30-38	笹川臨風、白河鯉洋(1874-1919)、大町桂月(1869-1925)、藤田劍峯、田岡嶺雲(1870-1912)	《支那文學大綱》	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会社	東京
1897.6	30	笹川種郎(1870-1949)	《支那小說戲曲小史》	東華堂	東京
1898.8	31	笹川種郎	支那文學史	富山房	東京
1899-1905?	32-39	高瀨武次郎(1869-1950)	《支那文學史》	哲學館	
1900.9	33	中根淑(1839-1913)	《支那文學史要全》	東京金港堂	東京
1902.12	35	古城貞吉	《支那文學史》(訂正再版)	東京勸學會藏版富山房	東京
1903.11	36	久保天隨(1875-1934)	《支那文學史》	人文社	
1904	37	久保天隨	《支那文學史》	早稻田大學講義錄	東京

1907	40	宮崎繁吉 (1871- 1933)	《支那近 世文学 史》	早稲田大 学出版部 蔵版(台 灣大學有 藏)	東京
1907	40	久保天隨	《支那文 学史 (上)》	早稲田大 学出版部 蔵版	東京
1909	42	兒島献吉 郎	《支那大 文学史古 代篇》	富山房	東京
1910	43	久保得二	《支那文 学史 (下)》		
1912.7	45	兒島献吉 郎	《支那文 学史綱》	富山房	東京
不明		松平康國 (1863- 1945)	《支那文 学史談》	早稲田大 学出版部 蔵版	

本表依據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sup>1</sup>一文増補而成。

<sup>1</sup> 井上泰山：〈日本に於ける中国文学史編纂の歴史〉《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6期，2013年4月。



附表二：笹川臨風、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篇章架構對照表

作者	笹川臨風	古城貞吉
分期	總說	序論
春秋以前	總說 第一期 春秋以前的文學 總說 一、書 二、詩 三、易	序論 第一編 支那文學的起源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第二章 書契的起源與文字的構成 第三章 唐虞三代的沿革及開化一斑 第四章 周代的學制 第五章 諸子時代以前的文學
戰國	第二期 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 總說 一、孔子與老子 二、孟子與莊子 三、屈原 四、韓非子	第二編 諸子時代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儒家 第三章 道家 第四章 墨家 第五章 法家 第六章 名家 第七章 兵家 第八章 雜家 第九章 賦家
兩漢	第三期 兩漢文學 總說 一、賈誼與揚雄 二、司馬遷與班固 三、司馬相如 四、詩與樂府	第三編 漢代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議論體之文 第三章 敘事體之文 第四章 詔敕、上書及書牘體之文 第五章 漢代的韻文
魏晉南北朝	第四期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 總說 一、建安的詞人 二、陶淵明 三、南北朝	第四編 六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六朝的韻文 第三章 六朝的散文 第四章 六朝詞人傳
唐代	第五期 唐朝文學 總說 一、初唐的詩 二、李白與杜甫	第五編 唐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唐朝的儒學 第三章 唐朝的詩

	三、韓與柳 四、白樂天 五、晚唐的詩	第四章 唐朝的散文 第五章 唐朝的佛教文學
宋朝	第六期 宋朝文學 總說 一、蘇東坡與其前後 二、陸放翁	第六編 宋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宋朝的儒學 第三章 宋朝的散文 第四章 宋朝的詩
金朝 元朝	第七期 金元的文學 總說 一、元遺山 二、小說與戲曲的發展	第七編 金元間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金朝的文學家 第三章 元代的文學
明朝	第八期 明朝文學 總說 一、高青邱 二、李何七子與李王七子 三、小說與戲曲	第八編 明代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明代的散文 第三章 明代的詩
清朝	第九期 清朝文學 總說 一、詩人與文章家 二、小說與戲曲及批評	第九編 清朝的文學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清朝的古文家 第三章 清朝的詩家
		餘論

附表三：坦堂文庫史部藏書表格

類別	書名	版本
正史類	《史記》	清光緒十八年刊武林石簡齋翻清乾隆武英殿刊本
	《前漢書》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齊召南等撰 清陳浩等校
	《漢書補注》	姚惜抱先生前漢書評點一卷 清王先謙補注
編年類	《竹書紀年》	清洪頤煊校注 清嘉慶十一年平津館刊
	《司馬溫公經 進稽古錄》	宋司馬光撰 寬政十二年刊後印 江戶尚友堂岡村庄助
紀事本末類	《皇清開國方略》	清阿桂等奉敕撰 清光緒十三年刊廣百宋齋鉛印
	《平定粵匪紀略》	清杜文瀾撰清光緒七年刊
	《各國通商始末》	清王之春編 彭玉麟校 清光緒二十一年刊 寶善書局石印
別史類	《路史》	宋羅泌撰 明陳子龍等校 明刊周防國明倫館
	《元朝秘史》	元闕名者撰清李文田注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 史學齋編譯石印書局
雜史類	《國語》	校勘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一卷 吳韋昭解 清嘉慶五年刊 覆影鈔宋明道二年刊本
	《國語翼解》	清 陳瑒撰清光緒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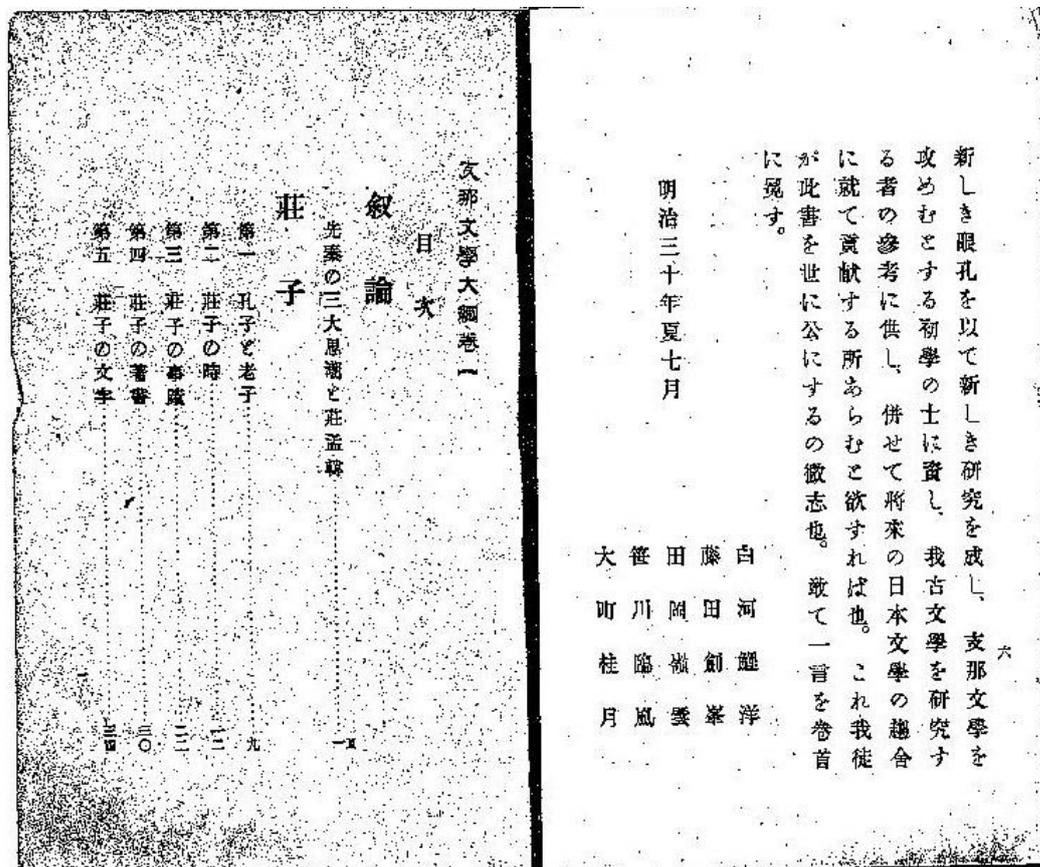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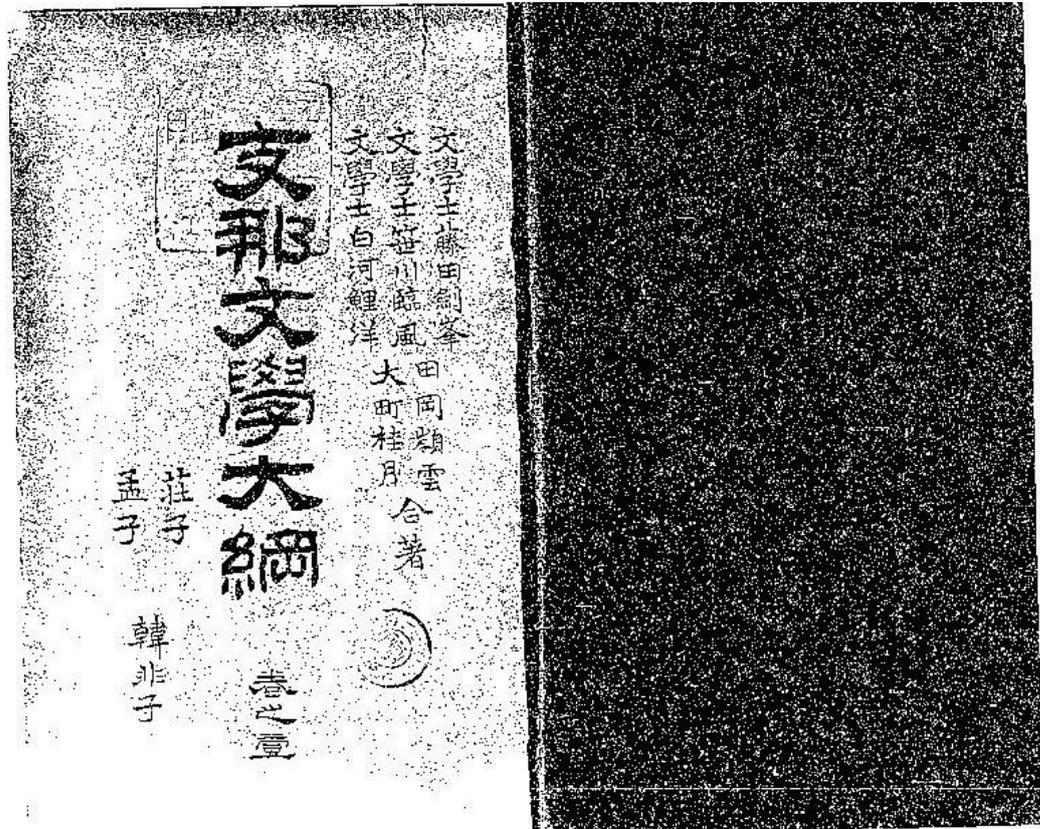
	《戰國策》	漢高誘注 宋姚宏校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 盧氏雅雨堂
	《明季復社紀略》	清陸西儀撰 清鄧實校 光緒三四年刊
	《記載彙編》	清闕名者編 清末刊鉛印
	《明季稗史彙編》	清闕名者編 清光緒二二年刊
載記類	《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	民國謝興堯編民國二十七年序刊
史鈔類	《歷代帝王年表》	清齊召南編阮福續編 清光緒十二年刊
	《二十史朔閏表》	民國陳垣撰民國一四序刊
傳記類	《陶靖節年譜》	民國古直撰
	《聖蹟圖》	清闕名者撰
	《求闕齋弟子記》	清王定安撰光緒二刊
總錄	《碑傳集》	清錢儀吉編黃彭年校清光緒十九刊
	《續碑傳集》	清繆荃孫編清宣統二刊
	《國朝名臣言行錄》	清董壽編清光緒二九刊
	《儒林宗派》	清萬斯同撰清宣統三刊翻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國朝先正事略》	清李元度纂 許時庚重校 清光緒十二刊
史評類	《史通通釋》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注 清光緒二五刊
	《中國歷史研究法》	民國梁啟超撰民國十一年刊
	《中國史部目錄學》	民國鄭鶴聲撰民國十九年刊
	《古史新證》	清王國維撰民國二四年刊
	《古史辨》	民國顧頡剛編民國十五年刊

外國史類	《續萬國史綱目》	清張茂綱等編 清光緒二九刊
	《遠東史》	John.J.Heerens 民國張立志編校 民國二四刊
地理類	《太平寰宇記》	清闕名者撰清光緒八刊
	《中國近世地理志》	清王統亨編清光緒三一刊
	《中國本國地理參考書》	清馬晉義編清光緒三一年刊
	《吉林地誌》	民國魏聲猷撰民國二刊
	《長沙縣志》	清張廷珂等編清同治十刊
	《學海堂志》	清林伯桐撰陳澧續撰
	《燕京訪古錄》	民國張江裁撰民國二二序刊
	《中國西部考古記》	法國色伽藍撰民國馮承鈞譯民國十九刊
地圖	《皇朝直省地輿全圖》	清闕名者編清光緒二一刊
	《中華最新形勢圖》	民國屠思聰撰民國二十刊
	《中國地名大辭典》	民國劉鈞仁撰民國十九刊
	《中華全國風俗志》	民國胡樸安等編民國十二刊
時令類	《清嘉錄》	清顧祿撰安原方齋校點天保八序刊
職官類	《歷代職官表》	清黃本驥編王廷學校清光緒八刊
	《福惠全書》	清黃六鴻撰小畑詩山譯並校點嘉永三序刊
政書類	《會要四種》	清闕名者編清光緒十刊
	《九通通》	清劉可毅編清光緒二八刊
	《漢代風俗制度史》	民國瞿宣穎撰民國十七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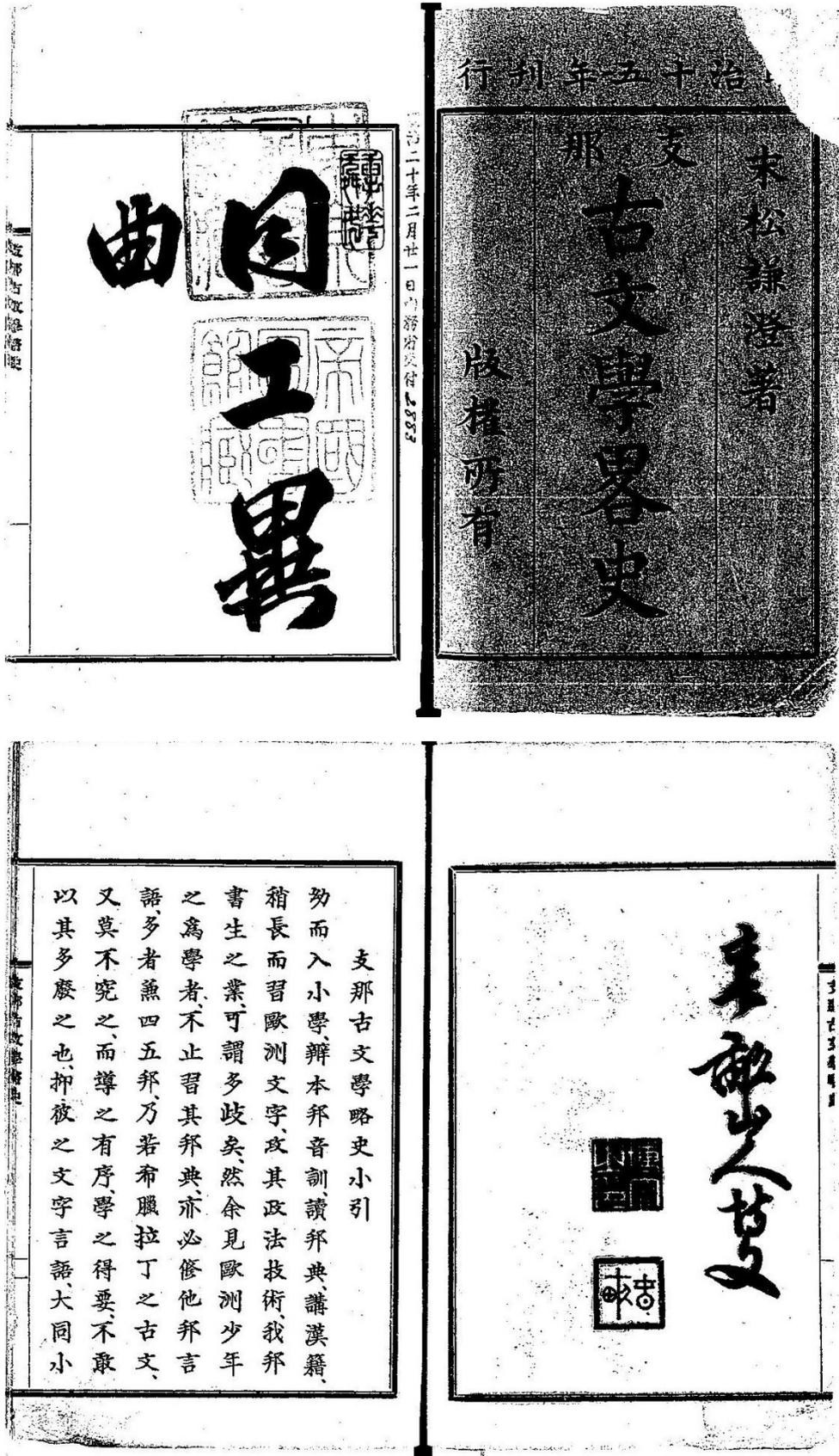
	《校邠廬抗議》	清馮桂芬撰王韜校 民國十七刊
	《中國政治思想史》	民國陶希聖撰民國二一年
詔令奏議類	《聖諭像解》	清梁延年撰清光緒五刊
	《李肅毅伯奏議》	清李鴻章撰章洪鈞吳汝倫編 清光緒刊
	《南海先生四上書記》	清康有為撰清光緒二五序刊
	《諫止中東和議奏疏》	清文廷式等撰闕明者編清光緒二一刊
	《道光參年癸未科第參假第壹明及第對策》	清汪封涓撰清道光三刊
目錄類	《千頃堂書目》	清黃虞稷編 張鈞衡校
	《文淵閣書目》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
	《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稟》	清邵晉涵撰馬用錫校
	《北平圖書館善本目錄》	民國趙萬里編民國二二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清瞿鏞編清光緒二四跋刊
	《皕宋樓藏書志》	清陸心源撰清光緒八刊
	《靜嘉堂文庫觀書記》	民國傅增湘撰民國二實勘
	《八千卷樓書目》	清丁立中編民國丁仁校民國一二跋刊
	《書目問答補正》	清張之洞編民國范希曾補正民國二刊
	《書林清話》	清葉德輝撰民國九刊
	《中國文獻學概要》	民國鄭鶴聲鄭鶴春撰民國一九刊
	《書舶庸談》	民國董康撰民國二八刊
	《西清古鑑》	清梁詩正等奉敕撰清光緒一四刊
	《商周文拾遺》	清吳東發釋注民國刊
	《陶齋吉金錄》	清端方撰清光緒三四刊
	《貞松堂集古遺文》	清羅振玉撰羅福頤摹寫民國六序刊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民國郭若沫編昭和十刊
	《金文編》	民國容庚編民國一四刊
	《殷墟文字類編》	清羅振玉撰商承祚編並補民國十二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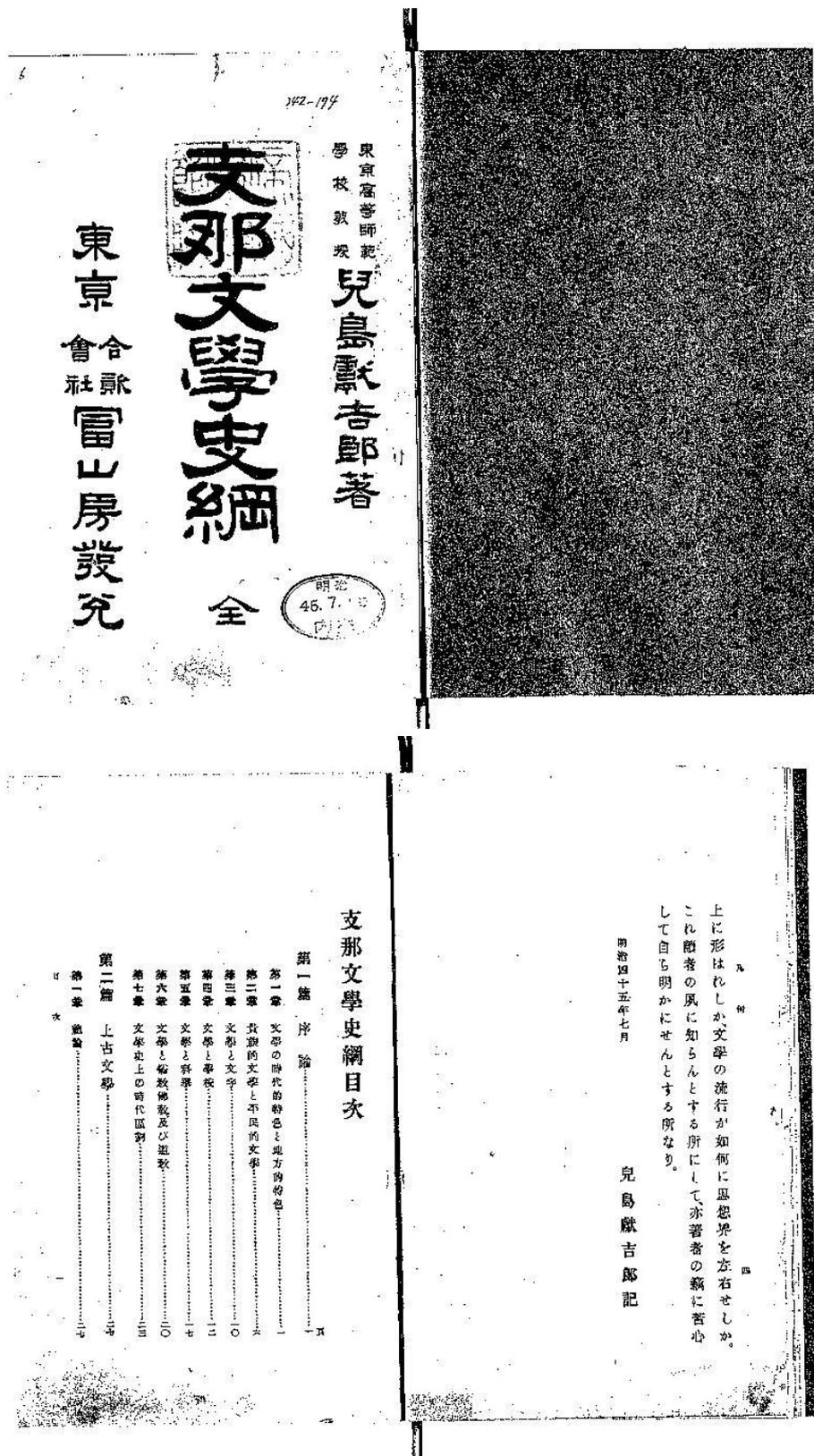
附圖二：笹川臨風等合著《支那文學大綱》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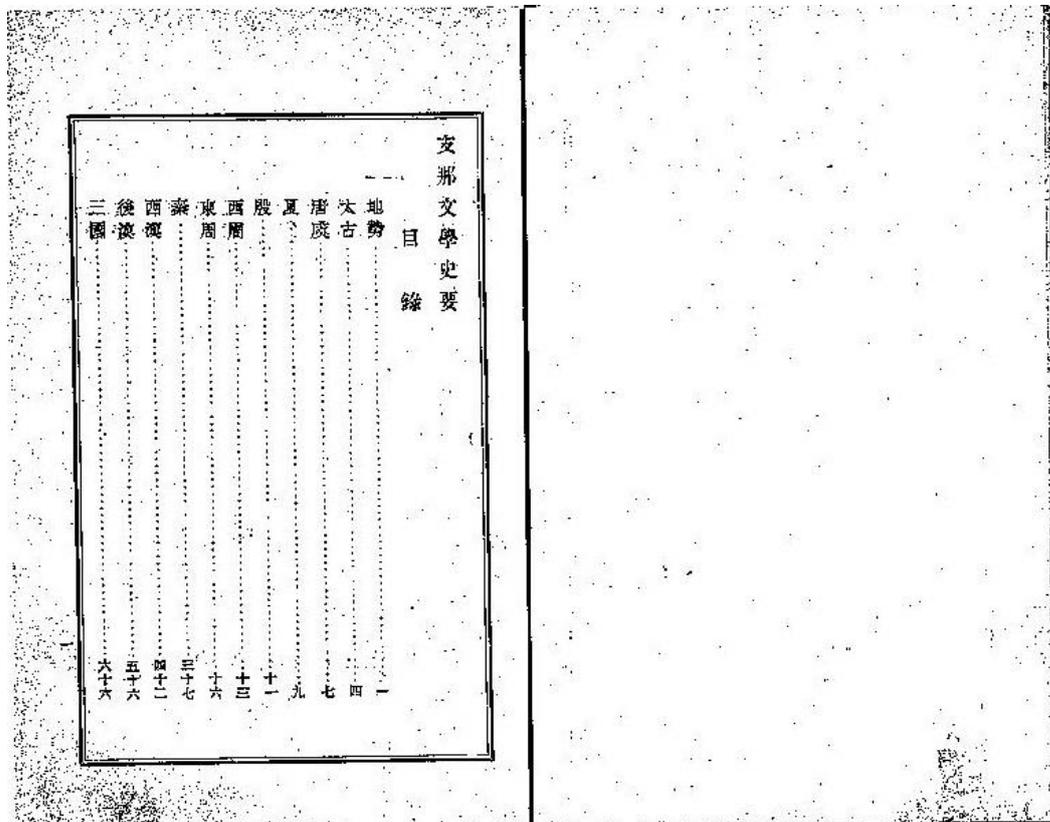
附圖三：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書影



附圖四：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書影



附圖五：中根淑《支那文學史要》書影



附圖六：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書影

